

今天

NO.1/2019 总第121期



《今天》编辑部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北 岛 西 川 芒 克 刘 禾 汪 晖

李 陀 宋 琳 林道群 格 非 徐 晓

黄子平 黄 锐 韩 东 韩少功 鲍 昆

鄂复明 翟永明

主 编 北 岛

执行主编 肖海生

编辑部主任 天 水

海外通讯编辑 陈力川 田 原

小说编辑 韩 东 杨庆祥

诗歌编辑 宋 琳 廖伟棠

评论编辑 杨晓帆 敬文东

散文编辑 郭玉洁

艺术编辑 鲍 昆

封面设计 李晓军



目录

长诗及评论

北岛	歧路行(10-18 章)	3
杨立华	《歧路行》新九章试读	34

写作新标

韩东	编者言	43
陈鹏	写小说，需要“难度”	44
陈鹏	向死之先	46

骆一禾纪念专辑

宋琳	“星核的儿子”	93
陈东东	圣者骆一禾	98
昌耀	记诗人骆一禾	132
于坚	世界的血	135
袁安	所有星光都是在赶赴生者的葬礼	143
张珠	从一封关于诗歌的书信开始	150
林贤治	悼一禾	180
朱正琳	老家伙与三剑客	185
	骆一禾诗选	193



寻访“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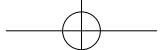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江雪	“星火”寥落，而我在寻找	221
江雪	顾雁：缄默的“星火”灵魂	235
江雪	谭蝉雪：星火爱情，于斯飘零	259
江雪	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273

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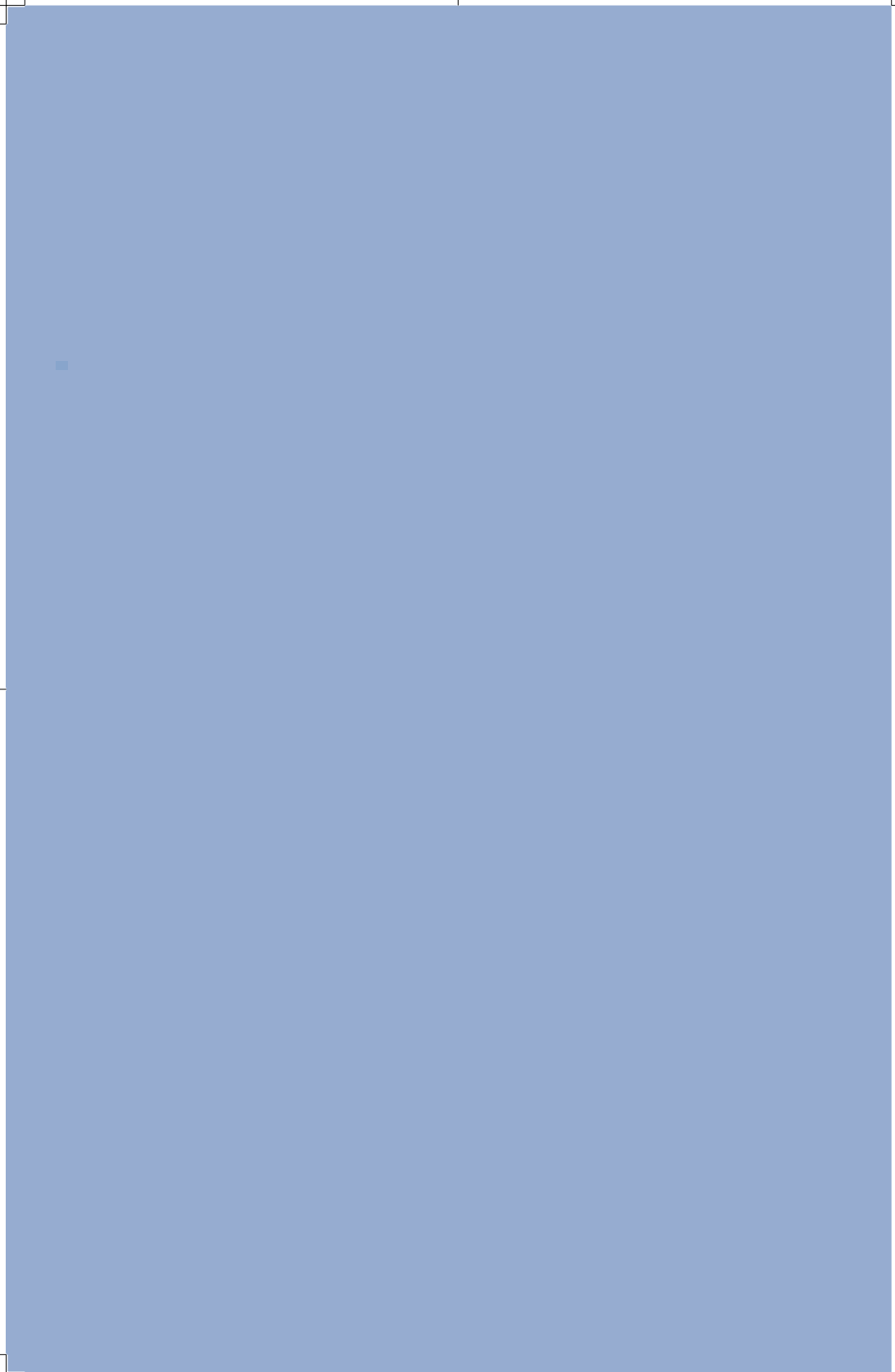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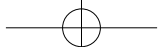
顾晓阳	北京野史录	297
-----	-------	-----

艺术

闽丽柯、苏伟	艺术与集体记忆	333
牧阳	后工业化时代的大批判	340



长诗及评论





歧路行

(长诗选 10-18 章)

北岛

十

1989年8月上旬，陈迈平夫妇开车把我捎上，早上从纽伦堡出发，
傍晚抵达布拉格市中心。

晚八点 一组组大小齿轮
紧紧咬合在一起
所有钟楼来自冬天的心
伏尔塔瓦河解开蓝丝绒包袱 ——
理性组装着国家的记忆
在雾中迷失的街灯走向我
两个时钟走得不一致
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的¹

卡夫卡是寒鸦²
暮色中 翅膀的剪影 ——
从他父亲的商号公函信封
到老城广场店铺的招牌

1 引自卡夫卡的格言。

2 卡夫卡捷克文 Kafka，原意是寒鸦。



1883年 我出生没有结论
却在最后的序言中³
女歌手约瑟芬吹着口哨消失
难道老鼠家族追随风暴

1889年 我出生的房子
毁于大火 搬到片刻⁴居民楼
三个妹妹出生在这儿
她们在纳粹集中营死去
那小行星为我命名⁵
罗马人把基督钉在天空
导游为游客拉开故居的布景
包括陈迈平夫妇和我

1989年 我们穿越大火
在石头开花中突围
内与外 —— 东方的智慧
中国长城建造时⁶
按“分段而筑”计算
石头建造官僚体系
复制长城复制奥匈帝国

3 最后一篇短篇小说《约瑟芬，女歌手和老鼠民族》。

4 名叫“片刻”（At the Minute）的楼房。

5 为纪念这位独一无二的作家，1983年发现的小行星3412以“卡夫卡”命名。

6 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



复制太阳之城⁷

在主人公K与城堡⁸之间
向下也是向上的路
落日——奥匈帝国的盾牌
局外人指向夜的逻辑
我在未完成的书中留下
结尾：在K弥留之际
城堡的信使跑过来
任用他为土地测量员⁹

在《给父亲的信》¹⁰中
我承认，我们在互相斗争
但是有两种斗争形式
一种骑士式的斗争
还有一种是小虫的斗争
为生存而吸血的斗争
在父亲巨大的背影中咯血
沉默戴上风暴的面具

7 《太阳城》是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 1568-1639）的对话体游记，首次出版于1623年。

8 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城堡》。

9 引自Max Brad的《卡夫卡传》，卡夫卡与传记作者谈到《城堡》结尾的设想。

10 1919年卡夫卡在疗养院咯血执笔《写给父亲的信》。



《手枪评论》¹¹的编辑马丁
忙于那封帝制复辟的联名信¹²
这是一次斗争的描述¹³
人们匆匆穿过时代的门框
1993年夏《手枪评论》
邀请这些《今天》的朋友们¹⁴
——从午夜到破晓的斗争
消耗了青春的油灯

2000年复活节前夕
在老城广场集市兜售春天
零从空篮子里变成彩蛋
桑塔格和我一起共进晚餐
霓虹灯与纸月亮调情
半夜迷路 苏珊转向我：
没人再想恢复旧制度
可要的就是这种空白吗？¹⁵

11 《手枪评论》(Revolver Review) 原为捷克地下文学刊物, “天鹅绒”革命成功后成为正式刊物。马丁(Martin)为编辑之一。

12 “天鹅绒”革命前夕, 马丁等正在发起为前国王的侄子上书的联名信, 但我反对帝制拒绝了。

13 卡夫卡的随笔《一次斗争的描述》。

14 应邀《今天》在欧洲的编辑和朋友, 有陈迈平(万之)、张枣、宋琳、北岛和李欧梵等。

15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 - 2004), 美国作家和评论家。我的随笔。2000年复活节前某天晚上, 我和桑塔格在一起小聚, 对话中来自桑塔格的原文(引自我的随笔《卡夫卡的布拉格》)。



十一

不如相忘于江湖
为了干涸的源泉¹⁶

奥斯陆 1990年5月
《今天》¹⁷永远是此刻¹⁸
十个人带来十面风
十个名字在测量深渊
十个食指触摸雷电
十个指纹公证的是风暴

狂风吹着词的裂缝

克林肖学生城¹⁹
我们为什么聚在一起
脚步追时针追秒针
军队逆转地球
为某个手势阻拦风暴

16 引自《庄子·大宗师》原文：“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17 《今天》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头一份非官方文学杂志，1978年12月23日创刊，1980年底被迫关闭。1990年5月，在奥斯陆参加《今天》复刊的筹备会议，包括陈迈平、高行健、刘索拉、老木、李陀、孔捷生、杨炼、查建英、徐星和北岛。当年《今天》复刊号当年8月在奥斯陆问世，26年过去了，从复刊至今一直按期出版。

18 在《今天》创刊号油印封面上注明英文 The Moment（此刻）。

19 奥斯陆大学学生城地名 Kringsjå Studentby。



为什么聚在一起

从风暴眼中出发

盲人领着盲人

在事故和故事之间

在新大陆和旧地图之间

文学的意义在哪儿

李陀²⁰用挪威刀比划

刀尖戳在桌面上

直到另一个词的边界

远征 —— 为挣脱身影

问路 —— 寻找家园

阅读 —— 在镜中迷失方向

诗歌 —— 为河流送葬

暴君 —— 变成咒语

历史 —— 时光即废墟

为了拧住水龙头歌唱

高行健²¹的镜片闪烁

20 李陀（1939—），文学评论家，作家，主要作品《雪崩何处》等。

21 高行健（1940—），作家，戏剧家，画家，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车站》等。



顾左右而言他
那箭头永远指向流亡
隐身于词的林莽
他留下剧本《逃亡》²²
为复刊号做广告

打开狼与狼的空间

挪威春天的阳光
照亮古老的小木屋
沿楼梯合影：九个人
迷上深渊的微笑
我们面对着死亡镜头
镜框以外是记忆

钟声忽明忽暗

还有叫外号老木²³的人
他侧面低头走神
聆听暴风雨的回响
从天安门广场的舞台
他拐进巴黎街头
成为追随狗的流浪汉

22 《逃亡》剧本发表在《今天》复刊号。

23 老木，原名刘建国（1963—），八十年代中期他主编《新诗潮诗集》（内部刊物），担任《文艺报》编辑。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流亡到巴黎，多年在街头流浪。据说他最近返回家乡。



为青春追逐颜色

在奥斯陆中心港湾
从栈桥通向无梦的深处
赤脚舔着甲板的海盐
我们一起喝啤酒
此地也是彼岸
低吟应和伤心的歌

十二

1978 年，北京之秋
命运女神用手语引领我们
无数拳头擂动西单墙
擂动那苦难的无言之门
乌鸦和文字一起叫喊
回声来自我们的心

从诞生到二十九岁的门槛
我是混凝土工我是铁匠²⁴
我是地与火的兄弟
为了珊珊的灵魂悲泣²⁵
我逆流向死而生

24 我当过建筑工人（1969-1980），包括六年混凝土工和五年铁匠。

25 赵珊珊（1953-1976）是我妹妹，1976 年 7 月 27 日在湖北襄阳附近的蛮河中救人牺牲，年仅 23 岁。



穿过新与旧的波浪的坟头

狗的鼻子遇上政治
空谈季节 —— 为花朵开放
为洗刷无罪的天空
—— 飞鸟吐掉瓜子皮
种子在日夜的裂缝中生长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²⁶

在那棵老杨树的荫底下
黄锐、芒克和我²⁷
半瓶二锅头半瓶暗夜
酒精照亮绿色胆汁
为暗夜掌灯共同击掌
听太阳穴的鼓手

拉开抽屉 —— 死者活着
影子与影子在决斗
拉开抽屉 —— 手稿满天飞
难以辨认他者的身份
当身穿便衣的无名时代
正窥视门后的锁孔

沿着 1901 年的琴键 追上

26 1978 年 12 月 23 日,《今天》创刊号发刊词的第一句。

27 1978 年 9 月下旬,三人在黄锐家的小院,共同商量文学刊物的可能性。



拉赫玛尼诺夫的手指²⁸
在钟鼓楼附近的小窝棚²⁹
我们正围着裸灯旋转
黑胶唱片不断重放
淹没 1978 年的文学争吵

流星的大锤敲打着
日子 —— 直到太阳
在深夜的大海中淬火
是的我们一无所有
共同啜饮《罗亭》³⁰的泪水
—— 为了自由献身

沿新街口外大街骑车
在流水中刻下的青春：
我们俩互取笔名
猴子摇身一变 ——
他是芒克，我是
北方之海沉默的岛³¹

28 《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俄罗斯的作曲家、指挥家及钢琴演奏家拉赫玛尼诺夫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 1901 年。

29 张鹏志的家，位于北京钟鼓楼附近。在这里，《今天》创刊前多次举办编辑工作会议。

30 《罗亭》是俄国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

31 在创刊号前互取笔名。姜世伟的外号猴子，我按英文谐音取名芒克；我的笔名是芒克取的，在《今天》二十周年在东京的纪念活动，日本记者问，芒克终于解释笔名的含义，即“北方的海中沉默的岛”。



数数红绿灯的眼睛
迎来无数的翅膀
幸运的是不幸中书写
哦天空的读者——
让失去记忆的山脉流动
让鸟路勾勒大地之歌

一张过时的北京地图
在城乡结合部某个盲点
冰下是细小肮脏的亮马河³²
温暖的大雪覆盖此刻——
五个多变而折叠的身影
从油印机翻过一夜³³

十三

另一个男孩拼世界版图
语言有另一种颜色
我与影子共饮另一酒杯
和情人一起在另一张床出海
寒流抵达另一港口

32 北京河名。陆焕兴当年租的农民房，大约仅六七平米。这是《今天》杂志诞生的地方。

33 1978年12月22日《今天》杂志诞生，12月23日和24日分别张贴在北京公共场所。在所在地印制三天两夜，包括陆焕兴、芒克、黄锐、陈加明和我。



我手中放飞另一封信

奥斯陆 斯德哥尔摩
奥尔胡斯 哥本哈根
在北欧变幻莫测的天空下
为了寻找另一个太阳
品尝糖或盐或砒霜
大雪絮语是暴君的承诺

博鲁姆³⁴，我的法官³⁵
引领我——厄运另一个影子
在古老的死亡地图³⁶中
寻找诗歌的诞生
我俩紧紧挤进小电梯
——下降，但没有地狱

在哥本哈根的法国餐厅
侍者预约另一个日出
打开地下的阳光的红酒
他吞吐雪茄好像火车头
右耳垂的金属大耳环
在梦中的雾中一闪一闪

34 鲍尔·博鲁姆 Poul Villiam Borum (1934-1996)，丹麦作家、诗人和评论家。

35 博鲁姆以严厉评判北欧诗歌的丹麦报纸的专栏出名，据说他是诗歌的“法官”。

36 他家有私人诗歌图书馆，约有五万册多语种诗集（参考我的散文《鲍尔·博鲁姆》）。



是的，我睡着了
在桌子之间或大陆的距离
失眠是永恒的另一向度
镜中有乡愁的王国
中文 —— 流亡的北极光
公鸡练习破晓

沿酒精的高度攀登
闪电通向树根的祖先
让木柴陈述另一种火焰
见证的是囚禁的热情
在白纸写下第一行
当大雪的罢工在进行中

奥尔胡斯是我另一个故乡
命运每天敲我的门
我散步在每棵树后转身
病人们等待太阳升起
在海边留下一个个空椅子
我向摇滚乐警报报到

1990年8月4日
我在蓝房子留宿过夜
托马斯³⁷弹奏波罗的海³⁸

37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Tomas Tranströmer (1931-2015)，瑞典诗人，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38 《波罗的海》是特朗斯特罗默的唯一长诗，其中提到中风的预言。



按着某个黑键但没有声响³⁹

猫头鹰整夜号叫

遇见我 —— 另一个梦游者

向大地守夜人致敬

新世纪加上另一个早晨

托马斯带我采蘑菇

下雨 —— 他穿过森林领路

用军用小刀剥蘑菇

有的连忙吐掉：有毒⁴⁰

十四

蝉的北京 四面楚歌

那是旧梦的暴民

风沿着磨刀石的方向

垂柳顺从朕的意志

沿中轴线⁴¹贯穿四九城⁴²

39 1990 年 12 月，特朗斯特罗默中风，从此失去语言能力。

40 我和托马斯夫妇的“蓝房子”过夜（参考我的散文《蓝房子》）。

41 北京中轴线始于元代，南北贯穿明清宫城，具有左右对称的特点。

42 四九城是指皇城的四个城门、内城的九个城门的总代称。皇城四门分别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而内城的九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



从什刹海的后门桥⁴³出发
我追赶断了线的风筝
哨鸽抖开整匹蓝天
群山涌向瓦顶的排浪
让后海⁴⁴淹死太阳
鱼群吞噬水下的街灯

幽灵引领漕运的终点
鸦片馆 漩涡之夜
一盏盏灯笼迎面而来
太监和丫环们渐渐消失
野猫沿着夜拾级而上
五更寒 钟声⁴⁵变成晨光
另一个朝代醒来

进入胡同迷宫的中心
我学会蝓蝓的口技
争其王位 在百花深处⁴⁶

43 什刹海后门桥，原称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在水陆的切线点。此桥始建于元代 1285 年，是元大都城内通惠河漕运的终点。这是元代重臣刘秉忠（1216-1274 年）按设计的切线点。

44 后海是北京什刹海的组成部分，13 世纪元大都规划设计的基本项目之一，当时是漕运的终点。

45 北京的钟楼在鼓楼以北一百多米处，是中轴线的北端点。始建于元九年（1272 年），后毁于战火，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与鼓楼一起重建，成为钟楼，但不久后再次被毁。清乾隆十年（1745 年），奉旨重建，两年后竣工。这是中国现存最大最重的古代铜钟，有钟王之称。

46 百花深处是北京胡同名。当年是最重要的蟋蟀集市。



蟋蟀王高歌一曲
我开牙⁴⁷而败下阵来
在梦中的房顶上奔跑

从黑板上擦掉日子
粉笔末 老师头发变白
电铃声打断梦游人——
一排教室与火车头挂钩
新的一课是阶级斗争⁴⁸

冬夜——母亲的棉被
沿针脚是我思路的虚线
瞄准的是纸叠的雁行
起笔从左直到云的南方
烟囱拐脖抵抗西北风
我蟾蜍的棉鞋⁴⁹蹦跳
解冻的是绿色的信号

到节日焰火的对岸去
风卷红旗的河流
影子在行动 追上山河
高举父辈们的火把

47 斗蛐蛐的术语。

48 1962 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49 童年记忆中，我唯一的棉鞋在开春前脱开鞋底。



追上雷与沉默的拳头
如手掌天翻地覆

——随时准备着
少先队面向太阳宣誓
星星正敲响军鼓
我从口吃加入合唱
脊椎拔节般成长
我用橡皮任意地涂改
所有多余的日子

空行 —— 请等等
上个世纪如隔岸观火
回放的是折叠时刻 ——
狂风正挣脱门框
闪电的鞭梢抽打鬃毛
轭下是奔流的土地

门牙嘶嘶吐出革命
我肾上腺素急升
战歌加上抒情的翅膀
这是十七岁的战争
用耳朵吹响号角



十五

一千二百六十年⁵⁰的流水
向东 长江一号豪华游轮
追随杜甫 —— 从重庆到奉节
从甲板上推后群山
多少风云罩住一盏渔灯
国破山河在⁵¹ ——

白帝城码头 一级级石阶
登天 向悬崖承诺
杜甫一家在客堂⁵²落脚
失眠 —— 他投下我的身影
从鸟巢孵出新的月亮
我倾听他诗的心跳

夔门⁵³打开纸上激流
艄工如笔站立在浪头
峡中丈夫绝轻死⁵⁴
当浊酒遇上多病之杯

50 杜甫 766 年暮春抵达白帝城，我在 2016 年 5 月沿长江乘游轮，相隔 1260 年。

51 杜甫的《春望》。

52 杜甫在夔州（766-768）总共居住了一年十个月，居住了五个住处，客堂是夔州的第一个家。

53 在夔门入口处，是长江三峡的西大门，峡中水深流急，素有“夔门天下雄”之称。

54 杜甫的《最能行》。



我的晚风吹来杜甫的白发
帆——回首忆当年

744年初夏 在陈留⁵⁵
杜甫与李白一见如故
入秋 高适⁵⁶呼啸而来
三人醉卧在天空下
相别于兖州⁵⁷城东
李白赠杜甫——寄南征⁵⁸

君不见盛世山河改
——高峡出平湖⁵⁹
皇帝梦淹没白帝城
诗从西阁窗口⁶⁰放飞鸥群
我沿杜甫记住的小径
在古城墙脚晒太阳

一阵阵狂风何处而来
杜甫一步步登高

55 陈留，在开封附近。

56 高适（702？-765）唐代诗人。

57 袁州，现为济宁。

58 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最后两句是“思君若汶水 / 浩荡寄南征”。

59 引自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三峡大坝是李鹏（1928年-）主政建成的。

60 杜甫在夔州的住处之一。这是夔州诗中的高峰，诸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和《偶题》等。



在白帝庙高台望长江
这是 767 年重阳节
我喘息——他咳嗽
把狂风撕成山河碎片

萧萧 风急 悲秋 下
猿啸 天高 渚清 鸟飞
回 多病 登台 潦倒
沙白 长江 浊酒 滚滚
来 繁霜 苦恨 百年
独 新停 万里 作客

那些词语被狂风召回
转瞬间 头颅吐出小草
他脚下踏出平仄路
我听到他应和的回声——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⁶¹

那溜进暮色的孤狼
并不是为了明天
不同的时刻汇成河流
波浪复制着波浪
我追赶杜甫的背影——
焚烧多少王朝的太阳

61 杜甫的《登高》，写于 767 年重阳节。



768年正月出发
在夔州一年另十个月
杜甫买不起那大船
幽灵在夜色掌舵
目送出三峡进平原 ——
天地一沙鸥⁶²

十六

而塞纳河才是流动的盛宴⁶³

向城堡的里尔克致敬
他在罗丹的可塑的阴影中
学习孤独，为万物命名
是在天使的行列中倾听我的怒吼⁶⁴
呼啸的城堡 钟舌敲响 ——
倾听那颗动荡的心
逻各斯 —— 他一生的时间
写在上帝之死的生路上
—— 玫瑰，纯粹的矛盾⁶⁵

62 杜甫的《旅夜书怀》，写于768年早春离开夔州的途中。

63 海明威的随笔集《流动的盛宴》。

64 引自里尔克的长诗《杜伊诺哀歌》的首句。

65 引自里尔克的墓志铭。



向云中的茨维塔耶娃⁶⁶致敬 ——
追随爱情 —— 永远的异乡人
从心中放飞一对白鸽
新的世纪 —— 黄昏纪念册⁶⁷
她聆听死亡的心跳
时差：巴黎 —— 莫斯科
风中耕犁 —— 俄罗斯母亲
长夜挣脱闪电的链条
星子的规则，花朵的方式⁶⁸

向太阳的巴尔蒙特⁶⁹致敬 ——
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太阳
和蓝色的地平线⁷⁰
在革命第二天早上
在太阳歌手和午夜暴君之间
他保持母语的尊严
吻别土地 —— 因贫困而富有
拄着白银时代⁷¹的手杖
红头发的火炬变成灰烬

66 玛琳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1892—1941），俄罗斯女诗人。

67 茨维塔耶娃的第一本诗集《黄昏纪念册》，出版时年仅 18 岁。

68 茨维塔耶娃的诗《诗歌在生长》。

69 巴尔蒙特·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Бальмонт 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1867-1942），俄罗斯诗人。他一生执著于太阳崇拜，自称为“太阳的歌手”。

70 引自巴尔蒙特的诗《我们将像太阳一样》。

71 白银时代，是指俄罗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文学，比较公认的时间段是 1890 年-1921 年。



向苦难的巴略霍⁷²致敬 ——
印第安血液来自安第斯山脉
我出生的那一天，上帝正好生病⁷³
为花的暴动而镣铐入狱
在盾与矛的对抗中
空酒杯斟满西班牙的血
疯狂的月亮穿越墓地
我将在暴雨中的巴黎死去
那天早已走进我的记忆⁷⁴

向石头开花的策兰致敬 ——
他吹灭漫天的星星
手艺人释放创造的闪电
淹死在苦难的深井中
我们睡去像海螺中的酒
血色月光中的海⁷⁵
可变的钥匙⁷⁶打开心的位置
穿越语言暗道穿越栏杆
米拉波桥⁷⁷刻下流水

72 塞萨尔·巴略霍 (César Vallejo, 1892-1938)，西班牙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生于秘鲁，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他从 1921 年到 1938 年住在巴黎。

73 巴略霍的同题诗。

74 巴略霍的诗《白石中的黑石》。

75 策兰的诗《卡罗那》。

76 策兰的同题诗《可变的钥匙》。

77 策兰于 1970 年 5 月在米拉波桥在塞纳河中自尽。



向墙中的布莱顿巴赫⁷⁸致敬

你释放的疯狂

是铸造寂静的真理⁷⁹

永远不与权力认同的人

我迫着他的影子逃跑

每天早上 卢森堡公园

他光脚转着圈小跑——哭泣

来自权力迷宫的高墙⁸⁰

一朵白云在山头追问寂静⁸¹

向没有家园的达尔维什⁸²致敬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⁸³

为了隐喻的鸟群追上子弹

诗歌是爱情与坦克对话

巴黎——异乡人的驿站

约旦河⁸⁴是古老文明的血脉

78 巴莱顿·布莱顿巴赫（Breyten Bretenbach，1939—），南非诗人作家和画家。他因参加反种族歧视的地下运动，1975 年化名进入南非，被判处九年监禁。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1982 年提前两年释放，在巴黎流亡。

79 引自我写给布莱顿巴赫的诗。

80 1982 年冬天，布莱顿巴赫释放回到巴黎。据说头半年，在卢森堡公园的早上，他光着脚绕着圈小跑，按原来狱中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上放风半个小时。

81 引自布莱顿巴赫的回忆录《一个患白化症恐怖分子的真实自白》。

82 马哈姆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1941—2008），巴勒斯坦诗人。

83 引自达尔维什的同题诗。

84 约旦河源于叙利亚境内的赫尔蒙山，向南流经以色列，在约旦境内注入死海，全长 360 多公里，它是世界海拔最低的河流。



他的心像握紧的拳头
穿越诸神的敌意的边界⁸⁵
我希望自己是黑暗中的蜡烛⁸⁶

向叛逆的阿多尼斯⁸⁷致敬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⁸⁸
从童年贫穷的地平线
看权力之夜信号弹上升
代替那些陨落的星星
永恒——火与火之间的深渊
在父亲的苏菲⁸⁹血液中
君临废墟的宗教与禁忌
我的词语是撼动生命的风⁹⁰

十七

反抗流亡反抗土地的邀请
醒来——太阳的印章
我的心是世界尽头的闹钟

85 2008年8月9日，达尔维什在美国休斯敦因心脏手术失败而去世。

86 达尔维什的诗《想想自己》。

87 阿多尼斯（Adonis，1930-）叙利亚诗人，多年在巴黎流亡。

88 阿多尼斯的中文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89 苏菲主义即神秘主义。

90 引自阿多尼斯的诗《俄尔甫斯》。



反抗命运反抗我的河床
加速旋风 —— 从树的意志
从沉默的野草到重唱的山峦
反抗生死反抗秘密开关
切开苹果切开时间的深渊
古老的天窗放出鸟群
反抗知识反抗多余的尘土
昼与夜在星星棋盘上对弈
聆听大雪上金钱的骚动
反抗皇权思想的人质
影子队伍追上权力的光源
神灵 —— 笔在纸上

轻轻推开并随手关上
一扇扇明与暗的双重之门
记忆的刺客埋伏左右
满月照亮同一条路
从翻腾的行云汲取墨水
写下的是失败之书
爱情播下死亡的种子
惊鸟如箭从新月拉开满弓
狂风追逐永恒的阴影
内心是盲人的地图
落日正如英雄般的挽歌
有人在黑夜留下刻度
自由是语言的牢房
钥匙与锁是敌对的同谋



历史消失在阴影中

秋天的小提琴呜咽悠长
怠倦而单调刺伤我的心⁹¹
诺曼底——自由的沙滩
青春的血 翅膀上的天空
很多年过去了 音乐
为了高潮留下沉默的形式
退潮 留下空白的书页
历史的仆役隐退 继续前进
追上链条般黑暗的日子
追上祖先们的背影
追上没有名字的浪花
追上一颗子弹离别的意义
追上地平线以外的足音
追上我消失的诗行
——海螺小教堂的回声

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归⁹²

在新雨中穿行到死亡驿站
引导偷渡者到海角天边

91 引自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 (Paul Verlaine, 1844-1896) 的《秋之歌》的头两行。二战期间,盟军策划诺曼底登陆行动时,用英国 BBC 播送魏尔伦的诗《秋之歌》,向法国抵抗运动组织发出信息。1944年6月1-2日夜播放第一行,暗示联军准备在诺曼底登陆。6月5日晚播出第二行,暗示登陆行动即将开始,法国抵抗组织立即展开破坏铁路行动。

92 引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错过多少路口 —— 寻找童年
失忆的树冠在种子中
水平线收进暗夜的折刀
流水行云 曲终戛然而止
欲望的暗道通向尽头
所有的行星在手的罗盘上
穿过镜中古道的乡音
饥渴追溯到地震的源泉
全景视野 —— 第三只眼睛
云的思想成为一颗流星
照亮那大地的瞬间 ——
兵书落雪 汉字围城

十八

让人类加入星云般晕眩的时刻 我找到一份档案分类的临时工作 敲打着接近复调音乐的键盘 吞咽的是现实三明治⁹³ 追上一寸一寸的真理 有人打碎空镜子⁹⁴ ——

我生于1926年6月3日⁹⁵ 自由只存在于束缚之中，没有堤岸，哪来江河⁹⁶ 我和宇宙一起诞生 在生锈的排水沟格栅也是同一扇上帝的天

93 金斯堡诗集《现实三明治：欧洲（1957-1959）》

94 金斯堡诗集《空镜子：愤怒之门（1947-1952）》

95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6-1997）美国诗人，“垮掉一代”之父。生于新泽西州的纽华克犹太家庭。其主要代表作是《嚎叫》。



窗 父亲的背影⁹⁷ 像雨燕迅速消失在闪电中 曝光过度的家庭度假的旧影片倒退再重新播放 校车的车灯穿越母亲向左疯狂的深渊⁹⁸

1984年深秋在北京 艾伦和盖瑞和我在竹园酒店⁹⁹见面 钟鼓楼是聋哑的证人 密探可随时更换前台经理保安服务员或出租司机——艾伦和盖瑞是真的 他和艾伦有一种互补关系：艾伦好奇多动像水银，盖瑞沉静自持像水银的容器。¹⁰⁰

老虎！老虎！你金碧辉煌，火似地照亮黑夜的林莽¹⁰¹ 小手风琴¹⁰²和古老的肺那样舒展收缩 爵士乐凄厉的小号在行星中穿行 记忆之刃犁开惠特曼的田野 因为世界的另一半，在等待着黎明的到来¹⁰³

艾伦成为中国诗歌的主人¹⁰⁴ 他半裸穿过六十年代的风暴 更换成二手西服皮鞋的绅士¹⁰⁵ 送给我二手领带作为礼物 他亦步亦趋紧跟着赞

96 引自金斯堡的诗句。

97 路易斯·金斯堡 (Louis Ginsberg, 1896-1976)，艾伦的父亲，美国诗人，中学英文老师。

98 娜奥米·金斯堡 (Naomi Ginsberg, 1894-1956)，艾伦的母亲，倾向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潮。她在疯人院住了三年，1956年病逝。

99 金斯堡和施耐德于1984年11月参加美国作家代表团去北京上海等地。竹园酒店在北京钟鼓楼附近，原来是康生 (1898-1975，原中共政治局常委) 的官邸。

100 引自我的散文《他乡的天空》。

101 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 1757-1827) 的诗《老虎》。

102 小风琴 bandoneon，原用于演奏宗教音乐的德国的乐器。

103 引自金斯堡的诗句。

104 1988年秋由金斯堡主办的中国诗歌节，在纽约当代美术馆举办，应邀的中国诗人有顾城、舒婷、江河、北岛等。

105 金斯堡告诉我，他所有的穿着皮鞋都是二手的。



助的胖女人 从浴帘¹⁰⁶后魔术般变成金钱

我五雷轰顶——灵魂出窍如青烟上升¹⁰⁷《嚎叫》来自疯人院的狂欢曲式的源泉¹⁰⁸ 会说话的石头在地狱的火焰中滚动 从保守的新英格兰东岸到多民族的广袤起伏的西岸 在内华达山脉红罂粟铺满的小路引入佛门 诸神之光照亮旧金山的诗歌祭坛¹⁰⁹

艾伦是我的摄影师傅¹¹⁰ 互相交换眼色 相机镜头是死亡的大师 从长夜的胶卷冲洗到镜框的天空 艾伦教我在首尔市中心的路边打坐 我问起转世 一只在枝头的乌鸦飞起

追随你内心的月光，不要掩藏狂热的一面¹¹¹ 我蓄着大胡子装扮成狮子引导丛林的意义 造反加诗歌是不倦的火车头 让黑山派的呼吸法¹¹² 召唤翻天覆地的暴风雨 在喇嘛教练习手印¹¹³与禅坐中冥想 毒蘑菇¹¹⁴ 是欲仙欲死的微型原子弹

106 浴帘制造商经常为金斯堡提供赞助。

107 金斯堡于 1949 年在精神病院住了八个月，主要是电击疗法。

108 他承认他在写《嚎叫》时，“诗中的许多形式都是根据我在疯人院听到的狂欢曲式嚎叫中发展出来的。”

109 1955 年 10 月在旧金山的“六号美术馆”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金斯堡第一次朗诵《嚎叫》。

110 艾伦教会我使用奥林巴斯（Olympus）手动微型相机。我多年来使用它在海外旅行时拍摄。

111 引自金斯堡的诗句。

112 黑山派崛起于五十年代初，代表人物是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 1910-1970）。他们认为诗是一种由诗人传送的能量，诗本身是一种高强度的能量结构。诗是诗人的呼吸——瞬间的自然节奏中获得自己的形式。

113 指密教修法时，行者双手与手指所结的各种姿势。

114 毒蘑菇，强烈的致幻剂。



1993年10月在东密西根大学 我和艾伦一起并肩朗诵¹¹⁵ 他的嗓门比我大十倍 通上电的暗语加脏字被照亮 我们俩按中国绿林传统抱拳致意

我们内心都是美丽的金色向日葵，我们获得自己种子的祝福¹¹⁶ 跨越母亲的黎明的界河 在死亡之路打听另一个季节 秃鹫盘旋在西藏高原的金顶之上¹¹⁷

艾伦死了 中国清明节的周年祭日 我穿过时代广场沿14街拐到第三大道¹¹⁸ 从沸腾的广场到流动的小街——合上群山愤怒与大海呼吸的书 他在我的电话录音机留言

115 作为东密西根大学的客座教授，我邀请艾伦和我在大学校园一起朗诵。

116 引自金斯堡的诗句。

117 1996年金斯堡告诉我，他打算去西藏朝拜。这是未完成的夙愿。

118 金斯堡长期居住的曼哈顿东下区。



《歧路行》新九章试读

杨立华

与新九章相比,《歧路行》的序曲和前九章太过紧迫了。诗歌承载着沉重的历史感辗压过来,孤伶伶的读者要面对的是一个文字的军团。在一个强调诗歌个体的语词经验的时代,大写的作品带来的压迫感难免引生阅读的抗拒。北岛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各章间不断变换着行文的节奏,甚至将第九章写成散文诗的形态,然而,内在的张力并没有因此缓解,反而被意外地强化了。前九章里,第八章是个例外。诗人与孔子的交集大概只有年龄和各自面对的“失败”吧。六十岁的北岛瞥见了同样年龄的孔子,如奔忙一生的人偶然注意到了夕阳。一瞬间的感动溢诸笔端:“你年近六十/夕阳下,白发如笔锋/歪斜的影子如败笔/直指东方的故乡/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变成象形文字/并逐一练习发声/夜放飞千百只信鸽/在修复的战争版图上/你是残缺的部分”。孔子作为北岛诗歌的绝对意义上的他者,成就了《歧路行》前九章最具陌生感同时也最为舒缓的一章。而这一舒缓当中所蕴涵的超达和释然,使得诗歌的整体变得更丰富也更具内省的性格。

也许是岁月制造的空缺,曾经竭尽全力也无法挣脱的节奏和声响不经意间平静为深沉的潜流。在新九章里,命运、历史、诗歌中的自我与他者有了和解的迹象。虽然北岛还是那个北岛,对文字的锤炼和锻造一如往昔,但不再是出于近乎严苛的自律——这样的自律一定以强大的自我期许和确信为基础,而是来源于新的尝试和探索的企图。如果说前九章诗人努力寻找的是自我表达的形式,新九章则指向更深层次的



自我理解。不再有鸟瞰的视角，即使是对个人的经验和亲历过的时代。“迷途”这一北岛诗歌中的常见意象，成了他的诗歌的真实处境。惟其如此，“歧路”的含义才更为切己。北岛再一次陷身于语词和经验的无穷岔路，当代汉语中最“沉郁顿挫”的力量得到了又一次的触发。

新九章由诗人的个人成长经历和诗歌的历程交织而成。其中，第十四章是唯一与北岛的诗歌历程无关的，属于完全意义上的个人的精神史。在这一章，作为背景的北京城的历史积淀被分在两节，交织在童年的记忆当中：“蝉的北京 四面楚歌 / 那是旧梦的暴民 / 风沿着磨刀石的方向 / 垂柳顺从朕的意志 / 沿中轴线贯穿四九城……一盏盏灯笼迎面而来 / 太监和丫环们渐渐消失 / 野猫沿着夜拾级而上 / 五更寒 钟声变成晨光 / 另一个朝代醒来”。然而，这显然是诗人成年后的历史理解。在浸透了多重历史解释的背景下，“哨鸽抖开整匹蓝天 / 群山涌向瓦顶的排浪”，童年的记忆仍然单纯得耀眼。从“新的一课是阶级斗争”开始，诗人进入自我阐释。被不断复述的记忆和多重否定的历史观纠缠在一起，矛头指向了“暴力”的造就。对整整一代人身上的“暴力”的反思和抗拒，是北岛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问题在于，“暴力”仅仅是“暴力”吗？“门牙嘶嘶吐出革命 / 我肾上腺素急升 / 战歌加上抒情的翅膀 / 这是十七岁的战争 / 用耳朵吹响号角”，当革命不再是历史的真理，曾经的斗志和激情就只能被还原为革命的宣传和青春的冲动。如果北岛的自我阐释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歧路”的含义就只能简化为“曾经走错了的道路”，从而失去了更根本的指向，也将因此失去更为深沉的撼动人心的力量。“空行——请等等 / 上个世纪如隔岸观火 / 回放的是折叠时刻—— / 狂风正挣脱门框 / 闪电的鞭梢抽打鬃毛 / 驮下是奔流的土地”，这节诗行里既有对“回放的折叠时刻”中的多重历史观的警醒，也有对真实历史进程的蓬勃生命力的感性揭示，指向了诗歌的历史认识对种种历史学意义上的阐释的超越。

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与《今天》有关。1990年的“此刻”与1978年



的“此刻”对望。根据脚注，这两章的初稿应该是2016年完成的。在2016年的“此刻”回看1990年和1978年，得是多么复杂的日光的叠加啊！必须足够单纯，才能再现那些“此刻”的光和影。第十一章写得从容不迫，部分的原因在于它的结构。诗节之间单出的一句，可以独立成诗：“不如相忘于江湖 / 为了干涸的源泉 // 狂风吹着词的裂缝 // 从风暴眼出发 // 直到另一个词的边界 // 为了拧住水龙头歌唱 // 打开狼与狼的空间 // 钟声忽明忽暗 // 为青春追逐颜色”。在整个诗章中，这潜伏的韵律驾驭了诗意展开的节奏，同时又在宏观与微观、整体与细节之间构造出了精致的平衡。当然，这独立的短章在诗章中的嵌入是全无痕迹的：“在新大陆和旧地图之间 / 文学的意义在哪儿 / 李陀用挪威刀比划 / 刀尖戳在桌面上 // 直到另一个词的边界。”围绕《今天》复刊的关键争论中的焦灼，凝聚到李陀手中的挪威刀象征性的一戳。这一戳洞穿到词的边界的另一面，也穿透了几十年的岁月和历史。“挪威春天的阳光 / 照亮古老的小木屋 / 沿楼梯合影：九个人 / 迷上深渊的微笑 / 我们面对着死亡镜头 / 镜框以外是记忆”，在这一诗节里，北岛把修辞的技艺放在了一边儿，让诗句停留在光和影的表面。那在诗歌中复活了的一刻，比任何影像和记忆都更为恒久。第十二章自然地转向1978年《今天》的创刊。与复刊时的迷茫和焦灼不同，“旧地图”中的青春岁月简单而确定。“当身穿便衣的无名时代 / 正窥视门后的锁孔”，控制无处不在，但质地和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青春的激情反抗朝向确定的方向，“为暗夜掌灯共同击掌 / 听太阳穴的鼓手”。当然，一切的核心始终是文学。在北京钟鼓楼附近的张鹏志家里，“1978年的文学争吵”淹没于“黑胶唱片不断重放”的拉赫玛尼诺夫。《今天》的创刊是北岛本人的历史时刻，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时刻。

陌生语境中的流亡，对于北岛是刻骨铭心的生活和语词经历。相关记忆的冰冷锋刺漂浮在他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即使藏在最不起眼儿的角落，也往往寒气逼人。在《歧路行》的新九章里，这部



分的主题集中出现在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关键词是“另一个”，从第一节开头的“另一个男孩”到最后一节的“另一个早晨”，贯穿整章各个诗节。与寒冷有关的意象也时有出现，比如“大雪絮语是暴君的承诺”、“中文——流亡的北极光”、“在白纸写下第一行/当大雪的罢工在进行中”。但总体说来，第十三章的色调是中性的。贯穿诗章的“另一个”让语词的流亡成了内在于诗人自我的他者。北欧长夜里的孤寂中的母语经验，曾经在彻底的隔绝中将汉语内化为诗人的自我和主体性的根基，刻骨的寒冷背后是更高层次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第十三章里面的“我”被重新定义了——“博鲁姆，我的法官/引领我——厄运另一个影子”、“猫头鹰整夜号叫/遇见我——另一个梦游者”。那个在语词流亡中的“我”、那个在镜中看到“乡愁的王国”的“我”成了“另一个”。第十四章里那个“面向太阳宣誓”的“我”不是“另一个”，第十一章里那个“低吟应和伤心的歌”的“我”也不是“另一个”，第十二章里那个“在流水中刻下青春”的“我”更加不是，只有“中文”成为“流亡的北极光”时的那个“我”才是。在这“另一个”的经历中，最温暖的交流是语言之外的。鲍尔·博鲁姆“在哥本哈根的法国餐厅”“打开地下的阳光的红酒”，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带我采蘑菇/下雨——他穿过森林领路/用军用小刀剝蘑菇/有的连忙吐掉：有毒”。当漂流中的汉语主体沉淀为内在的他者，更朴素厚重的主体生长方向也就随之敞开。

在第十五章，杜甫出现了。在一千二百六十年后，诗人“追随杜甫——从重庆到奉节”。在跨越千年的汉语长河中相遇，没有古典诗歌与现代汉语的隔阂。生命的轨迹与汉语的诗心交融在一起，没有异质感：

白帝城码头 一级级石阶
登天 向悬崖承诺
杜甫一家在客堂落脚



失眠——他投下我的身影

从鸟巢孵出新的月亮

我倾听他诗的心跳

.....

当浊酒遇上多病之杯

我的晚风吹来杜甫的白发

.....

诗从西阁窗口放飞鸥群

我沿杜甫记住的小径

在古城墙脚晒太阳

无论多复杂的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学理论都阻挡不住生命与诗歌的本质关联。“在古城墙脚晒太阳”的北岛，卸去了现代文学的盔甲，以弱化了自我意识唤醒了更高的普遍主体，于是“我”的晚风吹来杜甫的白发，于是倾听到了杜甫的诗的心跳。诗人面对的总是语词化的经验和经验化的语词，时时要穿透双重客体化带来的隋性。某种形态的主体性的激发和强化在诗歌创作中是不可避免的，否则无法使语词和经验从各自的隋性当中解放出来，在相互的映照中重新建立起自由的澄明关联。然而，主体性的强化同时也意味着某种隔绝。自我意识的边界成了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刚刚被解放出来的语词与经验的关联之上，在不易察觉的固化中沉陷为更隐秘的隋性。在杜甫走过的小径，北岛彻底松弛下来。“溜进暮色的孤狼”已不再是多年前“踏着那节奏”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关键词》）的那一只了。他的目光不再看向明天，而只是停留在这万古一时的此刻。于是，“不同的时刻汇成河流 / 波浪复制着波浪 / 我追赶杜甫的背影—— / 焚烧多少王朝的太阳”。千年后的登临，沧海桑田间，767年杜甫的重阳节竟还在那里。“我喘息——他咳嗽 / 把狂风撕成山河碎片”，更直接的是语词的碎片。晚年衰病中的诗人面对命运般



的狂风，听任狂风中语词的碎片飞舞。意外地，“那些词语被狂风召回 / 转瞬间 头颅吐出小草 / 他脚下踏出平仄路”，伟大的诗意由被触动的诗心点化，获得了生命和形式。对于诗人来说，诗歌像命运一般不可捉摸。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他说的是谁的命运？

然而，北岛终归是现代的。第十六章开头写道：“然而塞纳河才是流动的盛宴。”在这以致敬为主题的诗章中，我们可以部分地看到北岛诗歌生长的土壤。从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到达尔维什、阿多尼斯这一致敬的谱系中的人物和作品，在北岛的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中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这些汉语世界的他者，早已进入当代汉语，成为这无比丰富又无比驳杂的语言和思想世界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复杂、丰饶和腐烂，缺少的只是真正有生命力的种子。当然，北岛所致敬的不仅仅是诗歌。这些超拔于自己时代的人，拒绝与时代合流，同时也在决绝的对抗中揭示出了时代的真理。“向没有家园的达尔维什致敬 /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 / 为了隐喻的鸟群追上子弹 / 诗歌是爱情与坦克对话 / 巴黎——异乡人的驿站 / 约旦河是古老文明的血脉 / 他的心像握紧的拳头 / 穿越诸神的敌意的边界 / 我希望自己是黑暗中的蜡烛”，在一个不断承诺人性与和平又在不断背弃承诺的世界里，任何简单的自我认同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背叛。将被致敬者的诗句融入自己的沉思和赞颂，同时也就将他者的责任、苦难、矛盾、眷恋甚至是疯狂承接到自己的主体意识当中。每一次致敬都莫名的沉重。

反抗依然是永恒的母题。从“我不相信”（《回答》）到“我不承认”（《歧路行》第四章）再到第十七章开头的“反抗”，时间的跨度是半个世纪。“反抗流亡反抗土地的邀请 / 醒来——太阳的印章 / 我的心是世界尽头的闹钟 / 反抗命运反抗我的河床 / 加速旋风——从树的意志 / 从沉默的野草到重唱的山峦”，岁月的层累改变了“我”的位置——从反抗的主体转移为反抗的结果。“我”不再是自明的了。既反抗流亡与乡愁，也反抗归根的愿望，只为在世界尽头一遍遍醒来，保持自己为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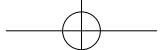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的印迹；既反抗命运的无常，也反抗平稳安定的自我，从一切非我中汲取拒绝的能量。反抗与诗歌互为镜像，极度单纯却又无限复杂。在新九章里，第十七章是最丰富的，丰富到可以涵括诗人的一生；同时又是最简洁的，简洁到可以化约为两个字。这几乎可以看作北岛诗歌写作的一个缩影。北岛的诗歌里缺少新奇的意象吗？仅以此章为例：“失忆的树冠在种子中 / 水平线收进暗夜的折刀”、“切开苹果切开时间的深渊 / 古老的天窗放出鸟群”，这是陈旧的诗歌意象吗？北岛之所以给人留下的重复的印象，是因为所有新的语词和意象都被放置在了一种看似熟悉的回旋当中，都或隐或显地指向了相同的方向。然而，一切生命的成长不都是这样吗？无论多么丰富的细节，并不在那至简的螺旋之外。而统一的机体一旦瓦解，原本以整体的自身同一为基础的繁多就只能走向腐烂了。在当代汉语诗歌中，北岛是荒瘠之地的苍柏。在野花烂漫的时节，总会有人讶异于他不合时宜的虬劲吧。

当然，北岛毕竟舒缓下来了。他开始留意“从鸟巢孵出”的新的月亮，他目送长江水“出三峡进平原”时，心中回响起的是“天地一沙鸥”。第十七章的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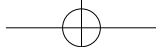
云的思想成为一颗流星
照亮那大地的瞬间 ——
兵书落雪 汉字围城

还是北岛的句子。但总觉得里面多了点儿什么，但又似乎什么也没多。

2019.4.7



写作新标





编者言

1990年代先锋文学在中国甚嚣尘上，到本世纪初其势头开始减弱。近十年来，业已成名的先锋作家们的写作纷纷转向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某种变体，这一脉几乎后继无人。幸亏有了陈鹏。在继承先锋文学写作指向的同时，陈鹏纳入了他们这代人全新的经验。先锋，在陈鹏那里也有了不同的含义。他强调写作的难度、复杂性，强调针对传统标杆的挑战。这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写作，也不谋求写作真理的“一统天下”，而是再次重申了个人的创造力对于文学写作而言的意义。从陈鹏的小说中我们能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兴奋和热情，有时候几乎是身体性的，是体力或精力旺盛造就的感染力。同时陈鹏的写作也暗藏莫大的玄机。对他而言，小说写作既是一场狂欢，也是智力精彩的游戏。

陈鹏另有三万字的作品将在《大益文学》2019年第三期“新标”栏目刊出，主持编辑仍是本人。

韩东

2019.2.24



写小说，需要“难度”

陈鹏

写小说，当然需要“难度”。

我说的难度，是写作者越写越顺越来越感觉良好的时候，勇于砸碎自己，挑战小说高标，够一够必须跃起来才能够着的东西——当然，也许你跃得再高也够不着。那也得试试。胆小的家伙太多了，但是，做一个安全的大多数，多没劲呐。

我编小说、写小说之余大面积阅读好小说，发现好的小说家都不愿偷懒，如石黑一雄、麦克尤恩、唐·德里罗等等好汉一直想在小说式微的当下做出惊人一跳，特别是，我特别想说说爱尔兰那个牛逼哄哄的班维尔，读他的小说很享受也很惊讶：小说还能这么写（小说就该这么写）！

他写的就是当下，是碎片，是反省，是不讲故事的故事，是诗歌，是沉思，是我们活着的平凡又简单的“印象”和“证据”，以及，各种各样的丰富与可能。

我想，这才是塞万提斯、托尔斯泰、曹雪芹、雨果、福楼拜们的伟大遗产——背叛，而且是有难度的背叛。唯其如此，小说之河方能奔腾不息，河流上游和下游的水质、速度、宽度是不一样的，可它们都指向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人的存在，人的复杂，人的善恶，人的暧昧，人的可能与不可能。

我坚持以为，现代小说比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更棒，因为它面对和展现的人的复杂性绝非过去的小说可比拟。从前的战争在大庄园大平原



上就拉开架势，现在的战争则在一个个孤独的人的内心进行，其激烈、苦痛和艰深，绝非前人可比拟，而且从来没有经验可循，一切都是新的，你必须挑战才可赢得，当然也可能一败涂地。所以，我更钦佩乔伊斯、卡夫卡，更钦佩海明威、福克纳，钦佩那些仍然妄想砸碎前辈功勋的小说晚辈们。

而眼下很多中国同行确乎太懒了，懒得变化，懒得挑战，一切扔给故事，以为故事，一个不错的故事就能搞定一切，以为故事讲得好才是小说家流的职责所在，问题是，故事之后呢？作为艺术的小说呢？作为小说的艺术呢？

向内的，向下的，向所有细节的，向着一切丰富的，敞开，重塑，创造，耐心，复杂，确认，具体……我想，小说是平行于生活的，不高也不低。是另一种活生生的存在，而且，它必须首先是艺术。

所以，小说写作是追求难度的行当，不是众声喧哗的“讲述”和“模仿”；我写了那么多，写了那么久，多希望自己每一次写作（至少一部分）都挑战新的难度啊，多希望自己写得好些，再好些——才不管别人怎么看呢，得让自己出一身臭汗，让自己满意一把。

多难啊！

可我想做这一类的小说家。



向死之先

陈鹏

不可含怒到日落。

——《圣经》

一

进门之后他没打招呼。不用打招呼，打了等于没打，没人搭理他，没人管他。只要找个地方坐下，倒杯茶喝着，看他们把手里的牌一张张打出去。他会猫到老扁身后看他出牌，老扁很讨厌他在身后像条狗似地喘息，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将满嘴的烟喷到后脖颈上。老扁会说方休你滚一边去。他不听，抬手扇老扁后脑，说你给老子闭嘴。老扁打几圈就打不动了，让方休上来。另外三个：黑其德，马基，王九嘲笑老扁手气臭到家了。四人鏖战二十几圈，直到隔壁厨房老许说，开饭了，才扔下麻将涌出去。打掉整个下午，人人累得够呛。况且黑启德说过，又不是职业赌徒，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他们坐上老许的圆桌，八菜一汤，除了鸡鸭鱼肉，还有酒，是方休在宜良开酒坊的爹精心酿的好酒。方休爹的宜良酒坊生意很火，你要是想喝他的酒必须提前三个月预定，否则一律售罄。方休觉得让他们喝爹酿的酒是他们造化，他们应该像过去在学校里一样待他——他曾经是他们的头儿，染着金发，穿萝卜牛仔裤，大方头皮鞋，红塔烟黏在嘴上。他们在录像厅熬过无数个通宵，《英雄本色》看了二三十遍，刘德华张曼玉钟楚红也看了很多，周星驰张国荣李修贤更不在话下。无人不喜欢叼着牙签的小马哥，最爱他为了掩护兄弟从容赴死。走，你走。小马哥喊道，转身还击，立即被打成蜂



窝。他们模仿发哥刘德华把隔壁卫校一党小子开了瓢，为此损失了一个兄弟刘冻，他为众人扛罪被勒令退学了。他们把他送回白马小区的家，对这个宽大的地盘十分满意，于是留下来混了三天，把冰箱里的东西全部吃了，把刘冻老爹的各种好酒喝个干净，最后打的赶回茨坝技校翻墙进去把宿舍的人一个个叫起来，没及时出来迎接的被罚去操场跑步，他们拎着酒瓶蹲在看台上，看那小子光溜溜的脑袋在月光下上下游动直到噗通跪地吐个干干净净。然后方休，也就是当时的头儿会说，走，干烧豆腐。他们第二回翻越学校大门来到亮晃晃的茨坝街头，扎进扑鼻浓香围拢低矮的四方铁皮桌子坐下，一气点一百只烧豆腐，让老板砸两件啤酒上来。重返宿舍是凌晨四点，他们约好不上课了。天王老子来砸门记大过也不踏进教室半步。有事一起扛。随便。大不了拍拍屁股追随刘冻回家算逑。这种鸟学校，这种烂专业，上个鸟。主意已定，一气睡到中午，中途没人敢来叫他们上课。从来没有。午饭时间他们横在食堂门口，全班三十个男生凡经过者一律从饭缸里奉献一大勺饭菜，哥几个夹道候着，一口一口吃饱了才一个个放行。老师也不敢管，低头走开装没看见。后来他们打了校长，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校长姓孙，长一副狗脸，瘦得像竹竿，走路的时候仿佛脚下有地雷一蹶一跳的。方休说我们收拾他吧。他要不签字刘冻走不了。黑启德挑头说好好好，必须收拾一下。马基王九当然不反对。一点反对意见也没有。计划早早定下来，他们挑个日子，用茨坝街头捡回来的装洋芋的麻袋把孙校长蒙住拖到球场边小树林一顿痛打。他们以为天衣无缝，但随后解救老孙的校工老张说看见他们了，看见方休的牛筋底翻毛大皮鞋了。孙的感受十分强烈——落在身上的狠踹几乎要了他的命，那种力道那种硬度那种让两只耳朵爆炸的刺痛，非翻毛大皮鞋不行。他纠集政教处教务处把方休传到校长办公室，方休一见裹着脑袋斜乜眼睛的孙校长就噗嗤笑了。这一下不攻自破，要撇清都不行了。孙校长为显示公允让他再踢他一脚试试，他踢了，孙校长说你再狠点，再他妈狠点。他使劲用力。孙校长惨



叫着说对对对，是他，就是这个狗崽子。他马上撂了。他们门关起门来准备揍他。孙校长说算了，何必跟一条狗计较？劝退。方休说，好。孙校长小心问他，你为哪样黑打我？我有哪点对不住你们？方休摇摇头说没有。没有？孙校长非常纳闷。他无法理解无缘无故的暴力，就像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半夜三更爬到你床上，所以他最看不上《聊斋》。方休说我真认不得，认不得就是认不得嘛。孙校长说我晓得你们是为刘冻。方休说不是我们，是我。孙校长说就是你们，你们好几个。算了，你想一个人扛那就扛着，其他人我概不追究。方休不说话。孙校长继续斜乜着受伤充血的鱼泡眼说，你们何必用一个更大错误掩盖一个很小的错误，你们根本救不了他，除了毁掉自己你们所做的毫无用处。方休说你的话我不懂。孙说你会懂的，总有一天，你会懂的。方休说反正，反正我吃饱了，闷得很。他说完这话就昂首挺胸走出校长室，劈面而来的阳光像警告，也像挑衅。他冲太阳啐了一口，噼噼啪啪奔下楼去，回到宿舍收拾东西。

黑启德马基王九问他情况咋样，他说他马上追随刘冻四海为家浪迹江湖。哥仨沉默片刻一起找校长求情，说事情是他们一起干的不能只罚方休。孙校长说好，很好，你们集体退学算了。哥仨回来也收拾东西，说要走一起走。方休像扛着炸药包一样肩扛包裹冲到教学楼大院里嚷嚷，有种冲我来，冲我方休来！孙校长站在四楼回廊高处，挺身向下望，其余人等保持沉默。他们知道对付一个小子最厉害的招数无非沉默。方休叫嚣半天毫无回声，所有人，几乎全校教职工齐刷刷站在高处向下俯视他就像盯着一条蛆。他莫名惊恐，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像兔子一样蹿出教学大楼跑回宿舍，说找把斧子将他们一个一个砍翻算球。砍翻了一了百了。他口干舌燥声音发虚。其实想躲开，想逃离，永远避开这些人，过另一种生活。绝对意义的另一种生活。换个地方就好了。生活的意义也许就是换个地方就好了。他想叼一支牙签，像小马哥一样抖擞风衣走出学校大门。实际上一件风衣也没有，牙签再多也没用啊。三



个兄弟跟在后面随时准备从容就义，再也不想回到这所弥漫着厕所和煤渣臭气的破技校。中途遭到班主任拦截，他说让方休一个人先回去就行没必要都陪他送死，否则这将是技校历史上最轰动最耻辱的事件。他求他们给他个面子，回去，回宿舍去。三个家伙不愿撂下方休，他们渴望效仿《纵横四海》里的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他们拒绝了班主任好意，信誓旦旦地说除非方休也回去他们才回去，否则免谈。班主任说好吧你们先回去，他去找校长，总会有办法。四人勉强返回宿舍，将大包小包撂在地上。一个小时后班主任赶来宿舍说有办法啦，方休回家取钱，赔校长钱，再写一份检讨，留校察看，记大过，事就了了。方休鼻子里喷出鄙夷不屑的哼哼声，其余三个也喷出哼哼声。他们将椅子翻过来双扣。天擦黑的时候事情急遽变化，一个五大三粗的家伙闯入宿舍问哪个是方休。方休挺起胸脯说我，你找——话音未落，此人一巴掌扇得他晕头转向。一时无人跳出来英勇反击。全懵了。按照后来方休的话说，忽然底气不足，觉得此人才是真正的黑帮老大。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是暴力终究会遭到更大暴力的全方位碾压。他们面面相觑浑身哆嗦说不出一个字也没人操家伙。来说他是孙校长的儿子，孙校长年纪大了，他当儿子的不能坐视不管。有种你出来，出来我们单挑。出来。他指着方休。你们要一起上也行，随便。走，去外面。此人一步跨到门外候着，四人咬咬牙抄了家伙出去没想到院子里还站着五条彪形大汉。他们刚出去就遭到一通袭击，满鼻子满脸的血和深入骨髓的疼痛让他头一回害怕了。他浑身冰冷，在地上蠕动，爬起，按对方要求靠墙而立，连脸上的血也不敢擦，只能弓腰背手，垂着脑袋，再次觉得自己渺小得像蛆一样，心脏在暗夜冷月和凄凉的晚风吹拂下砰砰挣扎。他大着胆子问对方究竟咋整，对方说，一，赔礼道歉，二，赔一笔钱，三，滚出学校。后来的走向基本上按照络腮胡子的要求发展，方休像只小鸡似地被他拎起来重返校长办公室认错道歉，然后通知他酿包谷酒的老爹赔了三万块钱，孙校长总算大发慈悲网开一面同意让他继续念下去，但记大过一次



并塞进档案袋里。后来方休才知道，是他的酿酒师老爹偷偷给孙校长及其来路不明的络腮胡儿子下跪磕头才确保他继续上学拿个技校毕业证。他爹走的时候哪样也没说，给他留了一瓶60度包谷酒。方休毫无办法。没有一点办法。他要不在学校待下去会让他爹那一大笔钱和遭受的羞辱全部打水漂。只好忍着，像吞下一口大便一样忍着，直到毕业。毕业说来就来，他夜里揣着毕业证跑到孙校长办公室门口拉了一泡尿，次日兄弟们作鸟兽散。他想在学校对面城中村租个小屋候着，专等孙校长溜达出来断他一条腿。但事与愿违，毕业之后忽然想开了，忽然觉得生命之意义也许就在于及时放下，何必纠缠从前，何况自己有罪在先。反正这个烂学校一辈子也不想回来了，再也不想见到各路牛头马面了。

最后一次见孙校长是多年后在市中心顺城楼下，孙头发花白，像老年痴呆一样颤颤巍巍，身边除了一条竹节拐杖一无所有，络腮胡儿子无影无踪。他没想到伟大的孙校长十年不见就老成这样了。本想上前打个招呼——时间终于让青春期荷尔蒙事件发酵为伤感和愧疚，忽然觉得自己该对这个摇摇欲坠的糟老头子负责。就好像那次翻毛皮靴的突袭才把他打成今天这样的，就好像他们一不小心就把伟大的孙校长彻底毁了。哎，罪不可赦啊。尤其发现孙的米色夹克上有一团污渍——也许是吃米线弄上去的，方休热泪盈眶，赶紧转身离开。再回头的时候，熙来攘往的人群将衰朽的孙校长抹掉了，就像从未出现，就像那个衰病的影子是他瞎想出来的。当年咋个用麻袋套住他脑袋来一次突袭？对，为了刘冻。可是刘冻和哥几个明明错了，恶行的由头居然是恶行遭到惩戒。真是荒唐。像蛆一样，和呆在楼房天井中仰视所有老师冰冷讥诮嘲弄的惨白狰狞的脸的感觉一模一样。他也许真是条蛆，一条拼命蠕动不可救药的蛆，无聊的暴力只不过证明自己无可救药而已。十年之后，他终于想通了。

嗯，现在他们开始吃饭，喝酒，聊女人。黑启德咂摸着嘴巴，一口气吞下三片粉蒸肥肉，干掉半杯白酒，像国王一样靠向椅背，眯着眼睛点



燃红塔山，问他们最后一把为哪样放水让方休赢了两百，他们说他们昨天输了五百八呢，好歹让他赢一把否则他就再不上桌了。黑启德说做梦，你们以为他输个几百块就不玩了也太小看他了，他脸皮相当厚呀。他们嘿嘿笑一阵。黑启德说吃完我们遛狗去。我们去东面大厂遛狗。狗日的混账回来了，狗日的混账终于回来了。它跑了七天七夜？七天七夜呀。马基、王九附和说是的，七天七夜。厨子老许说是啊不是七天就是八天。黑启德问咋个跑的？老许说链子松了，一不留神，跑球了。黑启德说被哪家骚母狗引的？老许挠挠脑袋说不晓得。黑启德又问是哪个松的链子，众人沉默半天也未想出究竟。方休忽然举手说，我。黑启德扭头看他。方休说那天，那天下午，我跟王九跑车回来，我觉得混账被栓得够呛，一天到晚活动范围不超三米，我就——你就，你就手痒了？黑启德说。我解开的时候它没跑。它照样躺着一动不动，我以为它根本就懒得跑，再也不会跑。这地方好吃好喝每天晒大太阳它咋个要跑嘛。黑启德嘿嘿笑，说我就是想球不通它咋说跑就跑了，伙食不好？够好了，老许说，方圆五十公里，没一条狗像它这种吃的，比我老爹吃得还好，顿顿有猪肉汤泡饭，我操。黑启德说我最恨无缘无故跑掉，无缘无故背叛。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啊。我就是想不通世道咋个了，想当年哥几个抄家伙冲出宿舍冲进院子也要跟一帮老狗日的拼命，现在倒好，连一条狗也会跑掉。你只要给它骨头，它就跑了，你只要给它母狗，它就不回来了。黑启德说完将杯里的酒一气喝干，马基将牙签纸巾递过来，问他晚上真要遛狗？他说给我湿纸巾啊，这种擦屁股的纸给我擦嘴？王九和老扁嘿嘿笑，老扁拿脚踹马基，说咋个做事的，咋个做事的，还想不想混了。黑启德又让王九泡一杯普洱茶，绿茶和花茶他从来不喝。至于方休，他说你出去把混账牵进来，这条老狗，我想它了，我真想这个老东西了，七天七夜没吃好睡好我怕它瘦了，我还怕人下药把它闹死，你们哪个都不关心它，你们对混账太不够意思了。方休低头出去，将一头膘肥体壮耷拉舌头的大黄狗牵进来。你能闻见傍晚的冷气酸气和浓烈



狗气，就像这七天里掉进阴沟一样发臭，让人觉得一整间屋子都容不下它。混账耷拉耳朵百般讨好东闻西嗅想找东西吃像饿得发昏的老乞丐钻在桌子下面挑挑拣拣，黑启德扒拉半碗小炒肉摊在桌下，混账两口吞个干净，伸出大长舌头吧嗒吧嗒舔着硕大的像拳击手套似的嘴巴和根根直立的硬胡茬子，讨好地瞅着他们五个及另外三个婆娘。走吧走吧我们去大厂，黑启德瞧着混账说，满脸带笑但在方休看来笑得诡异暧昧。走吧走吧，我给你们好戏看。黑启德起身，一把拽住混账脖子皮毛里那根三指宽的铜扣皮带。

二

夜路漆黑，屎黄色路灯从远处射过来，去大厂的柏油路很快走完接着是一段崎岖土路，他们全体步行，没人开车。似乎步行三四公里根本不算路，就连饭后散步也谈不上。何况现在天已全黑，错过了昆明黄昏最美妙的一个多钟头，好在路上没多少车，从盘龙江边一路过去只剩下密密匝匝的桉树影子斜插过来像一伙倒地醉汉被他们几双大脚踩得砰砰响。混账走路无声无息，像个小偷，舌头在月光下耷拉着，稀稀疏疏潮湿闪烁像咬碎了满嘴银币，光线照着那一身粗糙茂盛的黄毛就像照着油光水滑的磷皮。一路无人讲话，他们好像在牌桌和饭桌上消耗了太多口水。盘龙江在空阔的河道里刷刷流逝，速度快得吓人，也许能看清一些翻卷的碎垃圾烂菜叶，也许什么也看不见，只是混沌一片像灰色钢板的水。水。他的耳朵里不全是水声还有别的声音别的喊叫，他知道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是幻听毕竟大厂他才去过两次。只是个填埋垃圾的洼坑，从前是一片荒废的工地，每到雨天就积满雨水。后来黑启德接手，用它填埋从大溪地挖出来的源源不断的垃圾，说白了是泥巴，漆黑的闪着磷光和恶臭的淤泥一半以上是昆明人拉进大溪地的大小便。每天，他非常



清楚，每天四辆车一共四十八吨泥巴拉过来倾在大厂，渐渐堆积如山，他在盘龙江东岸也能看个大概——大象似的脊背，隆起，降落，向下坍塌，陷入黑暗，臭得像濒死的老人。他们深一脚浅一脚。黑启德破口大骂，说这一带再不修整会把脚脖子崴断的。他接连崴了两次，骂声传得很远，听起来像条狗的嗷嗷叫唤。方休开始思考人是否很容易改变，甚至改造，就像这个堆满烂泥巴的大坑原本并非大坑。黑启德老了，像自己一样老了，不再是20郎当岁了，他肥胖，肚子滚圆，皮带要扣头一个洞眼才行。这些年他混得相当好，他让方休过来帮忙并且承诺给他12%股份。他问为哪样是12%。黑启德说因为你晚来半年，要是你早一点和马基王九一起来就是20%了。现在没办法。请你原谅，兄弟。他敲开他房门时方休没立即认出这个大胖子，他咋个吭哧吭哧爬上七楼找到他的？他唯一的家，乱糟糟脏兮兮的窝，不足四十平，他买它的时候昆明房价还没过五千，他花光积蓄还欠下十多万外债。黑启德捡起沙发上几只臭袜子扔地上一屁股坐下，拍拍手。方休觉得难堪，是啊太他妈脏了像野猪拱过，到处是内裤袜子臭衣服，桌上杯盘狼藉，烟蒂塞满烟灰缸，不时有蟑螂溜溜爬过。黑启德说，振作起来，兄弟，振作起来。方休眯着眼睛，不好意思地说我先洗把脸。黑启德将桌上酒杯端起来闻了闻，大声说你爹还在酿酒？他走进洗手间，说不酿酒么整哪样？黑启德说就你混成这泡沬样。仔细瞧瞧你那张脸。你瞧瞧。方休凑近卫生间镜子仔细瞧，是的，鼻泡眼肿，不是喝酒喝的就是睡觉睡的，他太喜欢喝酒睡觉了，然后偶尔找楼下的小罗琴发泄一把。

小罗琴24了，工作东一下西一下，要么西郊灯泡厂干小工，要么找个洗脚城当领班，最新进展是她和小男朋友开了个火锅店，距此两三公里，就在盘龙江边。小男友肌肉发达，对她看得很紧，动不动喊打喊杀，说小罗琴不嫁他就把她扔江里喂鱼。小子贵州人（小罗琴当然也是贵州人），每天突突突开着黑色大洋摩托跑来小区门口接她，方休恍惚看见自己二十出头的鸟样。方休搞定小罗琴才晓得她租的一楼每月



1500块，不算贵。他佩服小罗琴的心脏像铁一样硬，即便小男友如此威胁如此疯狂照样偷偷溜上七楼和他做爱。不，不该叫做爱，他们之间哪有爱情呢。那么，他问她咋个愿意跟他睡，她说她也不明不白，大概太在乎小肌肉了吧，所以偶尔把身体交给别人就可以稍微抵消一下了。太在乎就像太匮乏一样让人绝望呐。他们认识那天机缘巧合，她一只高跟鞋卡在噗噗冒水的破地砖里拔不出来，方休走近说我来试试，手伸进脏水攥了一把，成功了，但是高跟鞋鞋跟被下水道栅栏咬掉一半，耷拉着，摊在他手上。小罗琴嘻嘻笑了，说你没事吧。他说我手又没断，给你鞋，怕要换一双了。小罗琴歪着脑袋咬咬指甲，说干脆去前面修修算逑。他觉得她是个笨女人，动作笨说话笨笑起来也笨。但长相秀气身材火辣，远看像一只小苹果，雨天挂在树上摇晃不定刚要熟透的小苹果。她香喷喷地趿着一条腿跳出院子跳到街口，果然在鞋摊上修好鞋跟，却发现没带钱，只好再次向他求救。区区三块钱，他弄到了她的电话。后来某天夜里她接了他电话就摸上楼来，让他怀疑她是一只鸡。不过她上楼的姿势远比此时贸然闯入几乎没敲门的黑启德优雅得多，这只小苹果喘着气，倚在门框上，一手拨弄长发。长发打着卷，衣服鲜亮，是带碎花的苹果绿，高跟鞋还是修过那一双，白得发黑。他说你进来啊。她说你这里真乱哦。她走进来，随手帮他收拾了一下沙发，将脏衣服脏袜子扔进洗衣机，再掺进洗衣粉，开动起来。房间里多了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就像末日之前人和上帝和魔鬼的喁喁低语，当然也适于两个陌生人的首次约会。然后他望着她，不知道她接下来还会干哪样。她走向冰箱，拽开，说你有鸡蛋，居然有鸡蛋。她的嗓门就像发现了一批恐龙。她说她还没吃晚饭哩，接着她从橱柜里找到面条，相当娴熟地煮了两碗挂面又卧了两只鸡蛋。后来他们擦擦嘴，她说好了，饱了。她打一个嗝，抱着脏碗走向厨房。方休跟进去，问了几个相当无聊的问题，就是所有70后都喜欢问的傻逼问题：你从哪里来，你干什么的，你多大了，你家里还有什么人。等等。小罗琴没回答，或者说她回答的声音一律被



她干活的节奏一点点粉碎。之后他从后面抱住了她，她挣扎了一下，说你搞哪样名堂噻。他默不作声，只在手上用力，她又说你到底搞哪样名堂。他把她肩膀拧过来亲她嘴巴，两瓣刚吃了面条的嘴唇上还有甜面酱的气味。小罗琴说你不怕我男朋友——他装没听见。她说我男朋友在健身房练过。他才不管，觉得那些在大街上晃荡的狗屁娃娃都是纸糊的。就在沙发上把她睡了之后他觉得应该给她钱，但他按兵不动，想看看她什么反应。小罗琴这时候才告诉他她姓甚名谁，现在是一家绝对正宗的重庆火锅店二掌柜，他问哪个是大掌柜，她说，男朋友嘛。方休没吭气。这种事情超出了理解。按照他那代人的习惯他是不会和自己女人之外的姑娘睡的。而自己明明晓得也见过那个肌肉男朋友还是要睡她，到底说明哪样？无耻啊，他想，却身不由己，像有人劝他这么干，而且必须干，不然太不爷们了。他给她钱，小罗琴坚决不要。她什么也不要。她摇晃着身体说她要下楼睡觉了，又问他闻没闻见她头发里的火锅味，他说没有，他说你很好闻。他说我讲的是真话。你非常好闻，会让人闻上瘾的。小罗琴咯咯直笑，说你这个坏男人胆大包天哟。不过，我男朋友从来不讲我身上好闻。她笑一阵又说，你面条好吃，你要是一个人吃晚饭，我可以帮你把鸡蛋吃了，浪费了可惜。他说随便。小罗琴走到门口，略作停留就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下去了。他想她真他妈蠢到家了，连要点钱也不会，不过这也证明她不是鸡。但是还不太好讲，也有鸡是不收钱的，偶尔奉献一把，也好确定自己从未堕落。这种事情必须几番交手才晓得呢。离婚三四月来头一次睡个女人。太荒唐了，居然是楼下邻居。后来他渐渐知道小罗琴早就想甩掉浑身肌肉的小男友却怎么也甩不掉。她说他不生气的时候还是很帅的啊，即便生气的时候也很帅，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他浑身肌肉很性感吗？他说性感个屁，就像蜕了皮的青蛙，懂吗？就像一只脱了皮的大青蛙。

黑启德的眼神并未说服方休，反而让他郁闷，仿佛他的到来只是为了见证他的狼狈不堪；他们是兄弟啊，而他是昔日老大，最终把生活过



成一泡狗屎。他想他从来就是一泡狗屎，只不过他用自欺欺人的更大一泡狗屎把它盖住了。除他之外马基、王九都不错，至少没离婚，有老婆有娃娃有车有房，不用为钱发愁。他呢，开三年出租，挣很少的钱。勉强活着，勉勉强强活着。要是心血来潮买一件杰克琼斯就不剩哪样了。用不着别人可怜，虽然黑启德是曾经的兄弟。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就算越来越糟心也是自己过出来的。黑启德高高在上的样子也不是二十年前那个小跟班了，再不是嘴角随时淌口水的怂货了。他胖得像个杀猪匠，手上戴着碗大的金表和小叶紫檀佛珠，外套也许是什么古奇的，连皮鞋也是，黑黄灰三色，太阳洒上去闪闪发亮，晃得他两眼昏花，光线不足时要么半黑要么深灰像鲸鱼一样神秘莫测。黑启德说我要早半年找着你就好了，要早半年我给你30%，现在只能12%。他说你们咋又鬼混在一起的，黑说该走到一起的兄弟终究要走到一起。这是上帝说的。他咧开嘴巴笑了，露出黑魆魆的牙。上帝说要有光，世上就有了光，上帝说我们一起挣钱一起变老，你们就一个个冒出来了。方休说你咋个变成哲学家了，黑启德说你没发现我天生就是哲学家？方休问他想喝点什么，酒，还是茶？黑说哪样都不喝，你这地方太脏了我怕喝出毛病。方休问他咋个找着他的，他说昆明咪渣大个地方嘛。他听说他离了，马基王九也都离了其实，不离他还不想找出他们呢。是吗？方休大吃一惊。哪个时候的事？去年，黑启德摇摇头。不重要。这种事情算哪样事情？古代你们随时可以休掉婆娘如今咋个个怂蛋任人打整？马基赔十万，王九二十万，你给了多少？现在的傻逼婆娘想钱想疯了，靠离婚赚一辈子零花钱再选个嫩秧秧的新老公，不满意了再捞一把再换一个。世道咋变成这种了，被女人骑在头上拉屎拉尿了？你想想看，你想想，当年，我们在茨坝，女人见了我们哪个敢抬下眼皮？哪个敢？

方休讲不出一句话。是的，前妻，那个跳舞的女人，那个当年跑场露着肚脐的婊子一看就像婊子而他毫不介意跟她完婚而且场面浩大，他们参加了婚礼，黑启德说第一眼瞧见新娘披着婚纱走出来那一刻就晓得



不靠谱，终究要离。方休说马后炮哪个都会放。可他没有勇气直视黑启德眯缝的小眼，这双小东西精光闪亮，像布满浅浅褶皱的洞彻之物横在面前，让他胆战心惊。他闻见他身上淡淡的男士香水味道。很难说这家伙现在有多少钱，也许楼下停着一辆玛莎拉蒂也说不定。他偶尔听说黑启德发了，当上某某公司头目了，但具体怎么发的，如何发，如何擦上法国香水的对他这种出租司机来说是天大的谜，像宇宙黑洞一样无法破解。他说你是来看我笑话吗？黑启德说你都离半年了我看你笑话。你还不了解我？方休摇头，说三年不见了，三年，三年就把你变成一头肥猪啦！黑启德微微叹息，说万变不离其宗呀兄弟，我就算胖成十头肥猪还是茨坝镇那个跟你一起干架的兄弟嘛。这话令方休砰砰心跳，像在主演一部好莱坞煽情大片。黑启德此时此刻就坐在面前，真是奇迹。人会变，也不太会变，变的是吨位，是肥肉瘦肉的比例分配，不变的是那颗衰老的心脏及其黏稠滚动的黑血。淌出来如焦油一样再也不是鲜红的血了。他晓得，他从他进门第一秒钟他就晓得，他们被彻底改造了却又不想被改造，只能默默接受现状却比任何时候都想摆脱这些。从前多幼稚啊，早就在他们身上褪色消失像最后的尿滴一样哆嗦着渐渐隐遁无形。来吧兄弟。黑启德说。方休说我要做些哪样你给我12%，到底是哪样的12%？一个月多少？黑启德说了个数字，方休觉得这差不多是他开出租的两倍还多了。没理由拒绝。没有任何理由。何况，这个浑身香水味的胖子曾经是他兄弟。黑启德从口袋里摸出一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让他务必改善生活——太乱了，从猪圈里出来吧，回归吧。方休说回归哪样？黑启德若有所思，说回去，就是回茨坝去，回到二十年前。他说二十年前？我操，都老信了你娃娃也打酱油了咋个回去？黑启德说咋个回不去？当年我们在茨坝小街上甩烧豆腐干包谷酒的时候咋个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忘了？方休说他忘了，早忘了。那些狗年月像粗制滥造的毛片一样泛着死灰，长头发牛仔裤早过时了，现在流行大光头，因为头发再也长不出来了。何况，回去有哪样意义？方休问他



吃饭没有，黑启德说你不要只惦记吃。他说我就是只惦记吃，现在没哪样事情比得上吃。黑启德说你下月一号报到，地址就在江边七公里超美公司，我保证你吃饱吃好。兄弟们都在等你。你还记得小马哥赴汤蹈火之前说了哪样？方休摇摇头，他只记得小马哥的牙签披风围脖，手中双枪又黑又大。那时候弹吉他的普猛长得极像小马哥，尤其从侧面看去，短鼻子方圆脸，下巴微微撇着；刚开始标准三七开发型，后来受黑豹窦唯影响天天死磕吉他一头长发，长得垂到紧身皮裤兜住的屁股尖上，从后面看男女莫辨；他顿顿吃批发价0.5元一包的香菇鸡滑面，再不上学校食堂，也不屑于加入他们一伙夹道要饭。其实周末回家他就能从继父手里搞到钱，不是一般的小钱，够他挥霍了——周日返校必定请方休黑启德们去茨坝街口喝酒干烧烤，唱街头卡拉OK，把一个月生活费一次性花掉，剩下的就扛一箱方便面回去。他说摇滚的标配之一是方便面，不方便面不摇滚。普猛死于毕业后的某个深夜，这是后话，但在这里也可以预告一下，后面我还有机会细说：他搭乘K64次前往北京，在地下室窝了不到三个月就传来噩耗，煤气中毒。这是人所周知也是流传最广的版本，至于真相，我说了我们后面还会细细讲它，会的，我向你们保证。总之那个长头发紧身裤的普猛从此消失了，哥几个难过好几天，都没勇气参加葬礼。他和他的传说一起飘进风中。方休记得他躲在烂教室玩命练琴，手指不可思议地上下翻飞，技艺之娴熟让人怀疑他才是《无地自容》的主音吉他。他们翻窗进入，和他一起吼叫，然后围观，拍掌，高喊我操，我操，我操。普猛的死给方休重重一击，忽然发现青春瓦解了，像黑冰融入水里。真他妈难过啊，难过得像身上钻了个洞它们全都溜走了，让人怀疑它们是真是假。大约十年前他路过茨坝想找一下著名的老段录像厅，再也没有了，那里只是一间龌龊的四川小饭店，一对新人在举办简陋的婚礼。男的明显上了年纪，女的还行，也有很深的抬头纹了。他默默看着，发现男人没牵女人的手。他们的婚礼似乎不为结婚，是为左支右绌招待客人。方休看了很久，新郎新娘敬完酒



后男人终于拉了一把女人的手腕，就像普猛吉他上一记锐利的器叫终于落下，他低头走开，很快听到饭店里传来某个青年高亢的哭声。活见鬼了。他想，结婚还哭个鸟啊。他忽然忧伤无比。正如眼下，当黑启德让他重返过去一样忧伤无比。他无法转述这种忧伤，像要把脊椎骨抽出来扔在街上，被践踏，被唾弃。是的就这种感觉，这种糟糕透顶仿佛攥着油腻腻湿哒哒的抹布走在冰天雪地的感觉。现在他没有借口。一丝借口也没有。他过得很不好。他的家是猪圈。这个猪圈只有小罗琴帮忙收拾了一下很快又一塌糊涂。黑启德在等他回话——小马哥赴汤蹈火之前讲了哪样？他恍惚不定，盯着那双熟悉的细黑的眼睛，盯着深处不可名状的硬东西，犹如小玻璃球或沙子。他摇摇头，表示自己无奈又沮丧，黑启德也摇摇头，咬咬嘴巴，起身道别。

他走后——他没把他送太远，也就下到一楼，两人如同少年时代一般潇洒地挥挥手——他打小罗琴电话，后者答复说她在火锅店忙着呢，有何贵干？现在刚进入黄昏，离天黑还早得很，离他每周一到两次给她电话的惯例也早得很。她说你是不是饿了哟， he 说是。这是约定的暗号，饿，代表方休想睡她。小罗琴说今天没得空。他说我有事找你商量。小罗琴想了想说那十点以后再说。在这个空寂的心烦意乱的夜晚他等得实在心烦意乱。小小的院子里迟迟没响起小罗琴啪塔啪塔的高跟鞋声，倒是充满各种各样古怪稀奇之声，打嗝声放屁声说话声叫骂声呼唤声呢喃声还有电视里才有的夸张咆哮。他躺下又起来，看不进任何东西。他想去江边溜达，没走到门口就反悔了，担心小罗琴上了七楼他恰巧不在。于是从一个电视剧跳到另一个电视剧，然后是新闻，然后是《舌尖上的中国》。再然后差不多睡着了。为什么总是陷入等待，总是陷入对女人的焦渴等待。他讨厌等待。除了让欲望变本加厉让尊严不断贬值你等不来任何东西。磨掉，耗减，像蒸汽一样挥发。就是这样。对自己的憎恶愈演愈烈就像死皮赖脸等待施舍的狗，不就是吗，等待那个小罗琴离开她帅气的小肌肉，等待她敲门然后进门，等待她满脸鄙夷把他



当个变态大叔也就帮她嗨一把而已。可不是吗。

时间走向二十三点，差不多就是此时他们走在江边走向大厂泥巴垃圾堆洼地水坑的同时。是的，步调也很一致，六个人，六双鞋，踩在硬邦邦的秋天的泥地上砰砰响，如同金属撞击金属，肉切割肉。月亮在树杈间隐现，后来更厚的云扑上来吞掉它。黑暗如同江水，或者说江水之黑被黑夜完全淹没。他们走着，无人吭声，能听出各人或平静或复杂或简单的心事。他不明白为何非要赶去大厂。也迟迟想不起来小马哥生离死别之际到底说了什么。再也没功夫没心情计较那些老掉牙的港产片了。远处，漆黑的垃圾堆有哪样看头，而且必须此时就看。但黑启德的命令不容置疑，上一次他们半夜三更驱车三百公里外的红河弥勒只为找到和当年茨坝街口一模一样的烧豆腐。黑启德说全昆明烧豆腐摊都尝遍了，事实上的确尝遍了，就没找到一模一样的——那个姓氏不详的红河汉子左手烧豆腐右手清汤狗肉，你就是十公里外也能闻见那股淡臭豆腐与狗肉交织的奇香，它像大地像天空统治整个茨坝。他们赶到弥勒街角一家超豪华土鸡米线兼烧豆腐店，天就要亮了，店家忙着收摊，黑启德央求店家千万再烤一盘豆腐上来他给双倍的钱，老板娘勉强答应，烧炭点火，白白胖胖的淡臭豆腐像斩落的小脚趾一样咕噜咕噜滚出来。黑启德方休马基王九依次落座，怔怔望着老板娘那双黧黑巧手，望着炭火、铁架和豆腐辗转腾挪的魔术。香味扑鼻，烧豆腐依次上桌。黑启德小心翼翼举起筷子夹住一只，在卤腐碟里蘸了蘸，送进嘴巴。他们齐刷刷看着他正如现在齐刷刷看着月亮重新出来，天地银装素裹，就像此时滞重的脚步声划拉耳朵清除江水的喧哗，就像现在他们等待，揪心地等待并不知道下一步干嘛。黑启德也许只想看看大厂上空的月亮，也许他想写诗，也许他想爬到泥巴堆顶上纵声大吼。送进嘴巴的烧豆腐吐出来。不是，他说，不是，不是呀。他们失望极了，像死了亲人。老板娘说这可是全红河最出名的烧豆腐啊。黑启德还是摇头，再也没有了，完了。彻底完了。他们跑遍弥勒城也没找到茨坝男人一手烤制的烧豆腐。



返回时马基提议去一趟河口，就近嘛，从蒙自斜插过去就是河口，那里有青笋一样新鲜的越南小处女等着他们。臭味越来越浓，越来越重，他知道垃圾和泥坑就在眼前。他已经看见它起伏延绵巍峨如绝不就范的野兽蹲伏静卧溃败不已，这气息像他小时候闻见的脏血的气味。或一条腐烂的死狗，爬满苍蝇和蛆。好了我们到了。黑启德说。此后再不开口。他们向内，向边缘走去，避开肮脏的污水和泥巴。来自大溪地最深处的垃圾带着上百年前鱼虾的尸骨以及各式各样的粪便、金属和羽毛昂首站着，顶上有磷光闪烁，从下面望去有些瘆人。但几个人的脚步像要摧毁这里，重造这里，像要成为泥巴的统治者，或施展法术将它变成金子。然而它们已经是了，就是金子。一直是黑启德的金子。不能否认不可改变。他深知他们骨头血液精液里都奔流着这些东西，这些磷光闪闪的烂东西，这些黑脏污的垃圾，这些营养过剩的人类馈赠。黑启德两手揣在口袋里，抬头仰望明月，吹出一记口哨。哨声尖细，之后变宽，之后消散，在寂静中闪跳躲藏，像蛇一样。方休说你像他妈的诗人。黑启德没回答。方休干笑数声，然而无人搭理。马基站在黑启德左手三点钟方向，王九站在右手六点钟方向，他呢，至于他，发现自己站在黑启德的阴影之中，于是他后撤，走出来，让月光洒在身上。他忽然有点冷。

三

夜晚总是相似的比如那天晚上等来的是摩托的突突嚎叫。他知道完蛋了，小罗琴的小肌肉一定把她送回来了并且马达抽搐片刻后猛然停歇，他听着那小子将摩托推进楼道，次日必将引来早起婆娘们的谩骂。他竖着耳朵仔细听。他听见两人的脚步声一前一后或一左一右或毫无差别地精准走入屋内。他知道完蛋了。一天之中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失落莫过于漫长的等待与等待之后。他想下楼砸她的门但他知道不行，也不



应该。他是她哪样人嘛何况把人都睡了还想干哪样？他忽然自卑，那种戳在原地被狠狠俯视像蛆一样的感觉回来了。冰冷，蠕动，没有同伙，一个人。永远一个人。

当年孙校长才是穿披风的老大，就像击毙小马哥的皇家警察，手里有枪，有人，有他们从来没有也没法想象的东西。比如灰西装和别在腰带上的一大串钥匙，比如讲话的时候像死了爹妈一样满脸阴沉，比如讲出来的东西像盗版上帝一样有鼻子有眼。他像玩弄傻狗一样玩弄他们，像虐待私生子一样虐待他们。白沫横飞的嘴巴语重心长其实想抽他们筋剥他们皮。好吧现在说说普猛，他跳上绿皮火车漂去北京，此前他们在烧豆腐摊上喝了个通宵，吃了三斤狗肉一千只烧豆腐把街头KTV都唱烂了。下半夜摸到录像厅，起哄说来个“尖刚”的(黄片)，老段不敢放，说他们还未成年。方休砸了两条板凳三只椅子，老段忍气吞声主动赔款两百了事。他们从茨坝溜达到北城动物园，那是一座很小的动物园，没多少动物，只有几只灰不溜丢的老猴子，毛差不多掉光了。他们摸黑进去，找到猴房，把猴子一个个哄起来，听它们在暗夜里龇牙咧嘴吭哧吭哧发出又害怕又可怜的呼号，像一群人形鬼怪。方休觉得猴子实在难看，那种没进化完全的类人面孔就像满腹怨气，就像被人犯忌拖累遭到遗弃和惩罚的杂种。猴崽子呀，猴崽子。他大吼着，马基王九找来棍子，树枝，那时候还是个标准跟屁虫的黑启德掏出一瓶56度杨林肥酒，脱掉长裤，扒下内裤，洒上酒，点上火，扔进笼子，躲闪不及的猴崽子惨叫着传来皮毛烧燎的焦臭。他们用棍子捅，用石头砸，想尽一切办法，被猴类豕突狼奔的惨呼嚎叫刺激得也围绕笼子嗷嗷乱喊。一个个非常清醒。就像被刀子挑开脑壳。之后，他们累了，跑不动了，方休感到无限悲凉，觉得自己也是目光灰亮的猴子之一，也是无法进化的动物们，无法成人，无法被重视被犒赏。他挥挥手，叫停所有人的吵闹，长长的死寂中北风将粗大的钢筋笼门吹得哗哗响，老猴子蜷缩在角落里挤作一团，睁着扁圆的大眼珠子瞪视他们，瞪视这帮打着火机和手电的年



轻人类。方休说，走吧。他们后撤。方休把怀里半只狗腿扔进笼子。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猴子们瞬间忘记了刚才的折磨和羞辱，吱吱尖叫着扑上来你争我夺。方休说我操你妈。然后走进黑暗，走出动物园，返回茨坝大街。空荡荡的深夜月色华美，他们在宿舍门前和普猛紧紧拥抱，祝他北上好运，早一点闯出名堂，取代崔健黑豹唐朝。普猛咬咬嘴巴说没问题，兄弟们，没问题。那晚普猛没回宿舍，方休也没有，他一个人返回动物园，用一束手电强光直射猴脸，一只失眠的老猴子大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像惊吓过度灵魂出窍般牢牢瞪视着强光。他伸出手去，老猴子受宠若惊，一瘸一拐走向他，用粗糙的毛茸茸的手握了握他凉冰冰的手。那种感觉啊，像数不清的玻璃渣子扎进血里然后渐渐融化，如滚烫的银色闪电。除了黑还是黑。他缩回手来，丧魂落魄往回走就像此刻在盘龙江边深一脚浅一脚完全丧失了方向，就像自己不过是老猴子们的一份子再也没了人的尊严，仿佛连心脏也不跳了，仿佛他才是被圈养被击打被羞辱的对象。这种浑身乏力的感觉直到进入学校来到烂教室门口才消停了。天色微微发亮，他听见烂教室传来琴声。这狗日的太刻苦了。但这种刻苦感动不了任何人，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普猛能否成功，更不清楚他哪来魄力非要北上。他从来像个傻子啊，身高七尺的大黑傻子。方休走进去，面对他搏命般的最后一夜弹奏激动得想哭，那种被粗糙带毛的也许快死了的手握住的感觉正如眼前，被吉他的劲爆震得浑身发抖。这种感觉也许和死有关吧他想就像进入女人的最后一射。普猛停下来，满头大汗，看着方休。我没东西给你，兄弟。方休说。普猛说我也没有啊兄弟。方休把那只小手电递过去，普猛懵懵懂懂接过来。他们对视，场面有些尴尬。方休的羞愧和沮丧非常明显，普猛早该看出来啦。他们沉默。然后方休说，到了北京，怕要经常走夜路的，照个亮。普猛说好啊当他走夜路的时候必然想起他，老大。方休返身走出去，猛然发现外面杂草丛生的台阶上站着赵启航。一个很丑的女生，龅牙，金鱼眼，没人待见，但现在，方休发现身材挺拔的赵启航在第一缕



曙光映衬下宛如女神，他呆呆看着，不知要不要叫她。他搞不清楚赵启航是不是普猛女朋友或者他的仰慕者。他觉得他们应该没有关系因为从来没人提起。他站在原地不敢动弹，直到赵启航扭头发现他。她满面通红，咬着嘴唇落荒而逃。她又恢复了她丑陋蠢笨的样子让他十分遗憾。很多事情超出预料，他以为事事清楚其实不是，他以为他知道每个兄弟的秘密其实远远不是。后来悲剧发生了，去北京的人唯有赵启航，她不远千里，谁也没打招呼就从昆明赶到北京，将普猛火化后带回昆明。她一声没哭。很多人惊慌失措。他们终于明白她和普猛的关系应该远远超越了他和兄弟们的关系。她的所作所为实在令兄弟们羞愧。方休觉得日子白过了，就像普猛出神入化的吉他技艺最终被死亡消灭，一丝余音也未剩下。他还记得他在烂教室最后一夜弹了 Beyond 的《无尽空虚》。无尽空虚，像把刀锋静静穿过心窝。他哼唱着，回到宿舍，莫名忧伤。这种感觉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感觉又让他想起老猴子，被它轻轻攥了攥手的奇异的冰冷粗糙仍停在手指之间。还活着的也许明天就死的老猴子啊。

他睡得很不好，一直做梦，梦见穿风衣叼牙签的小马哥，梦见脑满肥肠的黑启德。世界变化太快。死的心都有啊。上帝派黑启德来救他了。也许吧，也许真该马上忘掉金可可了但咋个忘得掉总想起她在大明星舞台第一排亮闪闪的金色短裤踢起大腿亮出裤缝就像直苗苗的白桦，他抹不掉这些，干冰啤酒混合的气息让人招架不住像快死的老猴子扑在身上。两年了，他想要个儿子，金可可不干。跑夜场的女人啊，染金发的女人，身上有冷冰冰的香气，仿佛从冰河世纪里钻出来从大北极冬眠醒来。这种女人，一上场就迷倒众生让参加婚礼的兄弟们讲不出话。他们晓得她是尤物，而他，哪有本事搞定尤物？无尽空虚，无尽空虚。小罗琴在一楼呻吟，那小子，那个小肌肉相当卖力像猪一样拱啊拱啊拱。天快亮时他没听见摩托声。他走上阳台往下看，大洋摩托不见了。他下到一楼，没胆量敲门。他拨打小罗琴电话。她的嗓音正是那种被熬夜和



不健康不充分的睡眠败坏的嗓音，粘附着沙哑的厌倦和满足。他问她为哪样不来，她说不来，不来哪样？他说，咋个不上我家来？她懂了，像跳水的海豹一样清醒了，哦，哦，她说，太晚了嘛，而且他送我回来的嘛。他说我晓得，我晓得他送你回来的。他没走？走了，她说。他说我讲的是昨天晚上。她说他又不是头一次送我回家。他沉默片刻，说现在，现在上来？小罗琴说你有病啊，大清早的，我还没睡醒。她挂了电话。他忽然想把她房门砸开，狠狠扇她嘴巴。

月光亮得出奇。黑启德的口哨声是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太老了，但也不比《无尽空虚》更老。越来越冷，毕竟是昆明深秋，寒气匍匐飘荡，钻进每个人的身体。他看不清左侧马基的脸，右侧王九同样肥硕变形让他认不出来，如果大街上面对面走过去也未必认得出来。时间和事故将这些皮囊抻长，变形，变成另外的东西，另外的人类。那些猴子死没死？尤其那只握他手的老猴子。应该早死了早就死了也许那夜就死光了没人晓得。他们再也没回去，回深夜动物园去。他想哼出来但是不能，也不敢。是的，已经没胆量打断黑启德。二十年前他将毫不犹豫地骂他但是现在不行，现在他是老板，必须跟着他混饭吃。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啊。那天早上他在楼下小摊吃了豆浆油条，给黑启德打电话说，我什么时候上班。黑启德哈哈大笑说就差你了，你现在就来，快，我们等你。他打车赶到江边超美公司，一幢相当土气陈旧的方盒子大楼戳在院子里也许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更久，肮脏的墙面斑斑点点。他走进大铁门，一条棕黄色大狗躺卧地上一动不动，对这个陌生人的造访勉强抬了抬眼皮。他在一楼找到他们，他们一个个站起来，放下麻将和他拥抱，捶打。他们亲热得像这世上最亲密的情人。很久不见了。至少两年。离婚的时候没一个人在身边。这种事也不便说来说去除非他们还是天天腻在一起的兄弟。没到中午他们开始喝酒，边打麻将边喝酒，晃荡着脑袋和身体回忆过去憧憬未来。黑启德将他带入院子，让



他看一辆接一辆一共四辆硕大如火车头的东风大卡车。他让他仔细看。他说哪样也看不出来啊就是普普通通的货车嘛还能是哪样。黑启德眯着眼睛，举起三根手指做瞄准状然后扣动，砰。他让他看车厢尾部露出的东西。他凑近，发现是臭烘烘湿哒哒的黑泥巴。黑启德问他知不知道这是哪样，他说，泥巴嘛。他说，是金子，是黑金子啊兄弟。但他不解释，转身让他看那条黄色大狗——仍懒洋洋斜趴着吐出舌头，肚皮忽高忽低像小风箱一般喘着。它真大，简直像匹马一样大。混账，黑启德说，它叫混账。我本来想叫他普猛的。方休没吭声。黑启德仰着脖子大喊，混账。大黄狗微微挺身看他一眼，又倒头睡去。方休哈哈大笑。黑启德说狗就是狗，所以不能叫它普猛啊。他们很久没有说话，能听见混账喘息的呼呼声。方休的工作是守在院子里纪录车辆驶出又返回的时间与频次。他很快将几辆卡车车牌记得滚瓜烂熟，马基每次从010DE上下来就冲他挤挤眼睛，这是二十年前的习惯动作。他们抽烟，开玩笑，骂娘，然后马基洗脸洗手钻进麻将室准备干掉一个下午。然后是王九，然后是另外几个不熟悉的家伙。比如老扁，整个人真的很扁，像一台电视。此人很喜欢笑，嘴巴里回荡着呵呵呵的声音。他们将大溪地里的泥巴运过来倒掉然后打麻将。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运泥巴打麻将。就连抽烟的姿势也从未改变。不变的是一天接着一天。他到手的钱是过去三倍还多。一天夜里黑启德说跟我们走。他们开别克商务车冲向世界尽头般的海埂大坝，挑了最好的坚尼沃克威士忌摆在硬邦邦的水泥护栏上随便抓一杯一气见底，然后冲暗夜大吼，看谁嗓门最大，喝得最多。方休忍不住哈哈大笑，走到黑启德马基王九中间一屁股坐下，他们问他笑什么，他说你们没发现我的叫声像他妈快死的老猴子？他们没笑因为一点也不好笑嘛。几个陌生的不知哪个带来的烫金发的姑娘却跟着他嘿嘿傻笑把空杯一个个倒满。琥珀色的酒溢到水泥护栏上，像什么东西融化了，时间和金子，理想或少年。也许吧。他面前也许有一部不靠谱的机器，把过去和现在和一切绞杀在酒里。他们喝得烂醉，像被掏空了。掏



空心脏和大脑。但非常愉快。一种严重空洞缺乏方向和落脚点的愉快，如野鸟飞渡怎么也停不下来。他们重复着那些愚蠢的问题重温着陌生姑娘们身上冰冷的香气作鸟兽散。凌晨两点多，他拍打小罗琴的门，忽略了暗处那辆黑色大洋摩托。小肌肉开了门，睡眼朦胧地说你找哪个？然后认出他来。方休酒醒了，忙说抱歉，抱歉。立即跑上楼。很快传来大哭小叫的厮打声，他知道闯祸了。小肌肉跑上来砸门，他开了门，对方一把掐他脖子将他顶在沙发里，他回击，挣扎，但没用，根本不是对手。老了，他知道，他很清楚自己老了。被揍得不轻，也许掉了一颗牙也许断了一根肋骨，总之当时不觉得疼，因为酒喝多了。次日早上懵懂醒来，不过也许根本没睡，疼痛翻江倒海像豹子一样咬他。那种活生生的屈辱让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堆屎，老猴子拉出的屎，摊着，臭不可闻，一败涂地。他摸了摸软塌塌的老二，抬眼看看窗外。天空一片晴好，就像当年脉脉含情的赵启航。他无端想起她来。还想起老猴子厚实粗糙的手，这只黑色的手仿佛将他拽入地下，抚摸他然后埋掉他。阳光非常强烈。赵启航从北京带回的只有一抔骨灰，没有他送他的手电。他猜他早把它扔了，不值一提的破东西啊。我前面说过关于普猛的死我要说很多其实就这么多，原谅我欺骗了你们因为事情就这么简单。活着，死掉，就这么简单。赵启航去他父母家，他们一起选了墓地就在一棵巨大的樱桃树下。每到春天，每到昆明春天彤红纷繁的鲜花就沉甸甸缀满枝头俯身亲吻一个摇滚青年的黑色大理石碑。真他妈笑话，这个摇滚青年刚刚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一只名叫盘古的乐队就死了。无尽空虚。无尽空虚。生命只是上帝炮制的黑色笑话。他爬起来想尽快了结此事尽快。他妈的。要不将黑启德马基王九都叫来，想想又觉得滑稽。一个睡了别人姑娘的老男人凭哪样暴揍人家的小男朋友？可这是二三十年来被揍得最狠的一次操他妈呀此仇不报——此仇不报又咋个？他被疼痛折磨得极其虚弱，一步一颤挨到楼下，小罗琴的门怎么也叫不开。有人说一大早就走了坐她男朋友的摩托走了。他发现大洋摩托真不在院里停



着。他们也许去了火锅店，也许直奔民政局打证了，也许狗日的小肌肉将小罗琴杀了？不，不，刚才不是有目击证人说过他们一起走了而且是坐他摩托走的？那就没哪样好担心的。犯不着。多大的事情啊他活着那小子也活着。好歹，活着。像猴子一样活着。

金可可带走很多东西，一个西装笔挺的家伙带人搬走它们。我未婚夫，她说，我的新男人。喏，这个，我前任。她就说了这么多。男人沉着脸，自始至终没笑一下，和他的小工们把东西一件件搬上一辆五十铃卡车，轰隆隆驶出院子。那就是全部了，再也没下文了，再也没说过一句废话。说走就走了。人人都是向死而去不会相反，想想就让人悲凉。现在他走出五十铃卡车驶离的院子，阳光洒在身上就像洒在车厢挡板上像把刀子，他渐渐觉得暖和，非常暖和，渐渐热起来了，渐渐流汗了。他沿着灰色的盘龙江往前走。7公里，一小时就到。没人会管他迟到一个小时。那四辆超级大卡车将穿梭流动，厢底淌出滴滴答答泥巴草屑臭水。他熟悉了，熟悉那种臭味，熟悉这些金子。黑启德就靠它们发了财。他走在阳光和树影之间，走在水泥砖块铺的江边大道上，很快就是土路，再往前是施工现场，很多机器和农民工在使劲挖地铁。昆明面目全非，不再是二十年前的昆明了。茨坝消失了，动物园消失了。普猛也消失二十年了。那个甩着长发练琴的小子啊，永远21岁。金可可说她要离开他，必须离开。她这么说也这么做的。她多诚实啊，好聚好散呗不爱了就是不爱了。活着无非谈情说爱这是女人最大嗜好就像美容和八卦是她们的最大嗜好，何况这把年纪再不尝尝新的只能混吃等死了。大约三四公里吧，汗越来越多。太阳像鞭子一样抽他，他脱下外套。风里传来浓重的火锅味。他循路过去，是的一辆黑色大洋摩托就停在门口，他低下脑袋，拎一块砖砸了两面反光镜撒腿就跑，往小巷里跑。他跑得很快，身后毫无反应。很好。事情终究要了结。很好。舒服了，我操。他们仍在一楼麻将室，换了几个陌生人，也许是黑启德亲戚，也许是新来的，他没见过，觉得一个个都像骗子。老扁的呵呵笑声不断。他坐在



边上瞧着，半小时后无人愿意撤下来让他上。他回到院子里，马基刚好拉完一车泥巴回来，说老方我带你兜风吧。他说好。走前他们大声喊了一下混账。混账，那条大狗，懒洋洋晃了晃耳朵又睡了。他们从三环直奔大溪地。大货车马力强劲，跑起来像嘶吼的大象。马基点一支烟，也让他来一支。马基说你变了，他说你哪样意思？马基咧着嘴说，你变得比较丧。他说，我没丧。狗日的，马基说，我还不了解你？除了长胖你被撂倒了。狗日的，想想从前。想想吧。方休说你他妈不了解我。马基说我不了解哪个了解。没得哪样。没得哪样。这种狗日的生活，不怕得嘛。你要把它撂倒才行。现在我的感觉，兄弟们的感觉是，你狗日的被撂倒了。你，被一个女人撂倒了。他说没有，我很好，不是你们讲的怂货。我没讲你是怂货。马基说。你只是不一样了。你被撂倒了。多大个女人嘛，都离了，除了黑，都他妈离了，算哪样？女人如衣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反复说。你他妈的被撂倒了。他不再申辩，有点后悔干嘛跟他上车跑一趟。没什么意义。毫无意义，而且没什么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如此而已。浩淼的大溪地吞吐臭气像个超级大粪坑躺在西山脚下，大货车轰隆隆闯入一个小村子，一大堆小山般的臭泥巴早早卸在地上。马基调头，倒过去，打开货厢，一伙肮脏的农民不知道从哪蹿出来就像当年猴群一样围上来操着板锄铲子把泥巴刺啦刺啦飞速铲进货厢。马基下车看着，指挥着。半小时后装满，马基敲敲货厢板壁，上车，发动。一个老猴子模样的老头凑近车窗扔进一袋东西。马基看也不看，抄起来塞进工具箱。老猴子从踏板上蹦下，拍拍膝盖。回去的路上没人说话。风景似乎和来的时候不一样了。他嘟囔着嘴巴想打破尴尬，但很多事物已经变质，像车上的烂泥巴。哪样东西？方休指着工具箱说。你认得嘛。马基说。认得哪样？方休说。马基不再讲话，直到逼进大厂垃圾坑才把东西抽出来让他看。当然是钱。大约五万，很沉，像一堆砖头。方休觉得从没见过那么多现钱。当年他们一起花钱，一起喝酒。通常王九管钱，他们把钱都给他，月底还有结余就去录像厅，去小酒馆，



故意喝醉了在茨坝街头晃荡。他们期待发生点事情，比如为了某人头破血流躺在地上恶狠狠地诅咒。普猛一走，他们将赵启航约到小树林里问她 and 普猛的关系，她两手揣在牛仔裤兜里，一个字也不说，他们问不出个头绪，干脆把钱统统给她，让她转交普猛希望他在北京过得好一点，莫再顿顿方便面了。她并不知道普猛最后一学期几乎靠他们四个接济除非狗日的回趟家找来一笔钱。他们爱他，爱这个长发摇滚青年，像爱周润发一样爱他。次日，谁都没有想到，赵启航消失了，直到半年后被校方从某个歌厅领回来据说她在那地方坐台，再把钱寄给普猛。他们在烂教室请她吃烧豆腐，那是普猛天天练琴的地方，墙角还有方便面盒子和烟头。赵启航叉着两腿坐地上抽烟。不停抽烟。灯光划过她细细的带有小雀斑的鼻梁就像剖开的小水钻晶莹剔透。他忽然觉得她十分好看，也十分耐看。她说这是茨坝的最后一夜了，走之前轮流亲他们的脸。气息里有丝丝酒味。之后彻底消失，直到普猛的噩耗传来。赵启航说是她害死他的，如果她随他去了北京他就死不了。她对他负有责任。就像一个母亲对儿子负有责任。直到去往墓地她才哭了，才完全失控，才跪倒在地让他想起那个烂教室外面的守候之夜。无尽空虚。无尽空虚。去它的无尽空虚啊。普猛才区区21岁再也做不了伟大的吉他手兼主唱了，再也无法超越崔健黑豹唐朝了。他问马基一车泥巴咋个值这么多钱？马基说你他妈傻呀。他说你说说嘛。此时车子经过江边火锅店，没有小罗琴，也不见小肌肉，那辆被他砸烂后视镜的大洋摩托下面蹲着一个老家伙，一面收拾碎玻璃一面骂娘。他让马基靠边停下，跳下车问他，你的摩托？对方说不是我的是哪个的？我操他妈的狗杂种，哪个砸我摩托？你给认得，你给看见，哪个砸的？他摇摇脑袋回到车上。他们一起看着他，像追忆前半生一样默默看着。老家伙蹲地上，耷拉着两手，面对糟烂的后视镜无可奈何。风把火锅店帆布篷吹得呼啦啦响，到处是火锅味臭泥巴味，满地碎镜片反光直刺眼睛。你干的，马基说。方休咬着嘴巴，不说一个字。



四

现在他们挖坑了，像要填埋什么。黑启德来回走动，摇晃肥硕的身体这里指点一下那里指点一下。黑暗中响彻泥巴噗噗飞动四溅之声。方休挪挪双脚，还是冷，很担心感冒。他问黑启德到底搞哪样名堂黑漆妈古洞的挖哪样金银财宝嘛。黑启德说你会认得的。他说你到底哪样东西瞒我，黑启德充满深意地看他然后继续冲黑暗唱歌，《谢谢你的爱》。真他妈烦人，反反复复就这一首。他的嗓子相当破，还经常走调。技校时代他就是个唱歌很烂的家伙。茨坝街头露天KTV非常不欢迎黑启德抢过话筒，那将给所有人，唱歌的听歌的看热闹的带来巨大折磨，很多人一哄而散，一边走一边骂娘。方休想念普猛了，想念趴在门外啜泣的赵启航，但也许更想念老猴子粗糙带茧手指并拢的黝黑的手。普猛从来不是严格意义的兄弟之一，狗日的更喜欢独来独往，一个人弹琴唱歌。他们刚开始也不喜欢他，后来发现他人听话，不惹事，还会弹吉他，有时候就像一束清清凉凉的光，就像那只小手电。他都忘了手电是锡皮的还是塑料的，那一点点光亮直直射向老猴子木然发懵的脸，射向它先知一般巨大的灰色瞳孔和僵硬如死亡的眼白，好像这种简单对视只是为了彼此辨认对方种类和属性，辨认他们活在意外之外的幸运和灾难。他再也忘不掉了。黑启德点一根烟，又把烟和火机都给他，说我不容易啊，兄弟。他又唠唠叨叨。他就是一个唠唠叨叨的死胖子再不复从前的低调麻利了。方休说我晓得。黑启德说他老婆也快跟人跑啦，他老不着家，在公司泡着，尤物泡着，在海埂大坝泡着。我很敬业啊，他说，我一整星期都睡办公室。就在那张烂沙发上，比你家的沙发还烂的沙发。方休说你该回家啊。你不能让你婆娘重演我婆娘的伎俩啊。黑启德说随便，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便。我累死累活为哪样？为你们，为你们几个兄弟。方休说但是么亲兄弟明算账，我们这帮人，总不能……黑启德说当年我们讲过的话，你硬是忘了。方休说哪样话嘛？他说你真忘了？忘



了算逮，忘了说明你言而无信。方休说我真忘了，黑。后者扬扬下巴说我希望我让你们婆娘满意，方休说哪样意思，何况都没有婆娘了。黑启德说以后还会有嘛。我的意思是，以后你婆娘可以上金格买块手表，买个LV包包。你瞧我婆娘，我操。她嫌爱马仕不好看，非要古奇，穿在脚上还是难看，她说要么买格拉菲慕？我说，行，换格拉菲慕，还是难看，那就只有阿玛尼男鞋了。她倒是喜欢啊，一双男鞋居然相当好看，像范爷范冰冰，哈哈。就像范爷范冰冰。他们大笑不止。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概吧。录像里反复折腾的豪言壮语。当黑启德二十年后把他们一个个聚拢，豪言壮语就不再停留在嘴巴上了，但他渐渐反感又说不清为哪样反感。昨天夜里小罗琴上楼敲门。他睡得迷迷糊糊，梦见自己被一只蜕皮的青蛙吃了，惊出一身冷汗。他起身开门，那张小小的狐狸脸被惨淡的声控灯光刺得灰白，像门前的擦脚垫子。他本想出门游荡的，这是他的唯一爱好。他喜欢顺盘龙江走很远，观看江边一群群男女疯狂跳舞，各种各样的舞，自创的舞学来的舞。不可思议的是很多老家伙在劲爆的音乐里下棋，棋盘铺在地上，路灯照上去惨白一片。还有人玩蛇，玩老鼠，玩小孩的玩具火车。每个人都不快乐，否则就不会目光呆滞头发乱甩了。小罗琴踢着板凳说，这几天你咋不来找我，他说你和你男朋友在一起，我咋个找你？小罗琴凑近，让他闻她头发里有没有火锅味。他说你过来，不是我过去。小罗琴说难怪你老婆跟别人跑了，你就那么不顺着女人嗦。他说我就是太顺着她了她才跑的。小罗琴说哪样狗屁逻辑。他说你男朋友呢？小罗琴说，跑了。他哈哈笑了，说你开哪样玩笑。她说是真跑了，火锅店关张了，小肌肉欠一屁股债只好跑路。店是借高利贷干起来的，原本算过一笔账，只要每天上座率七成年底就能挣个70万，不仅能把一多半高利贷还掉还能带她飞一趟巴黎，去埃菲尔铁塔上拍婚纱照哩。方休说咋个会这种。小罗琴说很正常嘛，这种世道，很正常，哪个不欠债，哪个不出轨，哪个不跑路嘛。反正他会回来，只要不死，就会回来。方休说回来娶你？小罗琴点



头又摇头，说你到底给闻见我头发里的火锅味了？他说闻见了，很臭。你很臭，小罗琴。她嘿嘿傻笑，甩掉塑料拖鞋，用大脚趾搓他小腹。他说你整哪样，她说你说呢？他们就在沙发上顺势倒下，完事后她说我认得你去海埂大坝和尤物的女人喝酒了，方休说你咋晓得？小罗琴说我就是晓得。之后他们沉默。再之后她说饿了，起身把他冰箱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倒腾出来准备做一顿晚饭。他说我吃过了，她说我还没吃啊。她给自己煮一碗面条，放了番茄、青椒和几片不知哪个送他的宣威老火腿。吃完后她心满意足，叉腿坐在屋子正中，两手撑在椅子上，微微摇晃着，目光轻飘得像羽毛。他说我有个兄弟，让我去看场子。她点点头，说哪样场子？赌场，酒店，还是舞厅？他想了想说，垃圾场。她笑了，说你哄鬼哟。垃圾场还要人看吗？有人会偷垃圾？哈哈。方休说真的，是真的，没必要骗你。小罗琴抬手卷弄长发，缠在食指上，又松开。方休说你以后咋个整？我养你？还是你去尤物坐台算了，一晚上挣两万。她说你想死啊。他不说了，抬头望着她。他感到忧伤，非常忧伤。不知道今夜之后怎么办，事情将朝哪个方向发展，不知道小罗琴还是不是她小罗琴，不知道小肌肉还回不回来。最重要的，和面对老猴子的感觉一模一样——短暂的出神恍惚灵魂出窍以及万物暂时平衡的幸福都会消失的，也都要消失的。今晚他们在你面前，明晚就不见了，甚至过了此刻就再也不见了。青春，普猛，茨坝，都将消失而且速度飞快你就是用你余生力气也追不上它；那些经历快如风暴，眼睁睁从指尖飞走，而你连抬手指的气力也没啦。他说我给你钱吧。她说我又不是鸡。他坚持给她两千块钱，握在手里薄薄的，不太真实。她接过去了，揣进兜里。这一次沉默的时间很长，就像天已经亮了，就像他们即将分开。但不会，还不至于。她好像随时会走又好像会永远留下。今天她穿一件庸俗的低胸长裙，裙摆上有臃肿的褶皱，像穿着一只包子。他感到浑身乏力并且喘不上气。活着也就如此而已吧。乏力并且喘不上气。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熬夜开出租，像孤魂野鬼一样游荡在昆明的大街小



巷，拉上一个个奇奇怪怪的客人，再把他们扔到奇奇怪怪的地方。有那么几员彪形大汉，他误以为他们会把他骗到郊外干掉，抢他车抢他钱，但是没有，他们客客气气在郊野公园下车，给了他足够的钱而且不用找零，立即勾肩搭背亲起嘴巴来，原来是同性恋呐我操。他不歧视他们，只是好奇并且匪夷所思。男人和男人怎么能干呢？而且是真正的爱情。不过，男人和男人就不用离婚了。多好啊。他从黑漆漆的山路上小心开回城里，在白马小区狗肉摊要了三两凉拌狗肉一瓶大理啤酒，他吃得很慢，通常这是一天的开始，宵夜就是早餐。天色很黑，他想起路上的心惊肉跳忍不住笑出声来。但他提醒自己这种跑郊区的活计以后不能再接，拒载咋啦，命要紧。可为哪样保命？他想不清楚。人人要死可也人人怕死，他无牵无挂可还是怕死。吃完狗肉整个人都热和了，既有想法又没想法，不会辜负这个洒水车悄然驶过的黎明，也不会辜负那些漂亮的招手打车的姑娘。金可可搬走那阵他以为熬不过去，心悸气喘头疼胸闷，常常半夜惊醒，浑身冒汗嘴里发苦。他给很多人打电话，半夜三更的，接电话的人多半不熟，他们骂他疯了，无人听他瞎扯。他起身去江边，去没人的黑暗里，循着江岸密林一路往前，有时碰上做爱的情侣，有时碰上流浪狗的聚会，有时碰上落单的妓女问他要不要安慰一下。他同情她们，但是上帝不怜恤她们，让她们挣扎，疲乏；她们一身的病呀，还那么年轻，年轻得像他出生前的妈。她在他十六岁那年死了，父亲后来去了养老院，后来中风了差点就死。老头子流着口水眼泪磨磨唧唧告诉他说他母亲是被他活活气死的因为他和单位小文员搞上了那个年代哪个容忍这些，老头子活在沉痛的愧疚悔恨中直到中风倒下。那一代人也这样了，把自己活活逼死。像猴子，关在笼子里，或混账，拴在院子里。每个人心中重要之物都不一样也很难一样。他现在找不见的就是这个重要之物。无尽空虚。到底哪样东西是他念念不忘宁愿去死的。没有。不会有。不是金可可。不是中风的老头子或死去的妈。哪样也不是，哪个也不是。



现在小罗琴打着哈欠准备下楼，他问她有哪种想法，她说哪种想法？他说以后，你哪种想法？她说你这个人真是有病，我咋认得以后？睡好觉，吃饱饭就行了嘛，没吃的我就来找你吃，没睡的就来找你睡。他笑了，说随时欢迎。明天我就买一袋最好的东北大米。小罗琴说是今天，你看看，都四点了，今天你就买米买面让我吃嘛。他说没问题。然后他们又沉默了。小罗琴问了问他的新工作，他无法解释清楚，小罗琴也无法想像泥巴咋个卖钱而且是大价钱，他说他也没想明白，而且，是挖泥巴的农民给他们钱，黑启德再把钱按月发给他的兄弟，他们每天再把钱按一定比例从牌桌上返还黑启德的腰包因为每月拿的不少，将近一万啦。他感激黑启德又莫名惊恐，他清楚他干的那点活根本值不了那么多。小罗琴打着哈欠说钱多是好事，你还怕它咬手啊，那你给我花嘛。方休掏出几百递给她，说拿去，拿去。小罗琴笑着说我还真没见过你这种男人，但是老娘说了卖艺不卖身。然而他的手并未收回，钞票亮得扎眼，小罗琴像上次那样一把抓过去，说好好好，下次我请你吃火锅。他说你店都没了咋个请，她说我请你上别的重庆火锅吃嘛你还怕我请不起？小罗琴走后，他睡了一觉，醒来觉得很累，非常累，一种性事之后的深深疲乏，感觉身体和灵魂都空了。

上午十点，超美公司院子里没有一辆车。厨房老许说都出去了，头一转还没回来。他搬一把椅子晒太阳，时间移动缓慢。他回到麻将室，桌子椅子都空着，自动麻将桌也空着，没有一张牌。他抓了一张纸糊涂乱写，车，水，饭，人，操。不是练字，只想打发时间，他觉得无聊。非常无聊。无聊的人还能到手那么多钱，这世道彻底疯了。他想他今天必须输个三五百才对得住黑启德。最先回来的是王九，他穿得油腻腻脏兮兮，仿佛从车底才修完车爬出来。他们抽了支烟，喝了杯茶，他让王九带他跑一趟，王九说你该找个女人了，要么整一辆大车开开嘛，跟我们一起，拉泥巴。他说好啊，我跟你们拉泥巴。王九意味深长地说，不是哪个想拉就给拉的，要黑同意才行。他说不公平啊，我每天喝



茶，发呆，挣的跟你们差球不多。王九说黑早说过了，要对得住你，要对得住方休你。他说太对得住了。他从不欠我。欠，王九说，当年是他踹的孙校长，你顶的包。他想了想说，明明是我啊再说当年我是你们老大。王九笑了，说现在你不是老大了，你必须听真正的老大的了。黑干得好，义气。他说义气二字时方休恍惚看见两把银闪闪的快刀插进黑启德两肋，看见吴宇森的白鸽漫天乱飞，小马哥临死前摆个造型，深情地望着刘德华。他跳上车，王九开得极快，远比马基快，一路风驰电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将他熟悉的昆明大街一次次抛下。他问王九，烂泥巴咋个赚钱，王九说到了你就晓得。这一回的大溪地渔村不是上回那个，是绕了更远的路，差不多到呈贡了。他们沿一个峡湾往里开，村庄七零八落，狗和鸡满地乱跑。三五农民，而且是年纪很大的农民抽着烟，穿着脏兮兮的工装裤和到处石灰点子的帆布胶鞋蹲在一幢土坯房子下面，见大车驶进来后纷纷起立，其中两个冲一个更老的家伙打声招呼，走掉了。老家伙一瘸一拐朝王九走来，说今天没得泥巴。王九拉开车门跳下去，方休听见他说咋个整的，刚才菠萝村还拉了三车，你们村一车没得？老家伙说没人挖嘛。王九提高声音说咋没人挖？合同也有嘛你们赖账？老家伙说不是赖账，你回去告诉你们老大，怕是要多分我们小点，一车多个五千。王九说你们坐地起价嘛，咋个这种！方休闻言跳下去站在老头面前。王九冷冷看他，说你回去，没得事。方休心里一阵刺痛，只好后退站着。这种神秘尴尬的气氛提醒他他再不是当年的茨坝老大了。王九换了口吻，小声说你回车上，这种事情多了，我天天和他们嚷架。老头说不是我们不守信，是村里没得一个年轻人，老信们没力气挖嘛，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咋整？多要五千么我就好交代了。方休觉得王九遭到了勒索，这种事情搁在二十年前简直无法想象——一个路都走不动的老家伙，尿水随时滋在裤裆里的老不死岂敢明火执仗要挟哥几个？这世界已不可理喻，就像小罗琴的小肌肉开个火锅店就背一屁股高利贷被人追杀一样。么你要咋说，不是有合同嘛！他执意不回车上，反而提



高嗓门为王九撑腰，老头皱着眉头看他，表情漠然，像在看一个马戏团小丑。老头冲王九撇撇嘴，说，他是哪个？要这种谈，老子就不谈了，回去找你们老大来！王九扭头盯住方休，高声喝道，你回去，回车上，没你的事情。方休两眼发花，脑袋嗡嗡响，这当然不是那个屁颠屁颠鞍前马后往他杯子里添酒的王九了，甚至和刚才车上讲他被前妻搞走二十万的王九也不是同一个了。真他妈荒唐。方休觉得冷，空气里充满油漆一样浓重的恶臭。他转身，上车。身体瑟瑟发抖。他后悔跑这一趟了。何必要来？何必跟他王九跑大溪地来？和老猴子握手的冰冷感觉回来了。我操。王九唯唯诺诺，说他一定转达，老家伙摇摇脑袋，咬着腮巴不吭声。两人站在恶臭的风中，太阳垂直照下来。随后他们又低声说了什么，方休没有听清。或者，他已经不想听了。否则自己像个贼。他们的交谈一定涉及什么。就像他并不确切知道的事情总有诡异的征兆。金可可离婚前头两个月就喜欢偷偷摸摸躲进卫生间，回家越来越晚，说她所在那支跑场舞队即将解散，不得不抓紧机会去熟悉的场子捞一把。一天夜里他从她包里搜出一只避孕套，她说是跑来夜场的大学生派发防艾用品塞她包里的，当时她在台上跳《江南 style》。他说，你就骗我嘛，你他妈就骗我这个傻逼嘛。金可可像大领导一样挥挥手说，不信你去问嘛，问我们团小小。你认得小小，不信你问她，我要骗你我就去死。金可可一面说一面将避孕套扔进垃圾桶。他说好，我再信你一回。他想一直信她又不再信她。不重要了，信任是这个世上最昂贵也最廉价的东西。直到她找来那个男人帮她搬走家当他才想起那只套，被她扔掉的包装完好的套。他产生了恶心联想，觉得此人下面很小，套又太大了。他看着他们搬走东西，看着他们像两条随时可以交配的狗。他没生气，没真正生气，而是悲哀，像濒死的鱼一样的悲哀，无法游得更深更快了，也无法浮出水面。他们撤的时候说在附近一家火锅店定了座，彬彬有礼地问他去不去，他摇摇头。后来他从小罗琴和金可可之间找到这种神秘联系，也许金可可的头发里就充满油腻腻的火锅味，而她，小罗琴，头



发里从来没有，只有淡淡的柠檬清香。她周身都散发这种年轻人特有的清爽的幽香，一种让人心醉神迷的温热柔韧就像上好的小牛肉洒满匀细的大理石花纹。现在他知道这种糟糕的征兆往往确有其事。他明白了。王九马基看他的眼光的确变了，不再是二十年前的兄弟了，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还称他兄弟。真傻啊，哪有叼着牙签为兄弟挡枪的小马哥？王九爬上车，牛仔裤兜撑得滚圆，露出两只硕大的白塑料袋。他拽上门，发动。调头的时候那老家伙站在墙角冷冷打量。开出三五公里，王九拍了拍他大腿，表达某种不得不如此的歉意。他从他屁股后面抽出两只袋子，最少几万，太重了。王九说他妈的硬是少了五千。说不给就不给啊狗日的老杂种。方休问他究竟，王九说我告诉你，你不准告诉任何人，更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方休点头。王九说这种事情其实很简单：超美公司从农民手里买泥巴，农民呢，尤其村主任或村支书就给回扣。方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买些烂泥巴？王九解释，是政府的钱，必须花出去的大溪地垃圾清运费，买任何人的泥巴都是个买，关系熟的农民再把钱倒腾回来，也就是回扣。花公家的钱，得公家好处。懂了？方休点头。王九说这个村的老杂毛越来越精，硬是多留五千。你不能得罪他们，要是得罪了十来号人不挖泥巴，你还咋个搞钱？

一楼麻将室早就噼噼啪啪了，认识不认识的都泡在里面，茶也沏好了，一个浓眉大眼画浓妆的女人毕恭毕敬端到黑启德面前，后者眼皮都懒得抬下，手里稀里哗啦砌牌，打出去，忽然转向方休，说你没见过嫂子？方休说，是弟妹。黑启德哈哈笑，说，好，好，弟妹。我是比你小两个月，才两个月嘛，你叫嫂子。方休没叫。王九暗暗踢他。方休叫了：嫂子。一切像暗下来又重新点亮，他坐在一群人中间，既不受用，也不孤独。不，他从不孤独，又非常孤独，连金可可也无法缓解，仿佛一直呆在外面，外部，因为人群的激动稍稍激动又很难彻底激动，或者说，很快就陷入难熬的没法说清不知缘由的尴尬。他想他大半辈子除技校那点快乐时光之外都是在尴尬中打发的，没留下印记，连一点惊喜都



没有。也许结婚当天是例外，仅限于上台前二十分钟，此后就是面对一两百号亲友的张皇失措。哪个能讲清楚婚姻到底带来哪样，好，还是不好。一个女人走进生活或者生活与一个女人捆绑起来真不可思议啊要命的是你一直在找她。找到了，他以为找到了，慢慢就不对了。事情总在变化。从这头到那头。就像你舔掉过期面包上的糖霜就必须啃面包了。这个女人，这个面目不清的老女人真是黑启德老婆？没印象，没有一点印象。他明明参加过他们婚礼，明明第一天来公司报到就见过现在哪样都想不起来。他对婚礼也没印象了，好像根本没有参加。女人冲他笑笑，说你莫听老黑的，叫弟妹就行。方休还是执拗地又叫了声，嫂子。女人笑着出去了，过一会又回来，手里举着一只柚子，说沙田柚，很甜的，来来来，要吃的举手啊。

方休抬脚走到外面。下午太阳灼人，他尽量缩在阴影中，瞅着那条叫混账的大狗。此狗黄背黑尾，大得像匹马，侧躺在滚烫的前廊水泥地上睡大觉，耳朵不时扑扇着赶走苍蝇。方休盯着它上下起伏的肚皮，忽然突发奇想：混账的肉，好吃吗？他摇摇头，觉得自己极其可耻。他喊它，混账。混账眯着眼睛装睡。他捡起一粒石子砸它圆滚滚的肚皮。混账还是爱答不理。狗日的，他没法想象这么懒的狗怎么看家护院——从不叫唤，除了吃就是睡，对任何陌生人进进出出一概不闻不问。他搞不清楚黑启德养条废物干哪样。如果狗不是一条尽责的狗，就和一只鸡一只兔子差球不多，你还指望什么？难不成，养来杀吃？他又叫它两声，混账，混账。狗还是没动静，他提高嗓门大吼，混账！混账总算抬抬脑袋，冷漠茫然地看他一眼又睡下了。他正想上前踢它，忽听一个女人轻声说，听老黑讲，你离了？方休回头看她，猛然觉得她老得太厉害像换了个人。女人的巅峰期不过短短两三年，过了就跟报废的破车差不多。他笑着说，是的，嫂子。莫叫我嫂子。她说。算了，过去就过去了，我给你介绍个新的，漂亮，脾气好。他轻轻点头。女人说有空来家坐。他还是点点头。女人又说，你听说哪样了？听说哪样？他不明



白。你跟马基王九都出过车了？是。我们是兄弟嘛，当年茨坝四人帮。女人笑笑说，我认得你们感情好，但是，咋个讲呢，很多事情都有底线。莫怨我没提醒你啊。方休回头看她，女人的表情似笑非笑，从包里掏出一粒奶糖拨开扔给混账。嘿，嘿，吃糖。混账半仰脑袋，一嘴咬住奶糖，三两下就嚼吧嚼吧吞了。它听你话啊，方休说。对，它听我的，女人说，你莫叫它混账，它能听懂，晓得你们骂它。你就叫它兄弟，它保管听你的，不信你试试？方休笑了，冲混账大喊一声兄弟，混账果然窜起半座身体冲他呼呼摇尾巴。不可思议。他们嘻嘻哈哈又逗一阵狗，女人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折回麻将室。兄弟，狗日的兄弟。他瞧着他那张眼角耷拉目光呆滞的肥厚的脸忽然一阵凄凉。兄弟，你该走走了，兄弟。你狗日的要天天这种躺着你就废了。这不是狗该过的日子。人和狗都架不住这种过日子。你狗日的又没离婚你连老婆都没娶过呢。

五

现在挖土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有的地方出现咔咔响声就像挖到石头或废铜烂铁，马基王九和那个不算太熟总是输钱的老扁破口大骂。两个尤物的野姑娘穿着超短裙脚踩银色高跟鞋，抱紧胳膊顶着寒风瑟瑟发抖。越来越冷。月亮出来又消失，像人一样蒙受欺骗，像大溪地污染严重照样被打捞贩售的鱼，像地底的隐秘节奏，或磕磕巴巴的诗。他问黑启德这是干嘛样，黑启德说挖呗，有宝贝，挖到底下，挖到最底下就晓得了。快了。方休说挖来挖去不就是一滩烂泥巴？黑启德一言不发。长长的沉默就像他们之间早就无话可说了。月亮在云中钻进钻出，银辉一泻千里，让高高的臭泥巴堆闪闪发亮如钻石的穹窿。他想象不出烂泥巴底下埋着哪样，竟让黑启德大费周折。黑打破沉默说你还记得录像室老段吗，还记得那个瘸子？他说记得。其实老段不瘸，只是走路慢，脚



底板拖拖拉拉。你说得上名字的录像带他都能翻出来，有时候屏幕上刺刺溜溜闪出一片颗粒，也有清晰的好片，比如《跛豪》《天若有情》。他们经常熬夜，第二天该上课上课该踢球踢球一点不累。方休记得他们摸黑进入录像厅那种黏啦吧唧的臭味汗味烟味精液气味裹挟的闷热持久不散像坚硬的灰，你必须戳破它像戳破假话一样戳破它。一排排木头长椅依次排列坐上去感觉很硬很硌，像受刑，但你轻而易举就接受了这种刑罚，摸着椅背的粗粝手感像按住柴禾，很多人或坐或躺，有人干脆坐在椅背上两脚戳在椅子上这样就能看得更清更远。大多数时候他们去头一排坐在椅背上，有时遭到隔壁某校的人说你们这种整么，让别人咋个坐下来？黑启德立即拿眼白横他，叼着烟，抬起下巴说你再讲一遍？那人刚要回嘴，马基王九都站起来，有时候普猛也站起来。对方立马蔫了赶紧赔礼道歉或换个地方坐下或溜出录像室。瘸腿老段一通宵放四部录像，看完天就亮了；有一次连放《倩女幽魂》一二三四，从里面出来方休已搞不清楚哪一部讲了哪样。被打趴下塞到椅子底下的无业青年一表人才，他们打完了继续坐在椅背上等着，等那人纠集的人赶来。瘸腿老段求他们说哥几个要打架外面打嘛，莫这种整嘛给我个面子嘛我免费一个月，给要得？方休不发话。瘸腿老三腆着脸哀求，一把鼻涕一把泪直到浑身汗湿。时间无比漫长，像大铁锅里煮不烂蒸不透的猪下水。能听见外面马车的得得声不是汽车轰鸣真他妈怪了。然后他们散烟抽了一轮默默等待，十分钟后跳下椅背就当瘸腿老段不存在来回跑动把椅子踢得砰砰响，后来集体走到外面，马基想找一件顺手的家伙被方休制止，最后统一意见最多用棍子不用带铁的更不用带尖带刃的。微蒙的光拖过清灰色水泥地，那家伙口中的兄弟们还是没来，一个也没来。他们等到中午，等得瘸腿老段也不得不放弃听天由命躺在前排呼呼大睡。王九打开录像机重看《纵横四海》，最后火拼那一幕终于出现，哥几个一起拍巴掌热血沸腾嗷嗷叫喊，好像死是很简单很容易也很诗意的事情。但没人跑来送死，清晨的寂静变成一种沉甸甸的需要正视的东西，一种冷酷而高



贵之物。他命令黑启德打车将人送往医院。黑启德马基将年轻人从椅子下面拖出，打了车扛进后座消失在茨坝街口。日光清亮，风也没有。该吃午饭了。他们晃到川菜馆点了几个下饭菜，又要了两瓶包谷酒，准备在酒桌上消磨整个下午。黑启德马基赶回是两点多钟了，说事情办妥。他们喝了很多酒。一直到天色渐黯才返回学校蒙头大睡。

现在黑启德问他还记不记得那天，那个男人，被他们撂倒的总货，都以为他死了被扔在椅子底下蠕动哼哼的总货他们还站在椅子上砰砰跳啊跺脚啊。方休说当然记得。黑启德说，那天他和马基没去医院，没送他去，而是，拐个弯就撂街上了，扔在街心花园，但给了钱，自己一个月伙食费，整三百，塞他口袋里而且马基也把身上二十块一并掏了。他们打车回来，撒谎说把他送医院了。方休大吃一惊。原以为他们要是狠揍了哪个也会将他体面地送去救治的，像个爷们。没想过黑启德中途撂挑子而且瞒了这么多年。而且，最重要的，他们没听他的，他的话失效了。没人知道那家伙是死是活。完全没有下落，也再没见过。这个社会青年，穿白衬衫戴太阳帽的青年说消失就消失了。不，他没死，这个愣头愣脑整天喝得醉醺醺诅咒社会和命运的家伙注定不会很快就死，他会换个地方晃荡，其实并不招人讨厌，反而有些文艺青年的派头冲姑娘吹口哨。他们就为这个揍他，因为他冲班上一个姑娘吹了口哨。他们揍他时姑娘吓跑了。他们连她是谁都忘了，有人说她不是本校女生也是社会上混的。反正他们把他修理了管他为哪样修理，反正修理他的时候相当爽，现在方休深深后悔当时没那么多暴力是否活得好一点，现在每个人都不太好就因为当年罪孽深重。这种狗屎不如的生活，这种向死之先的闷躁，不是人过的。哪一种才是，他想不出来。蛆一样啊，像蛆一样。彻骨的冷又来了，像脚底黏在冰面上两肺顶着受恶臭和重压，脑袋疼得要命。

好吧说说小罗琴，这一次我提醒你们打起精神因为我讲到关键之处了。我知道这个小说稍稍有点长，稍稍超出了你们的耐性。没关系，好小说会让你一气读完的。嗯，我们的小罗琴隔三差五上楼吃饭，看电



视，做爱，但从不留下过夜。他问她为哪样，她说，不习惯嘛，你的床太硬了，不好睡。方休说，我从后面抱着你睡嘛。小罗琴捂着嘴巴笑说，你是电影看多了哦。再说，睡你床上过夜就成你的人了，凭啥子，我是有男朋友的嘛。他说行啦，你走吧。他听着她的高跟鞋咯噔咯噔下楼，消失，再也没有声音。他还想过另一种让她留下的方式：喝酒，她喝醉了就留下来了嘛，他无法理解她既然愿意跟他睡为哪样不愿留下。有时候空荡荡的家实在无法容忍，尤其半夜里一个人也没有，一条影子也没有。连条狗也没有。他想过养一条狗，但你知道的，这种小区单元楼养狗不合适，一是气味浓烈，二是楼层太高狗爬不上去特别是它老了之后，三是到底养哪一种狗也让人费脑筋，太小的太老实太大的又怕伤人。想来想去索性算球。小罗琴一度消失两个月，他忽然就没她消息了。这些姑娘的臭毛病无非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无非成天做梦嫁个好男人，但事实呢，事实也许她骨子里从来缺乏自信。哪个能给她自信呢总不能是他方休吧。当她忽然回来，两个月后忽然又像过去那样砰砰敲开他的门，他的心情糟得像冬天晾在寒风中的树杈，像一盘好菜硬是放坏了。为哪样回来？他想，走就走球了吧何必回来？她还是那样，似乎没变化，但仔细再看还是有变化：红色紧身套头T恤，牛仔裤，布拖鞋，很性感，也很憔悴，两个大大的黑眼圈；烫过的几绺发丝垂在窄窄的小脸两侧，像托着一碟过期奶油，眼角的淡蓝色血管周围已经有细细的纹路了。小罗琴进门脱鞋，经过他时重重叹气，走到饮水机前接了水歪进沙发一气喝干。然后瞧着他，说有哪样吃的？他说你自己看。她打开冰箱，找到些碎肉沫，又找到永远充足的面条，烧水，下面。他说你好像饿了三天三夜，她说我减肥呢，咋个。他问她跑哪去了。她说还能去哪。他沉默片刻说，找你小男朋友？他跑贵州了，我去贵州，又说在四川，我又跑四川。她说。又去北京天津上海，最后在南京。狗日的，我在南京找着他了。在一家健身房当教练。讲到此处她不再讲了。他们一起蹲在茶几边上吸溜吸溜吃面。然后他又煎了四只鸡蛋，夹三只给她。



她风卷残云，抹抹嘴，打个饱嗝。他问她吃饱没有。她说有烟吗？他给她烟。她抽两口，将烟雾喷向空中，忽然盯住阳台上一株快死的茛苕。他说你看哪样？她默默抽烟，说你没发现？他说发现哪样？她说，花快死了。他说他买下房子的时候它就在那了，要死不活。没有真死，也不能再活。是吗？小罗琴来到阳台，伸手摸它枯皱的叶子和干透的粉色小花，说你弄点水来。他打来一缸子凉水，她接过去小心翼翼浇到根部，棕色的脆泥发出饥渴的吱吱吞咽的声音。小罗琴笑了，说还能活哩，你给相信？他说我不信，她说赌哪样？他说赌一万块。小罗琴笑了，说好好，一万块钱。我输了大不了陪你睡觉嘛。他细看茛苕，除了显而易见的衰败，死亡，除了根本不可能重新焕发的被新水激发的一点点湿润，小小的陶瓷花盆里面哪样也没有。该死的终究要死，也早就死了。她要是不提，他早忘了。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小东西哪怕死了还守在阳台上迎接日升月落。他说后来呢，后来？后来，小罗琴说，我问他呀，钱还上了？他说早得很。他跑路么就是不想拖累我。我说你还要不要我嘛，他说你哪样意思？我说我帮你一起还。多少钱？他说一百多万，拿命还？我说我帮你呗。后来嘛，后来，我就帮他还钱。小罗琴停下来，斜睨着地板。方休说咋个帮？话一出口就后悔了。他猜得到，只是不敢说。三个月间她挣的每一分钱全部交给小肌肉，但就在前天的前天，对，五天前吧，一大早，她说，一大早起来，就在小肌肉的出租房里，他又不见了。消失了，收拾东西又跑路了。她等了三天毫无动静，也联系不上，连微信红包也没收。她立马买了火车票哐当哐当回昆明。为哪样还回昆明？为哪样还要回到这个糟烂的给她霉运的鬼地方？她不晓得，她说，回不了贵州那就昆明。必须是昆明。楼下房子还在，东西还在，她走的时候通知房东要是半年不回来就再不回来了屋里一切随便处置。可还是回来了，不明不白地回来了。

方休说你为我回来的？小罗琴笑了，说你好聪明哟，被你猜到了。他们哈哈大笑。然后陷入长长的沉默。他知道她是另一个人了不再是三



个月前的小罗琴了。人和人就那么奇怪。他盯着那盆茛萝，那盆似乎被新水催发生命的将死或已死之物，尚未脱落的叶片在暗夜里颤抖。时间到了。小罗琴说。他忽然担心她冲上阳台上纵身跃下。但只是短暂的幻觉，被黑暗和穿堂凉风撕扯后像墙上的水渍迅速消失。小罗琴说，今晚我跟你睡。今晚就睡你床上，好吧？他说不出话来。一种深深的无奈从水泥地板上升起来。他们看了看电视，他感觉到一点点情欲也被长长的时间摧毁了。他晓得她今晚不会下楼，不会钻进空闲三个月的发霉的被窝。

那么事情就这样了，就这么发生也就这么结束。他问她小肌肉还有多少外债，她说利滚利呀，少说八十万。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们上了床，磕磕绊绊准备做爱，小罗琴忽然掩面哭泣两腿并拢。他明白了，不再勉强。小罗琴丝丝缕缕的哭声很快止住了，说你嫌弃我？他说没有。我咋敢嫌弃你。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和下巴，说我才不信你不嫌弃我。他说我真不嫌弃你，不信我们就做啊。她两腿又并紧了，说，不要。他亲了亲她脸上的泪痕，说你睡吧，赶紧睡。她闭上眼睛又睁开，瞪着天花板说为哪样有人来钱那么容易，我们来钱那么难，要了命的难。人不值钱，像垃圾一样，对，就像你每天守着的臭泥巴。这话给他带来重重一击。他想起泥巴，到处泛滥臭气的没人要的烂泥巴。是的它们相当值钱，一车一车运来又一车一车清空。他说我给你讲讲这些泥巴，那我给你讲讲。她听着，没打断他。最后她摸黑抽了一支烟，说要么你跟我走。跟你？方休说。去哪里？我是半截老倌了。你喜欢我？小罗琴说。方休想了想，喜欢。那你跟我走？小罗琴说。方休想了想，去哪里嘛？小罗琴半天不说话，红色烟头在黑暗中明灭。屋里全是烟味。他喜欢这种气味。烟味香味汗味纷乱交织提醒他还活着。他想看看她，但只在烟头骤亮的瞬间才能看清她额头粗糙的皮，让他想起老猴子的手。是啊如果她真想离开也希望他跟她离开他会答应的。会的。这种事情很简单。没有比这种事情更简单的事情了。小罗琴说，哎。他说你叹气干哪样？她说，哎。长长的沉默。我没想好去哪里。小罗琴说。



到处都一样嘛，到处都一模一样。吃饭睡觉挣钱。是。他说。她又不说话了。是的。他又说。吃饭睡觉挣钱。吃饭睡觉挣钱。他们笑了，她挠了挠他的手心，然后抓住他。两只手紧紧握了很久。然后她说，按你的说法，你那个兄弟，来钱太容易了。他没吭声。她说，天爷，撑的撑死，饿的饿死。天爷。他还是没吭声。她说，你说他到底在哪。他枕着两臂说，我咋晓得。小罗琴用一种仿佛老去一百岁的沙哑嗓音说，该找的地方找了，该跑的地方跑了。他盯着她，幽暗之中完全看不清楚她，唯有她饱满的身体在朦胧月光下清澈发亮。你到底要去哪？他说。不晓得。她答。么你还叫我跟你走。她噗嗤笑了，说你当真了？是。我他妈当真了。他狠狠搂抱她，带着强烈的恨和爱狠狠搂抱她，想把她柔韧的身体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变成黑暗的一部分或者死的一部分。次日她帮他收拾了房间，他给她一千块钱，她收下了。他问她要不要那盆葛萝？她说算了，她会定期上来浇水的。好嘛，好。她走后他呆呆看它，枯死的叶子在凉风里打颤，单薄得可怜，也小得可怜。他想它肯定是活不过来啦。死就死了吧何必要活呢。小罗琴咋想的？他差点伸手碰它，差一点。就怕它干瘪的叶子一碰就碎，像残破的钱，像干土和沙子。

那以后小罗琴很少再上来敲他的门，他想下楼找她，又不敢贸然闯进去，何况她惦念着小肌肉，何况他明显感到那种距离了。她本来就不是他的。明显在躲他，就因为她在南京所干的，就因为那三个月所干的，为了一个小男人。男女之间的最大悲哀莫过于亲密之后比亲密之前还要陌生，这就好比恨是从爱中滋生的，无聊和疲惫也是。他们偶尔在一楼过道碰面也没话说了，点个头就擦肩而过，他能听见她掏钥匙开门的声音，脆得像在他太阳穴上钻个洞。走廊里有灰味臭味霉味蜘蛛网味。阳光恍恍惚惚，他也恍恍惚惚，从盘龙江边走回来，从公司走回来。回来也无所事事。一直无所事事。还剩一口气，还能喘气，如此而已。如果傍晚不上江边观看蹦迪的跳舞的他会觉得自己根本没活着，也没哪样希望。除非小罗琴搬走让他再也见不到她，或者干脆搬上



来管他三七二十一和他住一起。再或者他们真的去远方，某个远方，比小肌肉跑路之地还远。死是容易的，活着，就算没想法地活着反而很难。连续两周至少十天，黑启德约了他们去尤物会所泡，泡在酒精和坐台小姐们的劣质香水味和硕大胸脯上。身体的发泄轻而易举，之后一切发青，发灰，像普猛的骨灰盒，像拉回来的臭泥巴。他们一个挨一个呕吐，呕吐。他不快乐，一点快乐也没有。只是重复这些。千篇一律毫无变化。像猴子或老鼠。女人不是他的，工作不是他的，都不是他的。方休不知道活到这把年纪哪样才是他的。身体还是死亡？或者说，本来就不是他的，是上帝的，上帝早就做好安排最后都要收走反抗都是白搭。他忽然对黑启德说要么我不干了，我想，我他妈的想，一个人呆着。黑启德十分惊讶，瞪着眼珠说兄弟你没事吧？出哪样事了，我给你做主。方休讨厌这个大胖子训斥他们讨好他们。可他的确是最讲义气的一个，是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兑现了。狗日的。狗日的。跟他比起来他们都是白痴。从黑的掌心也能感到老猴子的粗糙微冷，一种没来由的生理性排斥，一种不言自明的傲慢和厌烦。连堕落的机会也没有。就是没有。他没这胆量，他只是活在罐头瓶子里探出脑袋喘气喘气然后等死。

下午他去江边看那些小孩钓鱼，还有点意思，鱼钩上挂一条小蚯蚓，鱼线上没有鱼漂，他们靠哪样东西感知鱼儿上钩啊。孩子们嘻嘻哈哈，说总有办法钓上来嘛，只要鱼咬钩。问题是，你们没办法晓得鱼咬不咬钩啊。晓得晓得，手感嘛。小孩们三五成群，像钓鱼老手一般蹲在江边石头上，抽着烟，望着江面那根细如发丝的钓线一动不动，像被施了定身法。方休只见他们钓起过一条鱼，一条小马鱼，最多小手指大小，几个孩子高兴得哇哇乱叫。他凑近时发现小马鱼死了，硬了，像一小摊鼻涕，孩子们讨论如何处置它，有人说扔球掉，有人说烤了吃，又有人说这么点小屁肉吃我呢吃。最后他们将鱼摺在水泥地上，其余孩子用脚底捻它，踩它，动作麻利凶狠，最终让它变成一条小小的泥巴。方休心惊肉跳，问他们咋要这种干，一个孩子的答案是死掉的东西只能这



种干嘛。方休沿上游离开，希望下次不再见到他们。但隔三差五他们又出现了，像头一回一样兴高采烈。方休再也不想见证一条鱼的结局，于是掉头就走。一个年纪稍大的孩子喊他，叔叔，我们钓着大鱼了。他说，哪里，多大？孩子比划着，让他跟上。他十分好奇，一伙孩子像胡狼一样包抄上来，散在他四周。岸边凹陷处有浑浊的江水，并不见鱼。然而大孩子口气坚定，这么大，他张开两臂，足足半米，他估摸着。应该是鲤鱼或草鱼，不会是江鲫，鲫鱼不会如此之大之肥。他们要在江边点一堆篝火烤了吃？还是拿去菜场卖钱？这些念头刚冒出来就消失了，因为他忽然明白这只是一出恶作剧。孩子们涌上来用脚踹，用手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揉进并不湍急也不很深的盘龙江。他上下扑腾，喝了几口水，立即稳住自己游出几十米从下游上岸。孩子们在上游石桥上哇哇大叫着作鸟兽散，跑得飞快。他湿哒哒爬出来。太阳高悬，但寒风吹得人难以招架，那种针刺刀扎的疼插进骨缝里血液里，像要将他整个拆除。这种感觉在他回到楼下遇见风尘仆仆似乎仍在搜寻的小罗琴时抵达高潮，他绝望地望着她，小罗琴说你去江里游泳呀？方休没回答。小罗琴说你喜欢穿衣服游泳？他还是没回答。小罗琴说赶紧换下来，我帮你洗。他说谢了，不用。然后转身上楼。那只是一伙孩子，最多八九岁。如果能让他们哈哈大笑一阵像记住当年麻袋套紧老孙狠踢一样记住那也值了。几分钟后小罗琴上楼敲他的门。她半个多月没敲他门了。她手里端着一碗姜汤，说趁热喝。他接过去一口一口喝净。小罗琴摸着门框说她打听到小肌肉消息了，在河口。河口？他说，他在河口干嘛？小罗琴没回答。他换好衣服裤子，知道这一回差不多是诀别了。小罗琴果然说，晚上就走，坐夜班车走，昆明到河口六个小时。他说我晓得河口，万一他又叫你做鸡呢？小罗琴笑笑说，那就做嘛。他说你要多少钱？她没说话。他从抽屉里掏出全部现钱——最多两千——她接过去，塞进兜里。他又把空碗递给她。之后，两人像从不认识又想竭力认识的陌路人一样小心对视。什么也看不出。熟悉的东西消失了。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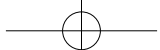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了。小罗琴冲他摆摆手，再见啦，然后转身，啪塔啪塔走下楼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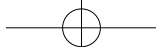
现在他满脑子都是这些。这些无法拼接完整的碎片，这些让他伤心却又难以讲清楚为何伤心的碎片。保重，有空么，来河口。这也许是她撂下的最后的话了。他不忍心看她慢慢下楼，不忍心听她微微拖沓的脚步声缓慢流逝，于是他果断地，轻轻地掩上门。在门后站着，等着，但不晓得在等哪样。无尽空虚。无尽空虚。马基王九挖坑的声音持续不断但总算突破了那些金属块或大石头突然通畅了，声音轻松响亮，锄头和铲子一次次吃土的吭吭声仿佛引吭高歌。黑启德说你没见金子吗。方休说我晓得你的意思。黑启德说对了，对了，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为兄弟几个多累啊，冒多大风险啊。他说是。黑启德说你认得个屁。方休没有回答。黑启德说挖好了吗？马基说，快了。方休毛骨悚然，忽然明白他们大概想埋掉哪样东西了——如果不是东西是人呢？比如自己，一个大活人。但有哪样理由？为哪样？他就问了这个问题，这个看起来不该问的相当愚蠢的问题。黑启德说我怀念过去啊，兄弟，非常怀念。方休说，我也是。黑启德说我们当年把瘸腿老段的录像厅都包了场，像土匪一样。方休说，是，像土匪一样。然后他不再开口，任由黑启德继续唠叨下去。说昨夜尤物的小姐居然嫌他个子矮粗，他就用三千现钞卷吧卷吧塞她下面。还小吗，现在还小？离开时姑娘含着眼泪把他送到楼下。黑启德说他想念普猛，想念这个狗日的一天到晚只会在烂教室弹琴。想念孙校长，想念赵启航，当然还想念那个穿白衬衫被打趴在椅子底下的装逼青年。没有好时光了。黑启德说。再也没有了。妈的。他忽然仰天大骂。方休真担心他们将他拖到大坑前活埋了。是他吗？不会，他们是兄弟。那为何在烂泥巴堆里挖个坑？黑启德返身盯着他，目光黝黑闪亮像洗得精光四射的黑玻璃球。我问过你的，小马哥最后时刻说了哪样？方休摇摇头，说他忘了，全忘了，也没再重新看过。黑启德咧开嘴巴微笑，小马哥说——算球，你自己看。有时间你就自己看。你不能哪样都来靠我。方休的心被放下又掀起，只好怔怔看着他。有人



找过我了，黑说。哪个？方休说。你说哪个？黑说。方休说，女的？黑启德哈哈大笑，说你瞧瞧，还惦记女人啊，我早说了有兄弟就万事大吉何消惦记女人？终究要跑的，不管哪个，吃饱喝足都会拍拍屁股跑掉的。方休望着他，望着被黑暗塑形的兄弟，这个变形的胖子，忽然觉得喉头抽搐四肢僵冷，嘴巴鼻子怎么也喘不上气，似乎已经遭到几个家伙的就地处决。混账在脚边蹲伏，像狼，像马，眼珠子在暗中射出森森绿火。活着总有小辫子，我们的小辫子，我的小辫子，这回还是我的，就像当年的小辫子被老孙攥住一样早晚也会被攥住的。泥巴，这些烂泥巴。让女人见鬼去。黑启德从他肩膀上挪开热烘烘的手，转身命令他们混账过来——混账，那条溜号的大黄狗，那条懒惰的宠物，从不履行职责的老家伙，出走二十天居然被他们重新找回的犬类，现在一路慢慢吞吞像个七老八十的胖子极其傲慢地摇晃到坑前。狗日的，黑启德亲昵地扇它一巴掌，跑，老子让你跑，老子让你不打招呼就跑。是我亏待你还是兄弟们亏待你？每天好吃好喝伺候啊还不知足？黑启德挥了挥手，揽住方休。喝令混账及所有人往坑内看去。马基王九一动不动两眼微闭两手放在小腹上方如同祷告，混账也耷拉脑袋静静瞪着圆坑恍如先知。现在形似坟墓的坑洞里面汪着薄薄一小层积水于是印出月亮的晶莹的影子。巨大的沉默像黑魑魑的蝙蝠趴在众人之上。方休仔细看但并不能看清。坑内除了死一般的垃圾臭泥巴脏水之外还有哪样。哪样也没有。到底要看哪样？是例行仪式帮他驱散被人狠狠俯视的阴霾？或只是黑的恶劣玩笑？片刻之后他莫名颤抖，像被一记长长的叹息笼罩了。黑启德死死搂着他，必能感到他的绝望、惊惧和悔愧，像那伙将他踹下盘龙江的孩子，像那只老猴子伸出的布满茧子的大手。方休忽然想起阳台上将死的茑萝真的活过来了，叶子泛绿花瓣泛红了，真是奇迹啊。这让他倍受鼓舞觉得小罗琴或自己也许会有不错的未来。是吗，未来？他们的未来？他别开头去，直视温柔巨大的圆月。



骆一禾纪念专辑





“星核的儿子”

宋琳

1989年5月31日，骆一禾逝世于北京地坛医院，时年二十八岁。就在他逝世前两个月，年仅二十五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两位诗人具有象征性的死亡事件过去三十年了，就当代诗歌进程而言，或就骆一禾“价值理性建设”的文艺复兴式伟大抱负而言，两个年轻生命的遽然离去，乃完成了一种精神献祭，似乎应验了席勒的诗句：“在诗里获得了永生的人，/必在生命里沉沦。”但历史诡计的神秘运作，也使两位诗人的死与那个转折性的时间节点永久地联系着，所以回头再读骆一禾《灿烂平息》的首句与结句——“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把我们轻轻放过”，不禁唏嘘不已。

2011年4月，我曾在张桃洲和西渡召集的骆一禾诗歌研讨会上谈到“骆一禾的诗歌有一种先见性，他的诗歌仿佛是为了未来而写作，跟八十年代的语境奇异地拉开了距离。”记得那次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海子和骆一禾的区别被忽视了，人们更多将他们视为孪生的一对。而他们二人，包括西川，在写作、诗学理念和交往中的确缔结了一个兄弟会般的精神共同体，其中骆一禾的思考与人格魅力又使他处于中心的位置，海子和西川都称他为“良师”和“精神导师”。这种关系甚至让我联想到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以及艾默生、梭罗、惠特曼的三位一体。骆一禾通过朱正琳的介绍，阅读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经由朱正琳本人和张珏的回忆，我们知道那是骆一禾诗学建构的重要思想来源，尤其是“文明周期”和作为文明生长动力的“创造性个人”学说，给了他思考“第四



代文明”和寻找“复兴之路”的强烈的使命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朱大可在长篇文章《先知之门》里认为海子和骆一禾的写作“都可以纳入诗歌神学的形而上框架”，而前者属于“绝望神学”，后者则是“希望神学”，骆一禾自己对文明解体的当代境遇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处于第三代文明的末端：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里；也处于第四代文明的起始：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见张珏《大生命——论〈屋宇〉和〈飞行〉》）。据此，我们大抵可以在气质上将海子称为挽歌体诗人，将骆一禾称为颂歌体诗人，而他们的精神同源，即基于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在骆一禾的“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的论断中得以彰显，且是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二者都曾表达过对浪漫主义诗人的热爱。在1985年的《祖国》这首诗中，骆一禾写道：“人/到这个时候/就该长成神明了”，这与施莱格尔“每一个善的人总是愈来愈变成神”（《雅典娜神殿断片集》【262】）几乎是一种呼应。在《美神》《火光》等诗学文章和书信中骆一禾设计了文化的历史活动的“顶点”，那个顶点即“诗歌的未竟之地”，由此引申出一种合乎理想的“共时体诗歌”，其方法则是（援引博尔赫斯）与神性建立一种“垂直关系”，即恢复赫尔德林“人将幸福地/用神性度量自身”。关于那个想象中的垂直体，海子曾在长诗《弥赛亚》中画过一个连接天和地的天梯，它是《山海经》中的一个原型形象，骆一禾则如此描述：“诗歌之垂直是未竟之地踵身而下，进入我们的渊薮。它是称为‘上帝’和称为‘本无’的本体的通明”（《美神》）。这里的“本无”很可能借用了禅宗的观念，因为他反对“做古代历史的盟主”（《水上的弦子》）的态度与禅宗颇为相似。穿越历史积层追寻神圣性的渴望使得那个垂直体成为骆一禾称为“诗歌心象”的一个象征物，恰如叶芝对螺旋体的迷恋。在最后的诗篇《壮烈风景》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朝向“顶点”的垂直运动的一种想象的构型：



星座闪闪发光
棋局和长空在苍天底下放慢
只见心脏，只见青花
稻麦。这是使我们消失的事物
书在北方写满事物
写满旋风内外
从北极星辰的台阶而下
到天文馆，直下人间
这壮烈风景的四周是天体
图本和阴暗的人皮
而太阳上升
太阳作巨大的搬运
最后来临的晨曦让我们看不见了
让我们进入滚滚的火海

1989.5.11

诗人的理想是，诗应该呈现“文明史与史前史的一种集成状态”，而诗人只有超越唯我论，获得“博大生命”才能进入“灵魂附体的状态”（《美神》），这首诗的诸元素用诗人自己的话说，“互相放射并予以熔铸”，目标是达成“生命的自明性”。它也许是骆一禾诗学理念的一个总括。而最具雄心的抱负当体现于他和海子并驾齐驱的长诗写作中，他留下了《世界的血》和《大海》两部长诗，后者五易其稿，尚未完成。陈东东评价说：“《世界的血》是中国自有新诗运动以来的第一部真正的抒情史诗”；西渡在他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中分析道：“组成《世界的血》的二十首诗合拢成了一个严整的对称结构。全诗六章，第一、第六章，第二，第四章，第三，第五章分别对称，在内容、风格和音乐性均形成对话和呼应”。第六章《屋宇——给



人的儿子和女儿》，副标题“穹顶”先期暗示了那个“顶点”，我猜测那是响应海德格尔“适宜于神的作为神的住所”的一个心灵建筑。骆一禾在一封致阎月君的信中所谈，大抵可以作为他欲构成文明新生的“时代的紧迫感的内在原动力”的另一个证言：“我和海子之写作长诗，对于价值理性建设的考虑也是其中之一。结构的力量在于它具有吸附能力，这可以从古代希腊的体系性神话、史诗，即希伯来体系神话的奠基对西方过程的影响，不断塑造和作为认知构架的例子得到证明。”正是从这样一个参照系中开始了建立中国“体系性神话”的巨大工程，因而他格外重视“结构的力量”，“斫伐与造型”，“聚集的运作”，进一步，他还从“太初有生”这一自创的命名中寻求创作与创世的同一性，“在这里，诗、‘创作’已成为‘创世’的开口，诗歌使创世行为与创作行为相迴（西渡解读为‘相遇’），它乃是‘创世’的‘是’字”（《火光》）。至此，我们大致可以明白他说“诗歌是这样构成了世界的一种背景的”意味着什么。“是”即存在，亦即肯定。而诗人在诗歌中的运作，乃是“登临的行动之血”（《屋宇》），是“热血自焚”（《女神》），是“血管里沸腾着金星”（《飞行》），只有当诗人之血与世界之血合一，神性才灌注于人性。写于1988年的《修远》中那句“那人与方向诞生/血就砍在了地上”中的“血”就是这两种血的合一，在垂直运动中“踵身而下”的速度和力量就聚集在“砍”这个动词中。

骆一禾在短短的生命中的加速度的沉思与写作为当代诗歌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我想把他和海子称为夸父式英雄并不为过。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美国学者在其所著的《与思想家对话》书中发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年龄差距在三十年之间，如果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骆一禾“时间是有浓度的”的认知，即他诗中出现的“三种时间”中的命运时间维度当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先知般的文化使命感。我在别处提到过织女星的光到达地球的时间正好也是三十年，那么，依据他的“大时间观”，如今我们能否像他期许的那样对“未竟之地”做出“危蹊”之“登



临”？能否回答“我为什么看到了朝霞”？这位“星核的儿子”，“血做的诗人”，早早在天路上走着，年轻而闻天命，独往而义无反顾，或许中国神话原型中奠基“体系性神话”之圣殿的“息壤”，已在他绘制的“图本”中标示出来了，那“图本”也已递给了我们。获得大生命启示的人是不死的，故他能够从容地说出：

不惧死亡者
必为生命所战胜

因此，这个“骆一禾纪念专辑”不仅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通过纪念为诗歌招魂，以重新审视的目光，辨认那已然诞生的“人与方向”。需要说明的是，本专辑中的七篇文章均由陈东东先生提供，特此鸣谢。

2019.3.17



圣者骆一禾

陈东东

聖：通也。从耳呈聲。式正切。

——《說文解字》【卷十二】【耳部】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道的那些诗人，大概都知道瓦莱里1927年某次演讲说过的一个段子——印象派画家德加也写诗，有一次他问马拉美：“我弄不懂，这首小诗，我怎么就写不成，其实我脑袋里装满了思想。”马拉美回答：“不过，德加，写诗靠的是词，而不是思想啊。”瓦莱里又特别指出，马拉美的“这句话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教训。”

1987年(算起来，刚好是瓦莱里那次演讲之后六十年)，骆一禾写了一篇题为《美神》的长文，其中有几句话，像是专门针对那个“重要的教训”而发的：

当没有艺术思维中一系列思想活动作为压强和造型的动力时，固有的词符是没有魔力的，必须将它置入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这置入的力量前已所述：生命自明)，它本有的魔力才会像被祝颂的咒语一样彰显出来，成为光明的述说，才能显示其躯骸，吹息迸射而有其身。这一叙述的过程，实际上与我们所有的思索，所有超出自我、追蹊美神、人类思乡的精神活动，乃是一种同步的过程，而不是绝缘于这一切的，思想也不是诗之外的一种修养。在什么思想水准上写作实质上是决定写出什么样的诗作的，这就是诗的精神和艺术的关系。



区别于热衷发明的语言和将创造让给词语以提炼音乐的马拉美，骆一禾显然更看重思想活动和精神活动对于诗歌的决定性作用。他稍后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语言创造的用心不在于去寻找一种新词的捏造或仅是寻找词汇的新组合，也不在于使用某种修辞格，如：词语性活用、词位倒装、变形、通感等等。”他强调瓦莱里演讲的那个段子相反的一面，实在也包含着重要的教训。

骆一禾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道的那些诗人中的一位，我在这里将他跟他大一百多岁的法国诗人马拉美扯到一起，除了上引那些话的针对性，还因为瓦莱里在那次演讲里对马拉美的一些讲述，让我联想到了骆一禾。瓦莱里说马拉美“重新塑造了他作为社会的人，塑造了大家所见到的那个人，就好比 he 重新塑

造了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一样。他很奇特地给我们树立了重新创造自我的榜样，树立了自然人品经过深思熟虑重新熔铸的榜样。一个人，能够按计划构想并且完成自己的思想、行为、作品，总之，构想并完成自我存在的全部形式，就像马拉美那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呢？”我觉得，这几句话也多少适用在骆一禾身上。当然，瓦莱里这么说，基于他对马拉美的熟悉程度，而我认为它们也许能部分移给骆一禾，却主要由于对他的阅读（我所听闻的骆一禾，也是我对他的一种阅读），以及跟他的一面之缘。

1988年晚夏有那么几天我在北京，听说参加诗刊社第八届青春诗会的诗人正集中在鲁迅文学院。因为一同参加过前一届青春诗会，西川就跟我说：“咱们去一下，把他们都见了吧。”尽管那些诗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我知道其中有骆一禾，也就很想过去见。这之前我刚读到他那篇阐发其“情感本体论（亦称性灵本体论）的生命哲学”诗观的《美神》，对他的文章和见识都很佩服；我也听西川和老木多次提到他，感觉他们在他们中间处一种“可为人之仪则”的位置。八十年代的许多诗人很愿意想象诗歌江湖，骆一禾再加海子、西川和老木这四个从北京大学毕业的



诗人，曾被唤作“北大四才子”；老木以编辑诗选、参与活动而为人知，另三位则以诗见重，又被称为“北大三剑客”。骆一禾还是《十月》杂志的诗歌编辑，主持的“十月的诗”栏目，在我看来，在当时的官方刊物里最具诗学眼光和构筑的雄心，刊发了西川、海子、昌耀等人规模不小的长诗和组诗。西川说他把我1987年写的一首一千行的长诗《夏之书》推荐给了骆一禾，我也很想听听骆一禾会怎么评点……

我跟西川、老木一起去了鲁迅文学院，直奔骆一禾住的那个房间。门敞开着，但见他在窗外传入的鸟叫声中独坐——一年后的一篇悼文里我演义说“他在倾听——鸟啼。虫鸣。黑夜落幕的声响。”实际上那时离天黑还有好一阵子。跟我所想的不太一样，他长得南方人模样（我当时并不知他的祖籍是浙江临安），微笑的面容甚至还有点儿女相，见我们进来他即招呼一起坐，样子沉静，嗓音沉稳，说话沉着，很有说服力地一下让我觉得骆一禾就该是这个样子的。聊了没几句他对我说：“你《夏之书》里那个‘趺坐’很了得……”，又说这首诗还在排队。我心想这好像有点儿敷衍，而他已经在谈论海子，就没有接口再说什么。后来我从他夫人张珏的来信里得知，骆一禾专门抄写过《夏之书》……原来他的确是很认真的人。他的言谈语调却多各式幽默，比如西川曾跟我讲起，有个想在《十月》杂志发诗的人打电话讨好骆一禾，说他家环境一定特优美，门前一定有个花园什么的，骆一禾回说：我家门前就一臭水沟……而那天西川提到之前成都诗人万夏到北京，回去后写信说自己跟北大“三剑客”见面是“三英战吕布”。骆一禾听了就笑道：“那我武艺差点儿，就算刘备吧。”

骆一禾给我谦和大度的印象，据说他更有博闻多识，谈诗论道言语滔滔的一面。我想到他的写作气象宏大，高屋建瓴，“武艺”实在一点都不差——不过他自比刘备也很有些道理，显然他是个主脑，有着要去成就大业的英雄气概，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我忘了我当时有没有顺着这种诗歌江湖的路数一路想下去……



2

1981年10月，骆一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第三个年头开始不久，他写了一首《桨，有一个圣者》：

有一个神圣的人
用一只桨
拨动了海洋
蒙昧的美景
就充满了灵光
天明的退潮遗下了彩霞
夜里闪光的菌类、贝壳、石英
宛如醒来时旋流的思想
成串的追忆
和细碎而坚硬的希望
那位灯塔一样
神圣的人
鼓起我张满的帆
引导我认识且启示海洋
像他手中的船桨

“圣者”之神圣在于“用一只桨/拨动海洋”，以使“蒙昧的美景”“充满了灵光”……“圣者”更“灯塔一样”“引导”（“拨动”）“我”——“鼓起我张满的帆”，去“认识且启示海洋”（以使“蒙昧的美景”“充满了灵光”……）。诗写到“像他手中的船桨”而告结束，诗意却又回到“用一只桨/拨动海洋”的起始——“我”作为“桨”的“拨动”，又将“灯塔一样”“引导”另外的“我”“认识且启示海洋”，以使“蒙昧的美景”“充满



了灵光”……那么，可以设想，“我”也会是“圣者”，“神圣的人”也曾有“灯塔一样”“引导”（“拨动”）他的“一只桨”；骆一禾展现在诗中的这个场景，有着连续不断的进程。那是下一个波浪接续上一个波浪的循环涌动，让人想到阴阳相生，日夜往复，生命周行，世界轮回。

要是去考察骆一禾是在怎样的时间意识里展现这进程的，也许，就更能从这首短诗窥见他宏阔的诗歌观念、构想和企图。骆一禾区分过三种时间：物理时间（以分秒、时日、年月为度量）、历史时间（以朝代、时代交替为度量）和命运时间（以文化、文明兴灭为度量）；诗中设置于进程的这个天明场景，在这三种不同的时间里，显示的意义强度和深度会很不一样。而几乎从写作的一开始，骆一禾就以文明为背景对诗歌进行周密的思量，他所选择的路向，跟八十年代同在写作的那些诗人大相径庭——将自己的事业和使命跟以诗歌去处理循环涌动在时间里的文明主题关联在一起。在他看来，诗歌与文明互为因果，文明之生即诗歌之生，反之亦然。

几年以后，1985年6月（那时他已任《十月》杂志的编辑），骆一禾在一篇文章里说：“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文明一如人生，也有它的春夏秋冬，有它的诞生、成长、解体与衰亡……”——要是找来骆一禾所写的文章，你会发现他差不多在每一篇里都提到了斯宾格勒这个名字，想来他确是很受这位德国历史哲学家的影响——参照斯宾格勒和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论著，骆一禾认为我们正身处某个旧文明的末端那种“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里”，但这也让我们身处一种新文明起始的“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很难说1981年的骆一禾已有了这样的看法（北大读书期间，他就从校友朱正琳那儿听说了斯宾格勒，读了台湾版译本《西方的没落》），不过，《桨，有一个圣者》所描绘的进程中的天明场景，不正该是“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发生之一刻？其动机——那只桨拨动海洋的动机，则是忧患于朽败的旧文明——骆一禾称之为“大黄昏”或“文明之秋”。



“这种文明之秋，”他说，“也许正在远东华夏文明中进行。诗人正企图通过史诗去涵括本民族的精神及历史，殊不知大树已朽，乡土中国带着自身的沉痾，从基本构造上，已很难对世界环境作出有力的回应。……鲁迅说：这是一个大时代，其所以大，乃是不唯可以由此得生，亦可以由此得死，可以生可以死，这才是大时代。他所说的乃是五四时期，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而这一努力，迄今尚未完成，中国的有志者，仍于八十年代的今日，寻找自己的根，寻找新思想以冲刷陈腐的朽根，显露大树的精髓，构成新生。”1981年骆一禾二十岁，他写的这首十五行短诗，已经透露出这样的气息，这样的消息，这样的滋息。

如此反观“圣者”的主题就更有意味。在这首诗里，“圣者”包涵启示和灵光，这便是灯塔的比喻；而那个桨的比喻，将行动置入了“圣者”的概念。“圣者”合启示、灵光、行动为一体，并且行动是第一义的（诗题中“桨”被列在“圣者”之前）：由于桨拨动海洋这样的行动，才有所启示，才充满灵光，才建起灯塔，才又引导行动……而这既是骆一禾的生命塑造，也是他对诗的要求。当骆一禾去做一个诗人，就努力于人跟诗的合一，生命跟诗的合一，他“感慨”一位朋友“视诗为生命的象征”，自己则认定“诗作为精神现象乃是生命的世界观”，使我们“获得生命的自明性”。“圣者”之圣展现为连续不断的进程，这个以行动为第一义的进程，同样展现生命和诗。当它又是命运时间这广大视野里的展现，这首小诗就该被读作微型史诗，或一首巨型史诗起于青苹之末的开头。

3

在《美神》里，骆一禾提到他“印象原生的第一个地区，那是靠近大别山脉的淮河平原上一个金色的三角地带，由罗山、息县和西华组成的丰饶的土地：那里终年可以吃到大米，然而仍是落后的，因为那里不出



别的粮食，发过大水，人们成片地溺毙，采石为生，排外情绪强烈但一口饭也要分半口给流浪者和乞丐，那里的人们把北京去的学生都看作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一种叫作冰瓜的香瓜只需轻轻一击就甜得粉脆，粉脆的甜……”他大概在读小学的时候到了那个地区，几年后才又随父母返回北京。

骆一禾进北京展览路一小正逢文革，被视为“狗崽”，状态颇多压抑和紧张——据说放学途中往往有孩子袭击“狗崽”，逼得骆一禾成了短跑高手（以至在北大期间，他的百米跑速度仍然令不少同学惊艳）——不久他家被拆散，被发配去生活条件跟首都相比极其恶劣的外省农村。然而对于少年骆一禾，这却也算一件幸事，因为不必担心再遭追骂甚至追打了。他多年后写进诗论的那句“那里的人们把北京去的学生都看作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透露的大概正是他当年在乡下感受到的小小转运和小小荣光。头一天送他去当地小学校读书的老保姆翟阿姨有一个说法：“一禾来了，整个教室都亮了！”

1961年2月骆一禾出生的时候，他那曾为国家计委副主任的父亲骆耕漠，已被调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的组长（退掉了标配给他的小汽车，开始骑自行车上班）。那是因为受到“潘（汉年）扬（帆）集团”案的牵连——以后每逢政治运动，骆耕漠便会挨整挨斗。1964年，骆耕漠由于旧案及支持孙冶方，包庇张闻天、顾准等“新问题”，在“四清”运动中以“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嫌疑”遭猛烈批判，1965年到周口店劳动。“文革”中骆耕漠被“贴标签”、抄家、游街，1969年11月，又随经济研究所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三年。骆一禾的母亲在物资部工作，那时候则下放到相邻息县的罗山县，骆一禾与他的几个姐姐及老保姆翟阿姨，只能全都跟着母亲……1978年以后，骆耕漠才又恢复了部长级待遇，先后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顾问。

骆一禾是骆耕漠最小的孩子，取名“一禾”，有“一禾发千枝”的期



待。父子俩感情深厚，常常切磋；据说，当有人来家里向骆耕漠这位经济学家、学部委员请教的时候，骆一禾会去旁听，偶尔还会一起交流。有一次西川谈起骆一禾，说他父亲是“中国财会制度的奠基人……骆耕漠和顾准的思想据说是影响了薛暮桥，薛暮桥影响了邓小平，所以后来有了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这个局面……”这讲得或许稍嫌夸张——西川想说明骆一禾的写作跟他颇有来历的家庭出身大有关系，觉得骆一禾诗歌的“宏大叙事”与之相应，“他看问题从来都是从大处着眼，因为他们家看到的问题都特别大，所以宏大叙事就宏大叙事吧。”

骆一禾用功的往往正是他所谓的“背景诗歌”，不过他也有纠结个人经历和经验，细节真切具体日常的诗。1987年9月，他写了一首《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讲述他早年的乡村生活情形，他的启蒙，他受到的最初的诗歌教育：

在那个年代
我是怎样得到唐诗的呢
是在淮河两岸枯水的乡村里
一个私塾先生的宝书中
他开始说诗
他竟至不能讲完 而抚摩着
我的脑袋

……

先生一世只收集了五种唐诗
先生看我如看幸福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先生身体健康
摸我的脑袋 口称娃儿



“好娃儿 讲完书了……总有一天讲完
那会儿就教不着你了……
天下很大大如诗
放手去闯 莫结秀才
结识几个有本事的英雄”

诗的最后一节写道：

乡村大道的两侧
栖息着黄土坟墓 队队上擎一只粗碗
麦田投往天边
前方是焚烧石灰的土窑
学诗的尽头是火红的窑火
而
直去东方的坡道下面
滚动着雨天之后的急流

这首诗朝向虚构，却更多回忆录的成分。它说出了另一个出身，平行重合于西川所谓骆一禾跟普通人不一样的那个特殊家庭出身。很可能，穷乡学诗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启蒙者和“老女人”翟阿姨会对骆一禾更加重要，这使得出现在他笔下的诸如土地、荒山、平原、树林、青草、野蜂、布谷鸟、果实、石头、地平线、村庄、农人、河的旷观、汗水淋漓的马匹、仓库、夕阳……乃至“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是美丽的”——这些八十年代的诗人最爱用诗歌擦亮的言辞，都有其过往和内心生活的来源。尽管在河南农村只短短几年，但“学诗的尽头是火红的窑火”，这让骆一禾在其“印象原生的第一个地区”的出身变得深沉。

要是去为他1981年写下的那首短诗里的灯塔/圣者代入一些名字，



无名“而抚摩着/我的脑袋”说“好娃儿……那会儿就教不着你了……放手去闯……”的乡村教书先生，就该并列于对但丁说“孩子，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其余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的维吉尔，以及，串在金链上的那些相应的名字。

4

在骆一禾的又一番回忆里，他开始读唐诗则是在1976年，他初三，从河南农村回北京已经有几年了。“那时候，”他在一封信里说：“基本都是靠手抄，至今留有一本二百页的手抄本，到了今天，还可以看出我对自己评价的一个依据：我的诗一开始就和朦胧诗有不同的起点。李白对我的影响很大。”骆一禾还提起，有一天“海子来玩，我们重叙往日。海子说他以前的诗作大都没有留下，我于是拿出过去抄的七本诗和六本写的诗，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有同感的是，当时读得比较多的浪漫主义诗歌，至今还是我们的营养，对他影响比较深的是雪莱，而对我影响深的是莱蒙托夫，拜伦和济慈。所以在北大，后来也有人评论我说是一个跨阶段的人物，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指的是我1983年以前的诗。而重读我的旧作，在1979年之后，这里面，浪漫主义的短命天才们，当然是我的启蒙老师。”对于“朦胧诗”，他则“是以浪漫主义诗人，唐诗和性灵为底色去接触它的，开始就有意去判别它……”。骆一禾作此回顾，是在1987年之后，那时候他早已发出对“朦胧诗”一代诗人“彼辈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壮语”。他又说：“朦胧诗和五十年代的诗歌一样，是我们所要对待的传统之一。”

不过，无论是在承继或反背他之前的传统方面，骆一禾都没有像跟他同时出道的许多诗人那样，赶往唯恐更新换代得不够先锋的那条路径。他的所谓“跨阶段”也许曾短暂地跨进过先锋的行列，但终于迈向一种史诗性的写作。



尽管他觉得到1983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对自己写作风格和道路的确认，然而他并未立即全力以赴。他写诗十年，《骆一禾诗全编》的诗歌部分八百多页，从1979至1985前六年的诗歌篇幅却只有一百三十页不到。他把1984、1985两年称为自己的“沉思期”。在他看来这是个“渡河时期，要么淹没，要么有另外的命运，要么有一个总的成型，有新的质地。”那正是“第三代”旗帜被祭起、比“朦胧诗”一代更年轻的诗人们喊出“pass北岛”的口号、四下串联、各种地下诗刊层出不穷、各种派别诗群雨后春笋般冒头、诗歌主张标新立异、写作实验和写作革命仿佛每天都在翻着花样的年月——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上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呈现的正是这种虚张缭乱的繁荣局面。骆一禾则对很多北京的诗人朋友说：“还要再拉开距离，完成自己的大构思。”在书信里，他写道：“我感到必须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

1986年，他有一首标题下注出“写给自己”的诗，《闪电（一）》：

大地昏沉
注视着城市在脚下飞去
我斜跨着播种者的步子
当然
我杰出的思想旋转着
向四周抛撒出
热情 雨水和冰凉的葡萄
是不可能看不出的
——一团酷似我的黑暗
无声无息
只有在它即将进入我的时候
它突然明亮



在我的漩涡中消失了

在我的心地里

躺着一排修长的银钥匙

感觉到此刻透穿我的那种超绝和完美

并知道我身边那些人

那满头的黑发和感情

都不是过眼云烟

我无法替代

于是

一场大雨在我的背后轰然坠下

巨鸟冲天而起

红太阳在我的心口滚烫翻腾

这是自我塑造和自我期许之诗。诗的第一段仿佛五年前那首《桨，有一个圣者》的变奏接续，“我斜跨着播种者的步子”、“我杰出的思想旋着”（与五年前那首小诗里那句“宛如醒来时旋流的思想”何其相像），同于“用一只桨/拨动了海洋”，但那个行动的圣者已经是“我”；“向四周抛撒出/热情”，令“一团酷似我的黑暗……突然明亮/在我的漩涡中消失了”，也几乎可以跟“蒙昧的美景/就充满了灵光”互换——“酷似我的黑暗”及“我的漩涡”，则让人意识到“我”是因被启示和引导而在黑暗和漩涡里成为行动者、圣者和灯塔的。第二节的前三行，贡献的就正是一个开启的形象——进入“我的心地里”的“一排修长的银钥匙”“感觉到此刻透穿我的那种超绝和完美”。这个形象，加强了这首诗对《桨，有一个圣者》的变奏接续，像是从灯塔/圣者的角度讲述了如何“鼓起我张满的帆”——而这又可以转换成已经是“我”的那个行动的圣者去启示的角



度。

之后四行，“并知道我身边那些人/那满头的黑发和感情/都不是过眼云烟/我无法替代”值得多留意。这当然涉及“我”与“我们”、生命中的青春、友谊和爱情等等方面，但它更涉及骆一禾“博大生命”的观念——尤其“我无法替代”既可读作“我无法替代”“那些人”，亦可读作“我”是“无法替代”的——第二年他在《美神》里提示：“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整体生命中的个人是无可替换的……在一个生命实体中，可以看见的是这种全体意识……”我想，这四行诗也当作如是观：“我”跟“我身边的那些人”乃至所有个体的人都“无法替代”，并且复合集成为“整体生命”或曰“博大生命”，它“作为一个历程大于它的设想及占有者。”而历程、进程，几乎就是骆一禾诗歌的形态(《桨，有一个圣者》是，这首《闪电(一)》也是，他两年后那首沉郁和高亢激越混响的《修远》更是)，他对于“生命”的这种设定和指认，也构成了他的诗学基础：“语言中的生命的自明性的获得，也就是语言的创造。”因而，诗，“是生命在说话。”要之，自明于诗中的生命、说话的生命已经不是个体。对此，诗人西渡有非常好的阐明：“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命既和无数生命个体相联系而处于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中，又在时间方面连接着人类过往一切进化演变的历程，同时作为现时的一个节点而联结着未来。”“我无法替代”“博大生命”，但“我”是“博大生命”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亦“无法替代”……

5

写给自己的《闪电(一)》，也相承了五年前《桨，有一个圣者》的“圣者”主题，并更鲜明地将之置放于“大地昏沉”“大雨坠下”的大时代背景里，更坚决地引向豪迈的行动。可以说，“圣”是骆一禾一生的关键词，“圣”不仅贯穿他的诗歌，也贯穿他的为人。



我跟他的交往太少，短暂见面来不及交流，通信则是在海子卧轨后才有那么一两个来回，而且注意力全在海子，但这已经能让我明显感受到他高尚人格的光照。跟他有过接触的人大概都会感受到这种光照，就像张珏所说，当年骆一禾就是以他的人格魅力，给很多朋友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她自己也从他那里汲取了一种力量……

他的形象，或许是他北大五四文学社任理论组组长时的样子，每天在学校里行色匆匆，手握一卷稿纸，从一个文学青年那儿到另一个文学青年那儿，策划组织着什么活动；或许是诗友撰文回忆他去朋友家串门时的样子，“轻轻地推门，轻轻地坐下，轻轻地说话，做着一些简单的手势”；要么是登门去他家时看到的样子，“总是在那张桌子前，无一例外地在写。”他带给人表里如一的纯粹和纯净，确确实实与众不同的人格、诗品和学养。而在诸如此类的形象内部，有一个骆一禾首先对自己说话的声音，那就是长诗《世界的血》里的一行：

居天下之正 行天下之志 处天下之危

西川说骆一禾“文雅、渊博、深刻、正直、爱朋友，对于世界文明负有使命感。”又说骆一禾“具备真正宜于思想的头脑，并且在他平和的面貌和随便的衣着之下，有着他对于诗歌艺术的严谨态度，对于苦难人生的关注，以及对于宇宙大真理和万物之美的迫切向往。”因而他称“一禾是我的良师，八年来我受益于他，以至在他病逝之后我竟觉得恐怕在我将来的岁月里，再也不会遇到一个像他这样近乎完美的人……”对于海子，骆一禾也起着指引、启发、示范和批评的作用，被海子视为兄长和老师。对于朋友、推而广之对于他人，骆一禾有一个很好的说法：“既使在我停顿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我在继续，这就是朋友对我最重要的意义。这得以使我不是只有一个灵魂。”这说法贯通于“博大生命”的观念。而坚信诗是生命在说话的诗人，也一定令其人品和人格贯通他的



生命和诗歌。

所以，如西川所述，骆一禾“从他开始文学思考以来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成就高迈的诗歌、宽广的诗歌，必要求诗人以其人格的力量为后盾；……所有属于开辟文学未来的人们，必要求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统一：这是由于，就纯文学领域而言，我们目下的种种努力无异于空谷足音，六十年来我们可资汲取的新文学财富不多——比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前者不是太过丰盛，而是较为苍白。”能够接收的遗产之少，让写作者只能更多地从内在自我汲取力量。

如他很早就认识的一位朋友所说，骆一禾像圣者一样的诗品人格是他的一种天性，但他也总是在重新构想和塑造自我，深思熟虑重新熔铸诗品和人格。他自觉的“沉思期”和几乎一意孤行的写作，都是这种塑造和熔铸。

写这首《闪电（一）》的时候，骆一禾也在筹划，为他任诗歌编辑的《十月》杂志开设“十月的诗”栏目，1987年初，这个栏目正式推出。在为之而写的引言里，骆一禾以“我们”的名义说：“某种感撼人心的东西骤然变为能听见似的，从而体验今人的生命。这诗歌不是心智一角的独自发声，而是整个精神生活的通明与诗化，它熔铸剥凿着现代意识，直到那火红而不见天日的固体呈现于眼前，新鲜而痛楚。”原稿有个副题：“一份短提纲”，并特别标明“中国当代诗坛最简明的、也最富于雄心的纲领”（显然是对“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铺天盖地的那么多宣言的一个回应），依据的正是骆一禾的“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之诗观，表达了骆一禾欲成就一种非个人的“大诗”之雄心。其最后那句话，跟《闪电（一）》结束那句“红太阳在我的心口滚烫翻腾”可以对照着读。

写给自己的短诗和以“我们”的名义为中国当代诗歌说话的提纲，一定跟骆一禾“沉思期”里“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的思索有关。西川说，“沉思对于一禾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沉思中听到了血涌，并起立歌唱。”“巨鸟冲天而起”，恰是骆一禾“沉思期”过



后的写照。

6

从《骆一禾诗全编》，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他“巨鸟冲天而起”的高速且不断加速度的写作：1986年，九十多页；1987年，一百六十多页；1988至1989一年半不到的时间，一百四十多页短诗外加二百八十多页、七千多行的长诗。如此推进的愿景和动力，可以略写为骆一禾1987年《汉诗一束》里的一则：

当脚掌证实心脏的时候
那是一条伟大的道路
一种新生

这三行短句的标题——“中国文艺复兴”。

“中国文艺复兴”，也即骆一禾所谓“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这个早于“五四”即已开始的进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新契机，所以（如前所引）“中国的有志者，乃于八十年代的今日，寻找自己的根，寻找新思想以冲刷陈腐的朽根，显露大树的精髓，构成新生。”骆一禾说自己“是有所思而燃烧的，因为我的诗以及我个人，是在辽阔的中国醒来，在1980年代初期一个多思的早上醒来。”正好踏入这一进程。

而骆一禾所意识者，他踏入的这一进程更是处于“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和“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这“命运时间”“可以生可以死”的节点。于这么个节点觉醒于新生的“文化的历史活动”，对他而言，就像斯宾格勒指出过的，“一如自然史的发展要创造出它的顶点一样，创造出它的血肉之躯：不能代之而生、不能代之而死的生命个体。这个顶点其一由无数个体生命的实体构成，其二是时间性的，即同



时含有过去、未来和现在，它由此而不是一个止境，不是一个抽象体，也决不是自我中心的狂徒，而是文明史与史前史的一种集成状态：这个历程交汇于他的体内，它所有存活的力量也就在于它聚集了运作……”

这就使得“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西川回忆说：“一禾曾有一个宏大的构思，那就是海子、我和他自己，一起写作一部伪经，包括天堂、炼狱和地狱。”可见骆一禾对“整个诗歌布局”的考虑，及于一种共同的“无名写作”性质。在1987年写给一位诗友的信里，骆一禾则从另一方面讲到他所希望的可能性：“这些年，其实写诗有成的诗人，也差不多都出现了，这种局面在今后的十几年内大概都不会有，这就是众人‘在场’，于今后乐观的唯一一点就是：更高的诗歌成就在优秀诗人的互相激发间产生的可能性。”并特别提到“在这种局面里，诗歌的创作意识，发生质变……”于是，“十月的诗”栏目设计的“最富于雄心的纲领”和它所发表的大篇幅的长诗和组诗，应被视为骆一禾对这种局面的创造，并不仅限于呈现。

骆一禾最后三年半不到的“巨鸟冲天而起”，正是要溶汇进那“博大生命”的“血肉之躯”，其方式则是以其高速的写作让“那些生者与死者的鬼魂，拉长了自己的身体，拉长了满身的水滴，手捧着他们的千条火焰，迈着永生的步子，挨次汹涌地走过我的身体、我的思致、我的面颊：李白、陶渊明、叶芝、惠特曼、瓦莱里……不论他们是贬谪的仙人，是教徒，是隐士，是神秘者，是曼哈顿的儿子，或者像荷马一样来自被称为Linbo的监狱，他们都把自己作为‘无名’整个注入了诗章。”

我想，如此视野、格局、抱负和使命，令骆一禾唯有选择史诗性的写作。哈罗德·布鲁姆说：“史诗——无论古老或现代的史诗——所具备的定义特征是英雄精神，”而“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就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骆一禾英雄气概的“注入”，要为自己找到相应的形态。

1989年4月，在他为海子的长诗《土地》所写的序言里，骆一禾说海子“引入了繁富的美和幻象的巨大想象力，从而形成了他对诗歌疆域



的扩展，他挑战性地向包括我在内的人们表明，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七十年来的那个样子。”实际上，那个突破新诗固有模型的策动者和全力实践者，恰是骆一禾自己；如果说这种写作对他构成挑战性，那就是一种自我挑战。也是在那篇序言里，借谈论海子，骆一禾概括说明了由他和海子率先（至少还有后来者跟进）在汉语里着手的“大诗”之要点：一，不是一种终结、一种挽歌，而带有一种朝霞艺术的性质；二，代表了人类创造性的积极方面，本身是行动性的；三，更多地是百科全书式的繁复总合与不断丰富，但没有放弃构造、造型力；四，走一条将格式塔式的完形能力与内心对抗、潜层深渊中的现代主义主题合拢的道路。而在指出海子的“大诗”写作“充满了危险”甚至“潜伏着毁灭性”的时候，骆一禾也指认了自己的如此写作“冲击极限”的不可能性：激情方式与宏大构思之间的根本冲突，天然条件或精神环境的缺失……

但是，就像赞叹海子“力行了他的诗歌理想”，骆一禾也坚定不移地投身于其中。同样是在谈论海子的时候，骆一禾告诉人们：“先不要说赞同或反对罢，因为这世界上还存着不属于表态之列的价值：认识价值，而许多新艺术之初都未必易认同而又分明是可认同的。”二十二年以后，在一次对骆一禾诗歌的研讨会上，张珏则说：我真正想赞美的是，他在那个时候敢于做这样一件事情。

7

在1988年的第八届“青春诗会”上，骆一禾以《修远》为题写了一首不短的诗，尔后又写了同题的另一个稿本。我首先读到的是他的第一稿，在编辑《倾向》第二期“海子、骆一禾专号”时，将它和张珏寄来的另一稿（注明是“定稿”）一起选入。跟许多人一样，我喜爱我首先读到的第一个稿本，而这并非由于先入之见。不知骆一禾作何考虑，他的第二稿把近一百行的第一稿砍去了差不多一半，且将一种铿锵乃至澎湃的



声音乐调凝滞固结，诗意也变得有点儿涩噎。而读过《修远》第一稿的人，都会为其刚健沛然、淋漓酣畅、交替着昂扬与顿挫的转力歌唱所动容。据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有些年轻人大声诵读《修远》竟至泪流满面；据说比骆一禾晚六年进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戈麦（被认为是一个拿起笔就写得非常成熟的天才诗人，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曾把《修远》一诗复印下来，贴在床头，反复诵读。我猜想他们读的也都是《修远》的第一稿。

西川说骆一禾的“写作和做人被‘修远’这两个字表达出来。”这也是对这个诗人有所了解的不少人的看法。然而，以《修远》为题、以“修远”为主题的这首对于认识骆一禾格外重要的诗作（它也对八十年代诗歌和百年新诗史意义重大）却不易索解，其峥嵘的诗歌思想，往往为散布于诗行间的诸多词语和形象迷雾缭绕。这或许跟骆一禾写作的语言策略有关——曾经在附于致友人书信的一则读诗笔记里，他借谈论海子的写作，再次说出他自己的方式：语言是散文式的，以减轻考虑负担；语言构成取决于句子和句子之间敏感在强度上的和弦；不是以句子为单位，而是以语境或语流为单位；专注于精神体验，而语言是第二义的；语言感觉得益于把象形文字复归到原形来看……而这实则也发明了语言。在我看来，骆一禾以《修远》展现的倾向于发明的语言和从中提炼音乐的创造性，已经使它成为了不可（无须）释义而只应反复咏赞，倾听其沉郁豪迈声音的诗——那么，有必要把这首不短的诗的第一稿抄录在此：

修远

触及肝脏的诗句 诗的
那凝止的血食
是这样的道路 是道路



使血流充沛了万马 倾注在一人内部
这一个人迈上了道路
他是被平地拔出

那天空又怎能听见他喃喃的自语
浩嗨 路呵
这道路正在我的肝脏里安睡
北风里 是我手扶额角
听黑夜正长歌当哭
那黑夜说 北
北啊 北 北和北

想起方向的诞生
血就砍在了地上
我扶着这个人 向谁
向什么 我看了好久
女儿的铃铛 儿子的风神 白银的滋润
是我在什么地方把你们于毁灭中埋藏
方向方向 我白银的嗅觉
无处安身 叫我的名字

浩嗨 嗨呀 修远
两代钢叉在水底腾动
那声息自清彻里传来锐利和痛疼
那亚细亚的痛疼 足金的痛疼
修远 这两个圣诉蒙盖在上面



我就看见了大盾的尘土
完人和戈矛 雅思和斧钺
在北斗中畅饮
是否真有什么死去 我触摸着无边
触摸着跪上马头的平原
眼也望不到 脚也走不到
女仙们坐在月亮的边缘

修远 我以此迎接太阳
持着诗 我自己和睡眠 那一阵暴雨
有一条道路在肝脏里震颤
那血做的诗人卧在这里 这路上
长眠不醒
他灵敏其耳
他婴童 他胆死 他岁唱 他劲衰
都已纳入耳中
听惊鸿奔过 是我黑暗的血

血就这样生了
在诗中我看见的活血俱是深色
他的美 他的天庭 他的飘风白日
平明和极景
压在天上 大地又怎会是别人的
在诗里我看见的活血汪霏而沸腾

沐与舞 红和龙
你们四个与我一齐走上风鸣马楚的高峰



修远已如此闪亮
迎着黄昏歌唱
你们就一直走上了清晨

那朝霞
诗人因自己的性格而化作灰烬
我的诗丢在道路上
一队天灵盖上挖出来的火苗
穿过我的头顶
请把诗带走 还我一个人
修远呐
在朝霞里我看见我从一个诗人
变成一个人

与罪恶对饮
说起修远
那毒气在山中使盛水的犀杯轰然炸裂
满山的崧岳 稀少的密林
那亚洲白练
那儿子的脚跟 女儿的穗佩 口中的粮食
身上的布袋与河流亮丽的分叉
连你们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看着道路
修远呐

与罪恶迎唱 拉开我的步伐
这就是我的涵歌
在歌中我们唱剑 唱行吟的诗人冒险行善



这歌中的美人人懂得
这善却只有等到我抵家园
唱吧 那家乡
我们分别装入两支排箫
素净两方门窗
这声息一旦响起
就不知道黯淡怎样吹过
天就一下子黑了
在大地的口中 排箫哭着
与罪恶我有健康的竞技

说一声修远
三种时间就澎湃而来
天空在升高中醒了
万物愈是渺小 也就愈是苍莽
那一夜滂沱的雨水中
新月独自干旱

8

《修远》的框架不脱《离骚》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题和诗中的道路意象、迈步行路的诗人形象，也正出自屈原。屈原一向就是骆一禾的灯塔/圣者，经由“修远”这个词，骆一禾致敬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文明史上那些伟大的圣者，其中当然也包括将屈原那行诗题写在《彷徨》扉页上的鲁迅。这首诗的背景，跟骆一禾的许多诗一样，恰是他所引述的鲁迅所谓“可以生可以死”的大时代背景。而骆一禾的语气是那么坚定，仿佛已经没有了彷徨。《修远》第一节里“是这样



的道路 是道路/使血流充沛了万马 倾注在一人内部”两行，跟前面引录过的骆一禾《美神》里“这个历程交汇于他的体内，它所有存活的力量也就在于它聚集了运作……”这样的表达相互发明；第三节“想起方向的诞生/血就砍在了地上”两句，也颇能道出骆一禾“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的诗歌精神。血是生命的象征，也是生命本身，血也是诗歌之喻；“砍”字则可感那大力（不，简直是暴力）的歌唱——海子有句，“阳光打在地上”，由此亦可见他跟骆一禾的相互影响——《圣经·约伯记》说：“寒冷出于北方”，又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被黑夜说出的“北”而又“北”的这么个方向，便有惩戒、受难、历练、获救等多重意蕴。当然，“北”更是指引——“完人和戈矛雅思与斧钺/在北斗中畅饮”……

骆一禾显然谙熟《圣经》。西川记得1982年他们第一次见面，骆一禾即跟他谈论《新约》四福音里有关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事；邹静之也说，与一禾相识，最初的惊异是他可以把新旧约的原文背出来。其诗歌的事象和象征系统，征用《圣经》不在少数。我甚至感觉（只是感觉，并未论证）骆一禾诗歌语言的节奏、用辞和口吻，也多受和合本《圣经》的影响——这倒适合他跟海子、西川的那个伪经计划。

1988年11月30日，在给西川的一封信里，骆一禾说他正在写长诗《大海》的第五稿，另外在整合一部长诗《世界之书》。“《世界之书》的开头是《修远》为引子，它是道路和‘道’的互为投射。”作为长诗的引子，《修远》或许有点像序曲，暗示情节，引入和打开。其有不可索解处，大概也跟后来骆一禾将它独立出来，没有纳入长诗有关。

“沉思期”之后，骆一禾的写作几乎就全部倾注于长诗。《世界之书》主要来自1987和1988年所写的十五首诗，后来这部长诗改题为《世界的血》，更是纳入了此前五年所写的二十首诗。大概，在《世界的血》的整体结构布局尚未从脑海里浮出之前，骆一禾着手去写的许多短诗就已经有了或朦胧或明确的朝向一部长诗的方向感。不妨说，骆一禾的短诗



写作都是为他最后两部长诗准备的。将写好的诗作整合成一部长诗的时候，骆一禾说：“近来读到福楼拜的一段话，‘现在我写成了各个部分，我可以肯定其中有无与伦比的东西，但这样反而不行，各个部分太固定，不宜于连接，所以又要把固定得很好的各个部分拆松’——这好像是无休止的，永不陷落的特洛伊或君士坦丁堡。”——不知道他的《修远》第二稿，是否攻坚战后遗下的云梯或投石车——这场攻坚战的规模巨大，他的规划，是要从两千三百行扩展到三千五百行左右，将那二十首诗的材料构筑成整体。

在写给西川的信里，骆一禾详细讲述了他这部长诗的设计、写法、主旨、思想背景、材料来源、三种时间的展开和生命实质的探索等等。他说：“这首诗在我的写作里也是个里程碑，它以古典式的‘开端——展示——高潮——再现——结束’为横向布局，以一个建筑物和圣徒传合一的象征体系为价值隆起的构造，使抒情歌唱为它们所承载，在主体建筑四周有次要建筑并置于自然环境之中，在‘气’元素中展现主题：‘博大生命’。”这哪里是去攻陷一座大城，简直是要建造一座大城！仅就其雄心而言，不只在骆一禾个人的写作史上，而且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算是里程碑了。

这部长诗在1989年3月以《世界的血》为题定稿，共两千八百行左右。骆一禾又再次申说：“《世界的血》主要的主题是‘生命’，我以为‘太初有言’、‘太初有道’、‘太初有为’三境界的深处是‘太初有生’，这是我长诗的精神线索之一。”这也是他一生写作的一条精神线索，其“博大生命”的前提在此。这部长诗的开头，后来用了二十六个分章缀成的“飞行（合唱）”（第一章），骆一禾说明写的是“万灵相抱具有同一价值”。这一“飞行”最终落向第六章（最后一章）“屋宇（穹顶）”（骆一禾自己说明是“伟大生命的现身，它的价值的诗化”）而告完成。张珏专门撰有《大生命——论〈屋宇〉和〈飞行〉》一文，认为飞行代表了人类的超越，同时也是最本质的生存，……屋宇是一个理想的空间：明天。历史和命运



在这里温故而知新。屋宇也是伟大的创造和伟大的压迫之间已铸造的烈火与青铜的艺术。……《飞行》与《屋宇》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历程……在飞行和屋宇的巨大气象中，所歌唱的乃是人之博大生命。这就是一禾所崇尚的、有时也还可以称为哲学的：性灵本体论。这说法来自骆一禾本人：“这部长诗介于人伦宇宙的境地，又还不是宇宙本身的诗作，属主体诗歌，而不是背景诗歌，另外，我的诗歌形态在这里是抒情方式楔入完整长度的，它也由性灵本体论决定。”

9

《世界的血》采用对称结构以呈现骆一禾想象或曰幻想的“生命结构”。仅看其中章节的一些小标题，诸如“飞行”、“狂飚为我从天落”、“世界之一：缘生生命（孤独动力）”、“大黄昏”、“黑暗”、“生存之地”、“大地的力量”、“世界之二：本生生命（恐惧动力）”、“天路”、“世界的血”、“梦幻”、“日与夜”、“屋宇——给人的儿子和女儿”，就能想到那是如何将一种“思想活动作为压强和造型的动力”去充注其诗的。当年在《世界的血》尚未正式出版的时候，读过《飞行》和《屋宇》两章，我曾说：“《世界的血》是中国自新诗运动以来的第一部真正的抒情史诗。诗人骆一禾用他那辽阔的歌唱把生命升华到了天空、火焰和海水的透明和纯净之中。”读着这部长诗，你确乎能感到它深沉庞大的思想结构和生命结构如热气球般打开，几欲胀破称之为诗歌的形体，缓缓向上：

我梦见望穿时空的气象

越过屋宇

闪电内部有一头狮子拖曳金书和谜底

身上长满岩浆

适逢晴朗时光闪耀的海洋



我所创立的屋宇和艺术
头顶有朝霞穿过狮子 过海而来：
不惧死亡者
必为生命所战胜

这部长诗结束在启示录般的嗓音里。

跟《世界的血》同步进行的《大海》，长达五千多行，采用波澜阵阵涌起的结构；虽然他前后写了有五稿之多，收入《骆一禾诗全编》的却仍是一部未完成的残稿，计二十歌，第二十一歌“化血斧运过欲望之国（黑潮。赤潮）”有题无诗。不知在骆一禾心目中，最终完成的《大海》会是个什么模样。据西川回忆，骆一禾“谈到过他的另一部长诗的构思。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写出一座城市，在大海之下——其规模大约与十六世纪意大利多米尼克派僧侣奥凡·康帕内拉所描述的‘太阳城’有某些相似之处——只有穿过大海的人才能抵达这座城市。”《大海》或许正是骆一禾当初谈到的那部长诗，从现有部分来看，其基本情节线索跟他对西川所讲的很相似，也是潜入海洋、深入海底、进入海底之城……不过《大海》里被骆一禾描绘的海底之城——“金币地帝城”跟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恰又相反，是一个恶的渊薮。比如：“这金币地帝城的都属扎在人性之中/……露出无耻的金子和退化的金子/炫耀的金子 社会的金子/……在金币地帝城中，怪物拎着死火……”（《大海》第十八歌）——这大概涉及“金币地帝城”所表征的人性中的贪婪吧。

在《大海》的第二歌里，骆一禾单列一节，醒目地写道：

澎湃吧，大海
我所迷失的
乃是命运的道路



这的确很容易让人想到但丁《地狱篇》第一歌那著名的开头。但丁地狱的圈层，差不多正是以人性七宗罪来分布的，骆一禾塑造的“金币地帝城”除了贪婪，也还表征其他各种罪孽；并且，以一阵阵波澜为结构的《大海》，也可视为以一圈圈放大的漩涡为结构的《大海》，而这跟但丁地狱篇那个漏斗状的漩涡结构也相仿；两部长诗的主角，也都是在幻游的状态里说出迷失、寻找和穿越之见闻、思量和行动的——长诗中的骆一禾比但丁更艰难也更勇敢，并没有一个维吉尔那样的圣贤引导；他甚至是一个与恶竞斗的英雄——也许可以说，《大海》中的“我”既是行动者，也是行动者自己的领航人（这似乎真就把骆一禾史诗的开头推到了1981年的那首《桨，有一个圣者》）。那么，有理由将骆一禾的“金币地帝城”类比为但丁的地狱；有理由将骆一禾的《大海》类比为但丁的《地狱篇》——西川曾说起的骆一禾想让他跟海子一起写作的伪经里，就包括了天堂、炼狱和地狱的构想；而据张珏回忆，分工由骆一禾去做的功课便是地狱部分……

这样类比起来，《世界的血》就成了骆一禾的《新生》——所谓“属主体诗歌，而不是背景诗歌”——《大海》亦只不过是一个更其宏大的诗歌计划的开端。然而骆一禾的写作却结束于此……那么我是否可以说，骆一禾是八十年代（回头来看，那是当代中国多么非常的一个十年期）里一个正欲起草自己《神曲》的但丁——一个还来不及成为但丁的诗人；他完成了《世界的血》，留下了以《大海》为基础的诗歌万神殿的施工现场……他在二十八岁英年早逝，让我们失去了可能的但丁。

我想要这么说，跟骆一禾自觉地置身自己于“中国文艺复兴”的背景有关。这种自觉，或许会被认为特别属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但骆一禾却走上了一条跟八十年代的那些诗人很不一样的修远之路——如张珏所言：“他跟八十年代是有距离的，他有点匪夷所思。……他不只是写诗，他只是用了诗歌这个媒介。他认为中国近现代社会以后需要一个精神的屋宇，我觉得他就是在用诗歌给我们建设一个屋宇。”而这不



仅出于一种理念、一种思想、一种哲学、一种历史意识和文明意识，更是出于一种情感，并且这才令他以自身为桨拨动海洋——他甚至只想去成为“拨动”——

《大海》第一歌里他写道：

渡手说：

人呵人呵，你难道不想成为诗人？

渡手呵，什么叫做诗人？

不，我想成的乃是诗歌

歌是我说出未可知的使命

因此我至为莽昧

歌，这就是带给世界

诗歌带来世界。

与一切而至万灵。

《修远》里他写道：

请把诗带走 还我一个人

修远呐

在朝霞里我看见我从一个诗人

变成一个人

10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骆一禾说“海子的死讯像一捆镰刀射上了我的肝胆……”，可见这突然的打击有怎样的摧毁力！他立即与海子的家人、中国政法大学（海子工作单位）的人一起赶赴



山海关。从山海关回来，骆一禾未回家而先去了西川那儿，西川看到他一脸疲倦，头发上、黑色的风衣上落满尘土。

对于骆一禾跟海子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张珏有一次说，“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说，”但她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禾在海子去世的时候在日记里写道：上帝，你杀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儿子。”张珏说她记得特别清楚，海子第一次由人带着去见骆一禾，拿出当时写的一首《山的儿子》，“是他特别早的一首诗。他的诗从此被人甄读了、被一个人评价了，这个人就是一禾。”以后骆一禾对海子颇多影响和激励，总是分析海子的诗，尤其在他受打击的时候。张珏一直记得，在她和骆一禾位于皂君庙的家里，海子坐在床头生闷气，而骆一禾在旁边背诵着海子的诗，然后对后者说：“你的诗，多好！”骆一禾曾说起1988年11月他到昌平去看海子，发现海子“已经吃了四天方便面，到了11月，他还没有想起把夏天搭的地铺重新支起……我和妻子就留下住了四天，给他做些饭菜吃……”有时候，骆一禾称海子“是个傻弟弟”。

海子的写作在许多方面得益于骆一禾。骆一禾总是为海子的诗歌争取发表的机会是一个例子；由骆一禾率先使用的“麦地”意象很快成了海子诗歌的标志性意象是又一个例子……更重要的，骆一禾的人格光照、精神氛围，他系统化的理论和框架性的构想，对他周边的人们往往起到引导的作用——西川说“骆一禾广阔的关怀对海子我想其实是有影响的。海子就开始思考这种广阔，比如海子的《土地》里就开始有结构了。”要是想到海子写《土地篇》是在骆一禾两年“沉思期”之后的1986年，这种影响就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到——当骆一禾致力于格局庞大、结构严整的史诗性写作，海子也转向了后来被骆一禾总名为“《太阳》七部书”的突入史诗背景的写作……直觉到骆一禾对海子的某种决定性，在1989年6月匆忙落笔的一篇悼文里我写道：“我把一禾看成了一个倾

1 陈东东《丧失了歌唱和倾听——悼海子、骆一禾》（《上海文学》1989年第9期）。在那篇短文里，就骆一禾跟海子的关系我继续

（接下页）



听者，一只为诗歌而存在的耳朵，而海子则是嗓子……对于诗歌，歌唱和倾听同样重要，有时候，倾听对于诗歌实在更加根本。”¹

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骆一禾完全投入到对海子辨析性的、乃至创造性的倾听活动中，并且满怀着悲痛——“不是悲哀而是悲痛”——他特别指出。从他1989年4月21日写给我的一封来信可知：他忙于海子的后事直到4月10日；然后立即投入海子浩繁的遗稿，很快大致整理出长诗部分；期间又跟几家杂志报纸商定海子的纪念专页；找出版社争取出版海子的诗集；搞义捐活动；4月7日，他在北大组织海子的纪念朗诵；4月11日，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演讲海子的写作“我考虑真正的史诗”……那是一种劳碌的节奏——从他留下的几篇有关海子的文章，也能看到

（接上页）

写道：“在海子和骆一禾之间，事情就是这样——由于一禾特别恳切的倾听，要求、鼓励、磨练和提升了海子的歌唱；由于一禾特别挑剔的倾听，海子的嗓音才变得越来越悦耳——‘黄金在天上舞蹈/令我歌唱’倾听者正是歌者的黄金。”如果仅就骆一禾而言，他亦是一个“灵敏其耳”（骆一禾《修远》）的倾听者诗人，而不是“最少听见声音的人成了声音”（骆一禾《巴赫的十二圣咏》）的诗人。骆一禾对自己乃至整个当代诗歌有其深思熟虑和阅读期待，他的写作是这种深思熟虑和阅读期待的后果，他是个带着自己的耳朵、带着自己的倾听去写作的诗人。“倾听对于诗歌实在更加根本”——这句话除了针对骆一禾自己的写作，针对海子乃至整个当代诗歌的时候，骆一禾则是要将“歌唱卷入到自己内部某种更大的精神风暴之中”（姜涛《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新诗评论》2009年第2辑）。骆一禾作为耳朵和倾听者，也突显在他同时还是优异的诗歌论者、批评家和编辑方面。然而有诗评家出于误解、偏见或别有用心，却认为把骆一禾比作耳朵、视为倾听者就造成了对骆一禾诗歌的“真正遮蔽”、“严重的遮蔽”，“表明人心的冷漠与势利”（参见陈超《骆一禾：敲响的火在倒下来……》，《中华读书报》2008年6月11日）——这实在让人疑惑且哭笑不得——如果骆一禾诗歌真的受到过“表明人心的冷漠与势利”的“严重的遮蔽”、“真正遮蔽”，以及，他一经被比作耳朵，被称为倾听者就只能“旷日长久地被称为是‘倾听者’”（这谣造得有点拙劣），那不是由于理应去做耳朵，去成为倾听者的诗评家的失察和失职？嗔怪将骆一禾喻为（誉为）耳朵和倾听者，并不是诗评家推卸责任还要泼脏水？



他透支脑力体力的紧张状态：4月12日凌晨，写成三千多字的《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4月26日，写成近六千字的《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土地〉代序）》；5月13日，写成近三千字的《海子生涯》……他急于让人们去听见海子，像他那样去倾听——骆一禾贡献给人们的是一个他所听到的海子，他对海子诗歌整体性的把握、勾勒和塑形，细致清晰，表明那是长期注重和思量的结果。这其中也包含着他对自己诗歌写作的总结和设想，对自己的倾听。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有人与骆一禾夫妇谈及死亡。张珏说：“参加我追悼会的人，不许哭，只许笑。”骆一禾在一旁沉默无言。

北京已处于风口浪尖，骆一禾也心力交瘁。5月14日凌晨，刚写完《海子生涯》没多久，以一个纠察队员的身份，他在天安门广场因脑出血而晕倒。骆一禾在天坛医院躺了十八天，一直就没有醒来。

就在骆一禾倒下之前几天，5月10日和11日，他写下了最后的四五首诗，其诗歌绝笔，是那首短短的《壮烈风景》：

星座闪闪发光
棋局和长空在苍天底下放慢
只见心脏，只见青花
稻麦。这是使我们消失的事物
书在北方写满事物
写满旋风内外
从北极星星的台阶而下
到天文馆，直下人间
这壮烈风景的四周是天体
图本和阴暗的人皮
而太阳上升
太阳作巨大的搬运



最后来临的晨曦让我们看不见了

让我们进入了滚滚的火海

5月31日那天，张珏看见重症监护室里坐着三个好看的女护士在聊着家常，而骆一禾躺在病床上呼吸有些沉重。这场景让她觉得特别奇怪，“又特逗”。“最后陪一禾的就是那三个人，”张珏说，“实际上就是在等他最后一口气下来，记一下时间。”不久她接到了死亡通知单，为骆一禾擦拭身体的时候她发现，他在这十八天里，长了点小胡子。

据说，在北大29楼与30楼之间“德先生赛先生”雕像旁的一次纪念海子的聚会上，骆一禾曾将圣琼·佩斯的一句话高声朗诵：“诗人，就是那些不能还原为人的人”。这跟《修远》里的那几行诗并不冲突。

参见和征引：

张珏编《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

西渡编《骆一禾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骆一禾《春天》（张珏编《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

骆一禾《水上的弦子》（张珏编《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

骆一禾《美神》（张珏编《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

骆一禾《为〈十月〉诗歌版的引言（一份短提纲）》（张珏编《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

骆一禾《读诗笔记一则》（未刊稿）；

骆一禾《致潞潞信（有删节）》[1988年5月15日]（陈东东编《倾向》第2期“海子、骆一禾纪念专辑”，上海，1990）；

骆一禾《致袁安（有删节）》[1989年4月28日]（陈东东编《倾向》第2期“海子、骆一禾纪念专辑”，上海，1990）；



果树林(张珏)《世界的血·后记》(骆一禾著《世界的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

张珏《大生命——论〈屋宇〉和〈飞行〉》(陈东东编《倾向》第2期“海子、骆一禾纪念专辑”，上海，1990)；

邹静之《正午的黑暗》(陈东东编《倾向》第2期“海子、骆一禾纪念专辑”，上海，1990)；

西川《怀念(之二)》(陈东东编《倾向》第2期“海子、骆一禾纪念专辑”，上海，1990)；

西川《生命的故事》(《北京文学》1998年第1期)；

西川、徐钺《骆一禾、海子、我自己以及一些更广阔的东西》(《诗林》，2009年双月号第5期)；

朱正琳《老家伙与三剑客》(《财新周刊》2018年8月6日)；

熊国胜《骆一禾的“背影”》(北京大学中文系1979年文学班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2009)；

陈涛《骆一禾已经退场，他的名字正如诗歌的名字一样被遗忘》(《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3月26日)；

西渡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及附录《“一个人去建一座教堂”——骆一禾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

罗梵译瓦莱里《文坛旧事》(郭宏安编选《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法国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翁海贞译哈罗德·布鲁姆著《史诗》(译林出版社，2016)。



记诗人骆一禾

昌耀

得知一禾去世噩耗时，我几乎是以一知情者听到谣传时所能有的漫不经心揶揄调侃了对方，声称事情完全被弄颠倒了，只应是一禾为故去的诗人海子料理后事而非一禾本人蒙受不幸。

其后不久接到了一禾夫人6月27日的来信，写道：“……5月11-13日他连续熬夜为海子著书著文，又上班，饭几乎每天一顿，身体很虚。……14日凌晨1时45分左右他突然发病，……他惊人地挺过了开颅手术，又坚持了十八天……在5月31日13时31分一下子停止了呼吸，自始至终没能发出一句话来。”

至此我始信一禾确实是远行了。后有友人汉卿悼一禾的一句话曾长久留在我耳边令我思索，话称：“生命真奇怪，越是精美，越是脆弱。”诚哉斯言。但我仍有不解：精美就必脆弱吗？一禾自己倒是以“韧性”对待自己的生命，而打算在其一生中还要做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情，其一即于诗。他欲效法庞德为英美诗人工作的榜样，拟将一部分时间为中国新诗的繁荣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他说，“如果缺少着眼于中国诗歌的胸怀，一个人的成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最后只等于一事无成。”他相信“平凡的人驮着更大的世界”，断言“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做什么”。因之他要以“韧性”自许。并让我相信他所表示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以韧性的战斗将工作切实地做下去”的决心原就基于献身的自觉。那么又怎样去理解生命的“脆弱”？

结识一禾仅有两年多，记得是1986年的秋冬之际他给我写来第一



封信。此后收到过他八九封信，少则几百字，多则千言，我将其看做是一禾方式的诗话。直到1988年初夏我去北京办事才得去《十月》编辑部拜访这位不曾谋面而神交有年的年青友人。见面初始，我特惊异于他那一头髻曲的蓬发，竟少见多怪地在心底为之咋舌，以为不可想象。第二天他到我投宿的一家浴池来看我，身着一套布料的墨黑西装，左侧领襟佩着一枚硕大的彩绘太极八卦图式胸章，同样出我意料（后来才揣摩出他对《易经》颇有心得）。他憨厚地笑着，为迟误了约会表示歉意，一面用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那天极热，我给他买了好几瓶汽水并看着他一瓶瓶喝下去。事后他对我也好生奇怪，以为常人的方式应当是陪着他一同喝，哪怕是仅只做个样子。我们最后的一次聚会是在其后的第二天夜晚，他约我在他的一个同学家里吃饭。他对主人的安排十分满意，心境格外舒畅而无拘举止。他喝了不少青岛啤酒，并且是自斟自酌（我与主人均不善饮）。对于此种氛围我也有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但见他渐渐地进入了一种微醺状态，只有在那时我才得见进入完全的自我时的诗人一禾之心性。我们不太插话以免惊动他，惟听他独语：或阐发见解，或背诵《神曲》章节，或引述名人语录，一任思路所之。我暗自慨叹他超常的记忆力与知性。无疑，他的经过切实思考而作出的对一些事物的独到判断更易给人留下印象。

我以为一禾是一位可以期望在其生命的未来岁月会有卓越贡献的诗人或学问家。如果说，他有可能成为一片新的陆地，但那陆地仅只是刚刚展开一道脊梁就已被无情的浊流吞没；如果说他有可能成为一环辉煌的彩虹，但那一作为太阳投射的生命的焰火刚刚呈示勃发的生机又未免熄灭得太过匆促；我们只听见一位伟男子的脚掌正待步下楼梯，但那人背转身去，从此我们再也听不到一点声息。一禾的去世太让他的朋友们感到悲哀。

近日特意翻检了他生前写来的信札，当初不曾为我特别留心的言语此番读来仿佛都另有深意焉，如称：“华伦斯坦在中年之际说了一句话：



‘人生是这样紧而窄’，这不是郊寒岛瘦似的缺少气象，而是指人在勉力前行时的感受，我值青年之际竟能领会一句中年人的感叹，……”如称：“苏格拉底说：‘你们去生，我去死，哪条路更好，只有天知道。’”如称：“我愿我的河流上/飘满墓碑”。……是指向未来的预言？或是对于生命的感喟？然而一禾终已无可挽回地永逝，隐忍不言可矣。

1989. 7.12 匆草

1991. 1.14 删定



世界的血

——怀骆一禾并谈论他

于坚

骆一禾坐在我旁边，穿着一件白衬衣，面庞白皙，手指修长，与云南高原上普遍的古铜色格格不入，像是一位误入穷乡僻壤的修士，天真而自信，才华横溢的样子，音调低沉而幽深，我耳背，不是听得很清楚。我们正坐在一辆旧的长途客车中，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我们一边挨着，一边谈着诗，高原上的冬天，并不冷，森林外面可以看见空着的土地，堆着稻垛。他说出一句来：“中国的大王，都是土匪出生。”我不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创作还是道听途说，只是隐隐地感觉到他对这种风格并不以为然，“也可以写”。我喜欢这两句，我们更热烈地讨论起来，都忘记了山路颠簸得就要把我们甩出车窗去。那时候人们不认为修路有什么必要，“道可道，非常道。”“只有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山顶。”（马克思）

那时候，骆一禾写的是：

喝河里的水

迎着天上的太阳

蓝色的门廊不住开合

涂满红漆的轮片在身后挥动

甲板上拥挤不堪

陌不相识的人们倒在一起沉睡



我写的是：

喝天上水

种地上的石头

永远爱不怕狼的女人

我忘记了我们是怎么相识的了，也许是通信，那时候诗人互相写信。我与韩东通信，与西川通信……写在那种每页三百或五百字的劣质方格稿纸上，信封上贴着邮票，盖了一个邮电局的黑色的圆印，似乎还可以看见寄信者的手指。“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里尔克）那是一个里尔克式的时代，一切都在等着揭晓，等着靠岸，等着拆迁，空气中弥漫着巨大的不安，但是旧时代的修道院般的窒息所导致的闲适并未散去，还有一点时间让那些如饥似渴、两袖清风的人们去阅读、讨论、沉思、写作……窗子打开了，“世界的血”涌进来，惠特曼、金斯堡、里尔克们已经写出了那样的诗，我们得努力呀！我记得我和朱晓阳一次次在深夜走过一条清代建造的长街（他后来也成为一禾的朋友），在幽暗的街灯下面争论老子和表现主义直到午夜。诗人们走上年久失修的街头，站在一个绿色的邮筒旁边，将剪去了一个角的信件投进信箱（只要剪去一个角，就意味着这是投稿，可以不贴邮票）那时候寄信的人之多，铸铁邮筒的投递口都被磨出了本色，像一张涂着黑色唇膏的厚嘴唇。我和一禾或许就是由于投稿相识的，昆明尚义街6号的诗人都在给《十月》投稿。《十月》就像是一本“世界文学”，“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陈寅恪）的载体。我们在“文革”时代孤独的地下写作中想象过的这种刊物。“世界文学”当然要有一个载体，一叠长方形的，散发着油墨香味，有着精致的软皮封面的纸。

我们前往云南西部的傣族地区参加一个笔会。我刚大学毕业，



一禾已经在《十月》当着编辑，被派到云南来组稿。我们下了车，前往一个山洞探险，那是我这一生最惊险的经历之一。这个山洞刚刚开发，我们被请去为那些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命名。走完施工已经完成的一段，大部分人就退回去了。向导建议，继续朝原始的部分走，那边有一个出口。有四五个人同意了，我骆一禾都在其中。于是我们进入了一片漆黑，攀过一段绝壁，立脚处仅够脚尖，下到一处巨穴里，向导丢失了手电筒，摸不到那个出口。我们坐在看不见彼此面目的黑暗里，为了证实自己依然存在，时时要用手去摸摸同伴，我不知道一禾在哪里，他像死了一样沉默。后来向导终于找到了丢失的手电筒，摸着了那个洞口，我们从鸡肠子般的岩石管子里挪出去，必须相当苗条。那时候我们都瘦得厉害，世界普遍地营养不良。终于重见光明。我记得一禾站在阳光下，周身苍白。

“这一天大海上有蜻蜓在飞
每一只都有翠绿的翅膀
每一只蜻蜓 都一直向前
都不在气流中倒退”

——骆一禾

我们不是通过观念认识的，而是通过身体和行动，这就有了一种更亲近。后来我们在德宏的天空下跟着异族人跳舞，饮酒。一禾被推到中间，狼狈地躲闪着傣族姑娘的攻击，酩酊大醉。他来自北方的观念之城，夸夸其谈者滔滔，而云南是身体激烈在场，沉默、忠厚、热烈，有着波西米亚风格的外省。我感觉到他的震撼。他后来与云南许多诗人、作家成为朋友，《十月》一度成为云南文学阵地，并非偶然。他过世后，张珏带着《世界的血》来到昆明，几个云南作家陪着她在翠湖北路1号的一座旧楼的房间里坐了很久，不说话，都低头翻着这本书。忠贞不渝的



张珏像个西南联大的女生，永远守着她的一禾。忠贞、世界的血这些词在这个无耻的时代，就像黑暗深处远去的烛光。

另一次在北京他那雅致而阴郁的房间里，我们也谈过一次。我记得他那双白皙的手在一摞书旁边晃着。仿佛一只绝望的蝴蝶。后来我听说了他的死，我想象着他坐在日落的广场边上，就像一只忧郁的鹤。河流已经失踪了。

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在骆一禾编辑的栏目上发表，这是八十年代的文学荣耀之一。我们其实没有在诗歌上谈得太多。不必说，彼此都是那种开始就是结束的诗人，只是在完成各自的天命。那是一个自由重返的时代，深刻的诗人都在建设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一禾和海子属于那种所谓浪漫主义诗人。浪漫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世界写作的主流，尼采、马克思、鲁迅……都具有强烈的浪漫气质。浪漫主义关心的是“世界方向”。诗本具原始的浪漫气质，浪漫就是超越，只是浪漫的倾向不同，尼采的浪漫导致的是爱伦·金斯堡，马克思的浪漫导致了鲁迅。浪漫主义是一种语词的高蹈。“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鲁迅《摩罗诗力说》）世界的血是一种精神之血。我与之不同的是，诗是语言之血，诗不是主义。浪漫主义的危险是缺乏细节，观念的高蹈常常重创现实。中国诗歌自屈原之后，被儒家诗学所制约，浪漫主义越来越弱，抒情言志往往满足于风花雪月的浅斟低唱、修辞的精密。“惟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发展既央，隳败随起，况久席古宗祖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鲁迅《摩罗诗力说》）山水诗的情形有点像西方中世纪教会文学，“道法自然”已经概念化，终于耗尽、用罄了山水的细节。二十世纪初的狂飙突进的新诗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解放、突破。草创时代，新诗即以屈原为号。高蹈乃是世纪主流，无论创造社、艾青、西南联大诗群、或者朦胧诗、社会主义诗人都在左或右、虚或实



的纬度上高蹈。浪漫主义或者是一种精神现象，或者成为意缔牢结，成为功利味道十足的本质主义。朦胧诗即是后者，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功利主义。多年后我重读《今天》，发现1979年创刊号的“今天”二字下面赫然印着“今天”一词的英语，真是深谋远虑。昌耀、骆一禾、海子是前者。昌耀的高蹈在于细节的丰富，他历尽沧桑，他的浪漫主义有些压抑、激愤。海子的高蹈则由于涉世未深，赤子也意味着浅薄，对“姐姐”这种词的依恋，是一种血气方刚的孤独，一种自我戏剧化的撒娇。浪漫主义的牺牲在海子这里被修辞化了。他在最近三十年一直受到追捧，已经充分暴露了这种“淳诗”暗藏着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即便如此，海子也高于后来那些淳诗癖，这位烈士至少“知行合一”，为“修辞立其诚”贡献了肉身。浪漫主义是一种重器，荷尔德林的诞生对德国精神产生了黄钟大吕般的影响，招致温故知新，重返希腊的冲动。海德格尔力挽狂澜，将这种观念性冲动引向语言（梅洛·庞蒂则更直接，语言就是身体。“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而不是“观念的冒险”（怀特海）。鲁迅也意识到浪漫主义乃是一种复古，温故知新，这个故乃是“赤裸生命”（阿甘本）“尼耙（Fr. Nietzsche尼采）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明如华，蛮野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摩罗诗力说》）鲁迅的浪漫主义最终为现代汉语奠基，汉语在鲁迅这里复活，因为鲁迅是一种可靠的现代汉语。八十年代浪漫主义三诗人中，骆一禾最为接近浪漫主义核质。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段自由思辨的时代，位于文革噩梦与市场经济的悬崖之间，沼泽般停滞的旧事物与满血复活的思想力之间有一种平衡，相对安静、沉思。出现骆一禾这样的诗人绝非偶然，他将浪漫主义推回到它久已废弃的旧轨道上来。世界的血，是一种精神之血。



五千年明亮的文字
挥舞着纤细的蚊足
在强烈的阳光中走过
不能看到理想
我感到阵阵心痛
而伟大的幻想 伟大的激情
都只属于个人
随身而来 随身而去
每个世纪都有人触摸它 由此竭尽
哪一首血写的诗歌
不是热血自焚

八十年代是修辞的高蹈时代，骆一禾试图为废墟命名。他走的是浪漫主义一路，但不是创造社的短时段的概念狂飙，也不是三十年代新月派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不是七十年代末朦胧诗的功力味十足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的浪漫主义。他想加入到屈原、尼采、荷尔德林、特拉克尔一路去。他思考的是世界意义，方向、善、爱、恶与光荣。他比海子想得更为清楚，深沉，而没有后者的那份自恋。海子的高蹈基于观念，骆一禾的高蹈是世界观。高蹈是八十年代以降越来越世俗化的中国世界精神焦虑的结果，读者对士农工商这一亘古秩序的大规模颠倒深怀恐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读者需要诗人再次出场告诉他们“我是谁，从哪里来，到何处去。”“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鲁迅《摩罗诗力说》）

浪漫主义的方向是“生活在别处”。与兰波的别处不同，中国浪漫主义的别处是对儒道释之外的第四个神的向往。自利玛窦以来，中国词



汇中逐渐出现了山水诗系统少见的形容词和直线，创造社时代是一个高峰。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基于国家与社会的黑暗没落，愤怒是真实的，迷信未来，轻视过去，所指摧枯拉朽也易朽。继承五四的传统，骆一禾也是命名者，他的野心是建造一种“长时段”的高蹈修辞。修辞立其诚。修远，他试图上接屈原那种修辞的神性，旁宗西方的阿波罗传统。他的局限是，这种高蹈语言缺乏经验和细节，容易流于空转。神性、兮、楚、赤豹、文狸、“终古之所居”……并不是屈原想象力或者概念计算的产物，而是他的此在，“大块假我以文章。”

荷尔德林的高蹈是有细节支持的，大地在荷尔德林那里乃是此在而不是概念，而荷尔德林的读者是海德格尔。“诗不只是此在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激情和消遣。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因而也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不是一个‘文化灵魂’的单纯‘表达’”。“诗给人非现实和梦幻的假象，似乎诗是与我们十分亲切熟悉的触手可及的喧嚣现实相对立的。实则不然。相反地，诗人所道说和采纳的，就是现实的东西。”骆一禾的拥趸经常会提到荷尔德林，这就是荷尔德林。

我肯定骆一禾的高蹈，这种高蹈不同于荷尔德林的高蹈，这种高蹈来自一种深刻的中国焦虑。二十世纪，中国那个亘古封闭着的潘多拉盒子终于被打开了，引发了普遍的精神焦虑和迷惘。昔日固若金汤的世界观分崩离析，必然影响那些杰出的诗人，他们必然做出自己的回应。学而不思则罔，骆一禾是思者。我们时代的诗人绝大部分是没有世界观念的，他们只在乎主义、观念、意识形态以及自恋式的修辞狂欢。“史诗指向睿智、指向启辟鸿蒙、指向大宇宙循环，而悲剧指向宿命、指向毁灭、指向天启宗教”，仅此愿景，骆一禾就月白风清、水落石出。骆一禾的意义在于，他在朦胧诗功利性十足的高蹈、海子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浅薄高蹈之后，触到了本质性的高蹈。“自古以来，诸神的语言就是暗示”（荷尔德林），当荷尔德林如此说的时候，他立足于一个古



老的拉丁语传统，高蹈是拉丁语系的根基。而在骆一禾或海子，这终归是一种“生活在别处”。在今天这个修辞的世俗时代，骆一禾就是一个烈士，他因为深刻而被冷落。

“必也正名乎”，我走的孔子的“温故知新”这个路子。但我时常在“生活在别处”的巨大召唤面前感到迷惘。有时候我会想到那个五月的黄昏，骆一禾坐在广场的边上，震耳欲聋，头痛欲裂，穿着他亲爱的白衬衣，那么孤独无助，仿佛置身在洪流滚滚之外的一块青石，即将死去。“逝者如斯夫！”孔子感叹的不仅仅是川，也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世界的血是这种颜色：
世界说需要燃烧
他燃烧着 像导火的绒绳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当然不会有 凤凰的再生……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他就是长空下 最后一场雪……
明日里 就有那大树的常青
母亲般夏日的雨声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2018.11.16，星期五，于昆明



所有星光都是在赶赴生者的葬礼

——骆一禾三十年祭

袁安

功到自然成，可能是骆一禾用得最频密的一个词。所谓频密，是指一起神侃的短短几天，就有几次听他说到。迄今念念不忘，除了这词被反复提及令我讶异，更要命的是，数十年后回头，发现自己一直就在这个观念的坑里，所思所为莫不如此，无逾矩规。功到自然成，或如世人所言，力不到不为财，于今已是很老派的观念了。我们都是旧时代的人，时间不仅掩埋了他的肉身，也掩埋了我的魂灵。

同样念念不忘的，还有他的容貌。北京回来，女友问起诗友种种，说到骆一禾，我说，一禾是雕塑家在半干的陶泥上，一刀刻下他的嘴巴，尔后不再雕饰，留下紧紧抿着的一条线。这是静态。走路的路一禾，穿着平底布鞋，步履有点拖沓，颇长的身子，背微驼，头微低，目不斜视，眼神渺远，口中时而念念有词，有人叫时，突然一愣神，然后粲然一笑。

时至今日，我想，在另一个时空偶遇，他依然会是这个样子，彼此一身落索，相视一笑。

1988年8月的一天，天蒙蒙亮，一个外省青年坐了两夜一天的火车，从公交车上下来，拎着行李包，站在北京东城僻静的街上，茫然四顾。问过两个扫街的大爷大妈，终于找到鲁迅文学院的小院，而这时，我已经迟到几天了。

诗刊社的邀请函，一个月前就收到了，但社长不放行，这倔强的老



头，因为我在职代会上跟他拍桌子顶牛，跟我这混小子杠上了，几年后退休才一笑泯恩仇。好在总编李士非力挺，让我先赴诗会，然后留下，作为北京国际书展的社方工作人员。这招瞒天过海甚妙，社长老人家也就没再为难。

鲁院的小楼有几层，已记不真切，当时我们活动的空间也就两层。谁领我进的会议室，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找了个角落默默坐下，没多久，刘湛秋老师进来，问袁安来了没有，我起身应了一声，甚觉难堪。座中有人知道我的来处，便扯到本社几位名声在外的老诗人，算是有了话由，另一些可能觉得这些不上道，这小子又来自出版社，关系户吧，脸上便有了倨傲之色。

平生第一次接触诗江湖，心情坏透了。来这找虐啊，靠。

中午，上交打印诗集。那纸张，是出版社打字小姑娘偷给我的，粗糙，发黄，倒很有文物的味道，很好。

下午继续开会，按议程，讨论某个与会诗人作品。刚开了个头，貌似肖开愚发起，骆一禾推手，主持人王家新放任自流，话题突然转到我的诗上来，整个下午变成我的专场，乱套了。赞美声中，我反而像犯事的坏小孩挨了板子，芒刺在背，一声不吭。这些人五人六的家伙，恁不成熟恁不庄重啊，几首破诗打通奇经八脉，这就反转了。

晚上，远离热闹的小圈子，跑到楼下大厅，躺沙发上看书。过一会，会务组的李英哼着歌，噤噤噤下楼，一照面彼此一愣。院子里的棚架下，她说到刘老师，这些日子在编辑部来来去去念叨“反叛三种”，说到一禾他们，怎么高调评论我的诗。你不像个诗人，跟他们不一样，李英说。这个新鲜，诗人还有模板？话说，我还真不是，那个时候，我的主业是德语诗歌翻译，一天一首，从不混圈子，兴许，这就是诗路不同的唯一解释。

记得一禾和开愚是住一间房的，我去过他们房间，旁听讨论。他俩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反复说到“中年写作”，而那时大家都才二十来



岁。后来的日子，回看一禾诗文，发现与我这种冲动型写作者的最大区别是，他早早就有了自己的美学主张和哲学系统，不是他们口中的中年写作，直接远承古典，无年龄、无年代、无疆域的深度写作。

必须说说骆一禾的诗歌语言，和诗歌节奏，这也是很多人不习惯不理解乃至诟病的地方。跟绝大多数诗人不同，骆一禾一直避免把诗写得流畅平滑，刻意采用非常规语言组合，甚至自我生造的语词，打破顺滑的节奏，读来阻拗、滞涩、虬结，从而使诗风朴拙、粗砺、奇峭。这正是骆一禾的独特之处，是他诗学观念的过人之处，也是他推崇的柏拉图美学：铁硬而苍雄。

漂亮让人目眩，华美则失凝庄，得其形，则忘其意，而复失其神。古今中外，风格大师则反其道而行：杜甫的拗体诗，梁楷的泼墨大写意，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艾夫斯的不协和奏鸣曲……

我不知道，时年二十七岁的骆一禾，以他的高远，以他的洞察，以他的沉静，假以时日，写作边界将去到哪里。“是修远/使血流充沛了万马，倾注在一人内部/这个人从我迈上了道路/他是被平地拔出”。这是他的《修远》。

没人知道，不到一年，一切戛然而止。

1988年青春诗会，是个奇特的存在。上半年已经召集过一班人马，李英说刘湛秋不满意，于是才有了8月的二期，我们这一拨。即便圈子小了一号，诗江湖依然还在，我到来时，他们已然分成两派，互不咬弦，这让会务主持王家新挠头不已。还好，新来的迟到的这位，老实巴交，不争不抢，完美的酱油党。

到会的第二天晚上，我一个人往外走，经过餐厅时给一禾叫住，进去招呼，一禾给我和座中来客介绍，是多多。我陪坐了一小会，一禾喝得有点高，继续他先前的话题，对开愚遭受的攻讦颇为愤慨，多多则频频举杯解劝。我一脸懵逼，插不上话，便出去瞎逛。



闲聊时，骆一禾说过一个有关他名字的段子，起因是，我们都认为他这名字大好，高端大气上档次，不像我们，还得抓破脑袋想笔名。一禾说，幼时随父下放河南农村，落户的李姓人家有一稚子，户主也跟我们一样，觉得他这名高端又接地气，遂给稚子改名，曰李一苗。一禾一苗，一根同生，其义无差啊。我们笑，名相如实不相如，咳咳。

印象中，我们那一群后来走得近的，是有合照的。为这记忆特意翻找了旧照，是有，但一禾不在，有家新，林雪，海男，开愚，和我，在天安门广场，很傻气地撮成一堆。至于哪一天去的，怎么去的，却怎么也想不起。只记得我和开愚、海男，是逛过故宫的，想必是在小集体“茄子照”之后了，我们以“子弹的速度”（我当时说的）一小时逛完故宫。逛完，又在附近小饭馆吃了午餐，海男抢着掏钱，说之前公交门票饮料都是我掏，这回该她了。真是好姑娘。那顿饭，按现在物价水平折算都不便宜，问题是，都没吃饱。

鲁院的研讨会结束，接着是好玩的部分，集体去北戴河。家新要留守编辑部，林雪要回东北，一禾要装修新房，马上要结婚，都没同行。我们起了个大早，一群人拎着包走去公交站。一禾也去赶车，走在我旁边，问我水性咋样，我说憋着气勉强能游过一个小泳池吧。他说，去了海边，千万别逞强，他一个小师妹，前不久在水库里遇溺，本身水性很好的。别逞强，别勉强，他再三叮咛。然后我们作别。

路上看到邮局，进去给女友发了一封电报，报个平安：无聊且乏味，此为青春诗会。现在去北戴河，勿念。他们以为有什么大事，关切追问，我把电报内容说了，几个女孩笑得花枝乱颤。

说到北戴河，顺便简单回放一下吧。坐火车抵达，住进作协的陈旧别墅，下午游泳，晚饭后大伙再赶往海边。在海边，邹静之老兄亮了一把金嗓子，彩声一片，然后各自星散。坐在沙滩上，涛声时近时远，明月生自海上，海男、童蔚、李英，三个女孩组成三声部，唱起了俄罗斯谣曲，“深深的海洋”，开愚和我则默然旁听。



人的记忆是一座幽暗森林，往事中的点滴，那闪亮的部分，像静夜萤火虫，在时空那端翻飞，明灭。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愿那一夜海边陆上的兄弟姐妹，此生安好。李英，也是麦琪，那个端庄、明慧的姑娘，眼底含笑、秋波流转的美好女子，愿你安息，无忧无怖。

北戴河回来，按事先约定，我变成书展的出版社工作人员，住进会馆边的旅馆。下午散馆早，闲来无事，在街边电话亭给一禾打了电话。一禾很高兴，说你快过来，小查也在。小查就是海子，一禾在鲁院时谈过。我犹豫了一下，推托了，那些日子诗友见得太多，一时吃不消，何况，那时还真不了解海子。

倒是家新，安排了哥仨的见面，在他西单的大杂院，一起吃的饭。一禾扒着饭，以他特有的惫懒，坏笑说道，听说你们这趟，去北戴河，搞出很多状况嘛，这一撮那一撮的……这里头，居然有我。家新一脸惊诧，我则一脸尴尬，这位大哥，浓眉大眼，居然也有一颗八卦的心，耳目还蛮广的。不过，消息失实，我最大的收获，是一个人坐在岸边破船上，帮人守了一晚的鞋，那些光脚的家伙，一个个走丢了。再有就是，回程火车上，海男和童蔚跟你一样，有颗知心大姐的心，跟我索看女友照片，我还真有，她们看得一脸激动，海男还说了一大通，可一口云南话我几乎听不懂。

诗会以后，与一禾有一搭没一搭通信，一禾回信总是很快，对我无聊的牢骚也饶有兴趣回应。我寄过一首长诗给他，他留用了，说要排队，还说很高兴有一本诗歌集子，把我俩都放在一起。这方面他又是先知，后来看到书，是一本年度诗选，我和他被收录的诗，都只是各自的中平之作。

1989，多难的一年，“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4月初，在出版社天台铁皮屋，打开寄赠的《澳门日报》，突然看到一小则消息：海子卧轨自杀，还有北京诗人圈的揣测评说。深为震惊，剪下报



纸寄给一禾，一禾简单回信，说报中所言不实，这些日子为抵抗谣诼，张罗海子后事，心力交瘁。

时隔两月，噩耗再度来袭，我已完全不记得消息来自哪里：骆一禾脑溢血去世。

听到消息当天，女友来探我，我抱着她痛哭失声，平生唯一一次，为家人之外的人辞世而痛哭。

第二天，按一禾以前留下的家中地址，给一禾父母发了唁电。半年前我失去了父亲，父亲的脸，在我手中渐渐冰凉，渐渐僵硬。老人失去亲子的切肤之痛，我不忍多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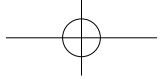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该为骆一禾做点什么。这个人，为他人诗歌做得够多了，这短暂的灿烂的一生，让它成为火焰，跳跃，成为琥珀，永固，留在人间世。

为这执念，一年后，当我进入《花城》打理诗歌栏目时，便第一时间付诸实施。骆一禾，海子，西川，曾经三位一体的诗歌兄弟，同一期亮相，大篇幅。为这事，早先拜访了张珉和西川，他们二位，一个为骆一禾，一个为海子，倾注了一生心力。

我无意把骆一禾当圣者来歌咏，虽然在我心中，他就是。我只是写下我有限的记忆，写下这活生生的兄弟，他若在生，我愿与他对酌终生。文本的骆一禾，我无力书写，自有达人从他留下的浩瀚作品中挖掘宝藏。他的两本书，黑封皮大部头的诗文集，血红的《世界的血》，躺在我书架上甚少翻起，那是掩埋的痛楚，那是时间的血痂，我倦于触碰。

“繁星已经无用，把它们熄灭吧。”奥登在他挚友辞世后，决绝写道。幸甚矣哉，繁星还在，每当夜临，星光迢迢奔来，照临我们，抚慰我们。三十光年外的星光，骆一禾溘然长逝那夜飞溅的星光，如今终于抵达，成为迟来的哀悼者。而今夜出发的星光，三十年后，我们安在？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 骆一禾《先锋》



从一封关于诗歌的书信开始

——《世界是从两个赤裸的年轻恋人开始的 —— 诗人骆一禾情书集》序

张珏

亲爱的读者，你们将要看到的书信写于1980年代，作者是诗人骆一禾。在那个以诗歌为先锋为光荣的时代里，他曾经是北大校园诗歌的领航者，也是那十年中国诗坛最好的诗歌编辑与诗歌批评家；当他的生命与八十年代同时终结时，年仅28岁，被看做是那个时代最后的抒情诗人，而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向史诗性长诗所发起的冲刺，至今无人能及。在他为诗而祭献青春热血的三十年后，再版他的诗集以及整理集结他未发表的遗作，既是因为骆一禾作为诗人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特殊意义和特别存在，也是因为我们更深地领悟到了八十年代的精神生活于我们今天的珍惜与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仅是一份个人感情生活的纪念，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生活之纯之密的一个见证。

一个诗人的生活怎可与爱分离？又怎么能不从中汲取生命的给养？这些情书不妨作为他那些升华了的诗歌的一份日常注脚，让我们更亲切地理解一种诗人的性格和命运。

而在此之前，也许，我需要先讲一个爱情故事，它从一封关于诗歌的书信开始，但却缘于一个年轻的死亡，想到其终结亦是如此，中间更交织着数个年轻的死亡，如一禾诗所言：“因此它是生命的写照，必然加入命运”。

那是1982年的秋季，我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二个年头，所在班级发生了一件吓人的大事：入学年龄最小的四川籍女生张延娟在宿舍



里用她的一条粉红色纱巾上吊！记得还有两天就是她17岁生日，她是家中唯一女孩，是家乡那个县城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而且考上的还是北大！

宿舍门一个上午反锁紧闭，我是最先撬门进入的两个女生之一，眼前所见当真是五雷轰顶，班长喻天舒大姐慌乱中到处寻找剪刀，我则拔腿向外跑，想着应该马上去叫医生急救。从31楼到校医院不算很远，那不到千米的路程我跑得无法呼吸，喉咙剧痛双耳失鸣，腿就像在噩梦里一般拖不动。最终，我记得自己在午间空荡荡的医院走廊里凄厉大叫，这样也是没救的了。后来看到她被我们班几个男生放在担架上抬了出去，难以想象她个子矮矮的那么一个女生，现在五六个人都抬不动。死亡真是沉重！我的眼泪这时才落了下来。

两天之后，我们同班四个女生一起搬进了215，原先与娟子同屋的人是再也不敢住在原地了，空床是条件不允许的，于是来自两个不同宿舍的两对好友自愿入住结成了新的小集体——她们就是一禾信里常亲切提到的A、B、C、D，我们按生日这样地排了老大老二，其实呢都差不多大。我睡在了娟子的床上，我们把屋子整理得干净整洁甚至可以说漂亮，书架上摆了很多心爱的小物件。第一个晚上是怎样入睡的呢？好像是熄灯前，四个人各自拥坐在床上，安静地写日记。这一幕恒久地被我记得，其实也是日后经常的状态，我跟同屋的大学时代非常美好，因为最初情形下的选择，已是难忘的情义。

入住不久，同系七八班的师兄潘维明和刘晓峰到新宿舍看访，大概既需要做些调查又有必要对师妹们进行安抚吧。当时宿舍里为啥是我一个也记不得了，未见得是点名要找我谈吧？班内部已经有些争执指责，她闹自杀不止一次，遗书写了几回，甚至有一次离校出走，搅得班里起伏伏，很多人卷入。她其实并非一个忧郁的孩子，快人快语的，就是文艺情结重，试图与两三位才子谈恋爱不成，上课学习也不是她的志趣所在，终究是在才女情愁的绮梦里失重，轻断了性命。我俩的关系很



好，她叫我二姐，常常搂着脖子说，我爱你可是我比你有才气啊。她这话总让我笑，但她的遗书让我笑不出来，写得都是虚妄。

那天下午我好像说了好多话，把娟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得两位师兄频频点头，临走前说会再派一位师兄来跟我聊一次，我很纳闷，聊完了呀。过了两天，七九级一位叫赵仕仁的师兄果然来找我续谈，看意思是想让我写点什么。这是要一个调查总结还是一篇报道？这怎么写？瞬间我就反问起他来，写张延娟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写这种死亡有什么意义？这本该是我自问的，可我却把问题抛给他，就这样进了另一种维度，它跳出了事实的陈述与真相的甄别，直接针对生死，青春、幻想、文字、真相，以及是什么赋予人生意义？是什么给予故事真实性？其实我的脑子是乱的，谈这些哲学或人生我还没有资格也不懂，因为不能接受张延娟的死而导致对事件的无从论起使我有一股强烈的怨怒情绪，让我对娟子的死倍感刺痛。

仕仁兄始终不慌不忙地跟我说话，有时也扶头陷入沉思。末了，才对我说实话，他奉师兄们之命要组建燕园新闻社，他们看中了我。噢，原来这是一次面试。接着他很关心地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诸如我哪儿考来的，有些什么文学想法之类。大概是我说了自己写了点幼稚的破诗之类，仕仁兄便嘱咐我下次来报到，一定拿来给他看看。又过了两天，我去37楼学生会燕园新闻社报到，把抄好的两三张作文纸给了他，他说他们班有个大才子，诗写得特别棒，说我让他看看给你评点评点。不久，他真就带回来长长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这个集子里的第一封信。

我的习作被如此认真地对待，特别令人感动，这人的文字也立即让我臣服，真是诗人真是好老师啊！多年后再看那封信，惊讶地发现那么幼稚的诗里，也是有点宿命感的：我现在也是有一封不知如何投递的信的。

老赵接着约我去见这位老师，这个建议简单到就好像老赵请我顺道



去宿舍串门一样，我没多想就去了。只在进屋的瞬间我突然感到畏缩，我不知道自己是干嘛来的。拜师么？好像我真要写诗似的，我什么时候想成为一个诗人了？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屋当中，惊讶地发现那个我要拜见的人还在老赵的上铺睡着没有起床，这都几点了呀？等他下床，空气早已尴尬凝结，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头发乱糟糟的他也不能与我对视，老赵没事儿似地自说自话，不知说了多久，最后一句竟然是没事你俩一起去看电影吧！半个多小时的见面我啥也没记得，就记住这句话，庆幸它结束了我的尴尬：既然这不过是老赵一厢情愿地要给自己的同屋好友介绍女朋友，那我能做的也就简单了，对他的信表示感谢，然后麻溜离开。

师兄真是好笑啊，都什么时代了？我们又在哪儿啊？恋爱不能自己谈么？搞得跟相亲似的，从头到尾这就是他下的套呀！我决定以后只去燕园新闻社再去男生宿舍了。老赵倒也若无其事，常常到我们女生宿舍这边来，一来二去我倒跟他们班女生熟了起来，尤其是老赵很要好的师姐丁玫。我们宿舍挨得近，师姐们很有生活气氛，不是打毛衣就是手工缝纫的，而且一半有男朋友了，好像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天气开始冷的时候，老赵召集开会，有个新的任务：当时校团委书记李克强希望我们能办一个新式的共产主义教育展览。这个临时成立的策展小组，后来被我们戏称为共产主义小组。老赵带出了自己的文七九三剑客阵容，除了骆一禾，还有何拓宇，而核心头脑就是克强书记推荐来的老大哥、当时哲学系研究生朱正琳。我只是个打酱油的小跟班，所谓工作就是替他们打饭、领点材料、刷刷浆糊，鉴于老赵下套未果，现在他们仨全都默契一致地拿我和一禾往一对儿里算计，不加掩饰地暗示、诱导，可我自打开始就被这个小组的魅力深深吸引，根本无力自拔，倒几乎天天要跟他们泡在一起。

老朱是个传奇人物，年青时曾因在贵州图书馆偷书蹲过监狱，考中北大却被拒绝入学，他的上诉信登在了青年报上，最终被破格录取，



所以他大我们十几岁。当然，他跟太太的恋爱也很传奇，讲课之余的闲聊，太太是经常被他挂在嘴边的，我特别记得的一个细节就是每次她往监狱里送的牙膏都不是同一种牌子，真是忠爱无极呀。说完他自己的恋爱故事，老朱顺手就过来敲打我，“小姑娘，恋爱要趁早噢！”对此，我只好用爹妈不允许来抵抗，虽说是真的，但无人搭理。彼时，我们无穷尽地迷恋老朱给我们讲课，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讲到存在主义，一路开讲到大文明没落大文化迁徙，完全是倒栽葱式的醍醐灌顶，直接往我这1.5级文学基础课还没上完的空瓶子里面倒。有些时候，还有点三英战吕布的意思，他们三个年轻的兄弟轮流质询老朱，说不过了就撂话，什么五年十年之后批判你之类。我是专心听讲的“小兔子”，老朱这样说，我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就接着说，可是这个小兔子总想惹人注意。我臊得不行，他不比其他师兄，是叫我敬畏的，而他狡猾地在我的本子上写，一禾说你路子对！

小宇是个叫人开心的家伙，有点坏坏的魅力，他的言语总是那么风趣、幽默，什么事什么人被他一讲便是妙趣横生了。倘若是我们几个一起，我一定是先对着他说话，一禾在边上倒是沉静少语的。然而，眼看着女生宿舍门要关的时候，小宇就会一本正经地说，让一禾送你回宿舍，我懒，美女我也不送。

我们办展览的地方在新建的三教一楼100号，最东头的大厅，那时还未使用，夜晚回到31楼要经过空旷的五四运动场边缘和未修整好的工地，是有点黑漆漆的，但比那个更让人担心的是我要和一禾独处。不是没有推拒，但他已经拿起了我的大衣。一路上找着话说，我紧张得不行，甚至没来由地绊了一跤，很是狼狈，冲口就怪他，马上又被自己的无赖惊着了，人家始终是碰也没碰我的呀。及至飞也似地逃进宿舍楼的灯光里，我才松了一口气。

之后，我对一禾产生了好奇心。他绝对不是一个讷于说话的人。当老朱讲课的时候，不难看出三人之中最有才学和语言能力的就是他，而



且他记忆力超强，能大段背诵诗歌或他看过的书，我们展览中的大多写作都摊给了他，老朱就写了一个漂亮的序言，开头抄的是《共产主义宣言》：一百年前，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

可是他为何总显得那么忧郁呢？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向老赵和小宇打听。比如问小宇，你俩性格差距那么大怎么成为好朋友的呢？小宇说他们俩成为好朋友的特点就是，他能说一晚上而一禾一句也不说，可是彼此感觉都特好。我有点明白了似的，之后便渐渐习惯了一禾默默的陪送。至于老赵，总算是约略透露了些一禾在失恋，凭着小女子的直觉我也不难猜出那人是谁。当时常来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串门的就是老赵的小女友、法语系的晓霖还有师姐丁玫，那时，我已经读过她的几首诗了，一禾爱上她一点也不奇怪，遗憾的是我已经在宿舍见过丁玫师姐青梅竹马的清华男友了。

理解了一禾的暗恋之苦，我也就理解了老赵的煞费苦心，从此解放天性，再无尴尬，高高兴兴在组里扮演插科打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师妹角色，因为我喜欢他们所有的人。那真是一段欢乐的日子，对大家都如此，最快乐的莫过于一起唱歌。这是从哪天开始成为我们的一个聚会传统的？我记得不确切了，但肯定是一个大家都在37楼的夜晚，丁玫和晓霖也在，大概是老朱提议的，一开始是合唱，从大家都会的苏联歌曲开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喀秋莎》到《红河谷》《深深的海洋》《鸽子》《啊朋友再见》等等。通常是一个人想起一首就起个头，大家马上加入。噢，那个还没有卡拉OK的年代，我们会唱很多外国歌曲，把世界各国溜完了一遍之后，我们便开始唱刚刚兴起的台湾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之类，老朱不大合这些时兴的，便打开箱底唱他的恋爱歌曲，声称以前都是给他太太唱的，都是些我们没听过的外国民歌——

“我怎能离开你，我怎能舍得你，爱人请你相信，我只爱你。有一朵蓝色的花，名字叫勿忘我，佩戴在你胸前，思恋着我。……”



“我今日上山漫游，梅姬，想起当年往事，小溪荡漾水车响，梅姬，仿佛当年同游时。……”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忧伤，我心中只有悲哀，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叫我不能忘怀，……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她高高地坐在山上，她有着金色的头发，一边梳一边歌唱……罗蕾拉的歌声谁听了都会哀伤，罗蕾拉用她的歌声将他这样埋葬。”

他嗓子不怎么地，却唱得很有板眼很抒情，惹得我也开始独唱，“不要责怪我吧妈妈，我是那样爱着他，没有他，我一人生活，叫我如何寂寞。”记得当时我跟小宇唱得最默契的就是“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的那首《童年》，最符合我俩的性格。而大家最爱跟我一起动作的，就是《拍手歌》，“你要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跺跺脚……”，最后我能把挤鼻子弄眼全都给带上去。到最后，我们总会唱《国际歌》和《友谊地久天长》，所以，对我来说，那一天总好像是圣诞节。

在以后很多次的聚会里，都有这样歌唱的场景，我记得一禾和小宇最爱合唱的，也是他们唱得最好的，就是侯德健的那首《归去来兮》。“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是多少年来的徘徊啊，究竟苍白了多少年，是多少年来的等待啊，究竟颤抖了多少年，归去来兮，青春将芜，老友将芜，心琴将芜……”而很多年之后，我再也无法去唱这首歌，因为老赵、一禾、小宇都不会回来了。

这快乐的日子过得非常之快，转眼元旦过完了，展览也结束了，最后一天小组活动，是一月八号，晚上在100号。在小宇还没从家里回来的时候，一禾说有东西要送给我，我高高兴兴被他拉着手走进了隔壁的教室，门一关，他未去开灯，而是一把将我拉进他的怀里，使劲地吻我，同时一只手也伸进了我的胸口……我僵在那里，这一幕突如其来，我完全不知如何应对！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老赵在喊我们，显然是小宇



来了，他在找，这俩在哪儿呢？我们顿时都像作贼一样，动也不动，彼此听见咚咚的心跳，大气不敢出，不敢答应，呆在黑暗中。不知过了多久，我俩假装没事出去，加入大家。但我觉得一切不过是掩耳盗铃，谁都瞧出我面红耳赤的不自然吧？只是没人忍心追问罢了。

我懵里懵懂地照旧被送回了宿舍，再一次一路无话。坐在床上，我也想起这便是我的初吻了，皮肤便一阵阵过电。即便是后来的初夜，也不曾像那一吻让我身心雷电通明，震颤到体无完肤片甲不留！

一禾大概也是一样，因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突然出现在我们宿舍门口，找了个没来由的借口，但我甚至都没法请他进屋，还有人没起床呢。不过，我明白他的心思，他仅仅是想看看我怎么样了。我微笑着向他表示我正常，但也没正常到会说话的程度，而他也很快地蹿开，我端着脸盆出去洗漱，在走廊里看到他仍在楼下张望，于是又朝他挥了挥手。

几天之后，再有独处的机会，是我送他到北大南门坐车回家，他毕业在即，只剩下论文，而我面临期末考试，压力山大。由是，我也没想弄明白在那一吻之后我们是何关系，以前我认定我无诗才不是他的菜，现在他却表白了他的激情，可他为何不等到我毕业？无论是师姐的存在还是爹妈的教训，都使得我觉得恋爱最好是以后的事，我甚至认为他肯定是明白这点的，因为在这个小组里面、在我喜欢的人面前，我从未遮掩过一点自己，大学期间不打算恋爱，跟他们的差距太大了要读的书太多了，友情比爱情更重要等等，这些话都是我认真说过的。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的一点窘迫、非典型性师兄的表现，他说他不知道展览过后，我们是否还有机缘常在一起，而不在一起，又会发生什么事，况且，他再有半年就要毕业了。想想，我们都说再想想，但他说可以等我毕业再来看我。

必须要提到的是，1982年最后的一两个月，对一禾而言不光是产生了新的爱情，更重要的还是他思想的启蒙，很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诗



学《美神》中这样写到：我想提到一位长兄，一个我在诗论《春天》里提到的背着空布袋走过沼泽地的智者，他在一个冬天里引导我的思想走上了今天的道路。并使我领会了这样一句话的全部意境：“孩子，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其余的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是维吉尔在《神曲》里所说的话，而我在青年时代得以感受到这样的真实和幻美。

这个兄长就是我所说的老朱。

寒假跟家人过得很快，三月回校后第一件事就去老赵他俩宿舍看他们，我发觉自己真是很想念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老赵很快告诉我们他又有了——间办公室，平时就用作聚会的据点，37楼137室，他们三个几乎轮流住在那里，而我呢，继续殷勤地每日饭点到那儿去给他们打饭，甚至用煤油炉做饭。后来小宇郑重地夸奖说，张珏同志给我们137室带来了家庭气氛。谁人在意我们成为恋人的事实，在他们眼里早就如此了，而我俩也顺理成章没再去讨论我们的关系。讲真？除了私下里偶尔有机会偷吻，表面上的日子也可以说变化不大呢，快乐的共产主义生活继续主导着一切。

当然，生活的内容还是极大地丰富了，尤其是对一禾和我而言，那毕竟是最后同校的半年，我们好像是在抓紧活动，实际上是抓紧时间相处。

首先是老赵怕我没了展览之后脱离组织，赶紧给我派了一个编《文摘报》的活儿，在屋里抄抄剪剪的；而一禾和拓宇则觉得有必要将我安排进文学社团。那时五四文学社基本上都在七九和八零级师兄们的掌控之下，社长是他们同班的胡迎节，小宇和石冰是小说组的，一禾本人是诗歌组组长，同级的诗人沈群、丁玫、熊国胜、老木，还有八零的于慈江等等，都是他的组员。后来很多回忆和评论都把一禾看成北大诗歌的领头人和开启者，我也是亲眼见证了他在北大的诗歌活动的，比如他和



西语系一个叫做“五色石”的诗歌小组接触，其成员除了西川，还有后来跟我成朋友的陶宁和李东。学期快结束时，八零级的师兄张颐武带着法律七九级的诗人海子来见一禾，我就在场旁听，他交上的诗是《山的儿子》，每句老长，跟后来他的诗风很不一样。西川和海子毕业之后仍旧跟一禾保持着诗人的友情，日后就被看作是北京诗坛的一个三人组。一禾对诗歌美学的论述以及对别人作品的评论绝对是精到富学的，所以他总是很能征服人。我想说的是，他后来当《十月》编辑的才识能力在那时便已显露无疑。

我自觉自己没什么作品，诗歌和小说组是绝对不好意思进的。想着或许进评论组比较合适，那时一禾同屋李景祥还有师兄张颐武似乎都是评论组的主力，我凑过去也不难，也似乎短暂地参与过系刊《启明星》的编辑工作，但最主要的还是在分支出来的“影评组”里找到了兴趣所在。最开心的是一禾、小宇、石冰等也一起参与，后来，我们干脆就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北大电影爱好者协会，会长是沈群还是王晓庆我忘了。由此，在校期间我看了很多电影，还经常拉一帮朋友去看。毕业以后，文学批评和电影制作也真成了我多年从事的领域。

回想那半年，整天在37楼里进进出出，我认识了很多一禾同学、团委和其他社团里的诸多师兄，有点活跃分子的小名声。大学时代，交友是非常重要的，我那时对自己的幼稚深感不堪，渴望成熟，所以尤其喜欢听那些比我年长的、有点社会阅历的人聊天。彼时经常出入137室的，除了跟一禾来往的文学才子们，老朱他们28楼的哲学家思想者，还有跟老赵一路的中文系其他师兄老潘、刘晓峰、胡春华等等，在北大团委里面，他们都跟克强师兄一样，是立志从北大出去从政的精英。除了谈国家大事政治改革，偶尔也谈点别的，有一天，看我在宿舍里给大家包馄饨，克强师兄便饶有兴致地教导我怎样在馅儿里包出汤来。他那时也在恋爱，据说经常关在宿舍里跟女友下跳棋。

小宇那时跟我讲，他们这文七九的三剑客是有明确分工的，老赵是



中国的头脑，他将来是要从政的，一禾是中国的良心，他将来一定要成为文学大师，中国最好的诗人。我说那你呢？你难道不想成为小说大师么？他笑着说，他们俩把大事都给干了，我就什么也不用干了呗，我就做个中国的胃！舒舒服服地整天吃喝玩乐，享受生活……顺便拉出点小说来。看着我冲他做怪脸，他很严肃地说，你笑什么？没生活你写什么小说？我就是要生活，小说？就是个顺便的事儿。一禾不是说什么，为了朋友的光荣甘愿做一个光荣的朋友，所以，除了生活，我还得写点什么，谁让我跟他们混呢。

这个段子很著名，因为小宇喜欢跟人讲，每讲就很得意，我敢肯定这是他们仨某天深夜长谈各自理想之后，小宇即兴创作的段子。他倒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潇洒的位置，可是你怎么能缺一个潇洒的朋友呢？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似乎一直过得很潇洒、快乐，他们共同的朋友向东说，那个小王八蛋简直没有一刻不是快乐的。直到有一天他潇洒不起来了，便断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大概可以这么理解他。

我因为这样有趣又广泛的交往、聊天，几乎完全忽略了与本班同学的交往，内心深处，我甚至认为跟同年龄的同学交往没啥意思；但女生宿舍除外，因为有很多恋爱秘密需要深夜长聊。我们班男生不得不到走廊另一头的七九级宿舍去打听，才知道我已经给师兄拐了。

说到恋情，那半年，我们的感情是青涩的，就像很多初恋一样。

开学没多久，一禾的大姐突然因病去世，而这病因其实是家暴的积疾。一禾幼年随父母下放，稍大些在北京上学是跟大姐相依为命的，受父母的牵累这个姐姐嫁得最为不好，才有如此悲剧发生。一禾当时是力主上诉公堂为姐姐求个公道的，但家里商讨半天最后作罢，令他不仅伤心更是忧愤。所以，我总觉得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忧郁。

而老赵呢，突然决定跟晓霖分手，回归他考上了武汉大学的青梅竹马、一个同样学法语的福建女孩林建桦那里。对此，一禾立刻骂他事儿



做得损，老朱也是不赞成。我和丁玫倒是同情老赵的，想想说到爱情，又有什么抵得过青梅竹马呢？毕竟老赵和晓霖也没处多久嘛。一禾头一次冲我发了火，吓得我够呛，也很委屈。老朱和一禾仍旧决定带晓霖玩儿，有时我们就剩下四人了。渐渐地，我就感觉晓霖仍留下跟我们一起，并不是为了老赵而是为了小宇，可我也不敢说呀。

也许更复杂更深的一层是，丁玫毕业去向的问题给她和恋人带来了危机，我不能不感觉到这也牵动着一禾的心，而我也眼见得师姐的忧伤；一禾有位极其漂亮的女同学陈燕妮，原先是老在通信的，如今一禾竟要背过身去撕她的信了。我明白这一切皆是关爱，不同于小宇的潇洒，我深知一禾的善良与重情。说到底，是我有点不自信，论才华论友情的根基我都跟这帮哥们姐们差得太远，一禾越是说我快乐的性情使他受到了吸引，我便越是不自信。这并不是说，我们俩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只是我开始品尝到爱情的苦涩，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惆怅了。

可是大学的生活是如此地活跃，我没那么多时间自哀自怜，更高兴的是我跟一禾有了更多的活动。比如，我们确实一起去看电影了，一起去逛书店了，一起去听讲座了，一起去听音乐会了，一起去图书馆借书了。虽然集体活动仍居首位，但我们有了更多的单独一起的机会，一禾也就更多地成了我的导师。他总是会给我挖掘和表达自己审美感受的机会，这时候，他是否是我的情人并不重要。

我们常在一起散步、聊天，未名湖畔、宿舍楼之间小道，留下了我们无数的脚印。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就在31楼南门外的小树下，他说起老朱说过的，三十岁以后就不写诗了，因为诗是属于青春的。想起他曾经跟我叹气，说这辈子好像只会写诗，别的都不会，我不由得问，那你干嘛呀？他回答说，他可以写散文呀，写小说呀，然后把毕生贡献给一部美学巨著，或许，最终他要写一个戏剧。他跟我说，文艺复兴往往以诗歌做先锋旗帜，呼唤新思想的到来，然后以小说为中流砥柱真实地表现那个时代，而最后为那个时代总结的是一个戏剧。那天，他跟我



聊了好多题目，最后他问我你想写啥？我想起自己恋爱之后又写的几首小诗皆被他批评为平平幼稚，就笑着说，有你在这里，我写诗还有啥前途，我还是写小说吧，或许我还可以写电影剧本。他提到入学头两年他也跟小宇合作写电影来着。末了，一禾停顿一刻说，“你知道咱们俩这叫什么吗？”我看着他，“年轻！”

我们年轻么？快到期末的时候，六月，我要过二十岁的生日了，天天都很紧张地跟大家伙儿唠叨，怎么过呀？我要老了哎。小宇咳嗽，怎么说话呢？比你老的可都在这儿呢。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男的没事呀，过不过二十的都是青少年、小伙子，可我自后就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人家再也不会叫我小姑娘了。全体哄堂大笑。最终，我决定去照相馆照一张相，留下我十九岁的情影，可笑的是洗完一看，老相得不得了，我记得那天熊国胜正好来，我还拿着照片给他看，是不是比我本人看起了老多了？一禾懊悔地说，早知道应该让你去王府井照相馆照，那有个师傅是给周总理照过相的。其时他三姐是在那里工作的，一禾没有食言，我的毕业照就是在那里照的，非常的小姑娘，跟我妈年轻时一模一样。

想我在北大十年，未名湖陪伴了我多久？后来我又跟一禾留了多少合影？在海边的、在山上的，但是留在脑海中最恋人的身影，就是二十岁生日那晚，他陪我坐在湖边，度过十九岁的最后一个小时。那天蚊子在我腿上咬了很多包，六月的石阶也是充满凉意，硬蹦蹦的，但就是舍不得离开，头靠在他的肩上，有种终身相许的依赖感。

年轻的紧迫感一直压在一禾心头。最后那半年，他依照着老朱的导引，去看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等许多大部头的史论著作，完成了毕业论文《太阳城》。借评论北岛这八十年代朦胧诗的领军人物，早在新一代诗人喊出PASS北岛之前，一禾已经辨析了他们的价值与意义，与他们拉开了距离，选择了自己要走的方向。同时，他开始在《青年诗坛》上发表诗作，新出版的诗集也不断收选他的作



品。那时，拿着一禾的稿费到燕春园去搓一顿是我和小宇的一大乐事。他总是说，哎，蝈蝈儿，你去查查，一禾的稿费到没到？蝈蝈儿是向东给我起的绰号。

毕业在即，分离在即，一禾总觉得该跟我一起出去玩一次，以增进我们的爱情，而对小宇来说，在朝九晚五的上班日到来之前，彻底地放飞一次也是必须的。我不能确定去北戴河的计划是小宇的提议，抑或不谋而合，但我有一种感觉，大海是他们俩共同的向往，因为最早他们合作的剧本，就以大海为背景，有老船长、少年、海鸥这样一些人物。而后来，小宇对一禾的纪念，也以大海为背景。

在小宇兴高采烈的“让我们看海去！”的欢呼中，我真是犯了愁。因为始终，我有一个问题。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回家一起吃饭，爸妈在吵架，我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傻劲儿，突然宣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我有男朋友了！这下，他们就炸锅了，开始我还信誓旦旦，绝对不影响学习，我男朋友学问比我大了去的，可是完全没用。有生以来第一次跟父母发生了激烈地争吵，最终撂下一句话，我二十了，你们管不着！母亲头一次听女儿这般说话，愣了半天嘭地跪在地上，好！都是我对不起你是吧？！我吓傻了。此后，我每次回家都是畏畏缩缩的，总感觉自己被监视，家长们用冷战的方式逼着我分手。如今我还要提出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儿，怎么敢呢？是不是得干脆来一出私奔呢？

幸好一禾和同班的旺子决定一放假先去广州玩，小宇表姐的同学李向冬在那里等他们，他们还要一起拜会刚给一禾发了诗的《青年诗坛》主编林贤治。其实，向东和一禾认识已久，通信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互相交换过诗，一禾给我看过向东的信，字写得漂亮极了，他居然叫他小长春藤！就是对一禾有女朋友这件事相当不感冒，信末直接警告，女朋友之类的东西是会影响男朋友之间的友谊的。这惹得我马上就问，小宇和向东，你跟哪个最好？一禾把向东排在了第二，但这也让我放心，我说不行，我得给他写信，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总之，我去一禾家



(他们对一禾谈女朋友这件事倒无异议，见我也不过是有些考察的意思)送他的时候，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一禾跟我说他会给我爸妈写信解释。最终，在我和小宇及其航院朋友出发之前，一禾的信总算是寄到了我们家，他恭敬的态度和信皮儿上的地址，终于也让爹妈放了行。而一禾呢，从广州回来没两天，也跟小宇另外三个朋友一起到北戴河与我们汇合。

小宇的朋友是北戴河的村民，我们一伙人都住在他们家，白天海边游泳晒太阳，晚上吃点农家蔬菜喝喝啤酒，然后坐在屋顶上乘凉海聊。跟一禾一起来的朋友里夏阳和潇潇是北师大的一对恋人，因为只有两个女生，我跟潇潇很快就进入闺蜜模式，她问你跟一禾怎么好上的呢？我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老赵下套的故事，可她却提了一个我没想过的问题，哎，你怎么没跟小宇好呢？我一时也不知怎么回答，恰好这时小宇也走上屋顶，单膝跪在我面前，双手放在我膝盖上看着我说，哎我说张珏，你没发现你跟一禾好了之后我都憔悴了么？我刮了一下他的鼻子，意思说去！后来把小宇这话告诉一禾了，他有点气恼地说，那他倒是跟我说呀！

海边的日子快活得不行，我可以跟一禾趴在皮垫子上漂好远，夜晚在海边散步，看到海里漂着绿色的海藻，惊喜得让我蹦蹦跳跳的。男孩们整天光着膀子想晒黑点都晒蜕皮了，我整天穿着小宇的大浴袍带着大草帽捂得严严实实，最后伸出胳膊一比，我最黑。

接下来是他上班我上学的日子，也就是1983到1984这两年，那是我们通信最多的日子。为了不影响工作和学业，我和一禾约定一两周见一次面。对初恋的人来说，两次见面之间真有无尽的相思之苦，除了每天在楼道里排队打个电话便是写信，好像是每天一封的节奏，写两封也是有的。这种约定也未必能全部坚守，但坚持约定是我的自律。跟一禾相处在学识上的差距，需要更勤奋地读书来弥补，差不多他一毕业，我



便下决心考研，后来一直读到博士，都是这种动力在里面。一心要做谢冕老师的研究生也是因为谢老师是新诗评论大家、诗坛领袖，感觉我能从事新诗研究，是可以跟一禾成为“贤伉俪”之类的搭档的。没有课的日子，我便早早地到图书馆占座读书，三教开放之后有了晚自习，我也常常在那里待到一两点。日记也没时间写了，晚上上床前的时间都用来写信。由是，我很早就开始用效率手册这样的东西记事，直到考上博士。我每次翻这些手册，都得意于自己基本保持着一周读三本书的节奏！当然，这是囫囵吞枣式的学习。

那些年工作还是国家分配，各行各业都急需大学生人才，早毕业的同学得到了好岗位，但我一直乐于留在学校，也是性情使然。学生生活简单好玩嘛，读书对我从来不是苦差，考试也吓不倒我，在这方面我是属于既聪明又有考运的那种人。我一直觉得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很快快乐的事，所以，选修课及写专题论文最得我重视，也常能得到老师的夸奖。在师兄们走了之后，我便把旺盛的社交精力全都投入到食堂舞会上去了，除了传统的交谊舞，我还去学新起的迪斯科以及国标舞，以致到大四混进了北大艺术团成了“专业人士”。这期间我又结交了很多不同系的朋友，多数是师弟师妹，俨然有点大姐大的意思了。

这些密集的信，基本可以呈现那两年我们爱情生活，需要我补充讲述的不多。第一件重要的是1984年的春天，向东带着女朋友关佩来北京玩，被旺子安排在他中关村的单身小屋。那时，我们班正要去郊区植树，我可舍不得为了这事不见一禾最好的朋友，于是旺子就想办法给我搞了一个病假条。当然，这件事后来败露，我受了班主任老师的批评。可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在那三天独宿的机会里，一禾和我终于偷尝了禁果。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为此而感谢向东的到来，他甚至带给我香港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当时很有性禁忌意味的书。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在长城上给了我一个下马威，狠狠地用脚绊了我一跤，痛得我当场哭起来，更把她的女朋友扔给我，单独跟男生们聚会。我便教唆



关佩喝酒，我发现她还挺有潜力。半年后他又来京一次，是因为要去日本留学特地跟朋友告别，醉得十分惨烈。

那时小宇也有女朋友了，是北航的女生褚雪清，来自安徽。其实海边回来，我便觉得小宇确实该有个女朋友，曾经试图介绍师妹给他，这类乱点鸳鸯谱的事儿我给一禾的同班好友老熊也干过，貌似颇得老赵真传，但比他还不得要领，毫无结果。一禾和小宇一起分配到《十月》编辑部没多久，小宇约我俩到他家吃饭，理由在一禾看来有些神秘，为此还专门到学校里给我留信通知我。那天 he 就把雪清介绍给了我们，介绍得极其含糊，这就是我那个……那个……咳，你明白吧？哎？吃了一晚上，我也没明白这个女孩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完全地欠交代。以致回家的路上我愤愤地对一禾说，凭什么他约会，我给做饭啊？以后好几次他的约会还是这样，冬天他计划给女朋友买双冰鞋，竟然让我列入一禾的预算计划，搞得我很长时间对雪清无感，直到她到北大来找我玩，我才接受了她这个朋友。几年后她也跟向东去了日本，而分手的最初矛盾起源于小宇不肯结婚，到最后他也没结婚。

毕业之后，老赵的日子是最不如意的，高检是他的选择，但实际去了又很不习惯那套体制，跟女朋友又长期两地分居，心情的低落可想而知。毕业后我跟一禾和他的朋友们大致还能以中关村为中心时常聚会，因为有旺子小屋和小宇北航的家，我跟陶宁成了闺蜜，住前后楼，石冰和一禾这俩同班兄弟搞得也跟连襟似的，常常能碰在一起。可是老赵在王府井离得远，国胜在八一厂也离得远。

到了1985年6月我生日前后，我花了几天时间不眠不休地誊抄完了关于曹禺的话剧《雷雨》的毕业论文交给了导师，而考研的事情也已落定。谢先生那年不招生，我便照顾了一下自己的戏剧爱好，考了陆颖华先生，专业方向是当代戏剧，所以很有些大功告成的感觉。那个夏天便常常跟闺蜜、同级经济系的雷音等一干文学好友去颐和园后湖游泳，一禾也来参加过一次，他提到了老赵的低落，说老朱也知，过两天准备叫



仕仁一起去怀柔水库玩。

一禾从怀柔回来，正好赶上我们同屋几个一起去看电影，他也就跟着去了。我们看的是滕文骥拍的电影《海滩》，其中有一个傻孩子落海的情节，一禾默默地流出了眼泪，而我专心看电影竟然没觉察。走回宿舍楼，他拉着我没让进去，难过地告诉我老赵没了。说什么呢？我完全不能相信！

事情大致是这样，老赵不会游泳，一直是抱个游泳圈在水库里泡着。另外两个女生也下了水，合用着一个游泳圈，一个想往中间游，另一个却不敢了。老赵就把自己的游泳圈给了她，自己朝岸边扑腾过去，也许他觉得这不过是很近的距离，可是没到岸边他就下沉了。当时老朱跟一禾在岸边聊天，看到了老赵的扑腾，冲下去想拉他一把，没拉到。接着所有会水的人都跳下去找他，却一无所获，谁也不知道岸边有一道几十米的深沟。直到潜水员来了，才把老赵的尸体捞了起来。

我嚎啕大哭，就站在路边，不管不顾。他是我和一禾幸福的连接者，此生最为感恩的朋友，可他竟然如此年轻、如此轻易地就没了？！前两天我还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同他说笑呢；而一禾也记得他赶到老赵住处跟他一起去怀柔，老赵给他煮了一碗方便面，还非要给他加上橙汁增加维生素。接下来的一周，一禾和老朱奔波于北京和怀柔之间接待他的家人和几乎疯了的建桦，料理后事。老赵遗体告别那天，我去一禾家，发现他因为牙床肿痛已经几天吃不下东西，喉咙也变得嘶哑。我心疼地抱住他，他也紧紧地搂着我，说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八宝山火化厅里，我们几个亲近的朋友一起最后陪伴着已经被放在传送带上的老赵，看到建桦用手绢擦着他耳后的血渍，我又一次哭出声来：我不敢碰你，原谅我，老赵。

之后，情形也不太好的一禾坚持要送建桦回大庆，她已毕业分配到那里工作。路上，一禾翻看了朋友的日记，他感到自己的朋友毕业后不仅鲜有快乐，更渐渐失去了思想和阅读，以前的老赵是一个多么爱谈思



想的人哪！那是没过三两句便要单刀直入地挑起一个重大话题的人。而最让他感到痛惜的是，从日记上他分明地感到老赵一直是个处男！即使是跟女友过夜，他也克制了自己的青春冲动。

七月末的最后一天，一禾和旺子几个朋友把仕仁的部分骨灰埋在了未名湖畔湖中心岛一个向阳的坡面上。一年后一禾两首题为《黄昏》的诗都是祭献给他的，仕仁就是他黄昏时的忧伤呀，而他在《美神》诗论中提到这位故友，是他曾经鲜活的青春融入了他的诗歌血液。老赵于我一直是大哥一样的存在，他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他的政治思想我委实也不大懂，除了是个笑咪咪的人儿，我想不起他更多的细节。唯一不忘的印象就是在37楼，当我和一禾抱在一起喃喃私语的时候，他可以安之若素地坐在对面桌前看书，这是一个我们初恋的守护者吧？他在给我的贺年卡里写道：我知道，点爆竹时你不会捂着耳朵，你是个大胆的女孩。我相信，你要比那些胆小的女孩有更多的福气和快乐。

一禾早期的诗歌跟青春与友谊密切相关，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些感情至深、默契共鸣的朋友。他很在意朋友，也很在意他们的感情归属，在我的印象中，旺子和小陈儿的分分合合，老熊的两次恋爱，大哥郑生与小雪的婚姻波折，向东和关佩究竟能不能撑住去国离别，石冰能否懂得陶宁的诗心，都是他关心的话题。随着老赵的去世，一禾开始有意跟小宇疏远，因为他知道了小宇跟晓霖早有私情，痛切地感到了朋友间的背叛与欺骗。一禾以为老赵情感生活的不如意和不能满足，与晓霖分手而招致的朋友指责是原因之一；他曾经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而对老赵早已被背叛的觉察，无论如何是让一禾对他的死感受更为痛切。但这仅仅是当时的一种情绪，感情之事有时候确不能与外人道，他只是伤了心；真正疏远乃是后来实际上的分道扬镳，小宇很早就想离开《十月》，他觉得做个文字编辑没啥意思，他要做生意干大事儿。

1985年考研前后，我们俩的书信开始稀疏，原因之一是一禾家搬



到皂君庙了，离北大也只有二十分钟的自行车程。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我想他、只需行动。二是，我毫无风险地考上了研究生，叫我爹妈的担心变得乌有，我说了我不会影响学习，只会更上进的嘛！再就是不需要更多的上课时间了，连关宿舍门这事儿也木有了，自然，我夜不入宿的事常有发生。一禾爹妈早已敦促我俩结婚，我做的菜他们喜欢吃，仅这一项足以使他们宽容我的夜入昼出，再也不搭个行军床扔饭厅里了。

此后的通信只是在旅行的暂别时。1984年夏天我借采风实习之机到南方整整玩了一个多月，同年的10月一禾也借开笔会之机上了一次黄山；1985年的4月和10月他先后去云南和四川开会组稿，去的地方都有一定的风险，但四川那次他因喝酒而感冒，身体很难受。1986和1988年的暑假我随北大艺术团去长春、大连劳军和巡演；1986年8月两人一起去西安，半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华山的庙里他抽到一支“亢龙有悔”的签；1987年8月两人重游北戴河，看到了十分壮丽的日出与日落；1988年8月原本准备跟一禾一起去西藏，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他为了那次旅行还放弃了参加青春诗会，并把《西藏文学》上发表的评昌耀诗歌的文章也署上了我的名字。

我跟一禾的祖籍都在江浙一带，所以1984年的江南游有点像认祖归宗，见了很多老家的亲戚，西安则是我的出生地，那里有很多当年父母的老同事。我带一禾去看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他对那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情，当以前的叔叔阿姨们提到我的哥哥时，只有一禾意识到我声音的颤动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悄悄地在身后搂住了我的腰。我有个比我大五岁的哥哥是家里的长子，当年父母工作忙，便把他寄养在乡下的姑妈家，一时没看住，不幸淹死在河里。这好像是我与生俱来的忧伤，某种宿命的起点，因为那时我已经在娘肚子里好几个月了。一禾在我的信里读到这段往事，曾经忍不住哭了一场，唉，他有多么爱我，那么地珍惜我，我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动他的心。他比我更知道我，我其实是不能离开他的，我们的两人世界没有距离，离开他就像是离开我自己。



在他面前，我没有任何秘密，身体和灵魂都袒露给他。看那些信就知道我有多絮叨，喜欢把周围发生的一切讲给他听，终极的一句话就是：哎一禾，我就是有了另外的男朋友也会告诉你吧？但这好不好呢？我想我的确把跟朋友之间不如意和引起的情绪波动一股脑地倾泻给他了！看一禾给我的信，除了诉说强烈的思念，就是交流学习和思想，但个性差异的冲突和调谐也是其中一个复调吧？说到爱情，再美好的故事也不会缺少痛苦，也是这份痛苦让感情变得沉甸甸的。

很明显，在一禾和他朋友们毕业之后，我开始结交自己的朋友，大多都是在舞会上。我那时酷爱跳舞，即便是考研期间也没断，以致好朋友见了我都会疑问，您这样是要考研究生么？当然要考了，我完了再去上夜自习呗。最初也没什么，因为我们共同在校的时候，一禾不会跳舞所以也从来不跟我去舞会。可是有人给一禾写匿名信了，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一禾把信撕了，觉得没必要听这种闲话，但我从此便有些心虚，觉得有点损坏名声，每去舞会后抱歉，对不起我又去了。一禾发怒了，他自始至终没有要阻止我的爱好的意思，甚至他是喜欢看我跳舞的，他为我写过《舞族》。后来我还是决定教他跳舞，为了我的缘故他也学了，但终究我们俩一同出现在舞会上的情形很少。随着我成了舞蹈队的一员，跳舞的兴趣得到足够的满足，便很少去舞会上出风头招人恨了，匿名信的事也再没有出现。

我在学校里的聚会从来不放弃请我的男朋友出场，我希望一禾与他们也能成为朋友，或许是他们与我相处的方式更容易些，而一禾是完全不一样的，别扭也是有的，我俩会为此不快。其实，从一开始打我周围的闺蜜们起，就有我俩不般配的声音，不过是印证了我俩看上去个性迥异。一禾是个安静的孩子，没有合适的话题，他或许不会开口，而我却是一个不安分的、喜欢挑战的，也是一个被他骄纵得很任性的孩子。但倘若一禾爆烈起来，也是很吓人的。那次去西安华清池，回来的时候，因为占座的问题，我跟一个野蛮的男人吵了起来，一禾冲上去就要



跟人打架，最终被表哥表嫂劝下。回到住处，一禾愤愤地跟我说，以后出来旅行一定要带把刀子！在他那文弱书生的身体里，始终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他不喜欢被人看成是书生，在喝酒和身体不好的时候总是过分逞强，我少不得母鸡般地呵护他，让他吝惜自己。我们没少吵架，但总是很快和解。最逗的是，有时吵着吵着，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俩在吵架，气就弱了，最后一同笑出声来。更多的时候，彼此之间的一个眼神，就看出冷和隔来了，马上就会走近些，用拥抱来缓解，你怎么能让爱你的人背转身去呢，我们之间永远应该还是没有距离的。

我们的爱情有幼稚笨拙的时候，但从来不是简单的，这可能是因为我那开放型的社交人设，也有一禾自己常说的那些不为人理解的古怪心情，我会觉得累，他也会叹息不易，但恋爱的七年之中，我们还是能够自许我们的感情不仅没有退化且在日益加深。因为我们一直很认真，从不回避矛盾和缺点，我们会向对方讨论和检讨自己何以如此说，有时也到了情理乱缠的程度，可也于此中成长，更加理解对方。比如，我们会认真讨论花钱的问题，是否出国的问题，是否会爱上别人的问题，甚至，我们说到过死亡。

当我喜欢上某个男孩的时候，我会问一禾万一我爱上他怎么办？他说这辈子我会允许你爱三次。为啥呀？不可能没人爱你，没人爱的女孩我也不要，人这一辈子感情经历丰富，总归是好的。那你怎么办？也许会很痛苦地看着你，但我有信心再次去争取你的爱，即使有一个加强班排在你身后，我排在最后，最终你也会看上我。这样胸怀的男人，我是再没有见到过的。拥有了这个男人，我好像就是拥有了世界；对他来说，拥有我，就是拥有生活，这是他常说离不开我的原因。老朱说起男子和女子的不同，经常说男子是要真实的生活历练才能成长，他要一步步去走才能领悟人生，而女子却可以因为一个男人而飞跃的。这话不知道是否算是大男子主义的一种，但我确是真心赞同的，因为和一禾的这段感情，让我成长让我更人性。



有一度，我大学时代的闺蜜都去了美国，雷音、小黎、勤儿、陶宁等等，我也难免动心，想考托福出国。虽然学习英文对一禾也是紧迫的日程，但这件事是我俩唯一没能讲通的事情，一禾从未答应跟我一起出国，理由是执拗的：一个诗人怎么能离开自己的母语土壤、他的根呢？我辩不过他，就不能不想，我究竟要让他等我多久？好在我英语也没学成啥样，谢先生也招博士生了，我终究是健忘了出国的事。

再一次轻松考上博士，我终于得考虑婚姻的问题了。陶宁跟石冰结婚了，旺子都让小陈怀孕了呀，等博士毕业我们就已经恋爱的时间太长了，六年了哎。之前也不是没有挣扎的，这倒并非因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老话，我记得当时问一禾，为什么我俩不能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度过一生呢？没有婚姻我们不是更为超凡脱俗么？一禾又一次苦笑着没能答应我，大致是说爹妈那边会很难过关吧。

结婚是让我有点发憊的，那时候，我想起了我的朋友雷音说的一句话，结婚是告诉所有人，我们现在上床是合法的。更何况，结婚是一大堆琐事，连婚前检查这件事都搞得我俩神经兮兮，婚后怎么住也是一个问题，我委实不希望马上成为一个儿媳妇，接着布置新房也几乎都是我一个人来。所以，我很有些发火，一禾的最后一封信就是说这些。那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写信了。这封信让我心服口服与他结伴终身，很多年以来，这封信是我最常看的，每看总是泪流满面。记得当时眼泪汪汪地问他，你以后还会给我写信么？写，他说答应你每个结婚日都给你写一封。

我们终于简单而快乐地结婚了，我是说我们骑车去了登记处，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仅仅是两个人都买了挺贵的西服。此后半年，朋友们争相来参观我们的小日子，那阵子好像我们每周末都在请客，以致月初就剩下五块钱的事时有发生，而我终于也知道，朋友们是艳羡我们俩的。1989年新年，一禾给我的贺卡上写着：



呈现给珠子女王陛下——美丽女仙，黄金女子，光着光明的
疯女儿

不瘦的健美爱好者，不胖的专业苗条者

幸福家庭的发动机，聚会的放火者和热烈者

布匹的磨损专家

学习的漫游女士：绿野仙踪

空气炒螃蟹、虾仁炖月亮、竹笋焖云彩的烹调家

直觉主义的美人，本本主义的妻子

怕发胖的著名唠叨学士，骑大马的硕士，诗人保佑的博士

_____明天早上我们会从哪一只鞋子里醒来？

1986、1987、1988这三年，一禾抒情诗的创作越来越多，发表得也不少，加上他《十月之诗》办得令人瞩目，推出了朋友海子、西川在内的许多重要的诗人，应该说在当代诗坛也有了独立的名声。1986年初一禾家搬到皂君庙，离海子工作的政法学院很近，好像当时西川的女友也在同校工作，他们三个应该是时有聚集的，海子的同事们大约也见过他的这两位诗友。他们都致力于浪漫的、气质高贵的、带有歌唱性质的抒情诗，与当时诗坛正在兴起的所谓第三代诗人更加口语化、都市化的趋势很不一样，他们并未去追随诗歌潮流，而是继续着他们在大学里讨论的诗歌目标，力图在一个更辽阔的文化文明背景里去从事诗歌的行动，那几年你能看到他们的诗都越写越长了。这种广阔而富于雄心的诗歌规划，一开始就是以一禾为主导的。在老朱引导下，他看到了文明的尽头，汉语新诗必须在传统与世界隔断之后重建一个创造的背景，整合与飞跃在他看来必不可少，就是我等朋友的目标。我考博士之前，他对世界诗歌的谱系与演化已经有完整的思考与勾连，曾经专门画了一张繁复而精密的图表为我复习。不过，当1987年9月，一禾接过海子交给他的那份油印的《诗学大纲》和长诗《土地》时，还是明白自己接到了一种



挑战。海子的第一部长诗已经完成，而一禾仅三百多行的《舞族》那时辗转几家皆因篇幅过长而不能发表，仅此一事便可知《十月》给实验诗歌提供的空间有多重要。好在次年《花城》也紧随上来开始刊登大型诗歌，年轻的诗歌编辑袁安最终编发了《舞族》。

骆一禾一方面开始审视和批判海子的诗学大纲，一面也开始构思自己的长诗《千条火焰》，这个题目来自仕仁的葬礼所见。1988年元旦伊始，他也开始长诗的奋进，一年之内就完成了四稿，改名为《大海》。而海子则带着他的油印稿开始“游诗”，春天去了四川，夏天又参加了幸存者俱乐部，可是不太有人理解他的长诗行为，面对批判他又是拙于言辞很难抗辩的吧，于是跑到一禾那里痛哭了一场。一禾也没说太多，坐在那里朗诵他的诗，长达三个小时，只说，这诗多好啊！我记得那天海子离开之前我是到了一禾家的，他二人相对而坐的场景一直留有印象。尽管一禾对这种混诗诗歌江湖的事儿不以为然，但面对海子所遭受的打击，还是予以兄弟的激励。大多数时候，他是兢兢业业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常常给作者写很长详的信去分析和指出他们作品的优势与缺憾，很多人都记得并感怀他的激励，能具有这种高度、视野和耐心编辑是罕见的。可是直到他离去，还是个助理编辑。有时候，他回忆起自己在人际中遭遇的不公，总是跟我说行善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冒险。

1988年海子搬到昌平去住，一禾和西川时而去看望，聊他们的大诗。有两次带我前往，海子的宿舍四平落地，环堵萧然，厨房材料的匮乏常常使我感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禾给我最后一张便信，也是告我他要去昌平看他，就在我俩结婚之前。第二年的春天，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消息是一禾电话告诉我的，惊得也不知说什么了。海子在遗书里写道：请将我的全部诗稿留给《十月》编辑部骆一禾处理。一禾西川与海子家人和同事料理后事，然后马不停蹄地连续在各高校做讲演，为海子募捐，我记得我同班男生邓映如在人大听了他的讲演，回来惊奇地说，你男朋友太能讲了！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没用任何



稿子，其中的引用全是背出来的。我只参加了在北大28楼前的纪念活动，结束后他就跟当时正在北大作家班学习的女诗人阎月君商量——她当时正在为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一套“世纪末诗丛”——请她征询出版社意见，能否加入海子的诗。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禾为海子的自杀所承担的压力。自然，诗歌兄弟的离去让他悲伤，但对一个诗人而言比死亡更甚的，是他诗歌的死亡，被人遗忘。在此之前，一禾已然顾虑到海子的诗歌处境，极力为他出头，《十月之诗》发海子的作品是次数最多的，甚至1989年第一、二期还连续刊登了他的诗剧，对海子的支持和激励莫此为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禾除了讲演，还大量地给诗坛的朋友们写长信去谈海子，并迅速整理和批阅了海子的全部诗稿，写了《冲击极限》《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生涯》三个重要的纪念文章。关于海子的死有各种传言，多年后，西川专门就此事写过一篇，在我看来非常必要的文章，厘清各种传言。对此，一禾早有预感，他在日记里写到：海子。我的傻弟弟！你死后还有多少人要贬低你呀！正因如此，一禾便一力要将海子树为“诗歌烈士”，与世界诗歌中一流的浪漫主义短命天才并列，并将他的短命具体定义为“激情的写作方式与宏大构思之间酝酿的根本悲剧。”

他就这样在悲痛和激昂的亢奋中不眠不休地写着海子，我回家，看到他长时间不吃不喝，真是心疼万分。他头痛，嗓子干裂，可仍旧拼命工作，海子的死比仕仁的死对他的折磨更长久。要知道，最后两年，一禾自己也处在一个爆发和挺进的状态，写作十分密集。《大海》已经写到第五稿，还写了若干诗学长文。3月，他刚把自己之前写的20首诗熔铸成《世界的血》这首长诗准备交春风文艺社出版，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要出版自己的诗集。但因为出版社不能答应多一本，他便决定放弃自己的机会，出版海子的《土地》。我记得他在灯下为《土地》写序的背影，而我在他身后，躲在被子里暗自落泪，因为我毕竟是个自私的老婆。他觉察到了，坐到床边用力地抱着我，“我们要好好活下去，这样



还会有机会”。可是，还未交付手稿，他便撒手人寰了。

他走以后，我重新跟春风文艺出版社商议，将《世界的血》和《土地》一并出了。此事能成，也要感谢我的父亲，他用自己在出版社的资源在北京出资印刷了这两本诗集。此事完成，我便把海子的全部手稿转交给了西川。这或许是该抱歉的，但我不觉得自己懂得怎么去编海子。聊以自慰的是，1997年我终于联系上出版社编辑了一禾诗全编时，西川编辑的海子诗全编也一起出版了。

海子有一禾这样的朋友是幸运的，但他的死对一禾未免绝情。背负起海子的诗歌生命是一种沉重的责任，一禾引导海子走上长诗的道路，也一路扶持推举着他的事业，是最懂他的一个；当他走在了一禾的前面转而向他的诗兄挑战的时候，一禾便也接受了兄弟的挑战奋力向前，最后一年写的《大海》曾经长达七千行，而他写了五遍，这是倍于《土地》的数量与体积！而且完全是打碎了之前的所有诗歌材料和抒情方式而重铸的。海子的死不能不说给了一禾迎面重重的一击，在这浩瀚修远的诗歌之路上，他的孤单与骨寒当是天地可鉴。有一夜，他如此仇恨上帝，对我说，我觉得它杀死了我的儿子。这话我铭心刻骨！一禾诗里说：长诗于人间并不亲切，却是精神所有、命运所占据。

我始终认为海子死后成名，跟其死亡事件有关，也跟一禾抵命弘扬他的诗歌生命有关，包括他对海子的基本论定。可是，难道他说的不是自己么？他不也是这样地在冲击极限吗？他不也是在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么？他是如此地感同身受，他是真正倒在路上的。甚至我也可以说，他早已预见了自己的命运，他在《大海》里已经经历了一切的死亡。而他从不忘跟朋友们说，活着，便是要拼，要轰轰烈烈地一场。

他好像就是那样慷慨激昂地离去的，1989年5月13日的深夜，从广场疾驰而去的救护车上，他半闭着眼睛，双手挥动，似在昏迷中讲演，语言和鲜血沸腾着冲击他的大脑。这一幕是如此惊心动魄，及至他被送进急救室，我便吐出了五脏六腑。



一个刚写完《世界之血》的诗人死于脑溢血是一种怎样的迹象？那个叫做“脑血管畸形”的杀手总是在伺机年轻的激动的诗人，它在出生之际就被置入了诗人的头颅，这就是宿命的烙印么？我不知道一禾在医院里昏迷的十八天经历了怎样的惊涛洪波及长涌赤潮？就像他在《大海》里描绘的一样。我只知道，就算是他的弥留是留给人世的告别，大夫也未曾允许我拉过他的手，哪怕一次！三十年来，这回忆好生残酷，等我可以触碰他时，他已经入骨冰寒。在医院的最后一晚我无论如何不能入睡，因为只要一躺下去，就仿佛全身的骨头都要崩碎。

才一个多月的功夫，这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天翻地覆？那一年春天果真不祥，一禾说“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西川在医院里拿着一禾最后的六首诗，《为了但丁》《灿烂平息》《白虎》《壮烈风景》《五月的鲜花》《巴赫十二圣咏》，每一首每一首啊，他不禁喃喃地说，这诗歌真是太过凶险。

为什么我们总会说到死亡？比如1985年11月5号的信，还有他日记里记录的种种，以及他的诗歌中死亡的字眼好像上百次地出现。这也是我在这个爱情故事里，必须再三讲述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必须再次经历爱与死的密切。我比旁人更相信西川所说的那个分工，在但丁的天堂、炼狱、地狱三个诗章中，海子是属于天堂的，而一禾舍我谁下的那个，只是苦了西川。我何尝没有直觉？但谁又会轻信命运？

记得我们初尝禁果，此后便忧虑怀孕，这个在信里是看得见的，一禾最怕，而我转念一想，人们不是说孩子是父母的延续，那么有了孩子，我们便是不会死的了。我的回答曾让他震动，把这句话直接地写进了《果树林》，那是他最早给我写的一组诗。但我真真的恐惧是有一日在家，做了一个白日梦，梦见孩子没了，我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醒来跟他哭了很久。在他走后，我又一次迟来了红，好像是又一次证实了死亡是真实的。

我们最后一次做爱是在5月，我莫名其妙地哭了。正是在那几日，



他对我说，你可以考虑出国学习。我不明白他为何此时可以放手，他说他总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或将终结。

直到我和一禾家里的老人寿终之前，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为何我总是要从年轻的生命去体验和领悟死亡。一禾去世后几个月，我回到了北大，那时总有人为一禾的缘故来看我。但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很深，她是我同屋的朋友，我原本是不想跟她说一句话，但总归有一天躲不过，我便问，你干嘛非要认识我？她说，我觉得你是经历过死亡的人，因为我可能也要死了，我想从你这里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她是那么地直接，问得我肝颤，突然意识到我已经经历了几次夭折，然而，关于死亡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是跟她做了朋友。她是沈阳人，叫刘莹，父母残疾有病，稍长大便开始了在医院伺候父母的青春，及至父母去后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却在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最终未能上过一天大学。1990年元旦后，她与台湾女作家三毛相隔两天病逝，我知道，她仅有过初吻。她让我想起延娟和仕仁，一禾诗里说：来自大地的无辜，不能逃出命运。

2007年的春天，旺子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禾的墓地。他到哪儿做什么呢？我突然预感到是小宇出事了，果然如此，他就在那天的凌晨从自家的21层楼跃下。—禾的死，小宇是缺席的。一个月后他从南方归来，从海南还是香港？当他出现在月坛北街的马路对面时，我是真真切切地产生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们再不能常见着，因为他经常不在北京。每次见面喝酒，他都要谈到—禾，据说他后来的同事们也是没有不知道他和—禾的故事的，有时候，他还想鼓动我们一起唱歌，但真是唱不起来了，以致我对他这种酒后车轱辘话也心生倦意。我容不得这种不停地磨说了内心的真切，岁月其实已经很无情了。但想到他没有了一禾的日子，我深信他失去很多，或许比我更多。我们这些曾经想跟—禾一样，要做一个光荣的朋友的人，在失去了光荣的朋友之后，



又失去了怎样的荣光啊？很多的朋友都不再写诗了，都老了。现在想想，那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我最后一次见小宇，是向东带孩子再次北上，我和旺子等人在我选的一个叫做“去哪儿”的餐馆，他迟到了，以中年发福之后突然间消瘦的形容出现在大家面前，说他已经一周未曾饮食仅有喝酒，我坐在他身边无法忍受他腐味的呼吸。第二天通话我愤然发问，中国的头脑没了，良心没了，就剩个胃你也要把它吃坏么？他说你总是举枪瞄着我，但从不射击。我想文七九的同学们参加小宇的追悼会，不能不想到为什么先走的就是这仨呢？这是又一次让我相信宿命么？一禾写过这样的句子：只有后来人才知道，偶然和噩耗沿着性格织入宿命。

他走了，而我终将活下来，变得衰老，不再是他的女孩。我接受这一切，因为之前我们这样一起经历过年轻的死亡，这样说起过死亡，现在已是无法反驳。他不是也说吗？那些生活所给予你的，连命运也不能把它夺去。后来在墓地上，我用他《大海》里的诗句，刻下了这样的墓志铭：大地啊，你的儿子骨肉双寒，死亡也不是他的领地，愿他此去英武，愿他在这条大路上一路平安。

我知道，他还在天路上走着自己。



悼一禾

林贤治

这是一个特别容易忘却的年头。大抵因为穷于应付眼前的事物，诸如住房，菜价，国库券与彩票等等的缘故，对于往事，人们已经不再有从前的那份眷顾的热情了。记忆如此的不值得信任。甚至连自己参与的有声有色的街头剧，在有限的时日中，也都可以消匿得毫无踪影。

我一样变得健忘多了。但是，有一位叫骆一禾的朋友，倒也还能时时记得起来。

十年前，由于向冬的推荐，我在所编的短命的刊物《青年诗坛》上，第一次发表他的诗作。大约这是他所愿意追怀的吧，几次来信，都提起所谓的“《诗坛》时代”。其时，他正在北大读书；到了临近毕业，携同另外的同学南来广州，我们便在向冬做东的宴席间见面认识了。在流花公园的草地上，大家一同倾谈，照相，盘桓了许久。

一年过后，我到北京组稿，接送都是一禾。在陌生的京都，我完全恢复了一个乡下人的呆相，没有一个向导，实在走不出胡同的迷阵。可是，除了一禾，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依赖的人了。这时，他已经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工作。为了陪我，请了整一周的假，即便上班，也没有一天不去招待所里看我的。他陪我找人，游览，购物，甚至结账，寄信一类极琐碎的事，也都帮忙着做。临别时，我看见他的眼圈潮红了，人也突然变得沉默起来，站在月台上只是不断地缓缓扬手，我把头悬在窗外看他渐渐远去，心里不无惜别之意。不过，应当承认，告别而无忧伤，



无论如何算不得交谊深厚的。

朋友这个词，对我来说至今仍感陌生。在乡下，最亲密莫过于一起玩泥巴长大的伙伴了，人类最本真的一种关系，却从来不以“朋友”相称。一旦置身都市，即像一头野兽从黑森林里突然来到黎明的河滩，四顾苍茫，绝无同类。对周围一切，我不得不怀抱戒备的心理，何敢期待友情呢？

两年过去，接到一禾收读我寄赠的《人间鲁迅》的来信；这时，我才发现，世上竟然还有那么一个人，在冠盖如云的所在倾听我。

信用“十月”的笺纸书写，计八页，密密匝匝全是蝇头小字。他仔细地抚摩过敲打过我书中的每一页，每一行，甚至每一句话；或表示同感，或直率地提出反对意见。为了探讨鲁迅的哲学思想，便写了整整四页。他强调鲁迅哲学的独创性，现代性，人格的深度，因而是中国情感本体论哲学的思想者，而不是逻各斯理性哲学的思想者。他援引了我书中的一段话以后，激烈地批评道：“你用了个‘但’字，对纯粹思辨，对体系哲学让了一步，从而在鲁迅的灵魂上叠了一道折痕，对战士与思想家的区分法做了一个难以觉察的让步，给了体系哲学一口气，”“从而你也就给许多膜拜体系哲学并以此微词鲁迅的研究者一个苟活的余地。”批评得何等好啊！我理解他何以如此的小题大做，他的着眼点在中国。实际上，他已经完全越出了书中的结论，而把挑战的目光投射到黑格尔及其弟子的体系哲学的巨大的传统势力里去了！他爱朋友，他不能让朋友的文字存留哪怕是半点瑕疵。

一禾如此看重友情，相形之下，我对于人则未免过于猜疑与淡漠了。而这，是应当得到十倍的诅咒的。

信中还有着对于时下诗坛风气的批评。这种批评，同反对思辨哲学体系哲学一样，在他那里有着很深隐的精神关联。他说，现在的诗人在精神生活上极不严肃，有如一些风云人物，花花绿绿的猴子，拼命地发



诗，争取参加这个那个协会，及早地盼望豢养起声名，邀呼嬉戏，出卖风度，听说译诗就两眼放光，完全倾覆于一个物质与作伪并存的文人世界，等等。看得出来，他并不否定理性。战斗的批评不可能没有理性。他所否定的只是“理性的狡计”，是理念对于个体生命的绞杀而已。

当今时世，才华决不是重要的。作为对小才子的一种对抗，他准备在《十月》辟出一个名为“诗原”的专页。发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真正有着献身灵魂，献身与人格汇通的艺术的中国诗人的诗作”。

他告诉我说，要找的诗人当大部分是新人，是被忘却、挤压在诗界之外，具有独立精神的、名气不大或无名的诗人。这种编辑的宗旨，是我所欣赏的。为了表明决心，他决定在相当时间中不把自己的诗拿出来发表。他表白道：“从一个年轻人的雄心而言，我自然是乐意发的，但我必须保持自己的清醒，以免与时下的风气同流合污。在我编诗的消息跑出去之后，有人说我专门发熟人诗，也有不少人突然变得非常狎昵，前来把诗塞给我。这种谣言和肉麻的举止，我唯有以阴沉待之，于是在某几群‘青年诗人’那里说我老气横秋，像是四五十岁的人，‘玩深沉’的。这种攻击传入我的两耳，使我感到我是对的。”

诚实，质朴，认真，执着。在有限的接触中，凡这些，我都有着不算太浅的印象。但是，他那细小的躯体内藏纳着如此阔大的气魄，憨厚到近乎鲁钝的动作贯穿着如此深澈锐敏的思维，温和宁静的微笑背后，霍霍燃烧着如此坚定而热烈的情感，却是我过去所未及体察的。

现在，重捡他的遗作，颇惊异于他最早寄来的诗为何都说到死，同一种英雄的死。《先锋》说了：“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就在长空下最后一场雪……”；《春之祭》说了：“我们的队长，在蓝天下美丽地乌黑……”；最后抄寄的《黄昏》，竟有了挽歌般的调子，哀伤得悠长——

这黄昏

把我的忧伤



磨得有些灿烂了
这黄昏
为女儿们
铺下一条绿石子的河
这黄昏让我们烧着了
红月亮
流着太阳的血
红月亮把山顶举起来
而那些
洁白坚硬的河流上
飘洒着
绿色的五月

命运之神！红马儿还在跑呵，青麦子地里的露水还亮着呵，然而，就在这五月，五月，那只沉重地上升着的“太大的鸟”突然坠落了——
一禾死了！

一连几天，我不敢相信这个传说中的消息，但接着，就收到西川发来的黑色电报。我流泪了。我其实是一个脆弱的人，今天已无力哭号。我知道，他是怎样结束了他年轻的一生的。他死于大脑，死于热血，死于忧患，死于疲倦，死于庄严的工作……

他刚刚逝去，《人间鲁迅》第二部就出版了。我在悲哀中写信给他新婚不久的爱人张珏，请求她允许寄去我的新书，希望它能被放置到一禾遗下的藏书之列。感谢张珏的理解，过了若干时日，我终于能够在寄出的书的扉页上，一如前次的赠书，工工整整地写上三个字：赠一禾。

生前每次来信，他都向我催索长诗，且不忘问及《人间鲁迅》写作的进度，说是“攫心之度，不下于希区柯克制造的不安”。而今连最后一



部也已经面世，然而一禾，无论如何是再也看不到了！

“读到你的《人间鲁迅》，从字里行间听到你的自白，我想，这认识的人是可信的，为此应当为之骄傲，这是一本中国人良知的书，而当我读它时，感到的是由衷的一种同感。你的三卷著作，成为我藏书里最好的那部分。‘文章风义兼师友’，你是我所不能忘却的。”这是长信中结尾的一段话。过分的期许，使我每读一遍，心里都不由得十分感愧。称“师”，我是不敢当的，倒是他的文字与生命给了我许多的启示。甚至连“友”也不及格，因为在他生前，我实在没有很好地寻找和倾听过他的文字，一如他之于我。而且，在他死后，时间从喧哗到沉寂已流走了长长的五年，我竟然没有能够为他写上一点什么！

《吕氏春秋》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琴曲中的志趣，子期心领神会，高山流水，无不极尽。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的确，知音已歿，声音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纵然听者沉默，我亦未敢断然弃置握中的笔管。明知道文字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于我，至少可以借此倾吐，倾吐一些为一禾急于倾吐而终至于未及倾吐的东西。

你是我所不能忘却的，一禾！

1990.8 -1994.6, 夜间



老家伙与三剑客

朱正琳

一

这样的相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或许是寻常事。相遇的双方，一方是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被称为中文系七九级“三剑客”；另一方就是我，一个“背着空口袋走过沼泽地”（一禾语）的“老家伙”（仕仁语）。他们三位，当年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纪，而我其时已三十有四。

对我来说，之所以刻骨铭心，不只是那个年代令人感怀的思想交锋和所谓两代人的忘年之交，更因为三剑客都已经离世了，只剩了我这个老家伙。

第一次见面只有仕仁和我两个人。仕仁领命操办一次展览，而我则被引荐做顾问。说事务只用了干净利索的几句话，就算是意向已然达成。正欲抽身告辞，仕仁却劈头盖脑地和我谈论起中国历史今后的走向。

在当年的北大，有人张口就和你谈大问题，本也不足为怪。你要在校园里散散步，耳里飘过来的字眼就很少有形而下的。不过，我当时还是有几分惊奇。这样的话题，我的同龄人倒是关切已久，而六十年代初才出生的仕仁，这问题却是从哪里来的？他充满激情地说着，没有注意到我的惊奇。看得出他有才华，但其实却有些讷于言辞。我望着他那张憧憬多于探索的脸，心里忽然有点明白了，他的问题包裹着一个核



心——我们的历史使命何在？

北大有一种似乎用手都能摸得着的传统，你可以称之为“以天下为己任”，我则更喜欢将之表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大的匹夫尤其有责”。眼前的仕仁，自然也在此传统之中。我自以为理解了仕仁的激情，于是开始附和着，满心以为他说的“我们”也捎带着我。殊不知他话锋一转，突然来了一句：“在我们看来，你们这代人已属过去的一代，只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了。”我心里一惊，再看他却是满脸的诚恳。我知道，北大的学生都狂，但仕仁在说这话时却不像是狂。我敢说，他半点也没想过这话有可能会伤到我。

我们这代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调门虽高，很有点“指点江山”的气概，但骨子里表达的其实是怀疑与困惑。时隔十年，年轻人接过这一问，则更多的是在表达某种振奋之情。破土而出的八十年代，确实在中国燃起了某种希望。不过我也看得出，他对“我们这代人”的探索还是有相当了解的，否则也就不会有“铺路石”一说。

也许我当年还不够老，铺路石一语竟刺激了我，让我终于忍不住尝试着把我十余年左冲右突的思考展现出来。我后来把这种历程命名为“理论突围”。虽然我的理论全是借来的大路货，至少我们这代人中爱想点事的人都不会太陌生。不过有一点，我并没有学究一般地照本宣科，而是抖擞精神，扣紧了我们正在谈论的问题。

二

如果没有记错，我当时谈了三种理论视角。

第一种是当时正时兴的所谓正本清源，摆脱苏联式历史观，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去探讨中国当前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从而展望其走向。我记得我特别提到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形态”，认为那不在



苏联式社会发展史的模式中。

第二种视角是我从斯宾格勒那里借来的。在斯宾格勒眼中，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是文化。从思想史上说，他所说的“文化”，与后来我们这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文化热”颇有渊源关系，尽管我们的文化讨论中似乎很少有人提及他。他的“文化”是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各有各的生命周期——诞生、成长、衰老与死亡，各有各的文化宿命。就其生命与宿命而言，各个文化之间不存在传承关系（否认历史阶段论），也不存在实质性的相互影响。如果相信他，结论就很悲观：惟一还活着的西方文化也已走向没落，中国文化则早已死亡。而且，根据他的看法，已死的文化并不存在重生的机会。如果我们把他的结论先“持保留意见”，沿着他的思路去探究中国文化的宿命，却是个诱人的题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牢里时，曾就此苦思冥想。当然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成果，牢里没书读，“思而不学则殆”嘛！对于我和我的同龄人来说，斯宾格勒的文化概念与脱胎于汤因比的文明概念，确曾提供了一种启发，使我们得以换了一种历史视野。

第三种视角其实是第二种视角的某种演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一套内部读物叫“外国资产阶级谈中国近代史”，其中有些文章，是把中西文明的冲突作为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其文明的概念与斯宾格勒的文化及汤因比的文明明显有亲缘关系。不过，历史学家不像历史哲学家们走得那么远，他们的概念总是要离实际经验更近一些。他们说的文明，没那么封闭，相互之间总是既存在冲突又存在交融。从这一视角看，不排除可以得出一种比较乐观的结论，即冲突与交融的结果，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这种结论的诱惑力自不必言。许多年后，我给那种诱惑定名为“第三条道路的诱惑”，并对之心生警惕，有无“第三条道路”本当存疑，但振振有词的论道却可画饼充饥，成为逃避选择的一种借口。不过，当初我还没这分警醒，在仕仁面前也画了一个大大的饼。

仕仁可能没料到他一石激起千层浪，竟惹得我这个老家伙把十几



年的存货翻出来搞倾销。他毕竟还年轻，一时当然拿不出什么反制的论据，只能默默地听着。但我看得出来，他听我讲话时和自己讲话时一样兴奋。正是他的那种兴奋鼓励了我，让我那多少有些空疏的宏大叙事得以滔滔不绝，我知道我遇到了最好的倾听者。好的倾听者往往也是好的谈话对手。在北大，你永远不会找不到谈话对手。这真是不亦快哉！

三

第二天一早，仕仁就到29楼我的宿舍造访。开门迎客，进来的竟是三个人，一禾和小宇也来了。没太多寒暄，就又接上了头天的话题。仕仁很清晰地发问，问题都在点子上，表明头天晚上他回去后曾认真想过。一禾、小宇两个也是好的倾听者。一禾沉静，但内在激情的充沛是很容易被觉察到的；小宇很洒脱，却又透着一种大男孩的腼腆。再加上个思想敏锐态度诚恳的仕仁，三剑客着实让我那陋室充满了活力和灵气。谈话的气氛渐渐活跃起来，我知道，我大概已通过了考察。告辞前小宇用调侃的语气告诉我说：“知道我们说过什么狂话么？仕仁是中国的脑，一禾是中国的心，我是中国的胃。”

这以后我和他们之间的来往可谓过从甚密。筹办展览的那两三个月，几乎天天晚上都聚在一起。商量公事通常只需要三言两语，剩下的时间就是侃大山，常常会到凌晨一两点，甚至通宵达旦。思想交锋的深层也有情感交流，私人间的友谊在悄悄积累。谈话变得更随意了，话题当然变得宽泛起来。有形而上一些的，直接关联着存在的意义；也有比较轻松的，琴棋书画饮食男女均有涉猎。随后由于张珏、晓霖两位女生的加入，气氛自然更加轻松活跃。

一个周末的晚上，大伙儿即兴开了一个音乐会，你一首我一首，居然一直没有冷场，直唱到天光大亮。他们唱的是当时正在流行的歌曲，其中几首台湾的校园歌曲尤其打动了我。从他们唱的歌，我才领会到校



园歌曲的清新。同时我也才意识到，尽管我在青年时期也曾激烈反叛过，但当初笼罩着我们的一种美学却是沉渣未化，依旧在阻碍和扭曲着我的审美。于是我有意避开了那种对宏大与高亢的崇尚，那种对烈火与热血的向往，尝试着唱起我在叛逆期从《外国名歌200首》中讨生活时学会的一些小歌谣……我一直认为，从那一晚以后，我们就真正成了朋友。

三十年后，刘索拉在和我进行的一次笔谈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审美立场比阶级立场更重要”，并且又补充说：“（在审美立场上）反叛容易反省难。”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一晚。于是提笔回应道：“我到北大上学时已经三十四岁，结识了一帮二十上下的男孩女孩，他们背地里都叫我‘老家伙’。最初的交往是北大特有的那种谈话，充满了形而上的字眼，并且摆出一副高手过招的姿态，试探性很强，那模样真仿佛隔着条沟（人称‘代沟’）。直到有一个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唱歌，我忽然觉得我能懂他们了，并且觉得他们好像也懂得我了，那沟也就消失了。从此就真成了忘年交。我清楚地记得，是他们唱歌的那种态度打动了我，我也因此就喜欢上他们唱的那些歌了。用我们此刻所用概念来说，那一晚我与他们显然是懂得了彼此的attitude,彼此的‘审美立场’，而且发现它们其实是相通的。”

从那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主要不是产生于思想观点的不同，而是审美趣味的歧异。反过来说也一样，人与人之间的融洽主要不在于思想观点的相同，而在于审美趣味的相通。这个结论一再得到经验的证实。一般地说，思想观点不同的人可能成为敌人，但不妨碍他们作为个人能彼此欣赏，在一起相处时甚至会觉得愉快，但审美趣味不同的人就很难凑在一起而不互相讨厌的。



四

回过头还是再话说当年。我那几位忘年交正值青春年少，又都热爱文学，“人生”当然也是常被他们关注的一大话题。我比他们长十余岁，又坐过几年牢，在学生中称得上是饱经沧桑，谈论人生我自然有点优势。记得我给他们讲过一些狱中经历，故事零零碎碎，体验点点滴滴，都是谈话中即兴说起。我只记得他们的眼睛像星星一般照亮了我，让我的故事因此变得更加纯净。我是说，我在讲述时无形中减少了“痛说革命家史”的夸耀，增加了“走在人生中途”（但丁语）的摸索。

我的摸索漫无边际，但也可简括为一个问题：“‘无彩人生’有没有意义？”我见过一些几乎一辈子都在坐牢的人，他们引起我的追问：这样的生活还有意义吗？我这一问，当然也是对自己提的，因为他们的命运就预示了我的命运。多年以后我写了《里面的故事》一书，我自己的解释是：“我写下的，只是一种个体经验，我自己和一些其他的人生境遇。我们这些个体连同我们所有的遭遇都不会进入历史，或者用我家乡的话来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连一个泡泡也不会起，但这却不意味着我们的存在、经历和感情就不是真的。我想表达的，就是那些被历史忽略不计的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想当年在北大听我讲这些故事的，都堪称天之骄子，难得他们竟无障碍地领会了我的所感所思，我不能不把他们引为知音。

关于我们最初见面时讨论的大问题，三剑客对我宣告：“我们讨论过了，决定用五年时间批判老朱。”我则赶紧缴械投降：“不用五年，我给你们交个底。”我说了几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也简单说了自己做“理论突围”的思路，以及在突围路上小心提防的种种陷阱。尤其重点谈到“历史”和“文化”这两个观念都有待检讨，而我自己的学力不够，只能说是正在努力之中。

“五年批判计划”在他们不是一句戏言。不久我就从一禾的言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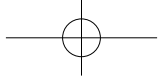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察觉，他在读《西方的没落》。他读的是台湾版的译本，我还特地借来乘兴重读了一遍。记得我还跟他谈起过重读以后的感受，大意是这样：我原先读的时候，觉得斯宾格勒富有洞察力而少学究气，读起来灵动而有音乐感，这一回读，却发现那种灵动的叙事中包裹着一个有如钢筋捆绑成的概念框架，其实也很僵硬，因过于严实和精致，反而让我几乎出自本能地觉着可疑。后来我读一禾的长诗《世界的血》，发现他所尝试写的“真正史诗”里有一种“大文化”的辽阔视野，显然取自斯宾格勒，而他笔下来到城市的“农家女”，也让我想起斯宾格勒的论断：“所有的文明都诞生于城市，所有的文明都会衰落，而农村却永在。”一禾那“辽阔的歌唱”（诗人陈东东评语）让我意识到，三剑客对我的批判业已完成。

只可叹天妒英才。事实上是还未满五年，仕仁在1984年便早早去世，三剑客折翼。他是应我之邀同去怀柔游泳时溺亡的。我从高处疾跑而下扑进水里时，他那扑腾挣扎着的身体已迅速沉入水底。据打捞尸体的潜水员后来说，那水底有十一米深。古语有云：“伯仁非我所杀，伯仁由我而死”。我总觉得，仕仁的死是我的错。

没想到这一错竟好似引发了一种连锁反应，变成了一错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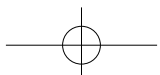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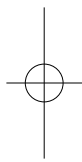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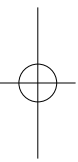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仕仁死后不到五年，一禾又走了。他死于1989年5月，大庭广众之下突然晕厥，送到医院被诊断为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导致颅内大面积出血。我赶到天坛医院去看他，他身处昏迷之中，没能说上话，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些环绕着他的瓶子和管子。

剩下个小字孤身一人流落天涯，说是“下海”了。偶尔回京与我相见时，总笑称自己是三剑客中硕果仅存者，有一次还感叹说：“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时说的那句狂话么？现在你看，中国只剩下我这个胃了！”话音未落，2007年他也决绝离去。据说是从高楼上毅然跳下，原因竟没人说得清楚；又或者是，说得清楚的人却也不愿细说了。我只能想，三剑客之间大概是依循古例订立了一种盟约的，而他这是践约去了。



192 《今天》总121期

一禾去世时我题写小诗一首：“终是诗人爱占先，广庭笃定好长眠。我惟坐等头飞白，未敢吞声哭少年。”到如今三十年过去，头是早已经白了，老家伙还在坐等什么呢？





骆一禾诗选

桨，有一个圣者

有一个神圣的人
用一只桨
拨动了海洋
蒙昧的美景
就充满了灵光
天明的退潮遗下了彩霞
夜里闪光的菌类、贝壳、石英
宛如醒来时旋流的思想
成串的追忆
和细碎而坚硬的希望
那位灯塔一样
神圣的人
鼓起我张满的帆
引导我认识且启示海洋
像他手中的船桨

1981.10.8



先锋

世界说需要燃烧
他燃烧着
像导火的绒绳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当然不会有
凤凰的再生……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他就在长空下
最后一场雪……
明日里
就有那大树的常青
母亲般夏日的雨声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1982

春之祭

冲破剑拔弩张的密林
群星已经聚集



是时候了
歇一歇你撕成碎片的躯体

我们的队长
在蓝天下
美丽地乌黑了
再也看不到
男子汉额角上
朗朗的泪滴

地球吹响绿色的树叶
原野蔚蓝
春天洁白如玉

1983

大河

在那个时候我们驾着大船驶过河流
在清晨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衣领陈旧而干净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疲倦
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只身一人
我们也不要工钱
喝河里的水



迎着天上的太阳
蓝色的门廊不住开合
涂满红漆的轮片在身后挥动
甲板上拥挤不堪
陌不相识的人们倒在一起沉睡
那时候我们没有家
只有一扇窗户
我们没有经验
我们还远远没有懂得它
生着老锈的锋利的船头漂着水沫
风吹得面颊生疼
在天篷上入睡的时候眼帘像燃烧一样
我们一动不动地
看着在白天的绿荫下发黑的河湾
浓烈的薄荷一闪而过
划开肉体
积雪在大路上一下子就黑了
我们仰首喝水
饮着大河的光泽

1987. 3. 7

杀我的状态

其实我并没有走开
只是没有说话



我快要死在你们自以为是的谈论
以及你们横竖有理的认定之中
真的我他妈的快要死了
可是有人不知道
也有的人不肯放过
一辆与我无关的汽车
停在黑暗里
我为了解闷儿钻在里头
雪阵白色的力量
把方向盘和后排软垫
微微照明
这种微光的状态
专门为我而设
以便我把烟卷上的火光
无聊地凑近玻璃
红色的火头在西风凛冽的前窗上
爬动着一百只细碎的脚步
如谣言
我果然是个天才
因为人们愿意得出的结论
略低于他们所看到的
而又相去不远
只跟在我的后面
而我却懂得你们的智慧
乃是把一切都说得稀少一点
不堪一点
尤其对不了解的东西



你们说得最多
谄谀之行往往用来证明兄弟友于活像
义愤填膺……
你们说起这些
就像当年的成人传说
“三排座的伏尔加牌轿车后排可以拆合
午夜那车里四条腿抬上车窗
外国人都这么流氓!”

1987. 6. 28

月亮

世界，一半黑着、一半亮着
事件堆起来了。那些流血的事实
城与年，日夜流着
是一些平滑的消息
使人们无所不知
黑着的一半
陈列着挑灯的街巷
月亮虽也照亮厚实的尘土，光辉
却遍地遗失。月亮陈旧
在隐没的蓝瓦上扔着、光着、贫穷着
像一些炭块上画下的皮肤
暗暗地红黄着
头戴半只黑盔，对秃海上的甲板



露着树枝
地面上的活人
不知你为何思想
世界，你这借自神明的台阶
下行着多少大国
和它们开发过度的人性与地力
只有月亮
在门边向着那健康的丛林
为我们谢罪

1988. 1. 8

诗歌

那些人变成了职业的人
那些会走动的职业
那些印刷字母
仇恨诗歌

我已渐渐老去

诗歌照出了那些被遗忘的人们
那些被挑剔的人们
那些营地和月亮
那片青花累累的稻麦
湿润的青苔即大地的雨衣



诗歌照出了白昼
照出了那些被压倒的空气下面的
疲惫的人那些
因劳顿而面色如蕤的人
种油棕的人采油的人
披挂着白色胶片的人
刀钻头乳房和剑麻
骷髅的痛苦和漂泊的椰子
那些野惯了的人
肮脏山梁上的人海边闪光的
乌黑的镇子
那些被忽视在河床下
如卵石一样沉没的人
在灾荒中养活了别人的人
以混浊的双手把人抱大的人
照出了雨林熏黑的塔楼
飞过了苍蝇的古老水瓶
从风雪中归来的人放羊的人
以及在黑夜中发亮的水井
意在改变命运的人
和无力改变命运的人
是这些粗人背着生存的基础
有人生活，就有人纪念他们
活过、爱过、死过一去不回头

而诗歌
被另一种血色苍白的人



深深地嫉恨
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
写下这样的诗歌
为此带着因低能而无名的火舌
向诗歌深深地复仇

1988. 3. 16

为美而想

在五月里一块大岩石旁边
我想到美
河流不远，靠在一块紫色的大岩石旁边
我想到美雷电闪在这离寂静不远的
地方
有一片晒烫的地衣
闪烁着翅膀
在暴力中吸上岩层
那只在深红色五月的青苔上
孜孜不倦的工蜂
是背着美的呀

在五月里一块大岩石的旁边
我感到岩石下面的目的。
有一层沉思在为美而冥想

1988. 5. 23，于小豆磨坊



修远

(第一稿)

触及肝脏的诗句 诗的
那凝止的血食
是这样的道路 是道路
使血流充沛了万马 倾注在一人内部
这一个人迈上了道路
他是被平地拔出

那天空又怎能听见他喃喃的自语
浩嗨 路呵
这道路正在我的肝脏里安睡
北风里 是我手扶额角
听黑夜正长歌当哭
那黑夜说 北
北啊 北 北和北

想起方向的诞生
血就砍在了地上
我扶着这个人 向谁
向什么 我看了好久
女儿的铃铛 儿子的风神 白银的滋润
是我在什么地方把你们于毁灭中埋藏
方向方向 我白银的嗅觉
无处安身 叫我的名字



浩嗨 嗨呀 修远
两代钢叉在水底腾动
那声息自清彻里传来锐利和痛疼
那亚细亚的痛疼 足金的痛疼
修远 这两个圣诉蒙盖在上面

我就看见了大盾的尘土
完人和戈矛 雅思和斧钺
在北斗中畅饮
是否真有什么死去 我触摸着无边
触摸着跪上马头的平原
眼也望不到 脚也走不到
女仙们坐在月亮的边缘

修远 我以此迎接太阳
持着诗 我自己和睡眠 那一阵暴雨
有一条道路在肝脏里震颤
那血做的诗人卧在这里 这路上
长眠不醒
他灵敏其耳
他婴童 他胆死 他岁唱 他劲衰
都已纳入耳中
听惊鸿奔过 是我黑暗的血

血就这样生了
在诗中我见的活血俱是深色
他的美 他的天庭 他的飘风白日



平明和极景

压在天上 大地又怎会是别人的
在诗里我见的活血汪霏而沸腾

沐与舞 红和龙

你们四个与我一齐走上风鸣马楚的高峰
修远已如此闪亮
迎着黄昏歌唱
你们就一直走上了清晨

那朝霞

诗人因自己的性格而化作灰烬
我的诗丢在道路上
一队天灵盖上挖出来的火苗
穿过我的头顶
请把诗带走 还我一个人
修远呐
在朝霞里我看见我从一个诗人
变成一个人

与罪恶对饮

说起修远
那毒气在山中使盛水的犀杯轰然炸裂
满山的崧岳 稀少的密林
那亚洲白练
那儿子的脚跟 女儿的穗佩 口中的粮食
身上的布袋与河流亮丽的分叉



连你们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看着道路
修远呐

与罪恶迎唱 拉开我的步伐
这就是我的涵歌
在歌中我们唱剑 唱行吟的诗人冒险行善
这歌中的美人人懂得
这善却只有等到我抵家园
唱吧 那家乡
我们分别装入两支排箫
素净两方门窗
这声息一旦响起
就不知道黯淡怎样吹过
天就一下子黑了
在大地的口中 排箫哭着
与罪恶我有健康的竞技

说一声修远
三种时间就澎湃而来
天空在升高中醒了
万物愈是渺小 也就愈是苍莽
那一夜滂沱的雨水中
新月独自干旱

1988. 8. 19 青春诗会



巴赫的十二圣咏

最少听见声音的人被声音感动
最少听见声音的人成了声音
头上是巴赫的十二圣咏
是头和数学
沿着黄金风管满身流血

巴赫的十二圣咏
拔下雷霆的塞子，这星座的音乐给生命倒酒
放干了呼吸，在

在谁的肋骨里倾注了基础的声音
在晨曦的景色里
这是谁的灵魂？在谁的
最少听见声音的耳鼓里
敲响的火在倒下来

巴赫的十二圣咏遇见了金子
谁的手斧第一安睡
空荡荡的房中只有远处的十二只耳朵
在火之后万里雷鸣

我对巴赫的十二圣咏说
从此再不过昌平
巴赫的十二圣咏从王的手上
拿下了十二支雷管

1989. 5. 11



世界的血

(长诗选)

(第五章 世界之二：本生生命·第四歌)

我来到最大的地方
那里有一个梦中老人，在图上指着人间
坐在不问生死的火畔
我听到他寂寞的声音：“真实的血
是时代死去的血。”

老人，我能够向你阐明图上的事情
心情从刀里把它收割
走过绿鸟的天堂，我梦见我的
大脑：沙漠和骆驼
然后是海上风暴和海上落叶
我经过了意义，看到了
人类的由来：那是潮汐和月亮
今天它变成了心脏和语言

在这之前，我梦见诗神
他创造了鼓声，使语言渐渐响动
而鼓声一旦响起
诸人便开始纷纷掷去石头
我梦见秋之鹿苑
那些和煦的舌头滚动在翠绿的田野
风车在那里被秋风阵阵吹卷
诗神在风车下头戴铁链



我从诸世纪而来，也就是来自人间

万有的诗人

变作诸世纪的诗人

无往不在的诗歌进入无往不在的枷锁

风车和奴隶的性质。

我看见诸人在诗上刺字

以指法造成一个时代

用来堆放诸般的鼓号

长明灯和胜利花环，在那里

事业使人相距甚远

其间布满了真实的事情、水晶、马尸和肺叶

这时我祈求我不是真的。

我是否大地的骨肉

或大地在流血

又或我同为骨肉之子和大地之子

充满矛盾，虚心妄想

眼前是生活起落，反复无常

用于人心的向背

此外是粮食、死亡和饥饿

在大地上骨肉相残

故我无须死去，只因为

——活着这仅仅是逼真的。

故我祈求我不是真的



心脏和头脑渡过血污，化作熔岩
这是世界的血
我经过了一连串叵测的和白化的漩涡
仅有一种永昼在我眼中刺痛
万紫千红

我梦见鲜黄的泥土、炉火纯青、蓝天剧烈
我梦见披花的田野一片翠绿，有如过眼云烟
我梦见人类女奴穿上了花瓣
我梦见戴铁链的头颅布满了翠绿田野

这时候，让泥土随身而起
把整个深渊提起来
并不是一切都要放在地面
提起伟大的青春、海拔和盐
从永昼里提起光明来
并不是一切都要放在地面

在这不问生死的火畔
我感到兄弟姐妹的眼珠划着我的眼帘
万紫千红，这刺痛
要我为他们祛除永昼
以一生作为离开
安放多少心灵，只为心情所见

这一夜我梦见熔岩滚动
在不问生死的烈火之畔，我



梦见鲜黄的泥土、翠绿的田野
冒着黝深的血色
其上有生动的纯青火焰
吞吐着大地的核心
金色梨杖不停地翻开苦胆：大地全都黑了
我想着头戴铁链的诗神
在暗中眺望不问生死的火光
一直活到天明，在日出时分
寂静地咽着淡水
我听见他说：“吃粮食是一件多好的事情”

故我以一生作为离去
完成我的性格，并求得青春长在
我听到辽阔天空施加于目的的声音
“这是什么样的血液？谁的血？”
天空的目的在于使人渺小
让我说
“这是什么样的世界？谁的世界？”

我听见这回声在世界的血里奔涌
我梦见一个蔚蓝的球体
正像从星际看到地球
我梦见我离它很近，伸手可及
然而它巨大无边
它的涵和忽，生和变，角质的尾舵和清浊的风帆，
向我迎风扑面
让我醒来。那是什么



我想那是我的脑海，一片眩目的大海沸腾
在脑底晕眩

我在七月的海边醒来
大海在那里吹浪凸起，一派生命
海洋里游着美丽女仙
“嗨，蔚蓝的地球，这是什么样的世界，谁的世界？”
置身于不问生死的烈火之畔
我感到旷野上有一根犀利的针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不朽地哭泣
“这是什么样的血，是谁的血液？”

在这个大自然里
熔岩是它的血液，七月里太阳又东升
大海在世界上波动着钢蓝的血液
而一个人，就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会说
“是啊，这是世界的血
浑浊的、粗糙的、彻底的
它的亲切让我惧怕
它和我一样简单，听我的胸口
哦，不要懂得我吧”

故我在不问生死的烈火之畔
故我的血流穿了世界



大海

(长诗选)

(第十一歌 新生)

(洪波)

安魂曲。欢乐颂。

闪电的大海

万有引力，我正跨过速度和生存的拱门

抛弃一切形相，拥有一切形相

可赞美的行动相对称

新生之门相对称

新生呵，不是一往无前

新生两两对称

新生之门刻有我入海时分的誓言

——与一切而至万灵

从日出到日落

正午和子夜在朝霞的极点对称

苍山如海蓝绿的霓岚分列朝霞两侧

生机的彩练

直跨在峻峭起伏的

大折皱运动反复营造的分水长岭

两两对称

生命永不止于纯真烂漫

生机盎然两两对称

凡有生命冲动云蒸霞蔚



必有新生

有两种雨声：从天上流入地下的雨声

以及从建筑上流下的雨声

从无限而来的雨声和直抵无限的雨声

雨水中万物皆绿、电光如闪

站在层林尽染的屋脊

两两对称

世代新生的建筑不朽

都是自然地或抗命地

与旷野和大海毗邻

大自然穿越其中。诗歌不可囚禁。

古格王朝的遗址

拖曳着断垣，墙窗都无上檩

龙马精神两两相应

两个纯金熔炼的少女，四支金色的民间喇叭

环绕死亡，灵息吹动

法老死亡的棺槨

沉重而高大，以足金制成

宽阔的金字塔迎风向路

乌龙盘绕的原野

土地高于人

莎草高于土地

而河汐高于青莎草

沧海一粟，每一质点

必是浑莽的质点，濒临沧海



此时此刻云水清潦
内心有如冬天的苍穹
耸立在高峻的山块
没有云河的山块
大海席卷着、腾举着没有人迹的山顶
一些翠绿的耳朵在礁石上伸缩
震栗与颤抖

坡冈上的紫云阴晴变幻
飞矢射在流年正中
射在我的身后
滚滚飞矢浮现出晴朗的银色
石子流淌得一片雪白
万物一望无边厚实而宁静
岁月的尘埃徐徐升起
阳光如注焕发着峥嵘的石头
我目睹壮丽景象一去不返
千载的美景千载难逢
里面必有我的初衷

圆满的树叶
转动着多芒的叶脉
蜡质深远蜡质金黄蜡质深厚
在儿子们的双肩插进
鸟群宽阔地飞翔着不停地周迴着
迎面扑来
撞碎在我的面颊



光辉的翎羽从我的两耳掠过
张开着梦想的骨头
我时时看见枭雄的儿子们
在腾达中独自焚毁
叫一个人坠落就是叫一个人坠落
海面上时时映出火光
半岛巨大地展开
思想沉沉地旋动摔碎
铺向湾流

“叫一个人坠落就是叫一个人坠落”
我默诵着新生的又一句铭言
布满了人世的匆匆
刻下了没有人再去攀登的图腾
想起我求生的人们
一次次将原野走得很平
明亮的山头上
空气寒冷

在这分列着硫磺和花朵的击水长岭
海岭开满硫磺花朵
两只真情的月亮出现过了
被骚动的人性吃光
刻入两具青铜人脸
从泥沙里仰望新生
举起双手，向天空谢罪
天空有日，正轰鸣振动



挂满瑞香的烈火战车
正辗过人体
新生

隔着云层珠母色的云层
日光直率而微微透明
大海绿闪闪的丝光
无限透明
一排粘土的坛子摆在粗沙海岸
灌进空旷的南风
这是新生

春天，一道道晦暗的台阶
向岁月顶端的高阳步去
春阴是这样敏感，毛蓝的坯子
平放在滚滚大雾
嵌入黑色屋瓦
和那心房上没有剖光的窗棂
这是新生

春天，一层盖过一层
大龙草的绿色祭坛
一层高过一层
东边吹来的搏荡
一阵大过一阵
棕榈色下的平原明暗对应
吃人的大自然



在我的心头爽朗地微笑
这是新生

土菜从地下叫着，那是布谷的亡魂
亚热带耀眼的雪山
把人口和牲口缝进平原
春天，一日一日，春天在缩短着
霏泽过后
春天细小而黝暗的绿光
高高飞起，奔放而又致命
正在追上我的步伐

狂飙为我从天落

一场初雪干燥在青铜人脸
微雨零漾，客死在不知不觉的人间
地力年年扩散
升降在岩石和堤坝
坚硬的刚砂突出表面。我时时听见
人类中传道：孤独
绿色和声音是与地层和鼎力对应
不能广大的孤独，孤独便毫无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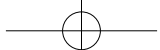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被春天捆绑着，零雨其濛
返回故乡深处
那些万类潜生的树林，绿门敞开
一阵潮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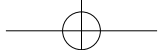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鱼和泥土的震撼
从深处涌来
大自然发出用肺腑吹响的气息
踏过抛荒的空地，穿过人影
搭起挺拔的箭支
踏开一架长弓
在朝霞中，我时时看见
意志射出的生命，而

一阵狂飙。

在朝霞之巅
我看见烈火之车投射的大道
从日落到日出
是
一阵狂飙



寻访“星火”





“星火”寥落，而我在寻找

江雪

1

一直想在九月的时候，再去看看向老师，闻一闻他窗外那满街道的桂花香。

我是在2016年3月的清寒中来到江西，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是武宁县城边一个新建的小区，门临当地的西海，宁静又空旷。我到的当天，他在门前摆满擦鞋摊的武宁县汽车站外接上我，笑容满面，皱纹密布在眼角额头。他接过我手里的水果，穿过车流不息的马路，在前面给我带路。

他穿件老式的黑呢子大衣，露出白衬衣的领子来，头发几乎全白了，走在这不大不小的武宁城里，不知为什么，他看起来与周围的人群有点格格不入。后来，我发现，是他走路的姿势。

快八十岁的人了，走路腰板还是笔直笔直的。手不拎东西的时候，就背在身后，脊梁还是挺直的。我问他，是习惯吗。他笑起来，说，一辈子这样惯了，在坐牢的十八年间，也是挺直脊梁。为了这个走路姿势，在监狱里还被批判过。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在里面十八年，我从来没有一天，在心里认为自己是个犯人。从来没有一天，我怀疑过自己。”他说。我相信。他从一摞摞旧照片中找出张黑白照片，是1978年，他出狱后第一天，在西宁照相馆的照片，穿着黑色布衣裳，脊背也是挺直挺直的，眼睛竟



然亮得出奇。

这是一副坚硬的骨头，我想。它应该是洁白的，白得耀眼。

几个月后，我在合肥见到了顾雁。他的头发比向承鉴白得还彻底。银发有一点点乱，让一张老人的脸高贵而生动起来。

老居民楼二层的窗外，杨树的叶子在寒风中呼呼作响。我听顾雁讲起六十年前的往事，讲他记忆中的天水——我的家乡；讲他的第一次恋爱，是和林昭。讲记忆中的林昭，那1960年10月苏州街角的最后一次回眸。那碎花衣服的背影。那些或平静或热烈的信——如今它们还尘封在法院的档案里。他说，林昭不是什么圣女，她只是为尊严而死的一个人。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就讲气节，这个气节，不就是人的尊严么。他说。

他何尝不是这样呢。十八年的牢狱之后，他终于等来可以进行物理学研究的机会。他把一切的心力都投入进去，为了他的量子混沌力学，分秒必争。1996年，退休年龄到了，学校有意返聘他，他却拒绝了。他完全退下来，开始做自己的独立研究。他不愿意在校园学术的各种人情往来中花费时间。一切的研究，只是为了自己感兴趣的物理问题。2016年，他82岁，书桌上还放着用英文写作的论文草稿，书架上还钉着物理学的公式。

在“星火”前辈中，我第一个见到的是谭蝉雪。2015年9月，在上海初秋依然聒噪的蝉鸣里，我听她讲起往事，讲起她永远的恋人张春元。1970年她在狱中，突然得到他的死讯——枪决他的布告就贴在监所的墙上，上面打的那个红叉，剜去了她的心。她在暗夜里眼泪长流，咬着嘴唇不让自己痛哭出声，监视者就在近旁偷窥，随时准备去给上级打报告。那半个月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只知道，几天后，她的一头黑发几乎全部变白了。而他在生前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在上海，通过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捎给她的：“我对不起谭蝉雪，没有能陪她走完一生。”



我也再次想起冬日里穿过秦岭的火车，把我带到四川内江。在沱江畔内江师范学院的老家属院里，我见到孙自筠。在南方潮冷的冬天里，他裹着厚厚的棉衣，坐在沙发上，给我讲六十年前的往事。讲他和谭蝉雪等兰州大学的右派同学一起，在水甘泉镇下放劳动。在饥荒弥漫的1959年秋，他穿上母亲寄来的、平时舍不得穿的呢子衣服、皮鞋，装扮得体面一些，步行二十里路，想去位于北道埠的铁路食堂，冒充职工，吃一顿好饭。走在路上，他被面黄肌瘦、饿着肚子还在田里干活的农民看到了，他们把他当成了干部，骂着，朝他吐口水，扔来黄土块，弄脏了他身上的新衣。

他的心被刺得生痛，一路走着，农民的骂声还在耳边环绕着。回来后，他思量再三，决定要给共产党的刊物《红旗》杂志写信。他是一起下放的右派同学中唯一一个党员。因为他的“红帽子”，和他关系一直很好的谭蝉雪，不敢和他交流关于时局的看法。而此时的他，坚信“党中央毛主席”是被蒙蔽了，不知道农民正在挨饿的现实。他感觉，从大跃进、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农村正在被基层胡作非为的干部拖入巨大的灾难之中。他觉得自己是党员，有义务向党中央报告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要为正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做点什么，就必须说出农村的真相……在昏黄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这封大约三千多字的信，偷偷寄往《红旗》杂志后，在忐忑中等待着消息。

十多天后，他被当作“反革命”，五花大绑从正在干活的田间抓走。从此，开始服刑、逃亡，在四川乡间隐匿五年又被发现的亡命生涯。

而他始终不知道的，是他的被抓，直接影响到了《星火》的诞生——他的兰大右派同学们，看到他作为党员给党刊写信，竟然被打成反革命，并在全县召开公判大会，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放弃了对执政者最后的一丝希望，开始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和反抗——酝酿和创办《星火》杂志，在信息隔绝的黑幕下，希望星星点点的光能连结起来，刺破黑暗。



2015年的这个冬天，我也来到武山，来到当年的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的坟前。那是一处荒凉的山坡，干枯的野草摇晃在寒风里。杜映华的两个儿子——都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每每提到父亲，都泪流满面。大儿子杜佩民说起那一年，是1970年的3月，父亲在兰州的红山根，和张春元一起被枪毙。三月兰州的风，冷得要穿透心肺。姨夫带着他去红山根寻尸。灰蒙蒙的天空下，不见父亲的尸骨，只见乱石嶙峋，野狗在荒野中奔窜。他们久寻无果，只能将红山根的一把土，带回家乡。到了村里，“反革命”的家庭，父亡亦不敢举丧，一家人哭都不敢哭，夜间只在栖身的破旧土窑里，躲被窝里嚎啕。直到1980年平反，才在这母亲娘家的后山坡上，觅一处黄土，请阴阳先生念经，请众亲戚作证，按家乡的习俗，为父亲招来魂魄，葬于此处。从此年年清明，有了一个可寄放念想的地方。

我也来到河南，在郑州满街道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招牌底下，去城市的新区寻访张春元的弟弟。他叫张春沛，是张春元活着的唯一一个兄弟了。老人羸瘦而虚弱，说起哥哥，说起往事，一次次硬咽着说不下去。说起1955年，哥哥从朝鲜战场归来，骑着马回到家乡，容光焕发。那一年，是自从哥哥13岁离家出走之后，他们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春节，也是记忆中唯一的祥和之年。家门口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子，鞭炮花在门口洒落一地，哥哥带着他走亲戚，去看舅舅舅探姑姑，老人们抹着泪，看他们兄弟俩意气风发，感叹从小没娘的孩子终于长大了，成了家里的荣光了。可这短暂的幸福很快一去不返，1957年，退伍后去了兰大读书的哥哥被打成了右派，再后来，被下放到天水劳动，再后来，哥哥和他的同学一起办《星火》，成了“反革命”被抓。再后来，1970年，传来哥哥被枪毙了的消息。

至今，他思念着哥哥，却并不懂得哥哥到底做了什么。几十年间，他也一直被哥哥连累着，“文革”中差点连命也搭上。他也曾在心里怪怨哥哥。“到如今，我让孩子们都入党。”几十年了，他似乎一直想证明点



什么，或许，那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想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在这个国家，为自己找回一点人的尊严。

一直到了1990年代初的一天，张春沛才再次见到谭蝉雪。她不是1959年和哥哥一起到河南老家来时，他记忆中那个高挑俊美的大嫂了。她老了，个头似乎都缩小了，瘦瘦的，一头白发。在机场接到她时，他环抱住她，忍住老泪，安慰说，大嫂，今天，咱不哭，我带你好好转转……

我想去闻桂花的香。那被痛苦浸泡过的老人，如今在生命的老年，回到家乡，在桂花的馥郁里，舔舐着生命里的伤口，还在想这一切苦难（不仅仅是自己的遭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退休后的向承鉴，写《炼狱归来》的自传，写《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因为这本书，惹来审查的官员上门，连续三天，软磨硬泡，让他停止出版。

就这样，在三月春天的夜里，我陪老人散步。听他长叹着：六十年过去了，真像一场梦啊。对我来说，这个梦早都醒了，可还有好多人，还在梦中哩。

2

万古长夜闪“星火”。

说起来多么惭愧。作为一名记者，我是在2015年的春天，才知道这世间曾有《星火》存在的。

《星火》的出现，是1949年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奇迹。

这份诞生于大饥荒时代的地下杂志，由兰州大学当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劳动的师生创办，仅印出一期，就被发现，在莫须有的“星火反革命集团”案中，逮捕43人，判刑25人，在“文革”期间被枪决杀害两人，与“星火案”有关的林昭也在1968年不幸遇难。

顾雁，《星火》最重要的发起人、作者；向承鉴，《星火》第一期的刻



印者，作者；谭蝉雪，“星火案”受害者，晚年竭尽所能寻查“星火”档案，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以下简称《求索》）一书，为“星火”立传。

2015年，我从友人王天定处得到了一本《求索》的复印件。更进一步，我才知道，《星火》就诞生在天水，它最重要的参与者张春元、顾雁当时就在马跑泉镇。而这个西北小城的小镇，就是我的出生地啊。从小，我就在家旁边的马跑泉拖拉机站玩耍，那里后来成为镇上的酱园。夏天时，满院子是装酱的大缸，弥漫着大酱又臭又香的味道。1980年代初的乡镇小学，学校里响应“除四害”，让小学生去打苍蝇，还要给学校上交“成果”，我们就去酱园里追着苍蝇打。

而马跑泉拖拉机站，就是张春元1958年下放到天水劳动，并酝酿创办《星火》杂志的地方。当年，谭蝉雪、顾雁、苗庆久他们，都曾到拖拉机站来过。

我曾猜测，我那饿死于1960年的大饥荒、当时48岁正值壮年的祖父，一定见到过张春元。那个中等个头，脸方方正正，眼睛明亮的年轻人，他是下放的大学生，举止气派都和乡民们不同。

为了确定我家隔壁的拖拉机站就是张春元曾经住过的地方，我还费了点周折。结果发现自己弄错了。那个拖拉机站，也在镇上，却是在街道的西头。而我家，在街道的东头。

2016年夏，我在父亲的带领下，找到了曾担任马跑泉农机站站长的杨伯伯。我没想到，当我说起1958年下放的兰大右派学生，说起拖拉机站，他竟然说出了张春元的名子。

他告诉我，我家隔壁的那个拖拉机站，是1970年后才设的分站。马跑泉镇上，共有三个地方，曾设过拖拉机站。最终，他把我带到了张春元当年住过的地方。从1950年代到60年代，这里是马跑泉拖拉机站所在的准确地址。

我们穿过镇子西头一片正在加盖的房屋，又穿过几条长长的小巷，



来到一段高二十多米的土崖下。这里属于今天的马跑泉镇胡王大队。一直到1990年代之前，这里都保存着它原来的样子，几间平房，一个矮矮的铁门。如今，它已被紧贴隔壁的一家医院征用。当年这个医院是部队医院，如今改制成民营的广济医院了。

这里是一片无人打点的荒林了。一片梧桐胡乱地舒展着枝叶，旁边就是医院的殡仪馆后门。在七月耀眼的阳光下，我拍下照片，发给谭蝉雪。这里正是她记忆中，土崖下那个曾经的小院子。在那里，她和他，每次见面，没有“谈情说爱”过，只是一份淡淡的默契相知，彼此见面时，眉目间都是难以掩藏的喜悦。

回去时，我穿过镇上的街道。路两旁的房屋拆得七零八落。新修成的高铁站即将通车，小镇上遍布垃圾和废墟。几个孩子在高架桥下的污水沟旁，玩耍着。

这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镇子了，更不是顾雁、谭蝉雪他们记忆中的了。

在我的少年时代，这个镇上那眼著名的古泉——马跑泉还在。传说，唐朝的大将军敬德西征路过这里，人困马乏之际，他座下的宝马刨出了这眼甘泉。旁边的古寺，两棵近千年的古柏，到现在还繁茂着，说是将军系过宝马的地方。在我长大之前的记忆里，那泉水冬暖夏凉，汨汨流淌着，不分日夜。隔了六十年，顾雁还记得那泉水的甘冽。

从1990年代初开始，泉渐渐干了。先是越来越小，到后来，一丁点儿水都没有了。干枯的泉眼上，用劣质水泥砌了两个花坛，这里成了一个小广场。两棵古柏，在寺院不断加高的楼阁和香火熏绕之下，树冠逐年缩小，不复有当年的葱茏。

和中国大地上无数个乡镇一样，这个镇子，也尝到了经济发展的甜头。人们手边宽裕了，房子越盖越高，伸到街道上去。过去那些古老雅致的木门面的、带着二层阁楼的老房，几乎全部拆掉了。整个镇子毫无规划地野蛮生长着。和越来越大的市场伴随着的，是成山成堆的垃圾，



没有人管，散发着恶臭，不远处就是人头熙熙攘攘的市场。

泉干了。家家早都接上了自来水。可这些年，到处是地下水污染的消息，越来越多的人不敢再喝地下水，而是买桶装的矿泉水喝。

2014年，高铁要来了。很快，巨大的高架桥就把镇子劈开了。到处是拆了一半的房屋，和堆砌的建筑垃圾。2017年7月，高铁通车，巨大的垃圾堆依然没有清理，镇子更脏更乱了。

2017年7月，我陪顾雁老师回天水访旧。他早已认不出这里。

顾雁是趁着受邀在陕西师范大学参加一个物理学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顺道去天水的。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徐诚，也去当年他教过书的天水市二中(当年叫天水县一中)看看。1958年，他们一行人下放到天水后，因为当时大炼钢铁、县里要建实验室的机会，他和徐诚、胡晓愚三人，被留在学校里办实验室、教书。

天水市二中也是我上中学时的母校。母校最著名的景观是操场旁那一排十多棵巨大、古老的柿子树。在2015年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顾雁，这位颇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当年的“星火”前辈，六十年前，在学校教书时，也曾在那繁茂的柿子树下徘徊……

这个七月，在天水市二中，他和徐诚，以及当年的几位老学生被请到党员活动室座谈。墙上，贴满了教师的政治学习材料，几个红色的字，晃荡在顾老师的头顶。我想起他说过，1952年上北大物理系，他和徐诚两人，最讨厌接连不断的政治学习，两人就跑到宿舍反锁门躲起来。

拍照片时，我特意绕开了那刺眼的红字。只留下顾老师满头的银发和沉静的面容。

在校史室的墙上，我也看到了堂伯父张翀先生的照片。1986年到1996年，他在这里担任了十年的校长，也是学校历史上最受尊敬和爱戴的校长。他的风度，高大清癯的样子，更像一个文人，和顾老师他们都有一种相通之处。



他也是兰大的右派之一。1957年反右时，他是兰大化学系的助教。我在向承鉴的自传中看到一份兰大“右派教师”的名单，他列在末尾。受到的处分较轻，是留校察看。

他于2015年的秋天去世，时年83岁。

我难以言说这份心中的懊悔。他是我的老校长，是我的堂伯父，也是和星火前辈一起打成右派的落难者。在1966年之后的“文革”，他同样遭了不少罪。而我，过去常在逢年过节时，去家中探望他，欣赏他晚年神韵颇佳的书法，却从没有一次和他谈起过往事。或许，潜意识里，我以为他并不是愿意和晚辈子侄谈论起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

3

我问父亲，可知道《星火》？他有点茫然地摇摇头。“当年影响很大的反革命案子啊，你不知道？”我提示他，他还是没有印象。

1960年，我的父亲14岁。那一年的大饥荒，他失去了父亲。

小时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和父亲一起去给爷爷上坟。要走很深的街巷，穿过整个镇子，一直往南边的山上去。在我记忆中，那是山梁上的一片坡地，很大，“破四旧”时坟早平了，所以并没有一个坟头。不知道父亲是做了怎样的标记，每次，他都能找到。大年初三，我们姐妹三个跟在父母身后，跪倒在那片冰冷的黄土上，看父亲点燃他用正楷恭敬地写了名字的纸牌位，点燃一张张纸钱，奠一杯茶，又奠一杯酒，然后，我们一起磕头。那时候，总是在无限怅惘的神色里，再传来他一声深深的叹息：我前两天还梦见你爷爷呢。

少年失怙的父亲，与寡母幼妹相依为命，曾不忍看母亲劳苦，辍学不上，最终，还是在亲戚们的劝说下，返回校园，完成了高中学业，最终因为美术的天份和才华，在县里的文化馆谋得一份差使，后来转为中学的美术和语文教师。



我曾无数次听父亲说起爷爷。每次开头，都是“挨饿的时候……”

父亲的讲述里总是充满痛惋。

在父亲的叙述里，爷爷的个头比他还高，大约是1米78左右的样子。他高大精壮，是一个能干勤快的庄稼人。1949年前，他凭着自己的吃苦能干，攒了点钱，在马跑泉镇的街道上买下一处小门面。他烙得一手好锅盔（北方的一种大饼），养活一家老小。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来了。苦难的岁月开始了。

食堂里没吃的，家里不让开灶，奶奶在地下藏了一点点粮食，结果收粮的干部来了，全部抢走。父亲至今记得奶奶呼天抢地的悲哭声。

家里彻底没粮食了。每天，从食堂打来一块“坝子馍”（类似玉米面发糕，但比较硬），就是全家一天的粮食。那时候，我最小的姑姑才一岁多，每天饿得直哭。爷爷把馍平均切开，拿小秤称，一人一小片，家里六口人，就切六片。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最大的劳力，可他的那一片，和最小的一岁多的女儿一样多。

一生勤苦正直的爷爷，就是以这样近乎迂腐的“公心”，保全了他的妻子女儿，而他自己，却倒下了。

父亲从学校里被人匆匆喊回，赶到家里时，我的爷爷已经不行了。他倒在炕上，高大的身躯再也无法起来。父亲跑去喊大夫，大夫来了，把把脉，看看样子，只是摇头。像所有在这个1960年的早春死去的我的乡亲们一样，他的肚子里，只充塞着树皮，观音土，早已到达了生命的极限。

这是公元2017年，我在这里，第一次写下爷爷的故事，写下惨痛的家史，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似乎看到爷爷的在天之灵，依然没有得到安息。他的死亡，他受的罪，他临死时对未成年的儿女千万般的不舍，他面对这改天换地后荒谬而不解的世界，带着多少的疑问？又有谁知道呢？

和他一样，在这个国家，从1958年到1960年，那地狱般在饥饿



中死去的人——他们大多数是农民，也有被打成社会最底层的知识分子。又何止千千万万呢？

2015年的夏天，有朋友委托香港的学生，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复印了一本谭蝉雪老师所写的《求索》给我，这是她花费了巨大的心力，收集资料，整理成文，将《星火》前辈们当年在黑暗中的求索之路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世间曾有《星火》。

我感念谭蝉雪老师。她在退休之后，就决定要把一生中最重要的这段经历写出来。她是为了历史，也是为了爱情。她的爱人张春元，一个英俊坚毅、富有思想又具有行动力的男子，是“星火”最重要的“带头大哥”。1970年，他和遇罗克等人一样，在监狱里“一打三反”的血腥潮流中，被杀害在兰州城外的红山根下。和他一起殉难的，还有“星火”的支持者，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在他们两人之前，1968年，“星火”同案的林昭，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1980年，星火案平反之后，杜映华被自己的两个儿子，按照当地习俗“招葬”在故乡的山坡上。而位于苏州的林昭墓，如今已成为一个象征，年年的祭奠甚至惊动当局，听说周围还安上了摄像头。只有张春元，至今英魂尚没有安放之处。

我也感念胡杰老师。他在拍摄纪录片《林昭》之后，又拍摄了《星火》。让发生在我家乡的这一段历史，让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如此重大的事件，第一次以影像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但是，因为那一道“墙”的存在，不仅在我的家乡，就是在整个中国，也并没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片子。

我感念我的记者生涯。经历了中国媒体1990年代以来的一段“黄金”时期，我在其中成长、思考，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只可惜，这一段新闻专业主义初建的旅途，我们虽曾参与，但行走不远，就遭遇了社会倒退的飓风，将一切推倒，只余遍地瓦砾。在最需要记录者的时代，我们没有了媒体，也没有了记者。



在一个如此充满禁忌，我们再也没勇气去触碰禁忌的年代，“非虚构写作”却有如一把虚火，到处在说，到处在谈。可当我受邀在一个朋友的“非虚构写作”平台上，试着去发布一篇看起来并没有“敏感词”的文章时，却怎么也发不出来。“非虚构写作”难道只能在时尚杂志上看到吗？有年轻的朋友问我。

还好。我写星火，不是为了“写作”。或许是记者的心怀太重，至今，我始终没有学会把玩文字。我骨子里还是个记者，我也并非是一个作家。我想，即使我是在“写作”的话，那我也不是为了文字，而是为了自由。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1959年开始，大饥荒席卷中国，死于这场灾难的人数，至今在这个国家还是一个谜。记者、作家杨继绳，在他的晚年，为这个国家那些死于饥荒的人们，用作品树立了一座唯一的《墓碑》。

从“反右”到大饥荒，一条言论与思想遭受打压，禁锢思想、控制舆论造成灾难的脉络清晰可见。“反右”摧垮了知识分子，也在全国范围内制造出“不能说真话”的寒蝉效应，到后来一系列极为荒诞的政策出台时，已没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正如向老师回望说，“全国真正成了一言堂”，毛成了皇帝，而无数的农民，被践踏入地狱。

“《星火》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是被低估了。”一位看过《星火》所刊文章的朋友曾感叹。如今我们看《星火》前辈的文章，他们思考的深入和决绝，他们对极权体制的认识，对现实问题的揭露，无不展示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思想的彻底独立，以及面对灾难的最大的勇气，以及诚实。不管是和同时代的遇罗克，还是和此前的一些思想者相比，他们都是最彻底最清醒的批判者。从今天来看，他们的脊梁，始终没有被极权摧垮过。

我在2015年7月，彻底离开媒体，成为一名独立记录者。这几年来，我访问了一些今天这个国家抗争者的故事，律师的故事，失去了阵



地的孤独的调查记者们的故事。但我心里最萦绕于怀的，是星火前辈的故事。

站在2017年的时代边缘，回望六十年前的1957年，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心有戚戚，或许会感知到这六十年的时光，竟然一线牵连，隐隐相似。

2017年，辛酉“反右”六十年。在中国的媒体上，和2016年的“文革五十年”一样，成为处处设防的媒体话题禁忌。这么巨大的灾难，在六十年后，没有反思的机会。

在香港，“反右六十周年的研讨会”曲折召开，到会的老人家们，已不到三十人。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时，还有一百多人参加。在2017年的这个会场，一位右派老人的儿子，也是五十多岁了，从国外赶来，讲述自己父亲当年的遭遇。他的声音突然凌厉起来：“从那以后，我的父亲就没有尊严地活着！”

他的父亲，毕竟活下来了。还有那些死去的人呢，那些夹边沟的阴魂呢？那暴露在寸草不生的荒漠里，无人收拾的白骨，到了2017年，只有艾晓明老师以一己之力的独立纪录片来呈现。

2017年春天，夹边沟的生还者，我的天水前辈李景沆神父于天水师范学院的家中辞世，时年93岁。2019年2月21日，在成都，“五七”幸存者，《格拉古回忆录》三部曲的作者张先痴，离开了人世。

越来越多历史的见证者，都走到了他们生命的暮年。以当时二十岁来说，他们到现在都已八十多岁了。很多的人，都已带着他们见证的这个世界的荒谬，那缠绕壹生的噩梦，离开了人间。

而我，一个家乡的晚辈，以自己的一段寻访，来向他们致敬。也向我的家乡，向我死去的爷爷、死去的父老乡亲，送上一份忏悔与歉疚的心情。这或者就是我追寻《星火》人物，以及那些历史印痕的唯一价值。



又记：

感谢我在访谈文章提及的所有受访者。

向所有的星火受难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写作中，参考了谭禅雪女士所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以及向承鉴先生所著自传《炼狱归魂》，并胡杰先生拍摄的独立纪录片《星火》，一并感谢。



顾雁：缄默的“星火”灵魂

江雪

2016年12月5日，我在合肥第一次见到顾雁。

没有事先给他打电话，也没有请认识他的前辈、朋友提前联络，我的到访，多少有点唐突。

我担心被他拒绝。早就听说他不愿意谈往事，即使已退休多年，一门心思仍扑在物理学研究上。在甘肃天水，我向他的老朋友、当年一起被打成右派的兰大研究生同学徐诚要电话，82岁的徐诚边找电话簿，边摆手对我说：别告诉他，我怕他说我多事。

我订了廉价航班，直接飞到合肥。猜测他会住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老校区，就先在校园外的酒店安顿下来。

电话过去，是他，声音洪亮。我说明自己是天水后辈，毕业于他1958年下放劳动时曾任教的天水市二中（原名天水县一中）。他竟慷慨地应允了见我。就这样，当天下午，在科大东区一座本世纪初建成的住宅楼二楼，我见到了他。

我们在他窄小的书房里聊天。往事惊心动魄。天光慢慢黯淡了，窗外的杨树叶，在冬天的风里呼呼响着。他满头银发，打着手势，一张苍老的脸高贵而生动，声音则是平静而克制的。

“我不想找政治，是政治来找我。”他说。1980年在上海，有人组织了一次林昭和她母亲的追悼会，他也去了苏州。那次，在摇摇晃晃的大巴车上，林昭当年的闺蜜倪竞雄曾问他：“你这样一个人，怎么就卷入到政治中去了？”他就这样回答。



倪竞雄是林昭当年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2019年，她已经九十岁了。林昭若活在今天，也是八十七岁了。

林昭比顾雁大三岁，却是他的“学妹”。在北大，他是1952年入学到物理系，她则是1954年上的中文系。

没有人知道。她是他的初恋。是他生命中永恒的秘密与哀伤。八旬暮年，不管讲述如何轻描淡写，也无法掩埋这份曾经的情感。

他认为，自己是了解她的。“林昭不是圣女，她只不过是一个把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更贵重的才女。”他说。

我们谈起《星火》，也谈起他和林昭的往事。那是淡淡的、一生难以忘却的爱情。林昭写给他的三十几封信，如果没被销毁，应该还躺在静安区法院他的档案里。他曾想索要档案，但无门路。他知道，此生可能是再也无从得见她那秀丽纤细的笔迹了。

今年(编注：指2016年)八十四岁的顾雁，是1959年大饥荒年代甘肃地下刊物《星火》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当年《星火》的刊名，就是他起的。他也是《星火》发刊词的作者。在这篇题为《放弃幻想 准备战斗》的发刊词中，他表现出远超同时代人的洞见。斥责当时的统治为“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在研究《星火》的学者钱理群等人看来，在同一时代乃至后来“文革”中出现的民间思想者中，《星火》的这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在对现实彻底的批判和认知的清醒方面，都远远走在了历史的前头。

顾雁和张春元，是《星火》的发起人，也是《星火》的灵魂人物。1960年，“星火反革命集团”暴露，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后，在1970年的监狱“一打三反”风潮中，张春元被杀害于甘肃兰州。而顾雁，判刑十七年，在青海服刑十四年之后，因“科技发明”减刑三年，于1973年得以提前释放。

2004年，“星火案”的另一位当事人，张春元当年的未婚妻谭蝉



雪，开始着手整理记录当年的《星火》杂志往事。作为“星火”的灵魂人物，顾雁却始终都保持着沉默。除了曾出现在独立导演胡杰的记录片《星火》中，他不曾就此事接受外界的访问。

“你能不来最好，既然来了，也就说说吧。”他对我说。

感念他，在一个晚辈面前，慢慢打开了话匣子。在其后我们多次的见面中，那尘封的往事，也终于慢慢展开。

上篇：顾雁和星火

1

1935年，顾雁出生于上海。

他的父亲顾仑布，是和徐特立等共六十人一起，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

“当年在法国的官派中国留学生，有一批人参与了政治运动，我父亲没有参加。后来民国的钱停掉了，搞政治的一些学生就到莫斯科去了。我父亲留下来打苦工，推车子挣点钱，留在法国十多年，后来又自学，在工厂做工程师。再后来一位美国老板要在上海开纺织厂，请父亲回到上海。他十九岁去法国，三十多岁回国，和母亲结婚……”

顾家是上海南汇的望族。翻译家傅雷就是顾仑布的表弟。傅雷当年出国留学，和顾仑布有关。“我父亲有一年从法国回来，劝傅雷去国外留学，傅雷的母亲不同意。我父亲就想了个办法，找傅雷的姑母出面，要将傅雷送出去读书。傅雷的母亲最后同意了，但提出条件，要傅雷先和梅馥结婚。”

抗战期间，日寇统治上海，顾雁的父亲也失业了，只身去内地找工作。家里陷入了窘境，小孩的学费无着落。顾雁记得，有一年冬天，



母亲曾带着他去住在巴黎新村的傅雷家借钱。母亲和傅雷夫妇窃窃私语着。第二天，梅馥就把钱送到了家里。

1952年，顾雁考上了北京大学。此时，他的哥哥顾鸿考上了上海的交通大学，后来妹妹顾麋也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

顾仑布一生饱读诗书。他给三个孩子起名字，取自于《孟子》：“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顾麋记得，1956年顾雁考上研究生后，一生饱经忧患的父亲格外喜悦，曾说：“我们这个家要结宝塔顶了。”他尚不知道，在这个国家，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即将接踵而至，巨大的灾难也即将降临这个家庭。

顾雁记得，上大学后，家里依然困窘，父亲还在失业中，还是傅雷帮了忙。让父亲写了份履历，由傅雷交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父亲后来被安排在上海第二纺织厂做工程师。1960年，“星火反革命集团案”事发，顾雁被抓走，父亲随即就病倒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父亲那时经常说，让我们不要搞政治。我哥哥进了造船系，本来让我进钢铁学院，我喜欢物理，高三时，就决定将来要搞物理。”上了北大物理系，一心要成为科学家的顾雁，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被卷入了历史的政治漩涡里。

2

1957年的7月，顾雁在兰州大学读研究生，正经历人生的一场天翻地覆。

“1952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正赶上院系合并，清华北大燕大三校合并。物理专业很受重视，我们一级招两百多人，还有东语系也招了上百人。但原有的法律系却被撤销了。”

他回忆，当年刚进北大，气氛不一样。老的传统还在，可以随便听课。他去听历史系听“考古学通论”，也去西语系旁听法语课。但两年



后就不同了，学校的氛围开始变了，老师经思想改造，也变得谨小慎微了。

年轻的顾雁，虽然读的是物理专业，但广泛涉猎各方面的书籍。他记得，1950年代初的北大，在图书馆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书。当时，美国还在不断给燕京大学寄来原版的书。图书馆的藏书，每一本上都贴一段英文的铭文。“（多看，多想，少谈）Read much Think more Talk less”。

也正是获益于当年广泛的阅读和独立的思考，顾雁后来所写的“星火”发刊词虽是急就章，但却能看出，他的洞察力远超于同时代的人。

1956年，顾雁从北大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兰大物理系工作。同年，他也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兰大物理系的研究生。由于他在“肃反”时曾被大学的同班同学，指责为“反动小集团骨干成员”，为了避免再碰上这些班干部同学，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兰大，未去北京。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标志着“反右”的开始。

6月8日，中共中央突然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

后来一同参与“星火”、一起受难的向承鉴，曾写回忆录，回忆当时的兰大“反右”。“一开始是鸣放，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大约不到一个月，突然转向，成为批判右派了，提意见的人都被打倒了。”

“我搜肠刮肚，实在对党提不出意见，所以星期日我和同学照常去省图书馆看书……在学校不断号召动员下，先是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一些大字报，他们了解学校一些情况。有大字报揭露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有批评某些党员干部盛气凌人、作风霸道的……新来乍到的一年纪同学，则批评学校在招生时浮夸吹嘘、欺骗学生，或者对学



校教学设备不满、要求更新设备、增加教育投资的……”向承鉴在自己的回忆录《炼狱归来》一书中曾写到兰大当年的“鸣放”及突然演变的“反右”。

和上大学前就“参加革命”的谭蝉雪、出身赤贫的向承鉴相比，那时的顾雁，在校园里的“鸣放”和“反右”中，更像是一个旁观者。

他和徐诚，一直属于学校里“染不红”的那小部分人。上海富商家庭出身的徐诚，更是一副公子哥儿的样子。在北大时，顾雁和徐诚最头疼的就是政治学习。每到政治学习，他们就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躲避起来。

“反右”一开始，由于顾雁在“鸣放”期间未提任何意见，更由于他主动放弃去北京，留在兰大，“表现不错”，校方一开始还任命他为兰大“反右斗争委员会”研究生组的委员。

但顾雁还是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原因是他和北大一位叫刘治平的同学通信。“刘治平是福建人，出身不好，父亲是一个小县的县长，被镇压了。刘在班上属于‘要求进步’的，但他学习很棒，和我的关系也不错，我们一起跟导师王竹溪（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西南联大时是杨振宁的研究生导师）做毕业论文。”

北大毕业后，刘治平留在了北京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想考研究生，但因为出身问题，人家不让报名，他曾写信给顾雁，发牢骚，顾雁回信劝了劝。后来“鸣放”时，刘治平因批评肃反是莫须有、扩大化等，成了科学院的第一个大右派。又写信给顾雁诉苦，顾雁写信安慰他，却没想到他把信交了上去。

“这就成了我指使他“鸣放”的，北京那边把这信转了过来。于是兰大赶紧把我的‘反右斗争委员’职务撤掉，就把我也弄成右派了。”顾雁说。

就这样，顾雁成了兰大的三名“研究生右派”之一。

他记得，打成右派后，没有了生活费，他曾和同学胡依理一起去找



当时的林迪生校长。“说我们没法活了，林就批了每月给我们十元钱。”

但其他的右派同学则没有这么幸运。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谭蝉雪、向承鉴等人，就停发了助学金，吃饭都成了困难。据谭蝉雪回忆，那时，兰州大学附近的和平饭店刚刚开建，他们不得不去工地上打工，帮忙搬砖、砌砖等，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换口饭吃。

从1957年7月“反右”开始，到第二年8月，被批斗的学生和老师們忐忑地等待着结果。1958年8月，兰州大学正式宣布了右派名单。全校师生，14%的人被划为右派。这个指标，远远高于当时中央要求揪出“5%”右派的比例。

向承鉴保存下来了一份兰大右派老师受处理的名单：

兰大右派教师受处理情况

第一等共七人，其中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者三人：陈时伟、刘文兴、段重希；只劳动教养者四人：徐长昆、田春如、曹文正、周志中。

第二等撤销原职监督劳动者九人：管照微、胡晓愚、任国钧、黄培柱、黄尧荪、邓志民、李思联、詹宗杰、徐修梅。

第三等撤销原职留用察看者八人：左宗杞、段子美、李剑夫、曹觉民、吴文翰、王景尊、周慕溪、陈佩芳。

第四等撤销原职降级使用者十八人：李学禧、匡扶、谷扬、张照珂、李延涛、李珍熙、王培桐、王德基、周琰、吴南儒、杨素空、王延湘、刘昶丁、陈湘凌、刘阿丽、王戢武、吴宗汾、李民忠。

第五等撤销一部分或大部分职务降职降级降薪者三人：丛林玉、陈耀祖（讲师降助教）、方孝博（副教授降讲师）。

第六等免于处分者三人：张孟伦、孙艺秋、张冲。

这个名单上的最后一位，即是我的堂伯父张冲。他当时是化学



系的助教，也给苏联专家做翻译。他去世于2015年10月14日。让我懊悔不已的是，在他生前，我没来得及访问他。

3

《星火》改变了顾雁的一生。

“我觉得我还是因为碰上了张春元。没有他，我也不可能去做《星火》。张春元是一个真正的行动家。如果只有知识分子，没有他这样的人，也做不成事情。”2017年7月，我再次见到顾雁。隔着近六十年的岁月，他说。

1958年的夏天，顾雁及兰州大学的四十二名“右派”师生，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劳动。顾雁所在的公社叫“花牛公社”（后来这里成为甘肃著名的“花牛苹果”基地）。他被安排到生产队干农活。

瘦瘦弱弱的顾雁，第一天背麦子就累得趴倒了。第二天，他被安排到老幼妇弱组，在农人们善意的调侃中，麻木地干着农活。

还好，一周后，他突然被要求到天水县一中（即后来的天水市二中）报到。赶到学校才知道，因为正在搞“大跃进”，县里大炼钢铁，需要建化验室，包括顾雁、徐诚等人在内的兰州大学六名师生，被要求在学校建立一个钢铁化验室。

大炼钢铁本身就是闹剧，小高炉也炼不出铁来。但最终他们却得到了留在中学任教的机会。当时的校长陈思勇决定留下他们，顾雁教物理，徐诚教数学，胡依理教化学。

至今想起来，顾雁都觉得那是一段难得的安宁日子。此时，大饥荒还没到来。在学校里，他们这几个外来的大学生，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

天水，是传统文化深厚的地方。或许是因为历史厚重，一时还不能被新政权的急风骤雨席卷，天水的民间还有着尊重师长的传统。“我们



走在街上，遇到学生，他们都会停下来鞠躬。骑自行车的学生，也会下车给我们行礼。”

在学校里，他们吃饭是在教工灶，并没有因为是“右派”而受到歧视。即使在大饥荒已经蔓延的时候，顾雁在学校里暂时还能吃饱饭。

但这些并不能安慰他。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个个运动伴随着层层谎言，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顾雁和他的同伴们，虽不敢说话，但内心的火在涌动着。

那时，张春元时不时会来看他。

张春元一开始是在甘十里铺公社劳动，不久，就被调到了马跑泉公社的拖拉机站。这样，就离顾雁所在的天水县一中近了。

在学校里，他们并不相识，这时候才算是熟悉起来。

在顾雁的记忆里，张春元的个子不高，脸方方正正的，平时总是笑嘻嘻的。他是朝鲜战场下来的复转军人，1955年考入兰大历史系。因为他的经历，当地的基层干部都很尊重他，他的生活待遇也没问题。

顾雁记得，当时的拖拉机站进口了一辆意大利生产的红色农耕地。因为说明书是英文的，张春元就来找他翻译。这次翻译之后，两个人就这样渐渐熟悉起来。

谈话是投机的。他从张春元身上，感受到他的责任和担当，也感觉到他是一个可以谈话的人。要知道，在当时，“反右”已经给人们上了扎实的一课，同学之间其实已很难再倾心交谈。

下放劳动的同学，彼此多有戒备，不敢随便表露自己的思想。但张春元和顾雁，却在1958年的这个深秋，因共同的思考，建立了彼此的信任。

他一直记得那个冬天，一清早，张春元来喊他，一起去甘泉公社拉炭。

深秋的风吹在脸上，冰冷又畅快。拖拉机慢腾腾地走在土路上。他们俩就在车上谈论着。



庐山会议，说出真话的彭德怀被打倒在地……

粮食已经极度缺少，农民被饿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毛给地级干部写的那封信(指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亲笔写了一封公开信)，完全是推卸责任……

这次畅谈，加上此前的交流，两个人已成了可以交心倾谈的朋友。

到了甘泉，装好了炭，张春元去找谭蝉雪了。顾雁隐约感受到了张春元对那个姑娘的倾慕。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张春元第一次去单独找谭蝉雪。

从那以后，顾雁和张春元见面和谈话的次数就多了。有时在田间地头，有时在路边，说话都是随机的。作为右派，他们必须谨言慎行，不能让人看出来。

这年春天，张春元以“抗美援朝”为题材写的一篇剧本发表在东北的《电影文学》杂志上，并接到了一笔稿费。顾雁看过剧本《中朝儿女》，写得很有才华。他记得，领到稿费的张春元，买了一个二手的名牌手表。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还打算把剧本拍成电影，但最后，因为马跑泉公社写信过去，说他是右派分子，拍电影的事情也就告吹了。

1959年10月的一天，张春元来找顾雁，告诉他中文系的同学、下放在甘泉公社的孙自筠被抓的消息。孙自筠本身是党员。他目睹饥荒，给《红旗》杂志写信反映问题，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

很快，县里开了公审大会，孙自筠被宣布判刑十年。他们曾经抱有的幻想就这样破灭了。“孙自筠这样的共产党员，给共产党党刊写信反映情况，就成了反革命，这样下去怎么行！”

“孙自筠坐牢太不值得。信寄到《红旗》杂志，最多也就几个人看到，对社会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坐牢，也至少要起个泡啊。后来我们就说，不如自己做个刊物吧。”

在顾雁的回忆里，这是星火酝酿的开始。



这个细节，和谭蝉雪的描述有出入。谭在《求索》一书中写到，最初酝酿《星火》，是大家在拖拉机站常常相遇，一起讨论时提到的。

但顾雁回忆，在当时的拖拉机站，那样的情景下，周围眼目众多，不可能多人聚集谈论。而讨论办杂志的事情，更是十分隐秘。在他记忆中，没有大家一起讨论的事情，都是他和张春元在私下秘密商议。

无论如何，张春元和顾雁已下定了决心，甚至包括有可能到来的“献身”。

4

1959年11月，在天水北道的旅社，张春元、顾雁、胡晓愚、苗庆久四个人碰头了。这次北道会议，是顾雁记忆中唯一一次在天水正式讨论“星火”。“会议是极端保密的，除与会的四个人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入知晓。”顾雁说。

此时，谭蝉雪已离开天水，向承鉴则在天水武山县，二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北道会议，谈论的过程在苗庆久的交代里有详细的叙述。也是在这次，经顾雁提议，大家决定把要做的这份刊物起名“星火”。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

会议上，大家商定开始分头准备稿件，写文章。顾雁随即写下了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文章充满了那个时代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忧思和洞见。这些见地，至今看来还是超前的。其中写到：“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作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这是由于建立偶像迷信压制民主，形成中央集权的法西斯统治的结果。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作社会主义的话，应该是一种由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



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第一期的稿件，除了顾雁的发刊词，还有向承鉴的《自白》《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另外就是林昭的一首长诗《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一日》，以及张春元的《粮食问题》，向承鉴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张春元的《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胡晓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赫鲁晓夫》。苗庆久整理的《反右倾的由来》和《甘肃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的一些言行》。在“言行”这篇里，引用霍维德的话说：“思想改造、反右斗争把知识分子得罪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民得罪了；红旗竞赛、赶先进、超先进、提高定额、加班加点把工人得罪了。”

《星火》第一期还开辟了一个栏目，名为《参考文件和参考消息》。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看清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真相，专门刊载不见报章的重要文件与重要消息”。第一期，刊登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间给全国小队级以上农村干部的内部指示。

“每个人读了这篇指示以后，可以想象得到，忠心耿耿执行主席指示的干部，在今天将会有怎样的下场。”这是顾雁在前面写的一段“编者话”的内容。

关于刻印的问题，最终商定，由苗庆久带回武山刻印。

1959年12月，在武山一座破旧的砖瓦厂院子里，向承鉴和苗庆久趁着黑夜，一笔一笔刻印出了《星火》的第一期。刊头上的火炬是苗庆久刻上去的。

第一期，印了三十多份，除了朋友们之间传看之外，其余的，由向承鉴藏在了房东李大伯家的缸里。

按照顾雁的说法，《星火》第一期出来，并没有他们预料中的反响，因为环境太紧，很难散发出去。

曾亲手刻印《星火》的向承鉴也这样回忆。他只给自己极为信任的



少数几个人寄去了《星火》。

1959底，顾雁带着几份《星火》返回上海。在《星火》出来之后，因为饥荒越来越严重，大家商量，先回到各自的家乡，再做打算。

关于《星火》后续该如何做的问题，则在上海延续着。1960年6月，顾雁与张春元、苗庆久在上海的顾雁老家聚会，刻印了张春元写的《论人民公社》一文，共百余份，商议散发给全国范围内的各省党政负责人，并初步讨论了散发方式和地点。他们当时的考虑是，只有寄给这些人，才有可能产生实在的影响。

但这篇《论人民公社》还没有开始寄出，就因为谭蝉雪在广东偷渡被抓，张春元前往营救也被抓而夭折了。

1960年10月，顾雁在上海的老家被抓。他被铐上了手铐，坐船从乡下押往上海。

在被抓前顾雁已感觉到被监视，由于怕连累到林昭，他特意去苏州找了她。在顾雁被抓几天之后，林昭也被捕了。“星火反革命集团”冤案就此形成。此时，在甘肃、广东等地，“星火”同仁悉数被抓捕，其后又分别被判刑。

《星火》的这些文章，尘封了几十年。一直到2004年前后，从敦煌研究院退休的谭蝉雪，开始搜集资料写《星火》一书，才让这些文章重见天日。

下篇：顾雁和林昭

5

1968年的一天，在西宁，顾雁知道了林昭遇难的消息。是上海来的提审人员告诉他的。那时，他正在青海机床厂服刑。作为“星火”一



案的主犯，他在1965年，被判处了十七年有期徒刑。

他给家人写信。在信里不能明说，只写道：“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信通过了监狱的检查，家人收到了。夏瑜是鲁迅小说《药》里面的革命者，顾雁以之暗示给家人，自己知道了林昭已死的消息。

家人其实已经知道了，但不敢告诉他这个消息。可对他，“这一关必须要过。”

他记得最后一次见她，是在苏州的一个街角公园里。她穿的是中式布衫，像以往一样，似乎是带了碎花的。隔着五十七年的风尘，她的面容，似乎已模糊了，但记忆中，她的笑容，几乎一直是明媚的。

1960年10月，他在上海郊区（今浦东）的老宅里被抓。两个月后，她也被捕。她写给他的三十多封信，他藏了起来没有烧毁，结果全被抄走。如今，应该还尘封在上海静安区法院他的案卷里。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60年初。张春元是中间人。

他当然早就知道她的芳名。他比她小三岁，但却比她早两年进入北大。1957年，北大“广场”运动，她是灵魂人物，她的美丽，以及激情飞扬的才华，早就在年轻的大学生中流传，而他当时已离开北大，到了兰州。那时两人并未交集。

未见面之前，他先看到了她的笔迹，是在天水。

其实在酝酿《星火》之前，张春元就一直想联系到林昭。在水天一起劳动的“右派”同学孙和愿意牵线。孙和的妹妹孙复和林昭是同学。孙和遂以妹妹的名义，给林昭写了一封信。很快，林昭回了信，并寄来了一首叫《海鸥——不自由毋宁死》的长诗。

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
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
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
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



.....

张春元从孙和处得到了《海鸥》，拿给顾雁来看。诗写在蓝色透明的纸上，字迹特别娟秀。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信纸特别美。

他们决定把《海鸥》油印一些，供在天水的兰大朋友们一起看。油印的地点在张春元所在的马跑泉拖拉机站，由张望风，顾雁在里面刻印出来。

《海鸥》印了十多份，悄悄地在朋友们之间传看着。到了1959年11月，《星火》第一期刻印时，没有征求林昭的意见，他们就决定把林昭的另一首诗《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一日》放进去。

《星火》的第一期刻印，在武山由苗庆久和向承鉴完成。拿到第一期《星火》后，顾雁就回到了上海。这之前，大家一起商量，暂时无法做什么，也不能返校，不如回到各自的老家。

回上海前，顾雁先到了兰州。当时是1959年12月，他发现兰州火车站已经很混乱，无数的难民在火车站要饭。他从兰州直接到了上海，把自己在学校的很多书也整理成行装。哥哥、妹妹都来车站接他。到了上海之后第三、四天，他就去找林昭。

回上海前，张春元给了他一个暗号，是约好见林昭时用的。

他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林昭的家里。她家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一带，那里是中产以上的上海人聚居的一个区域。不过她家的房子很小，是个小小的二楼。他敲门，似乎是她母亲开的门。林昭带他去了复兴公园，就在公园里边走边聊。

他给她看印好的《星火》，她却始终没有打开看。就那样放在一边，和他聊一些家常的事情。

他有些失望。心想，她实在不像一个革命家的样子。

复兴公园不大，走走就到了头。留下信址，他们分手了。几天后，他接到她的信，简短的两行字，约好某天在中山公园门口见面。



那次他按时到了，她却晚到了半小时。他心里有些不快，却看到她拿的一本书，印象中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她说是从卢湾区图书馆中借来的，值得看，要借给他看。

那一次，他一直在听她讲。讲一些民国往事，讲书里面说到的黄花岗，林觉民给未婚妻的信之类的东西，却没有谈到《星火》。

“我也不好意思开口问，因为把她的诗放里面，也没征求她同意。现在她看到了，也没有反对，表示默认了，我们的东西具体怎么样呢，她没有说，但看起来，似乎也是赞同的，否则为什么要讲黄花岗烈士一类的事呢。她也稍微讲了一点她过去的情况。”将近六十年过去了，那天的每一刻，都还印在他的记忆里。

以后他们又见了几次。但因为他搬到乡下老家去了，他们见面就少了，但断续着书信。

过了年，到了1960年的二三月份，张春元来了，告诉他，他和谭蝉雪同居了。约上林昭，他们三人一起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张春元专门请他们到上海有名的绿杨村菜馆吃饭。

他记得，那次林昭也喝了酒，有点醉了。三个人还一起到碧柳湖长风公园游玩，乘船。“那天，记忆很深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生平就这一次。”

早春，风还冷，三人荡舟湖上，谈的话，却都是最平常的问题，并没有谈政治的问题。

那以后，顾雁和林昭的接触多了。他送了她一本英国诗人雪莱的诗集，这是他唯一送她的礼物。在上海的国际书店买的。是苏联原版的书，也是莫斯科大学外语系学生课外阅读的书，注释都是俄文的，但正文是英文的。

5月的一天，她突然写信约他到上海的襄阳公园。

见面，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笑嘻嘻的。说，要搬到苏州去住了。因为她藏在桌子上的《星火》，大扫除时，被母亲找出来了。



“她母亲当然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了。从林昭的口气看，她母亲对我印象还是不错的。但她一旦知道我们一起做这种事情，马上就急了，要她立即搬去苏州住。”

他记得，那次林昭约他出来，还给他一张纸条，写着“苏州乔司空巷十号，许莘收”，问许莘是谁，说就是她。她还说，她母亲认为，你们写的这些，都是一些青年不懂事，发泄情绪而已。在记忆中，他们很少聊起《星火》，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记得，她到了苏州之后，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一个星期至少有两封到三封信寄过来，而且信写得长了。几十年后，顾雁想，这或许是和她母亲的干涉有关。越不让她和他交往，她越要坚持。“她性格中有叛逆的因素。”

就如1957年她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后到人大新闻系的资料室里干活，和同样为北大同学的甘粹在一起，因为被人说他们是两个“右派”谈恋爱，她生气了，便真和甘粹谈起恋爱来，甚至还去申请结婚……

那些写给顾雁的信，也似乎带着叛逆的味道。顾雁记得，从五月开始，差不多也就三四个月时间，她就写了三十多封信给他。有时一封信还没有回，她又一封信就来了。其中一些信是热烈的，洋洋洒洒，无话不谈。

他记得，她的字非常秀丽，而她的信纸，都印着花，信封上也有花。她是非常用心的人，在生活的细节方面很讲究。

他们像男女朋友一样相处了。“中间当然还有很多小插曲，我后来去过苏州，三四次，她也到上海来，瞒着母亲，早上坐火车，我去接她，她还带着一些自己做的点心，水什么的，在公园里野餐完了以后我就下午送她回苏州。”

和刚开始相处的许多恋人一样，他们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他记得，有一次，晚上看完戏，他们一起走在苏州观前大街上，她突然叫他停下。路对面有个中年女人，她走过去，两人说着话，她指点着他，告诉



那个人。后来才告诉他那是她母亲的同事。他心里不太高兴，觉得应该正规介绍自己一下。

“她是比较强势的，不太考虑别人的心理感受。”他也记得，有一次两人吵架，他翻了脸，却没想到她马上就软和下来，让他大吃一惊。

记忆中最温馨的一次，是她带了点心来上海，两人在公园里一起吃。她笑吟吟的，那是她最温柔的一面。

“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谈恋爱。我想带她去见父母，她不吭声。我不想偷偷摸摸。她也瞒着她母亲，每次我去，母亲都不在。”顾雁说。那时，他有些怨言。到今天，他回想，她其实是认真的。

1960年10月，顾雁感觉到了情势不对。家附近出现了盯梢的人。他知道，该来的大约要来了。他决定去找林昭。

“最后一次去呢，有双重因素，一是我觉得我的性格，的确和她不合适，晚断不如早断。另外一个因素，感觉情况不对，不能再拖累她。”顾雁说。

这是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他提出分手，要她把信都还给他。她的信，他也会烧掉。她不高兴，未置可否。临走时，给他的包里塞了篇文章，是评白居易诗的。在他看来，这正是她的性格。“这位大小姐任性着呢。她是告诉你，你说分手就分手吗。”

关于林昭的被捕，妹妹彭令范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到：

“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派人去苏州将姐姐逮捕。那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居，父亲住在苏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亲家里。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亲的房内。公安人员进来进行了搜查，把罐头都打开来看，姐姐讥讽道：如果我有能耐将情报藏在罐头里，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恰好这时父亲闯了进来，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说着踉跄离去。不到一个月，我父亲自杀身亡。”（《彭令昭：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1968年月日，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以“未婚夫”的名义去探监，并见到了她。张元勋在1990年代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这次见面，在这次见面中，林昭说，请张元勋将来代为收集她的文稿和书信，一本是《自由集》，一本是《情书一束》。

看到这篇文章的顾雁，在心底里有一丝悲凉的温暖。他知道，如果收集情书，她给他的三十多封信，也许应收集于其中。“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他想。

他也想起父亲说过：“林昭是才女。”父亲国学功底很深，非常欣赏林昭的才华。

他被关在监狱里，后来才知道，在她1962年取保候审回家，还没有被重新抓起来的时候，她还去看望他的父亲，给老人捶背，并且给老人买来点心。

她被杀害快五十年了。他去过她在苏州的坟。时常，他会想起她，怀念着她。1981年，他结婚了。新婚旅行，他还带着妻去了苏州，于她的墓前祭奠。也在内心，终于与她告别，与那一段残酷的岁月告别。

6

隔着历史的烟尘，今天的人们，回望林昭。她的价值被越来越认可。人们追崇她，认为她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圣女，一个殉道者。

可是在顾雁的心中，她只是一个高贵的人。她并不是圣徒，她不是为了别的而死，她是为了人的尊严而死。

“她并不是革命家。她一切的抗争，不过是为了人的尊严。”2016年的这个冬天，顾雁在悠长的记忆中抬起眼帘，这样说。他认为自己是了解并理解林昭的。

关于林昭和《星火》，多年来人们都把她当作《星火》的主要参与者。而顾雁始终认为，林昭和《星火》，确实并没有多大关联，她的被判刑，



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她对政治活动其实并不很感兴趣。

在他看来，林昭在《星火》中所有的参与活动，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一日》一诗被刊印在了《星火》上。而她和《星火》的朋友们，只是彼此欣赏，惺惺相惜。

林昭被捕后，曾在《我的思想检查》一文中，这样写道：“大约黄土高原上比之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内是辽阔而且犷悍，兰大的朋友们性格相当开朗而外向，好动作，却不甚好静去深思。这当然与客观环境有很大关系。似这种好动的习性用以造反，长处是颇富于进取，短处是不善于等待……”

事实上，林昭和《星火》的关联，主要是因张春元和顾雁的联系。对张春元，她非常尊敬，称他大哥。但对于《星火》，她并没有直接和主动的参与。

“兰大友人们”曾对林昭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林昭更多是一个知识分子，她并不是一个行动者，这点和张春元完全不同。”顾雁说，他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1960年，《星火》已经刊出，张春元曾到上海，大家一起讨论组织问题，也曾想过邀请林昭参加，但林昭的态度显然让他们知道她并不感兴趣。“她甚至连出版刊物都是反对的。”顾雁说。

“星火”案发后，和同案的其他人不同，林昭有两份起诉书，一份是关于“星火”案，一份是起诉她在苏州的活动。她的判刑，《星火》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原因。1965年，“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宣判，她被以“态度恶劣”，判处了二十年。张春元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1960年夏，顾雁在上海郊外的老宅里，最后一次见到张春元。那次，因为谈到关于谭蝉雪偷渡去广东的事情，两人说得不太愉快。临走时，不像过往那么融洽。顾雁没想到，这就是永诀。

1970年，正值“文革”，在监狱“一打三反”的风潮中，张春元在兰州被杀害。此前的1968年，林昭被杀害于上海。



7

冬天的中国科技大学校园里。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阳光涂抹在林梢，顾雁常常一个人独自在校园里散步。他穿灰白色的羽绒服，戴一顶鸭舌帽，虽然韶华已逝，但脸庞上还能看出年轻时的英俊。

他一个人独自住着，每周有阿姨来帮他打扫一下房间。平日里，多在学校食堂吃饭。

“生活比较方便。晚上喝点稀饭。早晨面包，牛奶。中午吃认真些。每天至少锻炼一小时，六点起来。我哥哥妹妹都在上海，我不愿意去。这里的房子也卖不掉。”他说。

1991年，他从兰大调到科大来，如今也二十多年了。

1962年，顾雁的判决书下来了，他被判处十七年。被押送到青海服刑，在一家机床厂干活。他是物理学专业，算是有技术，就被安排到厂里的资料室，日常管理资料。因为管资料室的便利，他还看了不少书。

1970年左右，“一打三反”，情势十分紧张，那段时间常常有犯人被拉出去枪毙。好在当时劳改场的一位队长还算保他，最终，他安然度过这段最危险的时期。后来，因为在监狱里有技术发明，他被提前三年释放，释放后继续在厂里上班。

一直到1980年，他才等来彻底平反的判决书。

平反之后的他调到了兰州大学任教。1980年代，他的同班同学方励之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任副校长，那时就想让他调过去。还没来得及调，方励之因“86学潮”被撤职，调到北京天文台工作。一直到1991年，他才调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平反之后的三十多年间，他潜心投入自己心爱的物理学研究，很少再对政治发言。

平反前后，他曾见到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一次。“林昭的母亲死得很惨，后来流浪街头，就那样死了。她弟弟后来也到美国去了。”



2015年，他去兰州开会，又去了当年的劳改地西宁，那时位于西宁南山的锻压机厂，已经变成很高档的别墅区了。

1983年，顾雁第一次出国。那时还在兰州大学。他通过了对留学人员的英语考试，申请到了世界银行贷款的访问学者，第一次坐波音747飞机，实现了出国看看的愿望。

“那种冲击是太大了。在华盛顿，高速公路边，我不知道不能过去，后来冲了过去。因为国内没有高速公路，我还想，公路上怎么没有红绿灯。”

那次出国，他凭着扎实的功底和勤奋，很快就做出了学术报告，也发表了文章。一年访学结束后，对方挽留，劝他呆下来继续研究，但那时因为继续申请留下并不容易，加上妻子在国内，他还是回来了。

顾雁1980年结婚，那时他已经45岁了。妻子是导师徐躬耦先生的夫人给他介绍的。两人结婚时，太太也已经40岁，所以两人没要孩子。

妻子是这样的贤淑温婉，全心全意地照顾他，也照顾他饱经忧患的母亲。在经历了半生坎坷之后，这爱的温情，滋养和安慰了他。

1998年，顾雁的母亲去世，对他打击甚深。不久他就检查出癌症，幸运的是手术非常成功。2000年，退休年龄到了，科大想返聘他，他未应聘。一来是因为考虑到身体，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不想再受约束了，想独立地做研究。

终其一生，他还是性情耿介的知识分子。“如果继续留校，各种博士生研究生答辩，都是麻烦的事。人家请你去，你就不能认真，一认真就得罪人……”退休之后，他不用跟风，也不用再管文章是否能发表，可以“真正开始研究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了。”他的学术成就，在物理学界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他朴素的单元房里，书架上还贴着写了物理公式的纸条。桌上还放着用英文写的未完成的论文。“不管能不能发，一些问题还是要弄清楚。”在劫后余生的年代，在生命的暮年，他追逐不渝的，还是他



物理学研究的理想。

8

2017年7月，借着到陕西师范大学参加一个物理学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顾雁去了一趟天水。

高铁通了。从西安到天水，路程不过一小时四十分钟。

他的老朋友徐诚让学生来接他。徐诚当年和他一起在兰大被打成“右派”，又一起下放到天水劳动。当顾雁和张春元酝酿“星火”时，有意避开了这个“单纯、胆小”的老同学。徐诚虽然当时没有被卷入“星火”案，但在“文革”中，依然吃尽了苦头。

在水师范学院家属院一处简易的三居室里，他们终于又见面了。一生风雨，劫波历过，他们都是垂暮之年的人了。

他们说起往事，说起2017年3月才在水去世的李景沆老先生。李景沆是当年从夹边沟死里逃生回来的“右派”，是基督徒，一生布道。晚年时，他把在夹边沟受难以及一生的际遇，写成了《蒙恩的旅程》一书。李先生退休在水师范学院(原天水师专)，和徐诚的家相距几十米而已。

渐渐天色向晚。夕阳从窗外落下来，阳台上，一盆红色的月季轻轻摇晃在热风里。说着往事，偶尔，彼此的眼角都有泪光点点。

“说起来啊，我是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你是一直清清楚楚的。”徐诚对顾雁感叹说。

次日，顾雁到他当年教过书的天水市二中(当时的天水县一中)访旧。消息传开，来了不少他当年教过的学生，大多也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校长致辞欢迎他的光临，当年的学生也纷纷发言，回忆顾老师当年的风采。但他们对当年所做的一切，并不了解。人们小心地回避他后



来受到“打击”的事。

禁忌是显然易见的。不管是当年的老学生，还是如今的校方，都并不了解顾雁的过去。在现场的人中，并没有人知道“星火”的事。

“顾老师当年到底是出啥事了啊？”会后，一位学生问我。我告诉他《星火》的历史，他一脸惊讶的神情。他不久前刚从市政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休。

离开学校，顾雁去看望当年学校的教导主任。老人90多岁了，躺在床上，紧紧拉住顾雁的手。“1957年反右后，人的头都昏了。”

“那时不是你昏了。是毛泽东的头昏了。”有人在一旁插话着。



谭蝉雪：星火爱情，于斯飘零

江雪

2012年夏天最热的时候，78岁的谭蝉雪在上海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王中一。他是张春元生命最后时刻的狱友。王中一这些年一直在找她，就是为了转告她那句张春元留下的遗言：

“这一生，我最大的心愿，是不能陪谭蝉雪度过一生。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张春元是她的未婚夫，殁于1970年兰州寒冷的三月。他是1960年大饥荒时期甘肃地下杂志《星火》的灵魂人物。

这句话，是在甘肃省第一监狱，张春元临刑的前一天夜里，专门交代给王中一，拜托他将来有一天转达给谭蝉雪的。

相隔了四十二年的岁月，这句话才送到了她的耳边。

2015年的9月，当我来到上海，在广粤路的一个小区里找到谭蝉雪时，她给我讲起了这段故事。往事惊心动魄，她那曾被苦难摧残过的容颜，依然是平静安详的。

她对我说，接到王中一电话时，她心跳得非常厉害。她没有说，当她接完电话，在最快的时间内坐上火车，去常州寻找王中一，见面细问当年的情景时，她哭了。

1、纸条与“罪证”

1998年，民俗学家谭蝉雪从敦煌研究院退休，回到上海定居。



无限往事仿佛已经尘封，但她其实从未停止怀念。

从2004年开始，她着手准备写关于当年“星火案”的第一本书，《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

那段时间，她奔波在兰州、天水一带，去寻找当时的案卷，要把被尘封的往事写出来。她到处碰壁。后来还是以给兰州大学写校史的名义，一次次找法院，也给管档案的人说好话，送给人家从上海带来的礼物。终于，在一个下午，她走进了武山县法院保存案卷的地下室。她听到管档案的人说，前些年地下室曾漫进过水，但所幸案卷完好无损。

在发黄的案卷里，她看到了张春元写给她的一张张纸条。那是1960年7月，她离开下放劳动的甘肃天水，在广东开平越境被抓后，他心急如焚，南下来营救她时写的。

作为《星火》的灵魂人物，张春元一贯是胆大心细的。但那次，他显得有些鲁莽。在得知她在广东被抓后，他化名“高澄清”，拿着假的介绍信，来广东救她。但他的假介绍信引起了怀疑，一到广东，就被扣押了起来。他无法见到高墙内的谭蝉雪，就试着联系“内线”。他把看守所里的女医生当成了好人，一次次写了条子托送进来。

那些条子是这样的：“雪：七月半来此被关，已知我们为大学生，此处一切好，我现在单房三号一八，可给弟去信，由我来办。亲朋不可理，一切谣言不可信，安心等着，老实守法，千万给我一回信！告知近况，前次带来的衣物收到否，还缺何物……”

“雪：医生应允帮忙，我们感谢她那善良的愿望和好心；你一定要写几句话，请托医生交我，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收到了呢？坐牢我不怕，也不悲伤。而最愁人的是你近来怎么样了？身体如何，快给我来信！”

“雪：今天接见请求不允，近在咫尺似天涯，一墙之隔难相见，真没有办法！我给你写了二次字条，收到没有？望告，切切！”

他不知道，那些纸条，全被女医生交上去了。包括两三厘米宽的小纸条，后来都作为“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的证据，放在张春元的案卷里



了。一直到2006年，46年过去了，她才在查阅案卷时第一次看到它们。

看到这些发黄的，粘贴在案卷中的纸条，她仿佛看到他的心。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它依然是鲜活的、炽热的。

和这些纸条放在一起的，是“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的其它罪证。她 also 才知道，早在1960年的4月和5月，和他们一起下放到天水劳动的兰大“右派”学生中，就有人向当局告密了。

其中一份档案写到：“案件的线索来源：1960年4月，兰大右派分子陈友达向省公安厅反映：兰大下放在武山及天水等地劳动锻炼的右派分子张春元、谭蝉雪、孙和等人经常去兰州与学校右派互相来往，秘密交谈，散布反动言论，行动十分可疑。”

除了陈友达，另外还有两个告密者，是他们的同学郑连生和柴继德。有人告密，加上她当时回广东老家偷渡被抓，“星火”同仁就这样全面暴露了。

1960年9月，谭蝉雪和张春元分别被押上了从广州北上的火车。4天之后，到达兰州。他们被关进了关押省级要犯的兰州贡元巷看守所。从那以后，这对恋人再无说话的机会。

如今，在生命的晚年，她已回忆不起这一生和张春元的最后一面了。到底是哪一次呢？

她拼命地想。说，如果有最后一面，应该是1965年的冬天了。那是在天水体育场的“反革命集团案”公判大会上。但那天，他们都被五花大绑着。在台上，他们被分开得最远，一个在最东头，一个在最西头，她只看到一眼他模糊的身影。那天宣判，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她被判处十四年。

她记得，那天天奇冷，阴沉的厉害。会场上，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谭蝉雪”！她知道，那是她的狱友叶青，一个因和人打架被抓进来的奇女子。在那样肃杀的气氛中，石破天惊一般，叶青喊了一声，就迅速地逃跑了。全场皆惊，谭蝉雪看见武警端着枪冲下去了。



叶青是她晚年时一直在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的人。她晚年想找的人，还有在狱中时为她治疗急性胃炎，救了她一命的慈祥老者；还有一位曾试图帮助她，但很快被撤职的看守所所长。天寒地冻，长夜漫漫，在极端的绝望中，依然有一些带着人性温暖光芒的故事，安慰了她。

2、大饥荒中“右派贱民”的爱情

“阿姨，你和张春元当年是怎么谈恋爱的嘛。”每次见面，我都会问她。她呢，静静摇摇头，微笑着：“那个时候，谈什么呀。”

其实，他们在兰州大学时并不相识。他在历史系，她在中文系。在校园里，她是光彩照人的。在“反右”前夕，校园里“裴多菲俱乐部”带来的热切讨论中，有她活跃的身影。她一度曾有“兰大林希翎”的美称。

1957年初夏，风云突变。从“鸣放”到“反右”，不过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莫名其妙的，她也成了“右派”。主要罪状有二。一个是她曾写过的文章《爱情自私论》；一个是在回广西老家奔父丧时，听老百姓们议论：“国民党贪钱，共产党贪功”。在“鸣放”时，她把这个问题转述了出来。

1958年8月，经过一年多漫长的等待，她和兰州大学的另外四十一个右派师生，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劳动。

张春元因为在上兰州大学之前，曾上过朝鲜战场，是汽车兵，所以被安排在北道埠（现为麦积区）的马跑泉拖拉机站。她则被下放到北道的甘泉公社，临时住在当地街道上的一座天主教堂里——至今，天主教堂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房屋了。

和谭蝉雪一起下放到甘泉公社的还有三个同学。其中一位是孙自筠，兰大中文系的才子。另外两个人，是数学系的周善有和丁恒武。

丁恒武是陕西人，大个子。1959年，他被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开始在附近的水库学游泳，说要从渭公河偷渡出去，“留在这里迟早也是



饿死”。有一天，他来向谭蝉雪告别，说他要走了，如果能活下来，一定回来找他们。如果再没回来，就说明他死了。从那以后至今，人们再没有见过他。

孙自筠还活着。2016年的冬天，我在四川的内江师范学院见到他。他80岁了，对我回忆起谭蝉雪等人，以及“兰大反右”、大饥荒、1958年的“大跃进”，还有公社让他们四个大学生三四天就办出一个“农业大学”的荒诞事。

早在张春元、顾雁他们酝酿办《星火》之前，孙自筠就给中共的《红旗》杂志写信，反映当时农村开始饥荒弥漫的真实情况。但因为他是唯一的党员，有“红顶子”，谭蝉雪和其他同学那时都防着他。直到有一天，他被以“反革命”抓走。

那是1959年的春天，大饥荒已开始弥漫。谭蝉雪每次去食堂打饭，端回来一盆面糊，清得能当镜子，照见自己的面容。

她记得，有一次上山打柴，积雪很厚，他们从山上滑下来，看见一堆人围着一个人，在卖包子。当时那种白面的包子，真是稀罕，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多少钱一个呢？大约等于现在的十块钱。“我们没有钱。看一看就背着柴走了。第二天，就听到人说，从那包子吃出了人的指甲。”

不断有饿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息传出来。谭蝉雪住的一户老乡家，房东老大爷也死了。饿死的。在一天夜里，她听到那一家人凄惨的嚎啕声。

2015年9月，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谭蝉雪时，我告诉她，我的爷爷张如林，1960年时48岁，也是饿死的。我爷爷所在的马跑泉公社（现为镇），离她那时居住的甘泉公社（现为镇），相距也就十多里路。

“那时走在路上，经常就看到饿死的人。你没法无动于衷。”谭蝉雪说。

而事实上，他们作为大学生，条件还是比普通农民好很多。她虽然



和家里没联系，但定期的，有亲友寄粮票来。孙自筠的妈妈省吃俭用，从天津寄粮票给他们。有时，他们会相约去北道的铁路食堂吃一顿。虽然饥荒弥漫，但铁路食堂还是有各种吃的。

环境困厄得让人绝望。但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大家曾以为美丽的谭蝉雪和英俊的孙自筠是一对儿，但其实，她喜欢的是张春元。

张春元那时住在马跑泉拖拉机站，和甘泉相距不到二十里路。马跑泉是一个大镇子，拖拉机站所处的地方算是一个交通要道，上下都要经过，右派同学们也时时来这里歇脚。如今，这里已并入了麦积区广济医院的后院，是医院的太平间所在了。

当年那里是土崖畔下的一个大院子。顾雁记得，当时的张春元，负责管理着全县唯一的一台从意大利进口的拖拉机。红色的，锃亮，看上去挺神气。

张春元留她吃饭。那时候大家都饿着，但他的生活条件还可以。因为他曾上过朝鲜战场，当地的干部，很多都是部队转业的，对他不错。

爱情是怎么产生的不知道，她也始终没有告诉我。

但在我的寻访中，顾雁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张春元一起去甘泉拉煤，他们坐在拖拉机上。天很冷，一说话就呵出白气。张春元告诉他，自己喜欢谭蝉雪。

他们彼此相爱了。在1959年，那个大饥荒正在越来越惨烈的冬天。从此，他住在她的心里，整整一生。

3、亲人，以及无法树立的墓碑

2016年冬天，我在河南见到张春元唯一的亲人——他的弟弟张春沛。

张春沛说，那一年，大嫂谭蝉雪回来，他去机场接的她。“大嫂老了，似乎人都缩小了。”这中间，隔着多么漫长又沉重的岁月啊。1998



年的谭蝉雪，已不再是1960年初和哥哥一起回到河南老家的那个高挑、美丽的大嫂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他环抱着大嫂——一个瘦弱的老人。说：“我带你好好转转吧。”

无处去凭吊。她一直想着给张春元立个碑，取一些兰州红山根下、他被杀害的地方的土，建个坟。但弟媳反对，弟弟张春沛也做不了主。人死了四十多年了，可恐惧还在。我采访时，张春沛回忆起哥哥，不停地流泪，还是无限的怀念。但说起当年因哥哥的案子，一家人受到牵连。他说：我让我的孩子们都入党。

很多年，他一直想证明，自己是好人，“对党是忠诚的”。对哥哥，他是那么爱他。但他至今还是很难理解，哥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017年10月，我在上海，辗转找到了顾雁家位于浦东乡下黑桥的老房子。那是顾雁从小生活，并度过了1960年9月“星火案”爆发前那段平静日子的地方。

在周围的一片高楼映衬中，这座位于河流和田野中间的老宅第，已无可避免地衰败了。是一处江南常见的传统庭院，已被拆掉了半边，但从精雕细镂的门窗，依稀能看到往日的典雅。我去的时候，院子里的一株桔树，正恣意地结满金色的橘子。

1960年，在第一期《星火》印出来后，顾雁就以回家看病的理由，离开了甘肃天水，回到上海，就住在这里。也是那次回来，他开始和林昭交往。大约是1960年初夏的那段时间，张春元和谭蝉雪也来了，并在这里短暂地住过几天。

几天后，谭蝉雪去了广东，打算偷渡出境。不久后，张春元再次来到上海，告知顾雁，他也要去广东。据顾雁讲，也是这次，他因为和张春元对“偷渡”这事看法不同，有点不欢而散。再过了一段时间，谭蝉



雪在广东被抓，张春元南下营救，也被抓。至此，“星火”同仁全部暴露。

1960年9月，在甘肃天水，“星火”的参与者、兰大右派学生向承鉴、苗庆久等人被捕。10月，顾雁在上海被抓，林昭也随即被逮捕。林昭被捕的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发表的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她因此也被当作“星火案”的当事人。

在甘肃那边，被抓捕的除了兰大的“右派”大学生，还有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以及当地的一些干部和农民。这起当年轰动一时的“反革命集团”案，直接原因是张春元、顾雁挑头办起的《星火》杂志。第一期只有内部的三十多人看到。第二期才在酝酿之中。

1962年和1965年，“星火案”当事人被分别判刑。其中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谭蝉雪被判处十四年。顾雁被判处十七年。另外还有向承鉴、苗庆久、杜映华等人，包括当地的一些农民，共逮捕了43人，判刑25人。

因“星火案”被判刑的人中，还有林昭。事实上，林昭其实并未参与“星火”本身，只是因为她的诗曾被印在《星火》上。而谭蝉雪，其实也并未直接参与“星火”……

1970年的“一打三反”，大规模的杀戮又开始了。这次，张春元没有逃过劫难。他和杜映华在兰州被枪杀于红山根下。

“张春元在星火中间是一个什么角色？”我问谭蝉雪。

“他是说干就干，特别有行动力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对当时的现实，头脑里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出路是什么，也很清楚。

他认为出路应该是以南共纲领草案为主。他那时说要起个名称出来，让老百姓也能接受，通俗些，不要太奥妙……”

“当时为什么起名叫星火呢？”

“那是顾雁提出来的，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

事实上，当张春元、顾雁他们把思考变成行动，着手办“星火”时，



谭蝉雪已经离开了甘肃。当第一期“星火”面世时，她看都没看到。一直是在四十多年后，她才在武山县法院的档案里，看到了那些凝聚和承载了那个时代最前沿、最勇敢、最深刻思想的文字。

5、“不写下来，历史无法交代”

2007年，谭蝉雪完成了对《星火》的第一部文字记录《求索》。2015年，我见到她时，她正在准备给张春元写传，以纪念他罹难45周年。

爱情，在她心中，不仅是一辈子的承诺，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我做这些，不只是为了张春元。星火这段事不弄出来，历史没法交代。”她说。

2017年，依娃帮她联系了明镜出版集团，出版了《星火》电子版。除了她原来那本书的内容，也包含了张春元的生平，以及他生前的一些文章。依娃很早就去了美国，她的母亲是天水人，父亲是陕西人。因为一份对故土的情怀，她曾多次到甘肃天水一带，做大饥荒年代的口述史。

在这本书的末尾，谭蝉雪写到：“有一种思念因你而存在，有一种沉默不是遗忘。”对她来说，这是很少有的文字中的感情流露。

“在他还没被处决之前，我做梦梦见他穿一个军大衣，走过去了。别人说，梦见穿大衣，可能是大难。大衣就是大难。”她禁不住我追问她和张春元的故事，慢慢浸入回忆。

她想起来，当他们同时被关在一所监狱时，有时，放风上厕所时，经过他的窗户底下，她能听到他的声音。那是他故意大声和别人说话，让她知道。到后来，他被转走了，声音就再也听不到了。

她记得是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有一天，抬饭的人来了，悄悄对她说，张春元从别的地方转到这儿来了。再去打饭时，她对那个人说：“你告诉他，他永远活在我心上。”但后来她才知道，消息有误，张春元并没有转到这所监狱来。她的话，还是没有送到他耳边。



1970年3月，他死了。可她连眼泪都不敢流。每天进进出出，杀人的布告就专门贴在她路过的地方，天天出门都能看见，躲也躲不过。半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本乌黑的头发，一大半都突然变白了。

1973年，谭蝉雪在酒泉坐满了十四年的牢，出狱了。此时，在老家广西，她的父亲已死，唯一的哥哥也已不在人世。她无处可去，只能接受“组织”安置，到酒泉的工厂上班。

不久，她结了婚，丈夫是支边的上海人，也是工厂里的“刺头”，算是有前科的。1974年，在四十岁这一年，她生下了唯一的女儿辛琪。

她对我说，那时她不想找知识分子，就想找个文化程度不高，受过处理的，“门当户对”。厂里填表时，在“文化程度”一栏，她填了个“小学”。心里想的是：如果不识字该多好啊。在这个国家，读书认字，做知识分子，只意味着苦难。

可她终归是读书人。在最苦难的日子过去之后，她先是从工厂调到酒泉师范，后来又调到敦煌研究院，做敦煌风俗学的研究，从1982年到1998年退休，十多年间，成就斐然，书出了厚厚的几大册。

2015年9月，我去上海第一次找她时，那些书就静静地立在书架上。

6、“该干的已经干了”

“想起这一生，会有后悔吗？”2017年，秋雨如注的十月。在上海，我问谭蝉雪。

“不后悔。我觉得起码我们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当地的农民。虽然现在想起来，那时思想上的认识，还是很不成熟。”她说。

彼时，我们是在距离她家不远的一所老人的日托机构里。近两年，女儿辛琪要上班，担心她白天一个人在家，就送她到这里，晚上再接她回家。



她一头银发，穿一件蓝底花色的毛衣。面庞依然是娟秀的，皮肤细腻白皙，除了额头眼角有一两片老人斑，走路背稍微有一点点弯之外，她的精神头好极了。

我们说着话，背后是鲜艳的墙。在这里，孩子和老人的托管中心连在一起，空间里有一种明快甜美的气息。我请她再讲讲，讲讲林昭，讲讲张春元，讲讲1959年在大饥荒中的甘肃天水，她的爱情是如何萌生的。讲讲1970年，她在监狱里听到张春元死了的消息，头发如何就白了一大半，从此知道，“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不是虚构的故事。

我们也说起那本厚厚的《林昭文集》。那是她这几年和林昭当年的闺蜜倪竞雄整理出来的。倪竞雄年龄比她还大，不会用电脑，身体也不好。所以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大多都是谭蝉雪一字一字整理下来。包括林昭在狱中的小说、颇有争议的《冥婚记》，也是她整理出来的。

“字非常小，眼睛都看坏了。也多亏有很多朋友帮忙。”她说。

“星火前辈当年对时局的批判那样激烈而深刻。那您怎么看待今天呢？”我问她。

“我估计我真看不到（我们那时追求的）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到2020年，或许还能看看，能否如愿以偿，还是很难说。”她说。依然是淡淡的笑容。

“我该干的已经干了。《林昭文集》出来了，关于星火，也一本两本也都出来了。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也可以告慰张春元。就算我去阴间见了，他，也可以有个交代了。”她说。

“就是给依娃带来了一些麻烦。”她有些抱歉。

“没事，年轻一代也应该做他们应该的。”我对她说。是为自己说，也是在替依娃说。

她说的麻烦，是指2016年，美国的“刘宾雁良知奖”评选委员会给她颁发了当年的“刘宾雁良知写作奖”。奖金她辗转拿到了，奖杯的故事则充满离奇色彩。



她年纪大了，没法出国去领奖。又担心各种“被敏感”，朋友把奖杯捎给了在西安的妹妹。本想着辛琪找机会来西安时，把奖杯带回家交给母亲。结果，人还没到，警察上门了，从妹妹家搜走了奖杯。一直到她离世，这个“刘宾雁良知写作奖”的奖杯，也没有到谭蝉雪的手里。

7、在她生命的最后，无所不在的奇怪氛围

其实，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一直感受着这种奇怪的氛围。这一切，常常让她想起六十年前的那场“反右”，想起生命中曾经历过的那些往事。

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会”，香港方面邀请她。她被阻拦，最终没有去成。

2013年，独立导演胡杰拍摄完成了纪录片《星火》，她去了香港参加放映。回来后，居委会的人就找上门来了。问她为什么去香港？她反问：我没有人身自由？对方打哈哈，哪里哪里，只希望以后你出门能说一声。

前两年，她整理好了《林昭文集》。有一天，约好了人，正要出门去印，居委会主任上门来了，说，正在外面请人吃饭，上头电话来，只好来问。要求她不能出门，也不能再去印书。“你年龄这么大了，就交给年轻人去做吧。”主任这样劝她。

《林昭文集》至今无法出版。她说，是因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不同意。但她还是把书印了出来，送给那些关心林昭、关心历史的年轻人。那是厚厚的一大本手稿，简易地钉在一起，有488页。第一次见面时，她送给了我一本。

2015年夏天，她腰骨骨折，还戴着腰托，就开始在电脑上写作《张春元传》，要作为他罹难四十五周年的纪念。

2016年4月，我打电话给她，才知道，她已写好了，热情的王中



一表示愿意承担印刷工作，在常州当地找了印刷厂，已经开始印刷了。但某一日，当地的文化稽查大队突然来查，说是非法出版，把已印好的五百本书全部没收了。不久，处理结果下来，印刷厂被罚款五万元，她自己则损失了八千元的印刷费。

到了2017年，她身边的气氛，似乎越来越紧张了。大约和她获得“刘宾雁良知写作奖”有关。有时女儿去取快递，也会被询问。十月，我最后一次访问完她后，从上海回来，就接到辛琪的电话，说有人在调查，那天是谁去了社区托管中心访问谭蝉雪。

“请不要再给我妈妈打电话了，也不要再联系她了吧。”辛琪说。

我后悔，没有再坚持。就这样，我错过了再次和她说话、再次见到她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她生前得到的那个“良知写作奖”的奖杯，如今躺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里。而扣押这个奖杯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2018年6月1日，因突发脑溢血，谭蝉雪在上海去世。从出现症状到离开人世，只有短短半天。

在母亲“七七”的那天，悲伤的辛琪请人为母亲做了佛教的超度法事。她相信母亲已经身在天国，或者是极乐世界。

我也相信。不管人世的坎坷如何，不管别人的评价如何。谭蝉雪在这一生，做了她想做的事情。

我也记起，她说过她早年的学生生涯。1949年，在广西，她看到解放军进城，听说以后上学不要钱而欢天喜地。她说，那时她很“革命”，是学校的积极分子，上了广西革命大学，下乡宣传，演白毛女。

“那时非常年轻，稀里糊涂，没有自己的观念。一直到1955年考上兰州大学，学校里有裴多菲俱乐部，在年轻人热烈的讨论中，思想才开始发生变化。”她说。

当年受张春元之托，托给她捎口信的王中一，如今也七十多岁了。很多年，他一直在找谭蝉雪。费劲周折，没有结果。直到2012年的一



天，他在书店里翻书，看到关于敦煌的一套丛书，偶然看到谭蝉雪的名字，这才终于联系到她。

而我，当记者多年，一直在关注外面的世界，一直到2015年，才知道《星火》，才知道《星火》就诞生在我的家乡——甘肃天水，张春元他们当年就在我家乡的镇子上生活、思考，最终走上为自由、为真理献身的道路。

当我要寻找谭蝉雪时，是在香港的记者张洁平，告诉了我她的电话。

在拨通她电话的刹那，我，一个后辈，终于和我家乡那段苦难的历史取得了联系。

历史就这样在人为的屏蔽中支离破碎着，也奇妙而又吃力地黏连着。那些思想史上的苦难往事，人们追求自由、并付出高昂代价的历史篇章，原本应有更大的篇幅书写。如今，却只能残存在一些片段里。

到今天，星火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知。胡杰导演的纪录片《星火》，在内地依然是被屏蔽的。而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在最黑暗的年代，一些最勇敢的人，是如何去试图“活在真实中”，并付出了怎样贵重的代价。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她时，她把我和朋友翟明磊送到楼梯口，又坚持要送下楼。为了老人们方便，托管中心的楼梯上安装了可以自动下行的座椅。她坐上去，男护士帮她把腰带系紧，她就慢慢地顺着扶梯向下滑落。她的面容，是那样恬淡从容。我沿楼梯走着，回头看她，觉得她还很美。

告别时，外面下着雨，我不让她出来，转头拥抱她，说：我会再来看您的。就匆匆打车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未曾见到她。2018年6月，在张春元被杀害的四十八年之后，她“星火”一般灿烂的爱情与生命，就此凋零。



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江雪

3月初的南方，天还冷，夜里有雨，清早积水成片。向承鉴穿一件黑大衣，背着手，走过湖边。“这里都是桂花树，香着哪！”仿佛只有此刻，那苍凉的声音才有了一丝欢悦，银发也愉快地颤动了。

桂花的香，能让他隐约找到一些童年的气味，仿佛故乡还在。而其实，故乡早已沉入水底，那是1965年大修水库时的事了。那年，他27岁，因为“星火”案，正在千里之外的青海高原，熬炼于十八年囚徒岁月。

2010年，向承鉴72岁了，才从兰州回到这座江西小城。县城早已迁址重建。他倾囊买下湖边的一套房子，自己看着装修了，安顿下来。妻子总是抱怨，说这里菜太贵，冬天又没暖气，不如兰州。他却喜欢这里的静，还有房前屋后的桂花。

九死一生，晚年能得一片安宁，他很满足，又不满足。他拒绝老伴们的建议，“少回忆，多养生锻炼”。绞尽脑汁，他还在追问那些纠缠了他一生的噩梦，以及噩梦的根源。关于自己，关于这个国家。

一本《炼狱归魂》的自传，37万字，1998年从中学退休后就开始动笔，十年前已完成。一笔一笔，蝇头小楷，用中学的大开作文纸，写了将近900页。妻子一字字帮他打印出来。当然是无法出版。

2014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书《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并在香港出版。书出来之前，不知怎么，惊动了相关部门。兰州方面来了三个人，包括当地一位官员。他们来武宁登门拜访。未见面前，先去



找了他的哥哥、弟弟，一生为他饱受惊吓的亲人，如今垂垂老矣，再次为他胆战心惊。

来人接连三天登门。坐沙发上，为他倒茶、点烟，但语气很硬，就是希望他不要出这本书。无奈，他联系出版社，但人家答复书已付印了，要履行合同，不能毁约。对方无奈，最终悻悻离去。

那之后，他和外界联系更少了。“我这一生，连累了很多。再也不想给亲友带来麻烦了。”他说。

好在还有互联网。他78岁了，睡眠少，每天清早六七点就起来上网。阳台改装的小书房里，先浏览新闻。偶而看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围棋，以及各种球类，都是他喜欢的。也会看看股票，很多年，他用两万元炒股，“为了验证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看法。”还有点收获。

夜里，一般都是读书，偶尔陪老伴儿看看电视剧。至于《新闻联播》，是极少看的。

他向北方来的晚辈回忆起过去。深深地叹气，抱着银发的头，靠向沙发。“老天爷！”在苦痛的记忆中忍不住喊出声来。又说起1960年的那个二月，饥饿的早春，太阳仿佛被寒霜冻住了的清晨。甘肃天水武山县，一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黑乎乎的小脸，就那样蜷缩在他的脚下……目光沉入往事，那揪心的痛，再次攫住了他。

1

1959年，大饥荒已席卷中国。那年向承鉴21岁，已戴上“右派”帽子三年。

“我这一生，受够了罪，要说享过点福，就是刚上大学的第一年。”他忆起1956年初入兰州大学的日子，那时，他意气风发，恰如刚“改天换地”后的这个国家。

他是苦孩子出身，也是“新中国”的红色少年，对共产党，“那是磕



头作揖都表达不了的爱。”

1938年，他出生在河南。才到人世不久，就遭逢河南大饥荒。兵荒马乱，父亲携一家老幼逃难到江西九江，流落在武宁城里。父亲当脚夫，母亲和祖母纺纱织布，日夜操劳，生活仍然艰难。

1949年了，穷人突然成了新政权最信任的人。他家“根正苗红”，姐姐参了军，他学习好，门门功课拔尖，成了县里的第一批少先队大队长。上了中学，老师动员他入青年团，他自我检省：“我还不够格，需要继续努力。”

1956年，他考入兰州大学。兰大是当时全国五所理科重点大学之一，与北大、清华等比肩，又位处大西北，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有国家战略的意味。

他报了化学系，“重点大学的重点系”，系主任是左宗祀女士，和丈夫陈时伟（当时的兰大副校长）一起，1949年后从美国双双归来，是备受尊敬的科学家。“系里有七八位正教授，师资很强，我那时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他说。

红色中国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与此同时，从1949年开始，各种政治运动也让人目不暇接。“肃反”、“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不断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掀起革命”。而向承鉴，因尚没离开过校园，对政治运动还没有感受。“身心都如一张白纸。”

大学一年级，他最深的印象是校园里的伙食“好得不得了”。大学食堂里竟然还吃到过老母鸡。他家穷，此时一个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补贴，心满意足，一心读书。兰大学习气氛浓，学校也要求严格，“两科不及格就要退学”，学生们学习劲头十足，实验室夜夜灯火通明。校领导甚至不得不劝同学们多休息，“身板好才能报效祖国。”

那场风暴，是在1957年5月渐渐浮现的。“五一”节前后，学校党委突然宣布“整风”，号召鸣放，每个人都要给党提意见。

“我再三想，绞尽脑汁，结论是，我对党没意见。”向承鉴说。但这



可不行。学生会、系支部等，多次举办点心会、茶话会，请大家座谈，给党提意见。他没去参加，因为实在提不出意见。结果被批评，“提不出意见，说明对党没感情。”

最终，还是学校党委再三的动员起到了作用。5月下旬，有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兰大“鸣放”的第一张大字报。

今年78岁的屈剑英，是兰大第一张大字报的执笔者，他是兰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大家响应党委号召，写大字报表达意见。我们几个同学商量的内容，主要是表达对学校管理的一些不满。由我执笔，写了两页。”2015年12月，屈剑英对雪访（编注：雪访为作者江雪の公众号）回忆起那个贴大字报的夜晚。他的同班同学、后来的“星火”创办者张春元也在其中。

一夜之间，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党委的鼓励下，高年级的同学纷纷加入“鸣放”，“他们年龄大一些，经历的事情多一些，也能提出意见。”但在向承鉴的记忆中，学生的大字报没有什么“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最多就是批评学校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很多同学对兰大招生中的“吹牛”不满，认为学校的设施等和重点大学还有距离，于是出现“并校”呼声，要求把兰大并到北大等其它几所大学去。

在向承鉴的记忆里，当“鸣放”越来越热烈，学校和上级却不出面回应，学生的情绪逐渐高涨。5月底，兰大组成了“赴京代表团”，由副校长陈时伟带队，屈剑英是历史系的学生代表。2015年12月，他告诉雪访，“赴京代表团”当时在西安停留，见到了国家高教部的副部长刘凯丰。其时，刘正在西安处理西安交大学生的“鸣放”诉求，在西安人民大厦，屈剑英是与刘辩论的学生代表。

此时，在全国，知识界的“鸣放”也进行得轰轰烈烈，而政治风向比天气变得还快。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是为什么》的著名社论，“整风鸣放”一下子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

几天后，甘肃日报以通栏大标题，整版刊发《兰大陈时伟的右派反



党罪行》，陈时伟成了甘肃省第一个“大右派”。兰大校园里的各级“鸣放委员会”一夜变成了“反右委员会”。

向承鉴成了化学系一年级小班的“右派”。他并不是鸣放中的“积极分子”，鸣放开始后，他周末仍旧去图书馆看书。之后，他“莫名其妙”被班里同学选为“鸣放委员会委员”，就组织同学，整理出自己一份唯一的“大字报”，标题是“某某教授访问记”，讲述了兰大一位教授在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遭遇。

除了赞成储安平“教授治校”之外，他的另一个罪名是“仇恨共产党”，因为他看了一张别人写的大字报，骂了句“该死”，被人举报说“要杀死共产党员”。

1957年7月，在副校长陈时伟的批斗会之后，兰大公布了首批“划右”学生名单，共二十多人，向承鉴也在其中。生活补贴停了，吃饭都成了困难，在冷眼和歧视中，他和其他的右派同学，只能去校外建筑工地上干活，来换一点饭吃。“我那么爱党，怎么突然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人？”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号召检举揭发、“痛打阶级敌人，捍卫党和毛主席”的气氛中，同学之间的友爱也不见了。从暑假前到新学期，批斗会开了一茬又一茬，19岁的向承鉴，成了兰大最年轻的“右派”，而且“气焰最嚣张”、“最顽固”。因为生性倔强的他，始终不低头认罪，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被“群众处理意见”定为“极右”。

屈剑英也被定为“极右”，开除学籍，立即送往兰州沙坪劳教。向承鉴不服，在最后时刻他找到了校长林迪生申辩。最终，他被降格处理，和另外四十名左右师生，包括此后的“星火”同仁——中文系的谭蝉雪、历史系的张春元等人一起下放天水，“保留学籍，劳动考察”。

这成了他命运的另一个分水岭。

五十多年后，他回望那一年，说，那也是他思想转变的分水岭。“反右”前那个“相信党的一切宣传”、从没有试着去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内心



深处，“一个迷信被摧毁了。今后，遇到任何事，都会去问个为什么？”

2

1958年7月，向承鉴等一行四十多人，离开兰大，坐火车到天水。到天水后，他们被分成了两部分，向承鉴、苗庆久等人到武山县，张春元、谭蝉雪等同学被派到北道区(当时为天水县)的马跑泉公社等地。

向承鉴被派往武山县城关的联丰公社，住在村支书家里，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被要求，“老老实实劳动，老老实实做人，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反右之后，一切反对的声音没有了。毛泽东真正成了一言九鼎。”他说。从1958年8月下旬开始，在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也席卷了联丰社。

联丰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间突然成立的。向承鉴被派去布置公共食堂，刷写大型标语。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中，人们喜气洋洋，遵循毛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家家户户撤掉锅灶，到食堂吃饭。到处是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

人民公社开始不到一年，大饥荒席卷中国。在这场人为的大灾难中，数千万人丧生。在张仲良主政的甘肃，死亡惨重。在通渭一县，死亡人数就占全县三分之一(据杨继绳《墓碑》)。2009年，《通渭县志》副主编张大发依据相关档案资料，出版了一本关于通渭大饥荒的书，书名就叫《金桥路漫》。

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来就是“大跃进”狂潮。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向承鉴所在的武山县是全国闻名的红旗县，也不断放出“大卫星”，著名的是“玉米亩产万斤”和“白杨树上结苹果”。

向承鉴耳闻目睹了谎言包裹下的荒诞。“玉米亩产万斤”的卫星，



在验收的时候，当地找来一批可靠劳力，挑灯夜战，把其它十多亩地里的玉米连根拔出，密密麻麻栽到“卫星田”里，密不透风，再放水把地浸湿，就看不出痕迹了。技术员跳到地里，数玉米棒和玉米棵数，算出来，远超过万斤。于是敲锣打鼓庆贺，干部们再去食堂大吃一顿，卫星算是放上天了。

随之而来的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因为都去吃食堂，农家的铁锅、铁铲暂时派不上用场，为完成大炼钢铁的指标，干部挨家挨户，把农民的铁锅摔碎，连农民箱柜上的锁头、锁扣都拆走了……

灾难的来临是有征兆的。在1958年这个疯狂的八月，受命去研制“高炉”的向承鉴，看到乡间山路上全是背矿石的人流，男女老幼，情绪高亢，唱着山歌。他在一瞥间，发现路边地里的庄稼已焦黄，麦粒全掉在地上，大炼钢铁的高潮淹没了往年夏天的“龙口夺食”，他心里掠过不祥的念头：来年日子怎么过？农民吃什么？

3

1960年的早春，记忆中最寒冷的二月。向承鉴永远记得那一天。

天冷得仿佛连太阳都冻住了，发出青色的光。路边的麦苗，还低低的，刚没过人的脚腕。他离开工厂，去附近的一个公社办事。正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地里干活的农民都停下来，呆呆地看着他。他莫名其妙，低头平整衣服时，一眼看到了那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

孩子大约有十一二岁的样子，“穿一件破烂的夹衣，蜷缩着。手伸在嘴边，嘴角挂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土坷垃，还是土豆……”

那一刻，他只是默默地站着，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妹妹，也就这么大……远处有人看着他，他无法大声哭喊，只得忍住心痛，走过一个大坡，转弯到无人的地方，才捶胸顿足，放声大哭。



“那一刻，我太痛恨自己了。为什么这样无能，甚至连记录下来的能力都没有。”他曾经在校报做记者。这时候，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相机，“为历史留下一个证据”。

在他的记忆中，从1958年冬天开始，在水一一带，农民就开始挨饿了。1959年春天，他因眼疾回了趟兰大，在兰州街上，满是沿街乞讨的农民，饭馆里供应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乞讨的人到处伸出干瘪的手臂。

在武山，他看到的，是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人们没有目标，只知道向西逃去，去新疆，至少，那里能够活命。

1959年夏天，饥荒疯狂蔓延。在武山县，渭河河川一带的杜家垅、百泉一带，原来很富庶的地方，也没有粮食了。正在灌浆的包谷地里，生产队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在当地的邓家堡，有社员因为偷挖土豆，用铁锨打死了看守的人。

在火车站一带，常常能看到饥民的尸体。向承鉴每进一次城，身上不多的粮票和钱都给了出去。

这年，他21岁。他一次次拿起笔，“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

“我想，党中央和毛主席可能不知道农村发生的事情。要是知道，能让这么多人饿死吗？”可信写好了，又一次次撕掉。“你本身是右派，被管制的对象，人家领导明明说形势大好，你却说这里饿死人，这不是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吗？”他煎熬着，痛苦不堪。

饥民遍野，“大跃进”的鼓点却越擂越响，上级要求“社办工业，遍地开花”，向承鉴和他的同学，先被调去筹备化工厂，后来又被调到盐井公社办厂。1959年9月，他有机会去北京出差买菌种，这次，他特意在铁路沿线的水甘谷、山西太原、石家庄、天津等地下车，为的是验证内心的疑问，也做一点社会调查。

而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到处是逃难的农民。在太原，他和已参加工作的哥哥发生了争执。哥哥指着城市里新建的高楼，说：“你为什么



就看不到新中国的这些伟大成就呢？”

返校此时也变得遥遥无期。和向承鉴一起下放的兰大同学，如谭蝉雪等人，都曾返回学校质问，但校方只是推脱。“那时，每天去食堂打回一盆清汤，就是我们四个人的伙食，能照出人影。”2016年，时已82岁的谭蝉雪告诉雪访。那时，她和孙自筠等另外三位同学，在北道区甘泉公社劳动，与武山县相距大约六七十公里。

向承鉴一开始也吃不饱。但之后，当地的“头头”要利用大学生为自己干出政绩，把他们调去办厂，武山县委给了他们“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每月供应一斤清油，口粮三十斤，全是细粮。当时的普通干部的标准是：清油四两，口粮二十六斤，百分之六十是杂粮。

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相比，这简直是天上了。

饥荒越来越严重，撒谎成风与毫无人性的掠夺仍在继续。1959年，在武山新寺公社召开的一次全县粮食现场会上，公社不但“超额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留足社员的口粮、种子和饲料外，还有堆积如山的余粮”。可向承鉴从杜映华（曾任漳县县委副书记，时任武山县委常委、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因支持“星火”同学而被捕，1970年被枪杀）处了解到：那个现场会议上，成山的粮食，除了表面，麻袋里装的全是麦草……

人们在饿死。而盐井公社，却调集了脱产干部，到农村大规模收缴粮食。因为“高产”的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而农民却喊挨饿，“上头怀疑农民私藏粮食，全面收缴。家家户户，火炕刨开了，连枕头都撕开了，房前屋后，猪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

“到处是饿死的人。有的村子饿死的人没人埋，也没人挖得动墓穴，就动员中学生埋死人，埋一个可以得到四两粮的补贴。在一些家里，人死光了，都没得埋……”

五十多年后的这个夜晚，向承鉴对雪访回忆起这一切，还忍不住痛苦地叹息：太惨了啊，农民太惨了！78岁的老人，眼角隐隐有泪光渗出。



4

1959年11月，也一同下放天水的中文系同学孙自筠在天水北道被抓，消息随即传到了武山。

孙自筠是在给《红旗》杂志寄出信的一个多月后被抓的，当时他还正在田间干活。“我那时丝毫不知道其他同学的想法。只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看到的真相反映出去。”2015年11月，孙自筠对雪访说。

他那时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被抓，导致了星火同仁们对当局幻想的破灭。

“这时庐山会议已开过了，彭德怀上万言书，已被打倒。孙自筠被抓，让我们知道，必须放弃幻想了，要救苦难的农民，必须寻找另外的出路。”向承鉴说。

此时，在几十公里之外的马跑泉公社，张春元等已经开始行动了。据谭蝉雪回忆，1959年5月，张春元和她，还有顾雁、孙和等人就在马跑泉公社的拖拉机站碰头，一起商量在当下的情况下该怎么做，这是他们第一次讨论到要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到11月，他们又在北道的一个旅社，商量确定了办一份杂志，来传递思想，把党内外有相同思想的人凝聚在一起，为苦难的中国寻找出路。

这之后，谭蝉雪到武山来看望苗庆久，和向承鉴他们深谈，交流了办《星火》的想法。

年轻的心灵心心相印，他们决定立即就干。谭蝉雪他们之前已经开始组稿，并和北大的林昭取得联系。这次她拿来了几份稿子，包括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一日》。另外，就是顾雁撰写的发刊词《抛掉幻想 准备战斗》，张春元写的《论人民公社》等。

因为缺一篇核心文字，向承鉴又写了两篇。“都是一口气写完。”他回忆。其中一篇是政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另一篇是《自白》。

那是在秘密的黑夜里。砖瓦厂原来遗留下来一个旧的油印机，小小



的，也就一尺宽左右。房间里因为培养菌肥，平时不让人进来，所以是一个天然的秘密场所。11月，深夜已经很冷，他们拉上窗帘，在如豆的灯光下，开始刻印《星火》。

刊头上两个火炬，是苗庆久刻的。在“星火”两个字在中间，一边一个。发刊词是顾雁写的，题目是《放弃幻想 准备战斗》。另外几篇文章，包括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还有一篇《论粮食问题》。另有一篇，是胡晓愚写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赫鲁晓夫》。

那是极端黑暗的夜。向承鉴和苗庆久，在密室里，一点点刻出心目中光明的轮廓。向承鉴对雪访回忆，其中《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文，边写边刻。第一期《星火》，仅仅薄薄的两页。刻印了共三十份，之后，“文章交给苗庆久保存，放在一个罐子里。”

印出来的《星火》，被他们以极秘密的方式，送了大部分出去。

那是石破天惊的文字。在这些文章里，耳闻目睹了苦难的他们，用自己的心灵，为农村呐喊，为苦难中的国家呐喊。他们对现实的反思，深刻到让今天的人，也会吃惊。吃惊于在那样的信息与思想隔绝中，他们的思考，能深邃到一个体制的腠理。

5

虽然早已做好了“献身”的准备，但向承鉴还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1960年9月。“进地狱的时刻到了。”先是谭蝉雪在广东被抓，张春元前去营救，也身陷囹圄。9月30日，向承鉴在水武山被捕。

“可以说，那时，耳闻目睹的现实让我太痛苦了，我早已下了必死的决心。”向承鉴说。“看到那么多死人，我就想，农民能死，我为什么不能死？”2016年3月，他对雪访回忆。

“1958年，大炼钢铁的后期，我的脚因为走山路磨出了一个鸡眼，



去做手术时，没有麻药，我说，没麻药也要做，我要去体会那种凌迟的感觉。”他说。也正是因为早已放弃了一切幻想，在随即而来的严酷审讯中，他也没有低头。

在水关监狱，“星火”一案已是惊动上上下下的“右派反革命集团”大案。张春元、谭禅雪和他都是要犯。“11号”是向承鉴的代号。此时，和他们一起被抓的，除了“星火”同学，还有支持、同情他们的武山县委常委杜映华，以及牵涉到案件中的本地农民。在武山，一夜之间被抓的有33人。而在上海，林昭和已返回老家的顾雁也被抓。

在监狱里，向承鉴一次次和审讯者对质，把审讯者变成了被审者。“你们的眼睛瞎了吗，看不到那么多饿死的人？即使眼睛瞎了，也能闻到遍野的尸臭吧！”他在自传《炼狱归魂》一书中，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他也因“态度最为顽固”，最终被判重刑。

1965年，已在兰州砖瓦厂服刑的向承鉴见到了一个叫张炳秋的犯人。张在当年审讯时，是在现场的武警干部，此时因重婚罪判刑。“张炳秋后来对我说，当时你痛骂审讯的人，那些话让人脊背都发凉！”2016年的这个3月，向承鉴对雪访回忆。

1963年7月1日，武山县召开了公判大会，向承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在之后，其余同道，也都各自领刑。1965年元月，在水关体育场的公判大会上，张春元被判处二十年，谭禅雪十四年……

向承鉴先后在兰州砖瓦厂服刑。之后又被转往青海海南州的农场劳改。

那是最为艰难的岁月。牢狱外，“文化大革命”开始，牢狱中，更要处处小心，在艰难的劳动中，唯靠内心的信念支撑着，活下去。

1970年，向承鉴再次面临极为凶险的命运。正是“一打三反”最严酷的时刻，在劳改队，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掉。一批政治犯，如遇罗克都是这个时候被处决的。向承鉴此时尚不知道，在兰州，他的挚



友、“星火”同道张春元、杜映华，也正是在1970年3月被杀害。在之前殉难的，还有北大的林昭。

作为劳改队小组的读报员，有一天，他保管的《甘肃日报》，头版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上，前额被人用烟头烫出了一个洞。

他立即成了破坏伟大领袖的嫌疑人。检察院专门来人调查，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那段时间，监狱里每天都更换新的杀人布告。

也许是命不该绝，他终于逃过了这一劫。1971年，他和其他犯人被调到了青海德令哈农场。之后，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服刑岁月。

1978年，十八年刑期已满。向承鉴穿着一件黑灰色的棉袄，走出了劳改队大门。他昂头挺胸。“这十八年，我没有一天，认为自己是一个罪犯。”在照相馆里，他为自己拍下了十八年来第一张照片。

他回到家乡武宁，父亲已垂垂老矣，亲人们相见，痛哭无声。

之后，他便开始申诉之路。经过漫长的等待，到1980年，“星火”全案得到平反。

他记得，1980年的那个早春3月，拿到一纸平反书后，他去了黄河边，祭奠死去了的同学、旧友。他是孤独的。没有人跟随他。是的，经历过这几十年的浩劫，人们怕了，也不敢了。

他一个人，跪在黄河岸边，祭奠那些冤死的灵魂。

他怀念张春元，那极富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还有杜映华，一个因为良知而不愿放弃思考的中共基层官员；他们，都已为“星火”殉道，在1970年的黑暗岁月里，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而惨遭杀害。

他怀念冯淑筠。那是他最好的朋友，一个宁可自己戴上右派帽子，也不愿“揭发”他的人，因为他，受到莫须有的株连，后来流落到新疆，死于坍塌的煤矿……

还有邓得银，1959年探亲返校，曾在水天与他相见，为四川饿死的乡亲们痛哭失声。文革时，在通渭一中，被活活打死……



还有史美堂，那样英俊洒脱，很早就参加革命、又到兰大来求学的上海青年，被打为“右派”劳教，听说是死在了新疆的电网上……

他是在自己重获自由后，才知道“反右”后他们各自的境遇。那些年轻的容颜，焕发的神采，高尚明晰的头脑，一个民族最杰出的年轻人，就那样在人为的浩劫中被一个个摧毁。很多人，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今天可知的是，仅仅在甘肃，就有两万“右派”。而他们的故事，文字记录，寥寥无几。写下自传的，也不过数人而已。

“我会永远怀念着他们，除非有一天，我也在这世间消失……”这个早春，在夜的清寒中，向承鉴深深叹气，目光沉沉，坠入永恒的痛念与追问里。



寻访“星火” 287

准考证

编号 1162

姓名 顾雁

考试地点 兰州


报考所别 应用物理研究所

导师 李荫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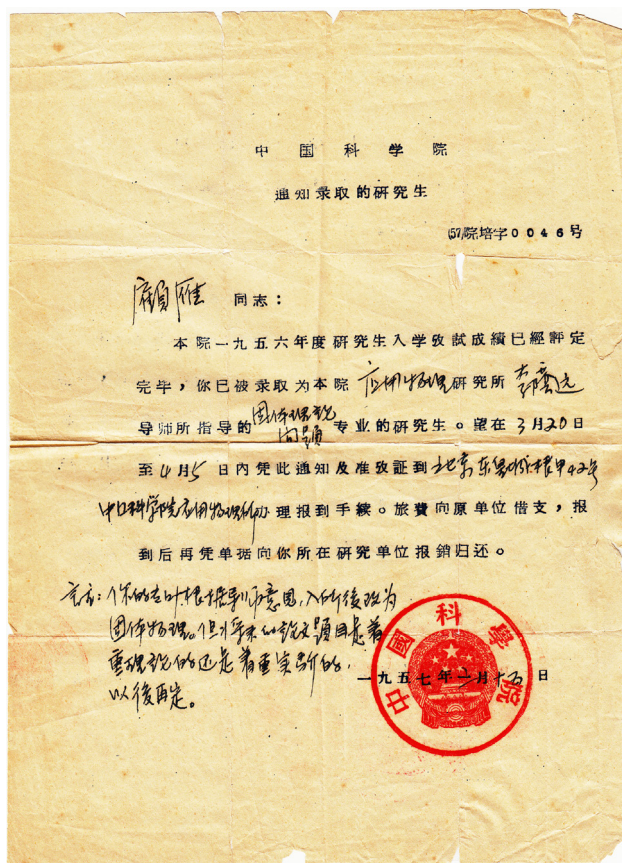
报考专业 固体理论问题

报考外文 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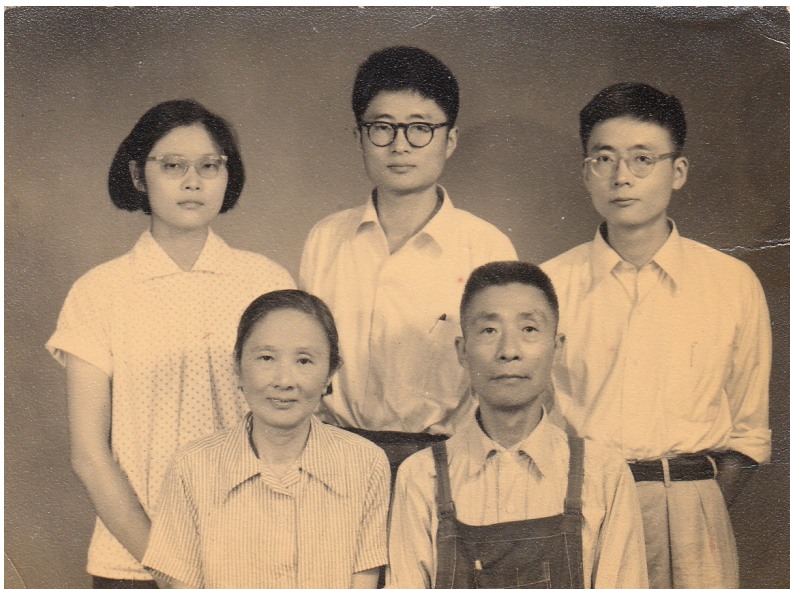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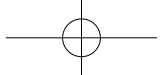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1956 年 9 月 20 日发



顾雁的研究生准考证



顾雁 1957 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的通知



1960年，被捕前的顾雁在上海和全家人合影。其时《星火》已经面世



290 《今天》总 121 期



谭蝉雪年轻时



2015 年 9 月，谭蝉雪在上海的家中



292 《今天》总121期



2018年6月向承鉴在西安



2018年7月，顾雁重返兰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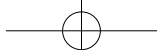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2018年7月，顾雁与向承鉴在兰州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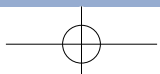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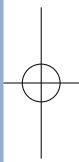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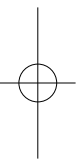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2018年7月，江雪在兰州采访顾雁、向承鉴两位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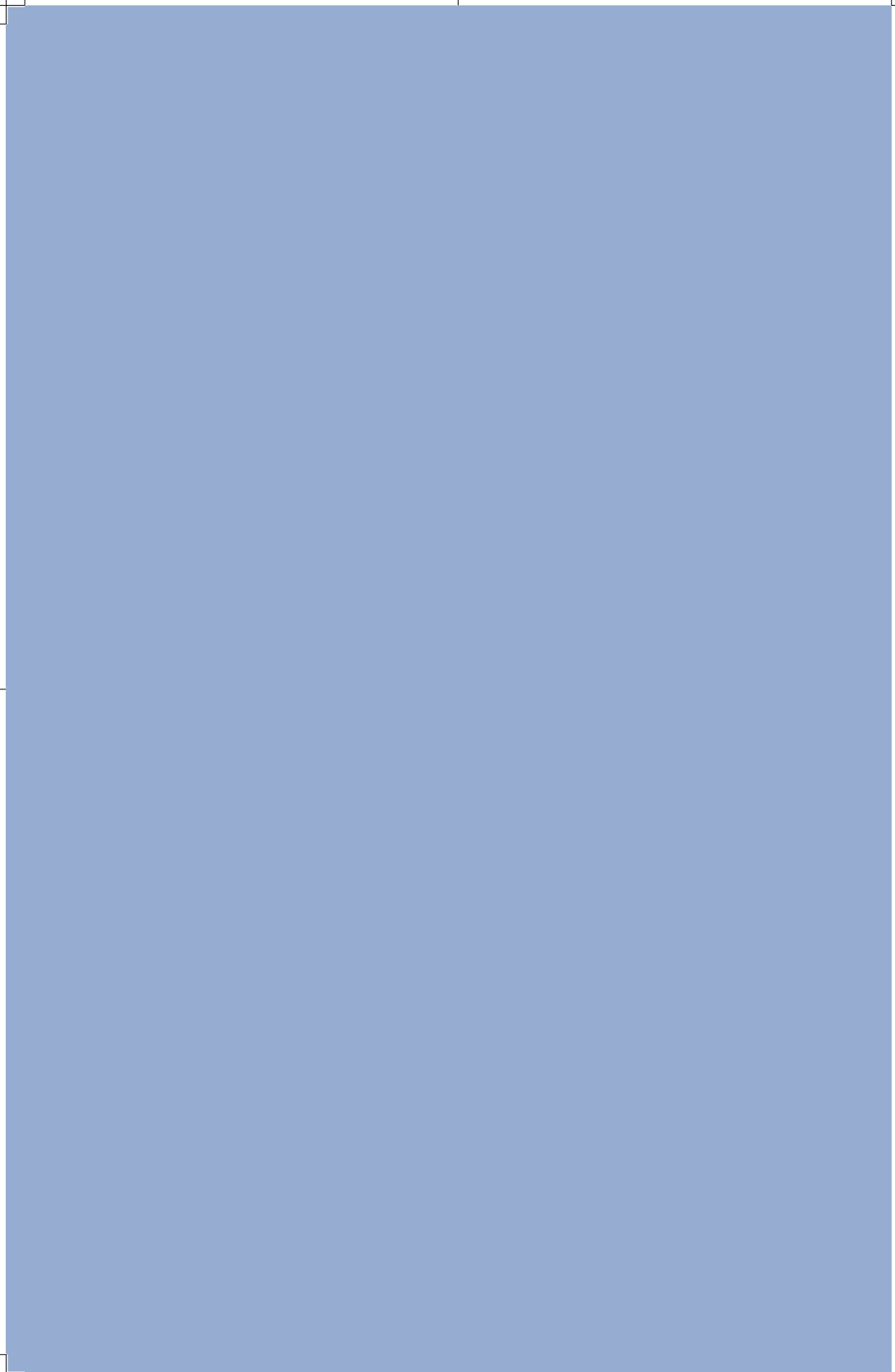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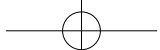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当年张春元、向承鉴等酝酿创办《星火》的天水马跑泉公社，
如今不复当年模样



随笔







北京野史录

顾晓阳

流到瓜洲古渡头

于国建，朝阳永安里人。为人木讷和顺，质厚少文。身长大，容貌平平。高中时，购西湖风景明信片一枚，书收信人地址为永安里自宅门牌号，内文曰“国建兄：多年未见，甚为惦念，一切都好吗？望多保重”云，落款为“你的好兄弟”。书讫，行至建国门，投邮箱内。翌日，于家中信箱得之。甚喜，遍示同窗邻里。

毕业后，入国企为工人，十年如一日，以处事平凡，未能有所用。年二十四娶妻，嗣后得一子。妻乃商店售货员，装扮入时，薄有姿色，性情，不理家务。国建操持内外，井井有条，勤俭善理财，衣食宽裕；余钱半蓄之，半予妻以为画眉点唇逛街游艺之用。妻以国建为模范丈夫，恒夸耀于人前。

厂长巡视厂内，至国建车间更衣室，见桌几明洁，杂具排列井然，地面如新，有异于他处。询之，人以谓国建日日洒扫，常年不辍。厂长招其来，与谈片刻，爱其憨。遂调为采购员。或谓国建不善交际，疑于采购似不相宜。厂长曰：“采购员往来交易，易贪。国建诚谨，而秀于内，虽讷何患？”用之不疑。

自是国建足迹遍于塞北江南，西通秦岭，东薄于海。虽拙于言辞，有恒力，客户交接既久，感其诚信，无不友之。货品或有短缺，人皆束手，唯国建能得之。如此又十年，厂长已迁局长。新厂长虽有高学位，



为人媚上欺下，所重皆小人。国建年近不惑，为采购科副科长。科长乃国建调教出道之后辈也。人咸为之不平。国建则恬然自处，尝谓人曰：“我国当一世为工人，今有此位，实出意外，复何求哉！”

子入中学，聪颖好学，嗜书成癖，出蓝之势已成。妻仪态妩媚，反胜于曩时，与国建意外而孕者凡三回，惮“计生”之苛猛，皆堕之。国建悯其痛，又知其不喜环宫套茎，乃自“结扎”之。

某日，之无锡出差。国建恐高，向以火车出行。对铺为一女子，年三十余，数以目睨之。国建怪而通问。女自言姓张名丽，蚌埠人，以故至东北，经京而返。语之移时，两相欢悦。国建谈锋甚健，如启闸泄水，快然而出，大有异于常时，亦自惊怪不已；方知胸中有千言万语而素无听者，今对张丽，始能倾心告诉。丽貌不甚美，而顾盼转睛，靡不令国建心醉神迷。乃执其手，恍然叹曰：“我生四十年，浑浑噩噩，茫然不知所为，实待汝之至也！”丽颜若桃红，婉然而笑。

至夜，灯熄就寝。国建心潮汹涌，殊无倦意。张丽亦不能眠，闻他客鼾声起，自铺而下，就卧于国建旁，援臂拥之，共其枕衾。国建以手触丽身，柔若无骨，暗香袭人；遂解裙襦，缱绻备至，悦爱无已。他客皆醒，嗽嗽咳之，或出恶声，二人旁若无人，嘿咻难止。车过蚌埠，丽亦不下，随国建至无锡。

入住五星酒店，三昼夜，房门闭锁，足不出户，但行欢爱。饥则以房中泡面食之，矿泉水及冰箱内储之酒水，饮啜一空。自以身在天堂仙境，福乐至极，拒一切酒店服务，即电话叫餐亦嫌其扰乱也。至第四日，酒店保安扣扉不应，惧房内有不测，乃破门入，见二人裸身踞案上，行乐方酣，其体位之怪异，令人观止矣。

国建携有公款，足支花销，至公差及家庭，竟浑然弃忘。张丽为机关会计，有夫与子，亦已置之度外。仿佛大千世界，唯你与我，他皆不存焉。

于是游太湖，登惠山，观天下第二泉。之苏州，踏芳径于留园，



访古塔于虎丘；同里镇内，借问酒家何处有？寒山寺外，夜半钟声到客船。又至杭州，国建喟然而叹曰：“昔我少时，尝自寄一明信片，即西湖风景也，冥冥中思有故人将会余于此。今竟得故人也！岂非前世之缘？”丽喜极而泣，曰：“我不遇君，不知生之乐；今既与君合，死亦快哉！”

国建妻久不得夫消息，乃询之于工厂。厂亦不知其所在，致问无锡，而杳无此人。遂报警，以国建身携大额现金，疑遭不测。历三月，扬州城管收容男女二人，验得身份，始通报家属及单位。盖国建张丽游历江南，挥霍无度，钱囊告罄。于是北之南京，又之泰州，转至扬州。身无分文，丐而行，不以为苦，欣然以为乐，竟不思归。时秋风萧瑟，天气已凉，二人宿于瓜洲古渡旁，相拥取暖，为城管所羁。古之瓜洲渡，今已成收费景区耳。

国建因公款私用，玩忽职守，遭工厂起诉，以贪污罪判刑二年。国建并诉离婚，妻初不允，以国建意决绝，乃从，所有房产储金有价证券等，悉归妻子。张丽返家后为夫所弃，净身出户，并夺其子。机关予其记大过处分。丽遂辞职。

嗣后，张丽只身赴京，探得国建服刑监狱在大兴，乃于狱旁赁一屋，四人共住，狭陋不堪，仅遮风雨。又以拾荒为业，所得聊供食宿而已。遂往探监。监规：唯犯人直系亲属可探视，月一回。丽至而不得通。然每月必一至，至则鹄立门前，自晨至昏，不食不饮，唯翘首内望。所携之罐头糕点瓜果，自不食享，日暮将归时，置于阶前，嘱警察送达国建。警察不允，丽亦不顾而去。如是一年有余，狱警皆感其诚，许相见。

二人晤对，倍极欢欣，遂相盟誓，欲结婚好。咨于狱方，并无不可，然手续繁剧，不易遽行。丽奔走大小官衙，磕头送礼，蒙羞忍辱，仍茫无头绪。方此时，国建以立功减刑，提前释放。宿愿终得偿矣。

婚后，相携入延庆山中，不知所踪。



将门之子

张小兵，安徽金寨人也。未满周岁而举家迁京。父为红四方面军出身，开国少将。小兵幼聪悟，手至巧，凡钟表收音机电动玩具等，皆能一一解为零散部件，而复组装如初。丰姿秀美，行如摆柳，有“梅兰小芳”之号。

小兵家境颇宽裕，而性喜借贷，每贷止二分钱，上不溢之，下亦弗降。人固以二分钱为不值，率尔与之，久之或忘，既不忘亦以讨二分钱债为羞，故有借无还，恒常如之。至中学毕业时，已告贷百余人，且有一人而贷十几次几十次者也。常独往酒馆，取啤酒二瓶、酱驴肉一碟、烧饼四枚，啖而饮之，醺然归去。

一九六九年入伍，为野战报务员，在武威。七一年入党。七四年复员回京，进国营大厂，为电工、车间党支部委员。居工厂集体宿舍，倨傲不群，舍友打牌弈棋辄邀之，皆峻拒；有好书者相与论辨，但以白眼睨之，不交一语。

男宿舍楼之北，有女宿舍楼一幢，遥相对。小兵自家取其父军事望远镜，以探太空奥秘为辞，旦夕观之不已。女楼三层有平台，台上撑杆拉绳，为女工浣衣晾晒之处。小兵观察既久，某衣为某人者、某裙为某人者，乃至一裤一袜，纤毫之细，莫不为其所烂熟也。一日，王小红至平台收衣，将一蕾丝镶边之奶子罩敛而纳篮中。小兵凭窗而眺，不觉失声自语曰：“又拿错啦！那是小琴哒，八十公分，你有那么大吗？”时中国闭锁，胸罩小大以“公分”计，不与国际接。舍友或闻之，不解其意，以为太空之密码也。

小琴者，鲁姓，年十七，面容姣好，清雅多才，善吹西洋长笛，每于日没后，立平台上，支谱架，习之甚久。天黑不能视谱，乃缚手电筒于谱架上。小兵观之，唯五线谱可见，而不得睹其貌，寤寐难眠。遂制一立灯，套杆调节高低，以电瓶输电，光至四十烛，因以赠小琴。小琴



谓电瓶乃公家物，拒不受。及小兵数望见小红敛人衣物，知其非误取，固盗者也，遂谓小琴曰：“小红，贼也，窃汝乳罩。”小琴不信。小兵又曰：“汝之胸非八十公分乎？”小琴大惧，奔走诉于厂部，以窃己乳罩者为张小兵而举之，羞愤交加，泣骂“流氓小偷”不绝。领导询之，殊无佐证，唯寥寥数语而已，而小兵根正苗红，一贯表现很好，遂疑小琴之言不实。乃遽命封查女楼，果于小红箱中发其所盗衣物若干，至是真相始白。领导以小琴资本家女，而诬党支委员、革军子弟为贼，事非单纯，乃反复盘诘之，小琴但饮泣而已。后调其出钳工车间，充后勤清洁队，日以洗扫茅厕为用，历二年余。

厂在郊区，外悉农田，东五里有镇，镇上设公共澡堂。小兵阴于市内购得花裙、头巾各一，伺天黑，悄然之镇，伏于澡堂外土沟内，饰头巾，更易花裙，然后跃出，欲入澡堂女更衣室。适有农家子甘小二者，为村中土混，行道上踵于小兵身后，见小兵翘臀长腿，款步蛇行，以为美妇人，欲褻之。乃遽抱小兵胸，以手探裙内，及触异物，惊曰：“你是男的！”小兵脱其手而走。小二大呼“抓流氓”，行人应声追之，扑小兵于地，押回工厂。

厂长见其状，大愤，捶案责之。小兵自辩曰：“吾昼寝，梦一女子裸身而来，甚奇之，与曩者所想象之女体殊异。是梦者真耶？抑幻者真耶？殊难遽断。今欲验之。”盖小兵年二十五，犹童男子也，虽持望远镜窥女楼数年，亦仅及肩臂足膝而已，近获友人出香港《阁楼》杂志而匆促一瞥，震诧不已，故有是举。于是，渠偷窥女宿舍、私用电瓶制灯及借钱不还等事俱为群众所举。党委撤销其支部委员并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小琴以此充清洁队，属处理失当，应予改正。是时，小琴忽得大学录取通知，大喜过望，乃不顾而去。自是，小兵名臭矣。遂称疾，居家养疴，鲜至厂内。

不数年，国门大开，市场复兴。小兵办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初以货广州蛤蟆镜、折叠伞等至京，获利不菲，而辛苦倍之。所与交易往来



之人，率皆市井无赖、刑劳获释者流，亲友同侪无不鄙之，小兵亦内自惭羞。其后，军队忽兴经商之风，公司傍辕门而并立，将校共商贩为一身。小兵父执辈固多高级将领，其后代亦不乏军中任职者。小兵风云际会，乘时而起，以军舰越海走私物资，千金立至，遂暴富。

小兵尝于深圳宿娼，事毕，喜而浴，不觉嘬其口而啸之，曲为《红色娘子军进行曲》。

其词曰：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啸声嘹亮婉转，至“扛枪为人民”句尤盘旋反复再四。妓者久候之不出，乃叩浴室门呼曰：“先生，钱！”小兵应曰：“搁桌上吧。”“什么搁桌上？”“钱呀！”妓者讶之，曰：“是你给我钱！”小兵裹浴巾出，亦讶之曰：“姑娘你搞错了，我是卖淫的，不是嫖娼。”妓者大愤，跳踉叫骂不止，小兵裸其身而辩，终以压价五十成交。

小兵交女友亦喜借贷，或五角或一元，较往昔所贷为多，盖市场通货膨胀，小兵亦随之浮焉，而有借无还则仍之。自遇余乃民，遽惊为天人，以为燕好一生者，非伊人而莫属也，于是俯身下气，曲意逢迎，一改旧习。乃民乃中学英文教师，曾以母病向同事告贷百元，逾年不能还，同事索讨甚急。小兵代其偿之。乃民染疾，久咳不出痰，小兵口吸导管使出，不恶其秽也。

时当邓公“南巡”之后，“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跟着跑”，人人思一夜暴富。乃民因以白小兵，谓海南有数百辆走私轿车，若购而销于内地，可获暴利，副省长楚某为其姑丈，宜贿之而得此单。小兵心动，询于海南友人，果有此事，亦楚副省长所辖者也。适楚来京开会，乃民使小兵会之，一拍即合。小兵大喜，遽集巨资，遣乃民赴海南司其事。及钱款汇出，款与人忽亡失不见。小兵急，遍寻无踪，乃亲至海口见楚副省长，及晤，愕然相向，非前所见之楚某也，始悟乃民作局陷己。欲穷究其行迹，则其人如寒烟之遇疾风，不知所向，亦不知所从来。



也。后闻乃民实有未婚夫者，海南行前，已得美国签证，俟小兵钱款至，即与其夫飞越太平洋，至洛杉矶购屋置业，未几并产龙凤双胞胎云。

小兵人财两空，从此一蹶不振。其于余乃民也，虽恚愤其诈，犹日夜思之不已，昔年为乃民吸痰之导管，秘藏篋中，常出而玩于掌上。其后终身未娶。

新富行状录

仇宝利，东城灯市口人。父为东单菜市场售货员。家贫，十四岁辍学，以父退休，“顶替”入菜市场，亦为售货员。师傅中多轻佻狎弄之人，尝数以亵语教宝利以为乐。宝利懵懵未开，知其亵而不知其所以为亵也。有菜市场东楼凤楼胡同七十老嫗田大娘来市黄鱼，谓宝利曰：“小伙子，给我挑几条冻硬的。”宝利故择化冻之鱼掷秤上，依先所教之言对曰：“老太太，您别瞧它现在软，拿回家半夜胡撸胡撸就硬了。”老嫗闻之，返身遽去。不须臾，率四子汹汹而至，四子皆彪形大汉，持顶门杠、铁锹、棍棒等，追殴宝利。宝利大恐，绕鱼池柜台而走，知将不免，见场内内有公厕，乃生急智，一跃窜入女厕所内。盖宝利未成人也，四条汉子虽欲擒之，犹不敢贸然乱入女厕。由是得脱。

宝利为人机敏多智，精于术算。领导识其能，调至购销部，习学采买。宝利勤勉用心，处处留意，一年有余，凡海产品之诸般知识及购销渠道、产地优劣、各地价差等，靡不谙熟。遂辞菜市场职，个体自营之。一九八四年，年十八，积现金二百万。当是时也，大学毕业生月薪五十六元，驻外大使才不过一百余美金，至若所谓“万元户”者，世人皆仰之以为富翁。故宝利亦自恐骇，亟停业洗手，蛰伏于家。巨款惧为官家所知，弗入银行，悉藏家中。家小而陋，竟凿墙掘地而藏之。

嗣后，宝利无所事事，终日游于西单王府井，出入莫斯科餐厅、燕京饭店、和平宾馆咖啡厅，得识于张小兵。宝利知小兵将门之子，遂刻



意结纳。小兵有借贷癖(事在《将门之子》中),虽薄有资财,仍以借钱为乐。小兵借一元,宝利则予其十元;借十元,则予其二十元,更不索还。小兵大喜。时小兵贩日用品于穗京之间,常遭同侪嗤笑,以“二道贩子”呼之,殊无颜面。宝利为其设宴于北京饭店谭家菜、马克西姆餐厅等处,每席辄十人以上,皆将帅之后。马克西姆餐厅,法国闻人皮尔卡丹所有者,巴黎上流社会之百年名店也,为中国首家中外合资餐厅,腾誉满京华。时崔健未显,亦驻唱于此。以其价昂,虽京城贵公子亦鲜得一入。小兵爱之殊甚,大筵小酌,必携宝利以往,如己之钱囊然。宝利由此得混迹于将相豪门之家,与二三名将之后尤相契。

如此二年余,宝利广其交游,眼界大开,衡诸天下形势,知“改开”已如洪水之溃坝,不可塞阻。且夫天下者,彼辈“红后”之天下也,今既与渠等有所勾连,分杯羹而食之足矣,亦何所惧哉!于是坏墙砖而发地窖,尽出所藏金钱,注册公司,重操旧业。

是时,北京营水产品者以浙人为多。盖京人情而骄,以其业为贱,鄙薄不屑为之。宝利固精于本业,又不惮烦劳,遂跻身四大经销商之列。又营肉类,注水于豚肉中,以增其重。设食品加工厂,引进东洋之法,一新国人口味。

岁入廿一世纪,将帅之后亦多为将军矣。宝利拥亿万家货,涉足金融界,运万国资本于股掌之间,益富。乃襄助少壮将军设非赢利研究机构,多行公益慈善之举。

先是,某故名将之乡人为其立塑像于故里,邀其遗孀赴之揭幕。时宝利年少伶俐,夫人携以从行。名将与夫人有二子,一暴毙一重疾在身,夫人乃谓宝利曰:“老头儿年轻时杀人太多了,在‘苏区’打土豪,把地主倒吊树上,头上浇油‘点天灯’,因此后代遭报应。”宝利闻之骇然,常惕惕于心。故其处世也,笃信因果之说,知所恐惧,不为大恶,数十年如之。



秦大妈

秦大妈，失其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幼养自南城陕西巷青楼内，洒扫庭院，侍鸨母起居。年十四，开苞待客。以貌丑，客人少恩顾，恒遭鸨母挞楚。然利口捷给，能谀嚅，于是伺人好恶，装痴扮怪，博人一粲，亦有薄名。

年十九，解放军入城。一夜间查抄“八大胡同”，二千年孳孳不息之性服务业竟绝，为人类史上所未有。政府揪斗老鸨，其大恶者刑于市，于是娼、嫖两造无不悚然。又集群妓开班宣教，呼之为“姐妹”，诲其自明：所以为娼者，乃生活所迫、社会万恶云云。秦以善言辞，委小组长职，主姊妹政治学习思想改造。某姊曰：“我性好吃懒做，身无一计之长，不入青楼将何为？”某妹亦言：“我乃离家私奔而为妓也，家人知之大恨，欲赎我出，为我所坚拒。实无人相迫。”秦骂曰“不要脸”。某姊质秦曰：“汝十三岁即欲接客，偷饮不孕汤药，为鸨母暴打，此宁非自愿耶？”秦曰：“那是我觉悟不高。”众姐妹讪笑无已。

后，“姐妹”或入社会做工，或由政府媒妁成婚，皆从良，是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者也。秦嫁清洁工人林诚志。诚志居城墙根下，以城墙为壁，搭凑砖席毡板为屋，风雨交侵，一贫如洗，年二十九未娶。建国后征入清洁队，与时传祥编为一组，即俗谓“掏茅房”者也。既婚，始于城南赁屋而居，以秦不孕，抱养一子，名小狗子。

秦为家庭妇女，能缝纫，拙于炊爨，不擅持家。喜群聚，爱哗闹，于人众中发一嚅语，哄然皆笑，辄欣然自喜。时政府构造社会，层层直抵于里巷，任闲散妇女为干城，散于闾中，邻里无分老幼贤不肖，尽织于网中。令自上出，迢递通于下，如臂使指，畅行无阻。于是各胡同设“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妇女称“积极分子”，居委员会主任、治保委员等月给微薄“补助”。秦初为积极分子，以在“除四害”运动中脱颖而出，



任为治保委员。四害者：蝇蚊鼠雀也。秦登屋顶，持铁锅，以擀面杖击之，橐橐而响，惊吓麻雀俾不落。自朝至午，咱窝头小憩，继又击打至日暮，锅为之穿。全城皆然。麻雀终日无所栖息，竟饥疲而死。秦集全胡同堕死麻雀，至街道办事处报喜。后科学家言：雀食害虫，为益鸟。于是去雀增臭虫为四害之一。秦率人案户而内，卷被去褥，掣床板置院中，煮沸汤以浇之，臭虫尽死。领导谓其任事泼辣，深加倚重。

“文革”起，为居委会主任，权倾一时，胡同内数百户俱为其所辖。公安局倚凭“积极分子”掌控各户居民，察人隐私，自吃、喝、拉、撒、睡乃至脑中所思、心中所怨，无不併力侦之，故人又称其为“小脚侦缉队”。“小脚”者，因“积极分子”中犹有缠足者也。

先是，秦大妈有邻名程阿姨，其夫为“历史反革命”，一九五三年遭枪决，遗二女小贞小妹。阿姨无业，于家中揽四邻裁缝漂洗之事，以为生计。二女幼，食常不饱腹。大妈广交游，屡为阿姨介绍客户，阿姨感念不已。及小贞长成，有美色，小狗子爱之，频传书信，并对面告白，皆为小贞所拒。秦大妈知之，不怪，负气谓狗子曰：“找她干嘛？她爸镇压了，哪配得上咱们工人家庭！”而狗子爱愈甚，常候于道中，蹀躞纠缠；夜则踰垣蹬屋而窥之，或投以石，或拟鸡鸣猫叫春。程家不堪其扰，阿姨乃稍稍言于大妈：“孩子还小，精力在学习。”程夫旧为高级警官，大妈为妓，深心实自卑下且有所惧恨，是以闻阿姨婉拒，以为轻己，遂大惭恚，曰：“新社会了，恋爱自由，我管不了，你也管不了！”由是深相怨望。

至六六年“红八月”，中学红卫兵来至派出所，询“黑五类”状况，大妈乃告以本胡同中唯一遭“镇压”者即程家。于是红卫兵抄程家，启箱篋，发夫妇合影一张：阿姨烫发着旗袍，其夫则服警官衣冠。红卫兵大愤，跪阿姨于合影前，使唾之，并呼“死了活该”。阿姨唾且呼，再，至三，涕泣不能发口。红卫兵益怒，以皮带、棍棒、铁钎笞之，肉烂露骨。又见小贞着家居便裙，谓为“四旧”“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争撕扯



之，裙裂裸下体，肤如凝脂，皮带挞之辄红，遂聚殴不止。狗子闻程家被抄，亟奔来，规视小贞惨况，心如锥刺，乃伏小贞身上以翼之。红卫兵摔狗子于地，蹴踏蹂躏。狗子怒，跃起与搏，人多不敌，遂入屋持菜刀，左右挥之，伤一人臂。于是大哗，红卫兵高呼“阶级报复”，血脉贲张，叱咤喧腾，群起与狗子战。

有人走报派出所。秦大妈以不欲使程家知己与红卫兵通，故淹留所内，方与女警闲话。闻报，亦随警察去。至，则见狗子体无完肤，血肉模糊，气已绝。大妈跌坐地下，大恸而哭。剥红卫兵足，为子索命。红卫兵踢之。大妈俯身啮其踝。警察排解之。

大妈爱其子殊甚，至八岁，尚夜夜为濯足；洗漱饮食皆侍于炕上，使足不沾地；不为穿衣套袜，则狗子不自能。故虽家贫，狗子身材硕壮，喜摔跤练武，学有师承，而不会家务。年十五，其生父母尝欲一见，大妈忧惧惶恐，匿狗子于乡下。狗子谓之曰：“世上只有您是我亲妈。”大妈为之零涕。

今狗子横死，大妈悲不自胜，日至派出所，求缉凶抵命。警察虽悯之，亦无能为也。天下方乱，纲纪崩坏，京师一月死人千数，皆如金风扫黄叶，零落无踪。遂不了了之。大妈又思狗子之亡，实亡于爱其所爱；而程家之祸，乃由己爱子深切、私心忌恨所致也。于是肝肠寸断，痛悔不欲生，系索于梁上，延颈索中，一踏足而椅凳翻，身悬半空。有顷，诚志排闥入内，大惊，急解索置床上，良久方苏。夫妻抱头嚎哭。

程氏母女以为微狗子，则己必死；狗子为救己竟以身殉，有再生之恩。乃感激涕零，没齿不能忘。程阿姨为狗子制绿军装一套，自持巾拭净其尸，衣以军装，扑地哀哭。小贞以“爸”“妈”呼诚志夫妇，晨昏必至其家，问温凉，为炊食浣裳。后小贞插队之雁北，则小妹继之，亲如家人。

秦大妈身形伛偻，不复谈笑。为主任，虽俨然其事，而暗行便宜，与前判若两人。里党中“黑五类”者，多得其翼护。小贞自雁北回，匿



家不欲归，而户籍监察甚严，警察常携“积极分子”于夜半突入民宅“查户口”，有插队不返者，辄强遣之去。大妈每得消息，必泄之，使小贞等走避。他相类者多有。

久之，派出所亦有所闻，免主任职，以靳婶儿代之。大妈怏怏不乐。居无何，蜚语传于闾里间，谓大妈曾为妓。又传言小贞十五岁即与狗子私，尝坠胎。大妈闻之大愤，质于靳婶，靳婶佯不知。又诉于派出所，警察曰：“此邻里纠纷，民警无权干涉。小贞在，可自问之。”大妈曰：“骂我为妓，是何居心？”警察曰：“汝固非娼家耶？言事实而已，何骂之有？”大妈瞠目无言，心寒如冰结。

归如程家，与程阿姨言之，泪下如雨。阿姨百般劝慰。大妈泣诉：“昔汝家之祸，实由我致之也。愧悔煎心，无颜面告。思欲秉良心以行事，又不称上峰意，弃我如敝履。故人之得失损益，皆自作之，而自受之，复何言哉！”阿姨曰：“往矣，勿再言。况我久已知情。”大妈惊问缘由。曰靳婶私告之，又小贞坠胎云云，亦自靳婶出。大妈捶床切齿而骂。

后小贞以病退返京，由诚志荐，亦入清洁队，为清扫工。文革终，考入大学。小妹亦进大学，在天津。阿姨憔悴一生，晚年幸得平安。小贞小妹月工资皆不足二十元，而月各奉诚志夫妇五元。大妈患风痹，不良于行，二女亲侍汤药，为濯洗发肤，购轮椅，时时扶轮出行。

七九年，诚志无疾而终。越明年，大妈二度中风，亦卒。程氏母女葬之。

秦大妈歿后，中国第三产业兴，而性服务业亦兴矣。谣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美人传之唐小玢

唐小玢，幼多病，四岁犹不能行。善仿鸡啼，偶一鸣，辄四邻所畜鸡莫不争啼之，与相竞声。年七岁，健如常人，攀爬跳踉或过之。舅左氏常携小玢游，伺无人，使小玢弄其阳具，又褪小玢裙裾，褻之。小玢惧，屡欲拒之。舅忿辞厉色，胁迫告人。故他人莫有知之者。而小玢居家，常于桌下独坐，或匿于床底，久唤不出，家人颇怪之。

年十八，入大学。黛眉美目，丰颐硕乳。其为人也，豪迈不羁，特立异行，倾一校之男生。法律系池京生者，善娱谑，多智巧，欲探小玢究底，乃谓之曰：“汝素称开放，敢裸泳乎？”小玢曰：“胡为不敢？”曰：“赌五十块钱，可乎？”答曰：“可。”京生遂邀新闻系齐祥、中文系李大立、法律系许剑同往为中人，皆男生也。至八一湖，小玢命四人背其面，自解去衣带，入水中后，方任意观之。游十分钟，登岸，振衣揽发。众壮其所为，京生遂输五十元。当是时也，五十元为“四级工”一月之薪给，其值匪小。京生心有不甘，复谓小玢曰：“我敢裸身骑车过海淀镇，你赌不赌？”小玢曰：“赌就赌。”仍以五十为注，邀许剑等，迨日暮，群集海淀镇东口。京生褪其衣尽，其下体已以墨涂画为三角状，俨若著内裤者也，众皆大笑。京生使齐祥李大立又各骑一车，左右翼之，三人并骑而过海淀镇。小玢笑而可之，如约。

小玢多才伎，雅善歌舞。入校戏剧社，于某剧中饰为女主角。该剧终时，男女主角作拥吻状，灯暗，落幕。某次排练至此，小玢内感乎心，呜咽坠泪，抚男主角颊，送喙于前。时池京生掌灯光，一捻而灭，台上遽暗。导演坐台下鼓掌而呼曰：“演得好！演得好！”京生忽动顽念，再一捻之，灯复明，追光如炬，照见二人熊抱蛇缠，犹酣吻焉。众大哗。

小玢固有男友小季，二人自中学爱恋，情笃好，而不相羁繫。小玢小季尝共男女十人杂宿，一夜间数易其偶，人以为乱，小玢辩之曰：



“既非相迫，何乱之有？”故小玢入大学后，虽多蜚语，小季闻之而不怪。后小季如西藏居焉。

迨毕业，配小玢至国家部委，辞不就，请入藏，与小季婚。一时轰动，人皆称奇。既婚，仍频与人私。拉萨有栾青者，仪容端严，博洽有才具，最为小玢所爱。其妻亦知之，尝于众中批小玢面，詈骂罔极。某夜，小玢栾青同宿于旅舍中，睡方酣，栾妻弟率三四莽汉持枪突入，妻弟以枪刺揭去衾被，栾青赧赧于床，而小玢无惧色。由是名大噪，咸称其勇。

北京友人张亦理游拉萨，遇小玢。二人故为君子交，小玢与语，大悦，遂邀其至家，时夫小季方出差返京。小玢为治具，烹肴饌，与共宴饮。酒酣，熄电灯，燃红烛十数支，遍插桌几床第之间，又开音响，播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于是牵亦理手，引至床前，备尽欢好。翌日，又邀亦理夜至。饭罢，乃嘱亦理刷牙。时居处简陋，洗漱皆在室外，亦理才出，忽有二人赳来，问曰：“你是来找小玢的吗？”亦理曰：“是。”问：“北京来的？”答：“是。”又问：“你认识小季吗？”答曰：“认识。”二人亦不再言，目亦理有顷，乃去。盖此二人者，小季友也，以小玢淫乱，颇为小季羞，故尽己之所能，俾少抑之也。亦理大惭，归告小玢“有急事”，遽辞而去，不复见。

闺蜜李花向与小玢善，尝对饮，因问曰：“你这么喜欢男人，是性欲特强不能满足吗？”小玢不怪，曰：“俗人们都这么说我，你怎么也这样想？我对性其实很一般，你说你常在性爱中体验到乐极欲死、飘飘欲仙的感觉，我从来没有。”李花大惑，又问：“那为什么？”小玢曰：“我是享受和迷恋那种气氛：烛光、音乐、鲜花、人与人的零距离接触。男人一旦进入我的身体，我就感觉人和人之间实在是太好了！你不觉得这种人际关系比其他的，比如金钱和利益关系、上下级关系、拉帮结派之类，要纯洁得多吗？”李花讶之，叹曰：“真没想到你这么浪漫！”又问：“你小时候缺爱吗？是不是受过什么创伤？”小玢曰：“不知道。”



在藏三年，将调回京。某日，与人同车出，欲之某藏族村落考察。其所经之山路也，藏人向有忌讳，禁女人行过。小玢有胆力，无所惧，而同行三人皆汉男子，亦不以为意。及行，山崩，路为之塞。小玢等下车步之，行未半，有石自山上坠下，中小玢头。石大才如卵，以所击为命穴，竟毙之。时年二十有五。闻者无不坠泪。

奇人蒋重阳

蒋重阳，生于延安，建国后随父母迁居北京，入育才小学。育才乃干部子弟学校，学生虽幼，惯以父母官职相高下。同窗中既多将军、部长之后，以重阳父为党内文人，资浅而官微，甚卑之。又重阳幼养自陕北农家，貌土而口音浊重，恒遭嗤笑。曾于夜中自寝室斥出，键扉拒入内，重阳徘徊无所归，不得已栖树上，同学因噱其为“鸟人”。重阳大恨，思有以报复。时育才校园广大，古木森森，有劈柴场，积薪万斤。重阳伺夜无人，燃之，火大炽。幸消防车来之速，未成灾害。公安排查火因，无所得。重阳窃喜。一日，校长呼重阳来，私谓之曰：“吾固知纵火者为汝耳！今不举之。汝年尚少，此生不可二过也。”重阳涕泣以谢。

十岁，父母仳离，又均各成家。重阳为父所养，后母待其甚苛。久之不能忍，遂投生母家。生母亦已婚，其夫故有六子，亦不容于重阳，每诟詈使去。时当盛夏，重阳遂夜宿于大礼堂石阶上。继父为显宦，居所在机关大院内，院内有警卫班。每晨昧爽时，警卫班即于阶前练武，重阳因不得眠，遂起而同练，自是知擒拿之术。

十四岁，在技校为学生，竟被打为“右倾分子”，下农村改造。值国中饥谨，野有饿殍。重阳以小故，被囚于猪圈内，与豕相争食。村中有老媪过圈前，见重阳瘦骨嶙峋、颜面皆绿，乃吐口中之哺哺之，重阳因以得活。



重阳父亦成“右派”，流配新疆石河子。年十八，往依其父，为团场职工。当是时也，重阳出落成人，风流倜傥，姿容丰美，女职工以其肖明星赵丹，遂呼之为“小赵丹”。重阳有勇力，多智黠。夏入山中捣狼穴，击狼致昏，钳其口，缚之舁归。售与武威、天水等地动物园，匹可二百元。或屠之，取其皮，其法为：置狼身于四脚条凳上，四肢各以铁丝缚凳腿，燃煤炙铁熨斗，至其尖烧红，揭狼尾，以熨斗尖插狼尻中，狼毛倏然毕立，然后杀之，剥其革。以此革所鞣之狼皮敷床榻，人卧其上，有不速客至，辄毛歔歔动也。团场人因以奇重阳。

“文革”起，以“现行反革命罪”，遭全疆通缉。重阳剃去双眉，蹬自行车自石河子如乌鲁木齐，偷扒火车，辗转潜出新疆，抵西安。见西安城墙有门洞，高广聊避风雨，遂夜宿于此。诂料四门之洞皆为丐帮所据，重阳夜半睡正酣，帮头以棒捣其腹，欲逐之。重阳怒，目眦俱裂，夺棒殴之，力大不能制，帮头哀求乞命。由是，重阳俨若太上皇，帮头日进以佳肴蔬果，殷勤侍奉，四门之丐皆凭其调度。

一九七八年，父平反，回京。后一年，重阳亦返京，得父之助，为杂志编辑。自云曾入秦岭，遇高僧，授数术，能相人。行止渐不入于俗。弟登高以重阳受苦最多，甚亲爱之，除夕，冒雪赍厚礼至其家，欲与守岁。扣门不开，呼之再三，重阳始自内应曰：“我明年有大灾，须于今夜以术禳之。方裸身，伏床下，以花椒、枸杞、大黄、韭菜花、芝麻、辣椒等所调之禳灾方剂敷背上。若人见，明年死矣！”登高大愤而去，以重阳寡情不欲见、故弄玄虚欺己，切齿对人言之。或曰：“此方剂，毋乃东来顺之调料乎？噫！尔兄明年将变羊也，其味膻，故下料猛。”

后乘桴浮于海，辗转至美国。以堪舆之术，名动北美华人间，唐人街侨民视之若神明。九十年代末，复返北京。

余友老八，蓄藏獒二十余条，视若家人。二〇〇五年元月，与余饮于国际俱乐部雪茄吧，遇重阳。二人固不相识。重阳视老八良久，从



容谓之曰：“汝之犬，年后将相续死。”老八愀然变色，汗涔涔下。余让之曰：“老八无后，犬即其子也，何遽言死？且今元月，年已过。”重阳曰：“我所谓年者，旧历年也。”遂不再言。迨旧历春节甫过，果有一犬亡。老八恸，谓尝有人欲以一百二十万购此犬，以己非狗贩，不售，今竟如重阳所言。亟请重阳有以教之。重阳命其图狗场形势，观之，谓狗舍之位凶，宜移置之。老八有难色，曰：“天寒地冻，破土不易，且村中农民畏寒，不出工。需待回春时。”重阳又不言。迁延数日，继死二犬。老八大惧，邀重阳至昌平山上狗场。重阳命其于场中竖长杆，集白球串之成链，挂杆头。又以白粉调浆，于狗舍墙上画圈。并指划狗舍吉位，嘱开冻后速筑新址。嗣后，藏獒遂安。迨新狗舍建成，益盛。

冯小刚迁新居，招友人来酌焉。有友亦邀重阳。小刚妻徐帆闻之，且喜且惧，曰：“他来了，让咱们拆门堵窗户怎么办？房子可是新装修的。”其信重阳者，率皆类此。

重阳自诞于世即陷困厄中，有亲难养，养于农妇手；迨天下初定，父母从龙得贵，方锦绣少年时，又遭家变，以致亲不能亲，子不能子，失双亲爱也。有弟与妹，却如飘萍之寄于流水，易散难聚，殊少骨肉相依之至情，失手足爱也。及长，祸患加身，流离颠沛，欲蹶迹于人群，而人恶于狼，争相构陷无已时，失人间爱也。呜呼！诸爱尽失，其情何可言之哉？故其行或有乖悖舛杂之迹，人多诟病之，而不知其所由来也。尝自测其运，谓耳顺之年有桃花，命丕变，大吉。时人闻之，皆掩口窃笑。

年六十，术益精。某日赴友邀宴，有白姬琼者，年三十余，额秀颐丰，花明雪艳，仪态端娴，有脱俗之质。友请重阳为其批八字。重阳既案其生辰，惊曰：“异哉！汝有牢狱之灾耳！”举座皆哂之，以为谬。友曰：“大师故作惊人之语耳！言姬琼红颜薄命或微中，至谓牢狱云云，何差之远也！”重阳曰：“此其命中所有，岂我能加之者乎？”姬琼笑而不言，归，谓其母曰：“重阳真神人也！断我有牢狱之灾。”母亦奇之。



先是，姬琼曾经商，以钱税往来故，触罪，入狱年余。而宴中人莫有知之者，与相交游，但觉词温气雅，大家闺秀，与牢狱云者殊不相干，故皆不信重阳之言。

自是，姬琼重重阳为人，以为可以托之者，凡郁结烦愁之情，无不倾心告诉。重阳则为之剖丝解絮，循循开释。重阳病，姬琼侍药床前，四昼夜目不交睫，形容瘦损。及瘥，性情乖戾，猜疑多忌，常无端詈骂姬琼。姬琼俯身下气，不辩一语。重阳富有赀财，然性慳，与前妻有一子，按律当赡养，恒迁延弗予，以至诉讼缠身。姬琼代偿之，且善其前妻与子，礼尚往来，和乐如家人。重阳心硬如铁，姬琼以爱感之，终化为绕指柔，乃喟然叹曰：“我六十遇桃花，非卿而谁何？”姬琼故曰：“此尔命中所有，岂我能加之者乎？”重阳大笑。

于是以其房产一予爱子，一赠姬琼之母，携姬琼忽然不见。友朋遍觅无着，皆诧怪之，或谓重阳素喜豹隐，神怪其行以邀誉于世也，久之自出。然至今十年矣，京师繁华益盛，而重阳姬琼之踪渺然。闻已入终南山中，屏迹于人间世。

甄大头小史

甄祥，小字“大头”。北城德胜门人也。头大如瓮，因有此号。八十年代高中毕业，入首汽为出租车司机。口才辩给，巧舌如簧，为同侪所称赏。

尝自机场载一日本客，客生于满洲，母坟冢在卢沟桥，数十年未至，今欲往寻而祭之。大头驱车道上，与客辩，褒其心而弹其行，述生死轮回之奥义，析古今变迁之至理，口中雌黄，妄言泉涌。客始怒，行未半，意乃解，不觉而悦，遂尽弃初念，依大头言，回车往八达岭，与同游长城古迹，指点塞上烽燧。所携“和果子”等，本为祭母之用，亦以当土产，遗赠大头。其说人之术，如巫如蛊，一至于此也。



某日，遇客人马小铭。小铭本业报纸编辑，甫辞职下海，与友六七子建通达贸易公司，在燕京饭店。小铭喜言谈，自负才高，视甄大头貌憨，悦之，因问年岁、驾龄及包车月金多少。大头一一答之。至燕京饭店，小铭嘱大头候焉，遂下车。入办公室，谓众人曰：“我刚包了一辆出租车，皇冠的。”众皆称善。或问：“司机怎么样？”小铭曰：“还行，一傻逼。”公司遂与大头签包车合同。

当是时也，知识分子下海将衍而成风。通达公司数子率皆诗人、记者、作家之属，既无经商之智技，又形容猥獠，或目茫茫而架镜，或发飘飘以蔽肩，有名士脱逸之气，无“大款”重厚之尊。游走于商界中，常为人所轻之。众亦自知，乃谋良策。小铭曰：“甄大头身高体胖，穿西装，有派头，咱们当中他才像老板，可让他撑门面。”众以为然。王吉自请曰：“我假装给他当跟包的。”小铭曰：“你不行，头发比女人还长，又不洗，像找抽的。”王吉怏怏而退。自是，大头常充老板，众左右相拥，侍如仆从。故公司往来接洽，大头多所闻知。

小铭素好歌吹，常夜出观演，皆命大头以车载之。大头不敢抗，而内不悻。王吉阴谓之曰：“小铭雇你的时候，管你叫傻逼。”大头大恚，由是銜之。

公司日常所为，无非设宴饮、賂礼、驱皇冠车满城奔兢，惶惶然如无头之蝇，而未获毫厘之利。久之，众相怨望，互有攻讦。大头从旁月旦，往往而中，众咸服其论。小铭奇之，赞曰：“别看大头没文化，口才不错嘛！”大头闻之，益怒。

先是，马小铭于采访中，遇昌平农民企业家张志一，乃大言煌煌，颇自炫耀。志一为所惑，遂刻意结交之。及小铭欲下海，询之于志一，志一慨然出资十万，使设通达公司。

既历年余，本金将尽而无所赢利，志一乃悟所托非其人也。于是绝其输给，使自生灭。小铭巧言说之，终无所动。一夕之间，通达公司作鸟兽散。



甄大头重回“首汽”北京饭店车队，而心已逸之，犹鹞之入于云霄，志在昂远，难囿于林木之间也。日日“扫马路”、机场“趴活儿”，无所赖籍，怏怏不乐，遂谋大计。忽忆：在通达公司时，尝宴东北某县国营燃料公司经理，经理谓“有计划内之煤炭，可以计划外之价售之，其间差额颇厚，唯难觅买家”。小铭即遣诗人戈巴往东北寻之。戈巴至大连，忽见海，心荡神邈，连呼“有诗”，卧滩上，得诗四首，遂返。王吉乃自陈其父抗日八年战于华北，门生故吏遍焉，愿亲往，必谐。小铭大喜。王吉遂治装行，北入五台山中，访千年古刹；南临黄河渡口，观万丈飞瀑；抚太行之崖而兴叹，掬汾河之水以濯足；归而核销差旅费。小铭见王吉行乘火车软卧，以为靡费逾规，不准核。王吉大怒，恶言诟骂之。小铭亦怒，摔王吉领，挥拳欲殴。众相解之。而煤炭事遂寝。

于是甄大头遍索家中旧物，果得经理名片一张。乃告假三日，往东北会经理。一经商洽，两造皆宜，欣然而返。然欲觅买家，则茫然不知所在。贸然往企事业单位用煤单位售之，无不见拒。尝于某单位见有业务通讯簿一册，窃怀之而去。每日出车后，无心载客，乃择一公用电话亭，按通讯簿中所记之电话号码，一一询之。仍不得售，而长途电话费颇昂，妻嘖有烦言。大头不悔。

一日，致电河北某地燃料公司，自称东北燃料公司业务员。接者林处长，详询所售煤炭种类、等级、价格等，大头皆能应声而答。林处长遂订煤数千吨，嘱来公司与赵科长签合同。大头大喜，驱车百余公里而至。赵科长迎之，色悦貌和，执礼恭敬。大头窃怪之。签合同毕，赵科长乃问：“你与林处长什么关系呀？”大头遽悟，答曰：“他是我父亲的老战友。”

既售，大头获金二十余万元，款额之巨，乃平生之所未尝想见者也。夙夜不能寐。昧旦即起，取现金十万内囊中，又往河北，欲谒林处长，思有以报之。及晤，林处长仪态峻严，不与语，挥之使去。

大头佯去，而候于公司楼外。迨下班，觑林处长步出楼门，取自行



车，骑行而去。大头遂驾车尾于后，踵至其家，暗记于心。

是夜，舍于当地招待所。

翌日，大头携囊而往，正衣冠，扣扉。林处长启门，见大头，大惊，继而怒，问曰：“你怎么知道我家？”大头曰：“您公司的人告诉我的。”又问：“谁告诉你的？”曰：“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林处长曰：“你想干什么？”大头曰：“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您的大力支持，我们由衷感谢。我特地从东北赶来，只是想来拜访一下，没有别的意思。”处长曰：“都是公家的工作，没什么可感谢的。”而色稍稍缓。于是延大头入室。大头坐与语，处长默然，时时视钟表。大头遂以囊置几上，揖辞。处长指囊喝问：“这是什么？”大头曰：“没什么，一点点意思。”处长大怒，曰：“拿走！拿走！”推让再四，终不受，出大头于门外。

大头仍宿招待所。隔夜空其手而访之。林处长但观电视节目，视大头如无物。大头有忍力，颇不自外，见电视中播足球赛，乃侃侃而谈，珍闻趣事，随口而出，处长为之解颐。

自此夜夜临之，竟如家人然。善伺其机，揣其意，言必中听，动静得宜。林处长戒心稍懈，渐与之语。大头固长于言辞者，凡市井民情，述来庄谐并有；海内秘事，靡不耸动听闻。海者，中南海也。处长为之入迷。

某夜，言谈及于儿孙。林处长乃徐徐谓曰：“我的孙子现在迷上了集邮。”大头默然不对，而心中大喜。

明日，至邮局，以十万元悉购珍藏邮票。夜，以报纸覆邮票，卷为筒状，持手中，访林处长家。略谓：“正好出一版新邮票，拿几张给小孩子玩儿。”又告处长：将赴北京出差，即辞行。言罢，遽去。处长送至门限以外。

归，单位以其无故旷工等，重罚之。甄大头遂办“停薪留职”，慷慨以去。

后数年，深结河北林处长，售煤炭无以数计。又自立公司，贩钢



材、盘条，走私汽车等，掘金藏宝，私家之富过于昌平张志一。

马小铭闻之，往谒大头，凡三顾，始见。小铭入，大头偃卧。小铭一望而惊曰：“大头！汝何肥硕若是之甚也！”大头不答。小铭又曰：“语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其此之谓欤？”大头犹闭目若眠。小铭曰：“囊者，汝不过为我御车而已。不数年，我商海沉舟而重搦笔管，蹇穷有逾于昔，而君暴富，何也？”大头遂起，箕踞沙发上，从容谓曰：“夫穷经籍，知礼仪，察究天下大势，洞悉四海风云，捉笔千言，焕然成章，吾孰与子？”小铭曰：“不如我。”大头又曰：“生于深宫之内，上可以见公卿，下与贵胄相交结，呼风唤雨，草偃风从，吾孰若王吉？”小铭曰：“不若吉。”大头曰：“诸君娇子也！而我与昌平农民张志一者流，皆如弃子。娇子非不爱财，指握在咫尺之内，吐纳于唇齿之间，取之可也。若夫流汗浹衣、劳筋乏骨、胁肩谄笑、舐痈吮痔，矻矻以攫金者，非我辈而谁与？适逢天下鼎革之际，时势改易，吾属乘风而起，此所以能富于诸君者也！”小铭默然良久，起谢大头。

又二十余年，甄大头由盛而衰。尝涉房地产业，以与人争地，遭陷，身系囹圄，资财罚没殆尽。出狱后，加盟滴滴专车，复为司机。马小铭屡易职，历报社凡四家，得评“主任编辑”职称，以待退休。王吉逍遥如故，与诸贵公子深相结纳，恃权敛金，腾挪有术，竟大富。

曾国良与康朵朵

曾国良，辽宁铁岭人也。初中毕业，返乡务农，娶邻村陈云花为妇。好读书，声光化电无不涉猎。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某重点大学。

国良为人持重自矜，喜怒不形于颜色。学业考绩，必欲出人之右。每夜熄灯后，辄蹇至楼梯处，借顶灯苦读，久之，目眦糜烂。喜与人谈心，述农家艰难，常至流涕。人以为诚，亦倾肺腑以报之，其言脱有讽世之论、谤议之辞，则国良必阴以泄于校、系领导前，自谓为“汇报思



想动态”。领导由是重之，任为班长。

同窗女生康朵朵，生于北京干部家庭，姿色中等，清词都雅，而不甚笃学。每临试，捉管对卷，焦苦甚至。屡请益于班上好学之子，或倨傲难近，或虚与委蛇，皆匪其所望。唯曾国良待之恂恂如，为详解肯綮，并授以应试之法。再试，果有所验。朵朵大悦之。国良贫窶，每饭但啖白馍以果腹。朵朵觐之，遂常购菜肴双份，以其一予国良，且曰：“肚子小吃不了，帮个忙好吗？”国良察其用心，深自感喟。朵朵又以《英汉大辞典》赠之，其书厚重，价颇昂，国良峻拒不受。朵朵知其内卑而外亢，故激之曰：“田中角荣学英语，辞典背一页撕一页，以示必须牢记不忘。你敢吗？”国良曰：“当然敢。”朵朵曰：“那么我们就用这本辞典实践一下。你背下一页，撕掉给我，我再背。”国良诺之，遂持其书，二三日即默记一页，裁之以传朵朵。朵朵既受，辄转而弃于女厕之内。

久之，国良生情。朵朵揣知其意，佯为不解，而稍稍疏之。国良情益切，寤寐难安，日夜思之。朵朵固非向学之人，无国良提点，则疑难如故，亦不能举一反三。于是国良每于试前，辄周旋于任课老师间，谀辞甘语，似涌自肺腑，问惑说疑，实欲探究底。师悦，且素善国良，遂旁出侧入，婉转为指画畛域。国良既得之，乃穷搜资料，为朵朵一一押题，并详备解法。朵朵考绩由是愈佳，大喜。

一夕，同游于圆明园内。国良临池水，折柳枝，以赠朵朵，曰：“柳者，留也。但愿我能永远留住你！”朵朵伪作痴态，曰：“你不相信友谊吗？友谊是地久天长的。”国良曰：“我指的不是友谊。”朵朵故问：“那是指什么？”国良持其手，曰：“我是指爱情！”朵朵闻之色动，缓缓脱其握，背而面水，似有所思。国良又抚其肩，问曰：“你能接受我的爱吗？”朵朵曰：“你是一个好人。”国良曰：“So？”朵朵曰：“真的！你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国良心骤冷，颤声问：“你是说？”朵朵曰：“原谅我，我妈妈说过，不能和有家庭的人好。”国良诳曰：“我们感情



已经破裂了。”朵朵曰：“对不起！”言訖，移步缓行，沿途攀花投石，谈笑自若。国良随而趋之，心如割。

翌日，国良遇朵朵，趑趄不安，而朵朵若无其事，待如初。

自是，国良谋与妻绝。妻寄书，皆不答。父母来信责之，国良回书辄数妻之恶，如对仇讎，且以之示朵朵。朵朵且阅且叹，并无一语。国良又书条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赠朵朵，慷慨陈辞，畅言大志，述自古英雄不问出处之理。朵朵颇敏悟，知国良自卑，以为所以遭拒者，由身为农家子也。于是延国良至其家，与家人共饭。国良视其屋为高楼四居室，气、暖俱有，抽水马桶、电冰箱、电视、录放音机等，奇器巧具，靡不鲜见。其父母姿态蔼然，待之如家人。乃大喜。

朵朵性喜交际，爱跳舞。某夜有舞会举于大教室内，朵朵散长发、着翠裙、足履高跟，翩翩而舞，艳惊全场。国良适自大教室外过，闻乐声激飏，不觉心动，遂入。朵朵方与一男生跳探戈，舞姿妙曼，婀娜生媚，国良睹之，心醉神迷。一曲才歇，众男围簇，把其臂、扶其肩，争邀之。朵朵欣然有喜色，酬应自如，又入舞池中。国良大妒，忿而欲去，又不忍，踟蹰彷徨。有顷，国良为朵朵所觑见，遂邀共舞。国良拒之。而朵朵未察其情，复与他人舞。国良益悲。不移时，灯熄，于窗台上燃烛数支以照明，室内浑然幽昧。舞者男女成双，挽颈环腰，轻歌曼舞，乃时人所谓之“黑灯舞”“贴面舞”者也。国良大惊，视朵朵亦拥一男，细审之，乃学生食堂售饭菜之“小白脸”也。朵朵与彼环抱甚紧，莲步轻移，腰臀缓摆，耳鬓相厮磨。

国良呆坐一隅，若泥佛然。迨散，夜中更深矣。乃踽踽独出，满腹心事。朵朵自后瞥见，大呼奔来，余兴犹未尽，遂挽其手，问曰：“怎么没看见你跳？”国良不语。朵朵曰：“不会跳？我可以教你嘛！”国良又不语。朵朵情致方浓，聒噪言笑，叙舞场趣事。国良终不发一语。朵朵遽悟，知其不悻也。是时，二人适步至本班教室前，朵朵牵其手，排闥而入。既入，国良突发雷霆之怒，吼声震屋瓦，欲倾尽天下怨毒之词



以责之，而所发之语，唯“你知道我多爱你吗？你知道我多爱你吗？你知道我多爱你吗？”声未息，朵朵掬其颐，以喙塞其口，吻之。国良遽抱朵朵置书桌上，又移他桌并为床，遂相缱绻。

自是，国良爱弥深，求欢无已。朵朵偶或予之，而时常相拒。国良问故。朵朵但以“你有家庭”答之。国良意颇沮。

冬，毕业实习，国良如沈阳，朵朵在上海。某日，国良伺人莫之知，潜回铁岭家。邀妻至村后山中，与论议离婚。妻坚不允。国良出所怀尼龙绳，勒妻颈，绞杀之，弃尸林间。旋又潜回沈阳。

按例：国良家乡当此季也，大雪将封山，人弗能至。故国良计之，妻尸将匿至明年雪融后。詎料是冬暖，雪未大降。不数日，妻尸即为巡山人所发见。

又，国良九日自沈阳返家，十日杀妻。临行，自沈阳寄妻一信，话家常而已，而故书“十日写于沈阳”，欲证妻死日已在沈阳也。警方获之，见信封邮戳为九日，早于信中所属日期一日，由是生疑。未久，侦得其实，遂捕国良。后以“故意杀人罪”，处国良死刑。

同窗闻之，莫不诤嗟慨叹。康朵朵亦殊未料及于此。人咸知朵朵与国良过从甚密，而未有得其隐情者也。朵朵遂缄其口，不泄一语。

数月后，朵朵步于校园林间小径，瞥见树下有物，近视之，乃《英汉大辞典》也。掇置掌上而抚之，硬壳封皮如故，而其中册页则仅余编末十数张而已。忽忆国良尝谓之曰：大辞典默记殆尽，腹中词汇量庶几可比英美土人耳！

“窑洞”博士

汪耀中，西城百万庄人。幼捷敏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性贪顽，耽于嬉戏。同伴中有拥“小人书”数十百本者，恒夸耀于人；人或欲借之，辄簇其左右以取媚。耀中家贫，不能购书，又耻于谄媚，怅然不乐。于



是与兄谋，欲自画小人书。取托尔斯泰《复活》，兄析为章节文字，耀中按文意图画。一画而兴味弥深，饮食俱废，昼夜不停笔，至头眩目迷，昏然仆地。书成，欲验其效，遂自友处借小人书数册，以自画之《复活》杂其中，退还。翌日，友持《复活》来，问购自何处？答新华书店，且问：“书如何？”友曰：“好是好，怎么有错别字呀？”耀中大喜，跳跟呼笑，奔走告兄。

又溺于弄笛。业课间，神游于外，口中“T、K，T、K”啾啾无已，故习吐气之术也。老师闻其声而不知其所由来，斥问之。耀中殊不觉，TK声愈高。满室皆旋颈视之，哄然而笑。师前牵其耳，猝之出，犹懵然不知何故也。有名笛师于百万庄居焉，与耀中家相去弗远，每向晚，辄至笛师家楼外窗下，聆其吹名曲《脚踏水车唱丰收》，如痴如醉，至夜方归。后且默背其曲调，归则以简谱记之。曲长，不能一夕而得，辄与兄区分段落，一段既谙，掣足奔归，捉笔记谱，而兄又继之，如此十数夕方竟。有好事者识笛师，欲为其引介。耀中曰：“技法卑下，不敢见。待稍稍入门，请一窥堂奥可矣。”自是习之益勤，与兄搜罗废品鬻之，并绝一切零用，渐积钱三元余，计之：刚可购红竹笛一支及一人往返车票。遂独携钱，之王府井宏声乐器行。时民风淳朴，老售货员又自“旧社会”来，恭谨敬业成习，见耀中幼而欲市之笛价昂，恐其糜费，先命其奏一阙以验之。耀中从之，吹《脚踏水车》，笛声甫出，店中人俱惊，驻足屏息，观者如堵。夫握笛之法，为左手置前而右手在后，而耀中以无师自通，左右恰相颠倒。奏罢，众皆喝彩，老售货员亦颌之，谓曰：“《脚踏水车》难度很大，吹得不错。”又问：“跟谁学的？”曰：“自学。”老者叹曰：“你这个手一错啊，就永远也改不过来了。就这么吹吧。”于是为其精选红竹笛一支，并赠以笛膜。

又半年，自度学有所进，乃诣笛师家，欲谒之。而笛师已迁居，彼好事者亦不知所往矣。

一九六七年，初中毕业。六九年，之延安插队。乡言“劳动”曰“受



苦”，耀中日日受苦，夜则挑油灯，与同炕之许小年读书弈棋。七四年，二人俱为“贫下中农”所荐，入大学，是所谓“工农兵学员”者也。

耀中在武汉。以其通音律、识五线谱，任为校乐队指挥。其乐队编制为：小提琴五、大提琴二、二胡三、唢呐一、小号二、圆号一、长号一、大号一、单簧管一、手风琴二并打击乐器。七六年初，周恩来薨。校园播哀乐。耀中鹄立于扩音器下，才一遍，已能记谱。趋至图书馆，自画五线谱并录之，又据本乐队编制以写配器。自是，乐队演练恒奏哀乐。队员以哀乐谱简调缓，易于吹奏，且配器得当，皆乐此不疲。

乐队排练厅在三楼，左右为家属宿舍。每曛暮，“受苦”人甫归家，哀乐顿起。餐则伴之，饮则佐之，绕梁徘徊，不绝如缕。聆之既久，人皆欲狂。某日，值合奏高潮处，忽有壮汉破门入，眦目詈骂曰：“你妈死啦？天天哭丧！”队员尽失色。吹大号者乃后勤处锅炉工，身長六尺，气壮如牛，吹奏方酣，横遭扰攘，大怒，肩壮汉至阳台，欲掷楼下。耀中扑抱其腰，呼曰：“若汝掷，将为其奏哀乐乎？”乃罢。

七七年，恢复“高考”，废“推荐”制。七八年，耀中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小年考入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研究生班。二人皆返京。

在班上，耀中最幼，同窗率皆“文革前”大学生，年三十以上，且多有妻子，以能再学于科学殿堂为大幸，故日未曦即起，中夜以冷水浇头，孜孜矻矻，以求精进。而耀中睡至九时方醒，卧床捧教科书，一览而过，读半小时，则一周课程悉明，毋需听讲。尤喜考试，每试，半小时内必交卷，各科成绩皆为第一。同窗大妒。某次临考，三五人忽幽耀中于寝室，谓之曰：“你不要去考试了，让我们拿一回好成绩。”耀中问：“为什么？”曰：“我们都是自单位来，毕业回单位，领导同事期望甚殷，成绩不好，无颜见人。”耀中不能辨所言真伪，然悯其情，果不赴考。后导师知之，怫然不悦，斥其妄。

耀中既不上课，每日至图书馆，窃读《和声学》，写交响乐。以不欲人知，常将教科书遮之。又习钢琴，弹自作曲，倚琴而歌，陶然欲醉。



迨结业终考，仍拔头筹。

毕业后，在科学院学术刊物为编辑。尝审一来稿，立论多纰漏，乃悉心为之删改。改毕，奉老编辑阅，老编辑乃从容谓曰：“他本来不是个东西，你给他一改，倒成个东西了。”言讫，掷文稿于纸篓内。耀中讶之，乃悟人心叵测。

后以不耐机关繁剧，复考博士生。三年，得博士学位。

先是，耀中中学时与李帜同校而低帜二届。帜家百万庄申区。申区皆为二层“花园洋楼”，乃高级干部聚居区。文革初，耀中尝往访帜，值帜女友白嘉林在焉。嘉林容光艳绝，见耀中，凝睇一笑。耀中心移神摇，忽忽若有所失。归则茶饭不思，结想成愁。知嘉林亦居申区，而不知确址，遂往侦候。月余，遇嘉林于道上。嘉林邀至家。耀中见嘉林读《复活》，乃自炫耀能倒背如流，请嘉林任择一章，读一句，则己皆能接续默诵之。嘉林试之，果然，遂异其人。又问：“李帜说你是数学天才，懂微积分吗？”耀中曰：“懂。”嘉林请曰：“那你教我吧。”时耀中才初二，未学微积分，实不明所以，遂谓曰：“学那个干嘛？”嘉林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每天演算微积分，他说是智力游戏。”乃以大学微积分教科书予耀中，强邀之。耀中匆匆一览，已会其意，遂授之。嘉林大喜，欲拜为师。耀中求之不得，诺之。临别，忽执嘉林手曰：“我爱你！”嘉林骤然色变，以为辱己，呵斥出门。

翌日，李帜率二三子至耀中家，痛殴之，断其肋。耀中卧不能动。

及伤初瘥，力疾起身，径至嘉林家。入其门，则其屋已易主，楼上下别居为四户，而白家人杳然矣。耀中大惊，亟往寻李帜，询以故。帜略谓：嘉林父忽遭逮捕，系狱秦城。母知其深为最高层所忌，必欲陷之，而已亦将不免，遂投八一湖而死。嘉林大愤，闯中南海投书毛主席，为父母辩，亦遭拘押，下落不明。一夕竟家破人亡。帜言讫，二人相拥而泣。

后耀中之延安，李帜之莫力达瓦，遂相失。嘉林则渺不知其所在矣。



耀中博士冠后，随团访美。在曼哈顿一书店内立而观书，一妇人过其侧，凝眸良久，去而复返，赧颜问曰：“君其汪姓耶？”耀中视之，嘉林也，大喜。计去授微积分之日，倏然二十余年矣。嘉林虽近中年，容貌如昔，睛眸流盼，尤婉丽清辉。于是嘈嘈问别后事。

嘉林引耀中至咖啡馆，从容与谈。其谓曰：中南海西门投书被拘，押于拘留所数月，又转至“学习班”囚之。后插队云南。七七年返京。父释，旋平反，官至省委书记。于是宾客阗门，趋附者议为觅新妇。嘉林兄妹念母之亡也，亡于代父受过，咸不欲父再婚。然父竟娶。嘉林大失所望，遂去家不归。居无何，嫁港商，移居香港，后又之美国。育一女，离婚。嘉林又问耀中，耀中一一为言之。嘉林讶其独身至今。耀中曰：“非欲独身，实曾未一遇似卿者也！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其此之谓欤？”嘉林慨然叹息。

天向晚，二人言犹不尽。嘉林遂邀耀中至家，为其烹鱼调羹汤。把酒对红烛，快意话平生。是夜，耀中遂宿于家中。

访问团忽失耀中，遍寻不见，亟通报大使馆及北京。后数日转访波士顿，更无踪迹。迨回国，乃将耀中定为“脱队叛逃”，除籍。而耀中嘉林已至纽约市政厅，以牧师证婚，结百年好合。

当是时也，昔在延安同“受苦”之许小年，已留美近十年，获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归国，成名教授。

野史翁曰：一窑洞出二博士，虽才别文理，际遇各殊，今人视之，都成佳话。

老革命孙廷一

孙廷一，行政九级，颇贵，然任职闲散，无权。同级别而得宠幸者或已官至副部长、副省长。廷一怡然自处，读书吟诗为乐。有三子一女，皆颖悟过人，喜谤议，词锋锐利；待廷一无长幼之礼，常诘辩至终



宵。某夜，三子曦东谓其父曰：“毛主席说过：有饱狗，有饿狗，有不饱不饿的狗。你就是共产党里不饱不饿的狗。”廷一笑曰：“那你们就是不饱不饿的狗崽子。”

文革起，造反派来抄家。长子曦明、二子曦晨皆为中学红卫兵，置皮带于案上，汹汹谓造反派曰：“你们敢动老头一根毫毛，绝没有好下场！”造反派摄其势，果未敢凌犯廷一，止搜其资料笔记以去。及查，曦明曦晨汗衫尽湿。

一日，廷一自外归，跛其足，自谓为自行车所撞，半身麻痹，医者诊为中风，嘱家人购杖。自是，凡出户，必拄杖以行，趑趄似地不平者也。造反派呼其为“残废”，常戏辱之，然逢批斗会，辄允其坐椅上，而他挨斗者则皆“坐喷气式”，撅臂折腰、头几抵于地，惨苦甚至。后下湖北农村“五七干校”改造，亦以病残，轻其劳役，命与妇孺杂坐簸粟剥豆。廷一爱诙谐，时发噱语，引妇孺解颐。未久，即调回北京。

文革既终，中央始重廷一，任以实职，食有鱼而出有车矣。一日，拄杖谒薄一波。廷一旧尝为一波下属，故相稔熟，欢谈洽契，胸臆顿开。迨作别，廷一欣欣然忘携其杖，独健步出，疾行至车前。司机见而笑，故问曰：“您的手杖呢？”廷一怔，继尔亦笑，复返身取杖，行如飞。自是弃杖不用矣。

老干部詹富光

詹富光，山东寿光人。家贫甚，走投无路，参加党。抗战中，转战胶东、淮海等地，为行署科长、副局长。日本降，内战起，迁调华北，为大军供军需，不辞劳劬，有功。建国后，入北京，任为副局长。

富光不学，在胶东“整风”时始扫盲，以后渐能通文字。某次，于文件上批云“关部长门”。秘书阅之，亟至部长办公室，阖其门。后数日，部长未见文件，迟误要机，怒，招富光斥骂之。富光归，又骂秘



书。秘书以其批示富光，富光益愤，曰：“这不是写得很清楚嘛！为什么不送？”盖富光欲批“送部长阅”，而“送”字缺“走”、“阅”字无“兑”也。一时传为笑谈。

富光身形长大，气貌甚伟，常著皂呢中山装、冠呢解放帽、踏牛皮鞋，行履庄严，橐橐有声。喜游走各地，“调查研究”。某次部务会议，筹发展贫困地区经济之策，富光乃上言曰：“我最近到贵州考察了一下。贵州是个好地方，山多，可以发展畜牧业，可以养驴嘛！我们古人很重视这个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黔之驴》。黔，就是贵州嘛。”言未已，部长以指叩案，止之曰：“富光，你知道《黔之驴》第一句是什么吗？‘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你就是那个好事者！”富光茫然不知部长所谓，然观其色，知愠，乃止。

后部长易人。新部长亦出自山东根据地，素善富光，因擢为局长、副部长。

初，办公厅打字员邹芬有姿色，善狐媚，常借故之富光办公室，娇声浪语，盘桓不去。富光悦而私之。及任副部长，益相爱昵，调芬为科长，未久，又迁为副处长。人皆窃议之，然止于捕风捉影，殊无实据。某日，富光例于午后之养蜂夹道游泳，定四时半司机来接。司机小贾为人莽愣，至富光办公室稍早，竟不叩扉，排闥直入。豁然见富光仰坐沙发上，分足抵茶几，邹芬跪其下，首蓬蓬然乱摇，如老鸡啄米，殷勤为吹箫。小贾大惊，疾退，已为富光所瞥见。阖户出，惶恐不知所为。思秘书小庞多智，且与己善，遂致电小庞求救。

小庞闻而叹曰：“糟糕啊糟糕！”沉吟良久，为策一计。

小贾依计，返家匿不出。至夜八时许，致电富光，曰：“詹部长，我该死！我犯了大错误！我呀，今天上午开车到昌平办私事去了，结果发动机坏，卧在昌平动不了了，现在刚回城里。我公车私用，是错一；耽误您的事情，错二；辜负您平时的教育培养，错三。错误实在太严重，后悔莫及，请求您严厉处分我！”其言甚哀，哽噎不成句。富光



踌躇斯须，旋大骂其滥用公车，并责其自偿修车费。小贾唯唯，再三谢罪。富光止之。

翌日，富光见小贾，若无其事，待之如初。小贾如释重负，乃厚酬小庞再造之恩。小庞有文才，名其事为“詹部长白昼宣淫”，私语于二三好友，为佐酒谈资。

居顷，富光以年高，“离休”致仕。而邹芬已官至副局长矣。

富光既退，犹不甘寂寞。尝命老干部局致电某省委，曰欲与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某公游该省。某公贵甚，省委闻之，特重其事。常例：凡政治局常委出行，概由中央办公厅属理。今某公由富光代庖，似于常例不合。恰该省省长在京开会，乃致电“中办”，问曰：“首长近日欲动乎？”答：“无。”该省愈疑之，再询于富光。富光曰：“某公对我说的。”遂信之。至期，省会道路管控，省委领导咸集于机场迎候。飞机落，富光携夫人翩然而下，一一握领导手寒暄。问富光：“某公何在？”富光曰：“病了，不来了。”省委大悲，诉于国务院办公厅，以富光为欺诳。或质于富光，富光坚称某公有约于己。欲对证，则事固微末，且系私言，殊不便核于某公本人；而富光“老红军”也，又已离休，难纠以纪；遂不了了之。

年八十一，于北京饭店外事宴会上，忽一垂首，脑卒中而亡。人咸谓富光无疾而逝，寿终正寝，福由天赐也。

狂疾

战菲菲，京东通州人。家族有精神病史，其祖、父、外祖父母、母、舅，逾四十岁后皆发狂疾。

菲菲幼聪巧，能女红，尤善编结。初中习化学课，对分子式一望而解其意，老师奇之，谓有天才，勉其勤力进学，将来成化学家。然菲菲爱文艺，殊不以师言为意，常漏夜读三毛，为之歔歔流涕，不能自己，



学业遂废。

及长，大姊言语失常，行多荒悖，疯兆渐露。菲菲始惧，知己亦将不免，惆怅无计。问闺蜜李丽曰：“人生奚为，俾无憾耶？”李固不知其所以问，率尔答曰：“无非声色犬马，及时行乐耳！”菲菲然之。于是盛其妆容，烂漫衣裳，或挽手袋步于闹市，骋目流眄，恣其所欲；或从群友游于郊野，纵酒浩歌，竟夜不归。尝与一壮汉“对吹”二锅头一瓶，大醉，披发裸身行道上，为“城管”所收容。李丽性怪，素贪食，视菲菲憨直，乃盛言京城名菜佳肴之美，日荐一店，诱相携往，饱啖之。又以母病、遭窃、失手表等为辞，屡向菲菲泣诉，菲菲辄慷慨赠其钱物。尝言：“乐人之乐，不亦乐乎？”

尤喜男女欢好，遇相狎者，多不拒。久之，人皆谓菲菲有“性瘾”，欲壑难填，可为千夫所淫，名大噪。菲菲貌固中人，然京城内才名之士闻其易取，翕然如蚁之嗜甜、蝇之逐臭，纷纷来聚。菲菲颇自喜，以为人之善己也，有大爱存乎天地之间，故每以赤心相见，倾肺腑以待之。有歌者田耳，为人短肥，发蓬蓬然，体臭恶有异味，亦奔来晤菲菲。菲菲接以礼。田耳啜茶才二三口，掷杯于地，强解菲菲裙裾求欢。菲菲拒之。田裂其衣衫。菲菲以巾掩其胸及鼻，呼曰：“汝何腥臊若是之甚耶！”田耳大怒，痛殴菲菲，破碎其家而去。李丽闻知，甚相怜惜，劝曰：“交友太滥，是祸而非福也，可不慎哉！”菲菲默良久，喟然曰：“世上还是好人多。”待人如故。

年届三十，忽然大悟，以为人生一世如白驹之过隙，转瞬即逝，浑浑噩噩，与蝼蚁何以异？必立非常之志，任不朽之事，传诸久远，俾形虽灭而神犹存也。于是绝交游、断妄念，自囚室中，发愤著书。日夜相继，两股久坐成茧。历三年，书成，传诸二三好友，阅者为之动容。又欲度曲，以简谱记之，呈某作曲家求教。作曲家曰：“学作曲，要先学五线谱。”菲菲曰：“聂耳也不会五线谱，但写了《义勇军进行曲》。”志愈坚，日日拨弦苦吟，十指俱烂。某酒吧老板聆之，击节赞赏，遂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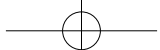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驻场演唱，厚其酬金。菲菲曰：“光阴迫促，将倾力作曲，无暇它顾。”辞不就。

时中学化学老师已下海，建化妆品厂，巨富。某日同学聚会，老师来，遇战菲菲。见菲菲形容憔悴、连遭潦倒，甚悯之，乃邀入厂。菲菲曰：“我现在做的，是有永恒价值的事。”老师劝曰：“你有化学方面的天才，在我这里可以发挥所长。”菲菲曰：“我不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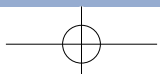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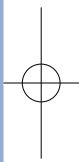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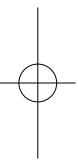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此后数年，仍度曲不辍，间有诗文出。断荤远室，自苦其身，人皆不得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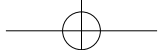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某日，会画家左大宁。菲菲与大宁故为旧识，向以兄事之。大宁为人朴拙，亦时时相翼护。菲菲乃从容谓之曰：“大宁，我想和你生个孩子。”大宁大惊，鄂然不知所由。菲菲告曰：“我家人到四十岁都会疯，我三十七了，还有三年时间，想趁现在留下一个后代。”大宁蹑蹑流汗，曰：“我是独身主义啊。你写的书，我尽力帮你出版；作的歌儿，我找歌手和乐队录成唱片，让它们流传下来。”菲菲闻之，凄然而笑，曰：“我自己知道，那些东西没有价值。”大宁酸嘶泪下，无以对。

后三年，菲菲果发狂，入精神病院中。所著诗书曲律，飘零不知所



艺术







艺术与集体记忆

闽丽柯(Ulrike Münter), 艺术批评家

苏伟, 德语文学博士, 艺术批评家

艺术家邱黯雄创作的动画电影以急速的方式将观众带回到文明伊始,一幕幕历史烟云接踵而至:了无人烟的自然里出现了耕作的人群,金戈铁马下一座座皇宫拔地而起,蜿蜒的万里长城在笔墨泼洒中穿越诗意的大地。紧接着,开采石油的油泵侵入地表,幻化为一个个动物形象;我们的目光进而被引向毛泽东时代,最终定格在奥运鸟巢里喧嚣的人群上。装置作品《为了忘却的记忆》则动用了一节火车车厢(1956年造),车窗上放映着邱黯雄自己制作的回顾中国历史事件的电影:通过这种方式,他将集体性记忆与集体性遗忘对立起来。本篇文章中,艺术批评家闽丽柯(Ulrike Münter)和苏伟对话艺术家邱黯雄,就其艺术立场和对人类文明颇为批判的姿态展开了讨论。

邱黯雄1972年生于成都,现执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在德语文化圈内,邱黯雄因其2008年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展示的装置项目《为了忘却的记忆》而知名。因四川美术学院和卡塞尔艺术学院的合作关系,让邱黯雄有机会来到德国,于1997年至2003年期间在德国学习。

“我在德国感觉很好”,邱黯雄这样总结到,“情感上德语对我来说仍然很亲切。正是因为离开了中国,我才开始重新思考搞艺术的动机是什么。一方面,与西方艺术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让我很激动,因为以前在中国只能看到复制品,现在则有机会看到原作。比如说杜尚,他那种知性的尖锐让我惊奇;而说到博伊斯,我非常敬佩他的意志力和理想主



义。在德国的时候，我也开始读一些中国的经典文学，就是为了搞清楚，‘中国’这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到底有何涵义。这种反思把我带回到了中国历史当中。”

尼莫西涅(记忆女神 Mnemosyne): 是否存在全球性的图像记忆?

关于艺术如何作为一种跨越时代的记忆载体发生作用，犹太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 1866-1929)的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他生前未完成的著作《尼莫西涅图集》，旨在通过图像直接展现古希腊罗马艺术在欧洲艺术与文化中如何继续生存着。从古代人的文献到18世纪的古典主义文人，如康德、歌德、席勒和温克尔曼等人，再到瓦尔堡的《尼莫西涅图集》，西方文化中令人铭记的都是勾勒身体的线条。

在西方思想中，线条是所有艺术形式的初始；而在中国思想中，这个位置则为水墨笔意占据。有关图像的概念，在中西方差别甚大，全球性的图像记忆是否存在则成为问题。抑或是中西方交流的全面性超越了各种制约，已经消除了这种文化差异？艺术家邱黯雄用他的电影从传统和当下中提炼综合，从美学上、某种程度也从构图上借助于传统中国山水画，对这一命题进行探讨。另外，他用丙烯色取代水墨做颜料，并用



水墨动画《山河梦影—三峡》(2009)，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电脑技术赋予图像崭新的活力。

谈到自己的创作时，邱黯雄说：“中国的传统水墨山水对我来说意味非常，在电影里可以看到它对我创作的影响。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过去要与当下共同发生作用。因此，相对应的，我用传统水墨的方式画过一些城市主题画。传统文化中深藏的智慧给予我灵感，是某种创新的源泉，过去成为了当下的开路者。”

《雁南飞》(2006年): 乌托邦的反面

经典的中式风景，野雁南飞，寻找温暖的寄居。一只野雁跌落在大地上。接着，笼中的一只鸽子死去。书籍，折翼般从书架上飞落，火光四起……影片末尾，书籍又飞回到原来所在之处。最后的画面中，恬静的大地上寂静无人，万物息声。在动画电影《雁南飞》中，场景和画面仍以水墨为主；在背景音乐的处理上，邱黯雄加入了微弱的钢琴音乐，我们还可以从背景音中断断续续、但明白无误地听到希特勒煽动人心的演讲声音和人群的呼喊声。图像流淌着，强烈地抓住你，让你为艺术家的绘画功力折服。从直觉上你会感到，影片中所看到的并非偶然发生。它让你惊惧不已。影片中发生的，有些是野蛮的暴行，有些符号暗示的涵义则不能确定。为什么那个穿防辐射服的男子两次出现？他是否象征了威胁人类生存的时代精神？影片的背景音向我们强调着，艺术家要处理的并非单纯的中国现象。

邱黯雄认为：“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似乎觉得正处在‘文明的巅峰’。真的是这样吗，我问自己。恐怕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文明观盲目地迈向未来，那就会走向堕落，走向‘乌托邦的反面’。在《雁南飞》中，我用书籍的象征表现了这种文明观的两面性。这里不是要说具体的哪本书，而是指知识本身，以及那种进步思想的阴暗面。当知识落入了错误的手中，抑或是将自身独立之后，会发生什么？影片中火的场景正



新山海经 I 的画面截图 (2006), 图片由慕尼黑 Barbara Gross 画廊提供

是代表了文明身上那种破坏性的成分。”

“电影里要处理的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更多地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所以我和音响师决定把希特勒的演讲声音断续、失真地插入到电影中去。这种煽动人心的讲演在世界各地都有，而我们每个人内心中都埋藏着这种声音。”

“类似的演讲总是以乌托邦的名义对未来世界进行着某种想象。我不相信这类集体主义式的观念、不相信线性发展观，所以我会去从像《山海经》这样的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中寻找答案。这本书让我学会从另一种视角、一种神话学的视角观看这个世界。我关注的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

《为了忘却的记忆》(2008年): 集体性遗忘

邱黯雄曾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展示过大型装置项目《为了忘却的记忆》。他动用了一节火车车厢(1956年造)，从内部的一些车窗上可以看到他创作的反映中国从辛亥革命到“文革”结束期间历史事件的影片，观众的记忆由此被唤醒。还有一些车窗上可以看到皮影动画，展示了一些邱黯雄童年记忆中的一些日常生活场景和电视剧片段。

邱黯雄说：“在《忘却的记忆》里，我重述了中国人在过去一百年中



所经历的历史。历史中，那些形形色色的政治符号设定的目标都是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要么是追求技术进步，要么努力追赶西方，共产主义中国应该富强独立，而且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还梦想着民主的中国。乌托邦的观念一直存在，而这些幻想在我看来最终都破灭了。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很多人却失去了方向，甚至我自己也是处在寻找的状态。对于这种寻找来说，重要的是在过往的历史中认清自己。”

“《为了忘却的记忆》也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作品。这样的火车车厢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部分，那时候每个人出远门都要坐这种车，所以它是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一些进入到这个火车装置中的观众和我讲了他们的经历。他们中的有些人，因为看到车窗放映的电影而勾起了不少回忆，想到了历史曾经有那么多的苦痛，于是马上就从车厢里出来了。他们宁愿忘记，而不是回忆。但我觉得，我们要去面对这些记忆，它们影响了我们。”

“在西方世界展示这个装置的时候，我觉得西方观众也能理解作品的意图。细节上看作品里讲的是中国的历史，但作品传达的基本经验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可以勾起人们对个人历史的回忆。”



影像装置《为了忘却的记忆》现场（2008），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山河梦影》(2009年): 图像, 历史书写

圆明园的废墟、末代皇帝和其子嗣、上海的港口、战争、满目疮痍的河山、毛泽东, 熔炉中的钢铁腾飞……我们马上意识到, 这里说的是“大跃进”。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欢呼的人群、阅兵式上的军队……大幕落下, 毛主席挥手致别, 又一个时代结束。巨大的工业烟囱拔地而起, 城市的迅猛发展, 验证着中国经济的繁荣。手机和其他消费品的符号盘旋在奥运鸟巢巨大的躯体旁, 微弱的钢琴声中, 笔墨流淌着勾画出那个著名的“重庆钉子户”的小屋, 新生活开始了……

这个作品中, 邱黯雄以一种近乎冷漠的方式让历史事件在观众眼前一一掠过。我们看不到任何痛苦中挣扎的个体特写, 无人的场景占了绝大多数。邱黯雄说: “这个电影里的一些图片是我从一本叫做《良友》的生活杂志里抽选出的, 这本杂志1926年在上海创刊, 发行量很高。无论用哪种媒介、哪些图片, 我的作品的主题一直都是‘时间’。在绘画中我努力寻找‘瞬间’, 在影像里我寻找的是‘流逝的时间’。”

“什么被回忆, 什么又被忘记? 真实的时间如何内化为心理的时间? 《新山海经》(2006) 实际上涉及的是现代文明现象, 不过我是从更



水墨动画《山河梦影-圆明园》2009, 图片由慕尼黑 Barbara Gross 画廊提供



为广泛的角度进入这个主题的，所以用了这本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作为样本。而在《山河梦影》中，我将重心更多具体地集中在中国的特殊现实上。比起早期的电影来说，我的创作视角更为宏观了。”

“我的创作方式和当今中国人的一种精神诉求有关。我们慢慢地看到，历史意识的丧失意味着身份认同的丧失。”

翻译：苏伟

2009.11



后工业化时代的大批判

牧阳

艺术家邱黯雄于2006年创作的水墨动画《新山海经》，曾在第六届“上海双年展”上引起轰动效应，作为前者的后续，《新山海经Ⅱ》正在民生现代美术馆“中国影像艺术20年(1988-2011)”大型展览上展出。影像以三个大屏幕拼贴呈现，借古谭奇书《山海经》喻古讽今，继续了艺术家对工业社会的反省和批判，展现了一曲后工业化时代的异形变奏曲。

《山海经》的现代化制作

一座静落于威武山脚下的幽静古镇，炊烟渺渺，流水淙淙，云霞飞绕，牛羊成群。《新山海经Ⅱ》以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与诗歌同行的小镇画面，作为影片的开始。随后，高楼平地起，大坝拦河，围墙圈地，诡异、克制、冷漠的音乐奏响，工业社会的冰冷机器开始向耕地文明介入侵蚀。人类焚林而猎，竭泽而渔。克隆羊被制造，并被快速复制和生产；白鼠被用来做实验，培养各类新鲜人体器官；牛被宰杀，变成催化剂代替草地对牛群的喂养，细菌蔓延，疯牛病盛行；媒体也跟着兴奋，纷纷拿起摄像机对准拍摄，带来歌颂与赞叹的声音。

“科学已经从最初谦虚的探索精神，演变为傲慢自大的不断更改和宣布我们命运的现代宗教祭司”，邱黯雄说。一座座工业城市被复制粘贴，同质到没有分别。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使人被工业垃圾包围窒息。物质消费对人的囚禁，也使人异化为丑陋贪婪的动物而不自知。荒



漠频陈，乌云密闭，这样一个荒谬、冷酷的机械复制时代，终被一场浩瀚大水淹没了。被侵蚀变形的各种生物，逃向外太空，变成一群没有方向没有归属的宇宙孤魂。“因为这故乡不再能庇护我们，我们想忘记它，让它从记忆中消失，让海的蓝色淹没土的黄色。让我们飘浮起来，去接近想象中的蓝色乌托邦。”影片在一派苍茫郁寂中结束，艺术家并没有给出希望与救赎。

邱黯雄将古代奇书《山海经》中的动物描写设置为与现实生活中的荒诞无稽相结合，隐喻科技、工业和军事的高度发达，给现实社会带来的种种危机，这种危机往往是被隐藏和漠视的，其精神实质类似于奥维尔在《动物庄园》中所呈现的现实性批判。《山海经》本是先秦古籍，许多古人对奇人异兽天真烂漫、无边无羁的想象，其形状塑造丑陋怪异，性格设置亦分忠奸善恶，能辨是非曲直，是民众对权威和力量崇拜的心理投射，多浪漫主义色彩。邱黯雄将《山海经》中的动物挪移至当代，意在借古讽今，“如果有一个《山海经》时代的古人到了今天，他会发现满大街都是看不懂的怪物。”

黑白水墨艺术的复归

除《新山海经》系列，邱黯雄用水墨创制的动画影像，还有《民国风景》《山河梦影》《空中的》与《雁南》等。在民生美术馆此次展览陈列的同一批展品中，另有几位艺术家，也用影像艺术实现了水墨创作的多种可能性。如马文的《脑海风尘》，用毛笔勾勒出一人一马在流动的黑白山水中的不断行进，再用泼墨影像，转换人物身后的各种背景，试验了水墨艺术的流动和写意能力；孙逊的《主义之外》，借用一位头戴高顶黑礼帽，身着燕尾服的魔术师，建立起个人经验与宏大叙事之间的联系，墨水塑造的石狮、飞龙、蚂蚁、蝙蝠、大象和红鲤鱼，在黑色沉郁的画面中翻腾，充满着象征和隐喻；陈绍雄的《墨水城市》，则实验了水墨在



摄影和录像剪辑之间的沟通和转移。水墨艺术，正以一种集体喷发的状态，复归于影像艺术家的创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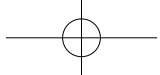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中国影像艺术的发展，至今看来仍有一条较明显的变化曲线，从八十年代末最初一批偏向观念、行为和录像，并将镜头的枯燥和机械重复作为媒体本身趣味的影像艺术；到九十年代初思考影像媒介本身便能带来的刺激和改变；再到新千年装置、行为、摄影、多媒体和录像艺术的跨界融合；直至最新近水墨动画在影像艺术中的复位和回归，大家意识到，能将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理解，合理运用，是使自己跳脱区分于国外艺术家，具有优质辨识度以及身份标签的艺术表现形式。

邱黯雄无疑是中国水墨艺术创作的佼佼者，其创制的动画亦被称为最具“中国基因”的水墨动画。在德国卡塞尔大学六年的留学背景，及此期间反复经历的身份迷失和创作怀疑，使邱黯雄意识到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和意义。邱黯雄说：“出国才是最管用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此以前我一心想做个前卫艺术家，对传统一点兴趣都没有”。回国后，邱黯雄重复阅读《山海经》，并将自己眼中的现代怪物一张张绘制出来，整合成最终的多媒体影像。邱黯雄认为新媒体的尝试比较符合自己的天性，而影像技术与古典水墨绘画的结合，并没有造成内在的冲突，反而因为两者之间的借力碰撞，激发出绝妙的讽刺意义。影像代表的当代艺术和水墨代表的传统艺术，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邱黯雄还想将《新山海经》一集一集做下去，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我们还没来得及调整眼睛的焦距，它就已经变换了样貌和距离。正因此，《新山海经》系列也有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影像装置《为了忘却的记忆》现场 1、2



344 《今天》总121期



新山海经 I 的画面截图



新山海经 II 的画面截图



新山海经 III 的画面截图



新山海经 III 的画面截图放驼风车

